



“国民作家”的立场

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董炳月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三 联 • 哈 佛 燕 京 学 术 丛 书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本书从个案入手研究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由于语言、资料的限制，中国学术界很少有学者对这些重要的个案进行细致的研究，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作者还引证了丰富的史料，书中论述的对象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许多资料是由作者第一次从日文译为中文，体现了扎实、严谨的学术态度。并且，自觉的文学史意识也使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相信此书的出版能够推动中国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促进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相互理解。

——钱理群

本书关注中国和日本在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两国的作家怎样被“国民”化，以及他们的立场怎样制约、规定了作品的内容和形态。中日作家分别以对方国家的人与事为题材书写的文本，在这部著作中获得了特殊的重视和新颖的解读。著者熟悉中日现代文学的历史状况，故能信手举出许多不经见的材料，并且从人们熟知的文本中读出新意。本书复原式地呈现了中日现代文学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有力地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王中忱



ISBN 7-108-02326-1

ISBN 7-108-02326-1　定价：19.00元　9 787108 023260 >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国民作家”的立场

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董炳月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This Academic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董炳月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2326-1

Ⅰ.国… Ⅱ.董… Ⅲ.现代文学-对比研究-中国、日本-民国 Ⅳ.①I206.6②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4270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扉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5月北京第1版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0.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19.00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引言　文学个案中的中日现代文学关系

这里所谓"中日现代文学关系"一语中的"现代"作为时间概念，大致限定在民国初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之间。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界，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被提出之后，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趋于一体化，"现代"一词因之逐渐失去有效性，但是，在中日文学关系的分期方面，这个概念却十分有效。原因主要在于日本一般将明治时代以来的文学通称为"近代文学"，很少使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而"近代文学"一词在中国的研究界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一般指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前的文学，在时间所指与文学性质等方面与日本的"近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而"现代"一词所指称的时间段——民国初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本上与日本的大正时期至昭和前期[1]这段时间相重叠。本书的研究对象，正存在于这个时间段之中。

就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而言，"一衣带水"并不仅仅是个地

---

〔1〕 大正时期为1912至1925年，昭和时期为1926至1988年。昭和前后期的分界线为1945年日本战败。

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后者是作为前者的引申物出现的，具体表现为文化形态的相似性与相关性。到了近代——具体说就是明治维新之后，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地理距离的切近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三种主要因素互相发酵，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向更为复杂的状态延伸。这种延伸体现在文学关系上，就是两国的文学发生了广泛、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呈现为交织状态。这种交织状态的密切性甚至超出了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无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所处理的范围。在19世纪末之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作家认识、描述着日本，日本作家认识、描述着中国，同时两国作家之间进行自觉的对话与交流，于是某些具有边缘性（或曰跨国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事件出现了。这些作品和事件作为文学个案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特殊历史关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涉及从个人情感、文化观念到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形态的诸多层面，在最为深刻的意义上表现出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本书探讨的文学个案为如下五个：

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十卷本长篇小说《留东外史》。这部于民国初年在东京开始创作的小说对留日、旅日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进行了批判性描写，同时在社会、政治、道德等层面上对日本人展开批判，不仅招来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留日派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批评，也引起了日本作家和学者的注意。

二、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的诞生、传播、衍生与变异。该剧本创作于1914至1917年间，1918年前后经周作人、鲁迅的介绍和翻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当年深受武者小路实笃影响的中国作家孙俍工创作了《续一个青年的梦》，而武者小路实笃本人却在30年代中期转变为战争支持者，甚至在40年代创作出赞美战争的剧本《妹妹》。

三、佐藤春夫的电影文学剧本《亚细亚之子》及其相关事件。这部作品创作于 1938 年初，故事原型是郭沫若在日本的流亡生活以及 1937 年的出逃回国，郁达夫亦出现在作品中。佐藤春夫在作品中表达了他的亚洲观、文化观以及他对于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的理解，但作品激起了郁达夫的义愤，郁达夫的檄文《日本的娼妇与文士》即因此而作。这是中日战争爆发后发生在两国作家之间的第一场激烈冲突。

四、“儒家文化中心论”论争。1940 年前后担任伪职的周作人倡导“儒家文化中心论”，并因此受到日本学者的质疑，被斥为“反动老作家”，最终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发生正面冲突。这场冲突的背景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已经论及的远为复杂。“儒家文化中心论”疏离于日本战时意识形态和汪伪政府的文化观念，显示出周作人思想意识的复杂性。

五、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该作品是太宰治 1944 年接受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取材于鲁迅的仙台留学生活及其与藤野先生的关系。鲁迅与藤野先生的故事在“大东亚战争”的背景上被太宰治以个人化的方式叙述出来，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形。

上述文学个案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历时性并且有大约四十年的时间跨度，涉及平江不肖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孙俍工、巴金以及武者小路实笃、佐藤春夫、太宰治、安冈秀夫等众多具有代表性的中日作家或学者，包含着中国人的日本观、日本人的中国观、中日两国作家的国家意识等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思想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诸种条件的限制，除了《一个青年的梦》和“反动老作家”事件之外，相关研究并未在中国学术界展开，《亚细亚之子》和《惜别》至今未见中文翻译。本书试图将上述文学个案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系列来研究，以深化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文学关系、国民关系乃至两国作家的思想、文化心理

的认识。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近代以来国民国家的形成与近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共时性的。不仅如此，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原动力和语境，后者亦常常成为前者的文学性显现。在日本，一目了然的是现代文学的形成与明治维新开始的现代化过程相伴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历史性事件而且成为文学性事件。日本对大陆的侵略展开之后，文学与国家行为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比如“满洲开拓”促成了“开拓文学”，1937 年的全面战争造就了“笔部队”。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梁启超所说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以及“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主张的“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均显示出文学与国民意识形成之间的直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即为“国民文学”，现代作家是作为“国民”展开书写活动的。本书所谓的“国民作家”即此种意义上的“国民作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近代以来国家存在方式的巨大差异（显而易见的如侵略与被侵略），日本人作为“国民”与中国人作为“国民”具有不同的意义，“国民”一词由此产生性质的差异。不仅如此，具体作家对待“国家”态度的差异性（比如认同或超越），则使“国民作家”一词变得复杂，有时候甚至转化为“反国民的作家”，由此走向亚洲主义、人类主义等等。不过，尽管如此，“国民”仍然从相反的方向对作家及其书写保持着内在规定性。

论述过程中的某些体例问题，首先说明于此：

第一，本书征引的日语文献资料除了特别注明的，均为著者翻译，不再另注。

〔1〕《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 1902 年《新小说》创刊号。

〔2〕载《新青年》2 卷 6 号，1917 年 2 月发行。

第二，由于论述的对象是中日两国作家，所以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使用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抗日战争”一词不适合于日本作家，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表述为“侵华战争”或“中日战争”。对于引文中的“支那”等词汇，则保留原貌，不加更改。

第三，文中“〔〕”的内容，均为著者的补充或说明。

此外，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由笔者译出，作为本书附录，供研究者参考。太宰治《惜别》为长篇小说，翻译工作这里无法进行，暂将创作该小说之前太宰治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提交的创作构想《〈惜别〉之意图》翻译于此，从中可以了解《惜别》的基本内容。《“仙台神话”的背面》一文发表于2002年10月号《鲁迅研究月刊》，同样作为附录收录于此，作为第五章的补充，以免去对于相关问题的重复叙述。

目　录

National Writer Standpoint

Content

第 1 章

“留学”的风景

——《留东外史》发微

中国人从1896年开始留学日本，但以留日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直到将近二十年之后的民国初年才出现。这就是不肖生的《留东外史》。

不肖生（1890—1957）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故又称平江不肖生。明治四十年（1907）十七岁时留学日本，民国二年（1913）回国，在程潜担任总经理的岳州洞庭制革厂当书记。同年参加倒袁运动，到北伐第一军任军法官。运动失败后随第一军总司令程潜亡命日本，入中央大学就读。[1]《留东外史》是他第二次留学日本、即将回国的1914年底开始创作的。在《留东外史》开头处，他写道：“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后三时，尘雾半天，阴霾一室。此时此景就是不肖生兀坐东京

〔1〕 关于不肖生的生平可参阅下述资料，这里从略。一、不肖生的《自传》。收入岳麓书社1984年版《江湖奇侠传》。二、成仪则《忆恺然先生》与向一学《回忆父亲一生》。此二篇作为“附录”收入岳麓书社1984年版《江湖奇侠传》。三、向为霖《我的父亲平江不肖生》。收入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湾）1984年版《江湖奇侠传》。四、《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所收有关不肖生的文字。魏绍昌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旅馆，起草《留东外史》的纪念。"小说共十集，前五集为正集，后五集为续集，共一百六十回，总字数大约117万。从在东京开始动笔到回国之后的1922年全部完成，创作时间断断续续花了约七年。1916年5月至1922年10月，该书由民权出版部在上海陆续出版。〔1〕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东外史》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不仅仅在于它开了中国留学生文学的先河，更主要的在于它提供了历来的中国文学作品不曾提供的"原风景"〔2〕，在于它对近代日本的认识与传达以及它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学构成的关系。

不肖生在日本开始《留东外史》的创作，并且是以留学日本、流亡日本的中国人以及构成这些人生存环境的日本和日本人为描写对象。这样，无论是对于著者本人来说还是对于作品中的中国人来说，作为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大清国的国民，或者作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国民，两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问题无法回避：第一，如何面对、以怎样的方式把握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3〕的日本社会与日本人？第二，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事实上，《留东外史》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在回答的过程中，国家、民族、语言、身份、抵抗等与现代国民国家直接相关的问题凸现出来，《留东外史》因此成为一个"国家寓言"。

《留东外史》出版、传播的过程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与落潮相重叠，它受到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否定，并且因为内容的特殊性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并引起冲突。这两种

---

〔1〕《留东外史》续集（第六至第十集）的初版时间为民国十一年（1922）10月1日。

〔2〕"原风景"这个词是从日语汉字词汇中直接借用的，可以翻译为"原型性的风景"。"原"具有"原始"、"原初"、"原型"的意思。

〔3〕1912年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开始。巧合的是这一年既是日本的大正元年又是中国的民国元年。

冲突的存在使《留东外史》成为解读五四文坛和现代中日关系的坐标之一。

一　丑角登场

在《留东外史》提供的原风景之中，占主要位置的是在日中国人的众生相。[1]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不肖生对当时在日中国人的基本状况以及小说的主要内容、价值取向做了如下介绍：

> 这《留东外史》是部什么书？书中所说何事？不肖生著了这书有何好处？说来话长，诸君不必性急，待不肖生慢慢讲来。
>
>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诸君须知，此次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拚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在这里的，多半

[1] "在日"一词亦为从日语汉字词汇中借用，为"身在日本"之意，比"留日"、"旅日"、"流亡日本"等表达更具包容性。

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略〕第一第二种，与不肖生无笔墨缘，不敢惹他；第三第四种，没奈何，要借重他作登场傀儡。远事多不记忆，不敢乱写。从民国元年起，至不肖生离东京之日止。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人有骂我者，则"不肖生"三字，生固是我的美名，死亦是我的佳谥，由他骂罢。倘看此书的，不以人废言，则不肖生就有三层请愿：一愿后来的莫学书中的人，为书中人分过；二愿书中人莫再做书中事，为后来人作榜样；三若后来的竟学了书中人，书中人复做了书中事；就只愿再有不肖生者，宁牺牲个人道德，续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党宣战。[1]

不肖生对描写对象的设定有两点应当注意：第一，小说主人公包括留学东洋（所谓"留东"）和流亡东洋（谓之"流东"）的两类中国人。从这个角度看，"留东外史"这个书名没有把"流东"者包括进去，并不确切。为了论述的方便，下文将会经常使用"在日中国人"这个包括了上述两类人的日语词汇来指称《留东外史》的主人公。第二，小说的描写对象是四种在日中国人当中的后两种，叙述者是自觉地以丑角为主人公，叙述负面故事。决定这种取舍的是叙述者设定的"绌善而崇恶"

〔1〕《留东外史》初版时是用旧式标点，笔者的引文据岳麓书社1988年重排本，仅对个别标点做了改动。引文中省略或说明的部分皆在〔 〕中标明。后不另注。岳麓书社版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原书正集五卷，一至九十章；下册为原续集五卷，九十一至一百六十章。岳麓版改用了新式标点，删去了原书上的批点和评注，并将原书中的日文译成了汉语。此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也曾分正、续集重版《留东外史》。

这种以牺牲道德为前提的逻辑起点——这一起点无疑具有反讽性。“留东外史”所谓的“外”既“外”于认真读书的留学生，又“外”于中国道德传统中的“善”。

从上述前提出发，《留东外史》叙述了大量在日中国人的恶行丑态：吃、喝、玩、赌、嫖、骗、斗。“嫖经”、“赌诀”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小说中。周撰、黄文汉、胡庄、罗福、张全、郑少畋等拿着国家官费的留学生们是如此，林巨章、康少将等亡命客是如此，甚至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的官员也是如此。朱湘藩身为驻日公使馆二等参赞，为了讨好日本女子，私自挪用留学生的官费；海子舆身为驻日公使，为了拿回扣、中饱私囊，伙同朱湘藩用国家公款去买日本人飞不起来的飞机。在这类故事中，在日中国人的道德感、羞耻心丧失殆尽，堕落得无以复加。不仅如此，甚至忏悔这种从“恶”中自我拯救的最后手段，也被用于作恶。以“江西经理员”的名义来东京的王甫察就是如此。他欺骗所有人——中国人、日本人、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并且欺骗生命垂危的病人，满足欲望成为他唯一的追求。将手中的钱挥霍净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好友吴嘉召面前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剃度出家，骗了一百块钱之后，逃到长崎继续作恶（第五十四章）。在《留东外史》中的中国留学生这里，留学生身份是虚假的，留学本身受到了嘲弄。妓院、宿舍、公园、餐馆等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他们与日本人的关系更多表现为与日本女性的关系——嫖日本妓女或者勾引女佣（即所谓的“吊膀子”）。相反，作为学生生活主要标志的教师和校园几乎没有出现。

《留东外史》提供的这道风景过于灰暗，但这道风景确实存在过。从早期留日学生的有关回忆中，不难寻找出上述描写的根据。

关于明治末年、大正初年日本中国留学生界的混乱情形，

许寿裳、鲁迅、郁达夫、张资平等早期留日学生有关留学生活的文章中均有记述。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曾写及邹容等留学生因为剪辫子问题与江南班监督姚某发生冲突。邹容等五人趁姚某与一中国女子奸宿之际持剪刀冲入房间，打姚某的嘴巴，并剪下姚某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姚某面子丢尽，含羞回国。邹容（1885—1905）后来因为《革命军》一书成为名扬全中国的青年革命家，与姚某的冲突体现了其叛逆性与革命精神。但是，如果抛开价值判断，把这种冲突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作为一个事件来看，就能够发现，普通留学生与监督的这种冲突方式表明的是当时留日中国学生界的狂躁与无序。鲁迅在写于20年代中期的《藤野先生》、《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等文章中，也写及头上盘着“富士山”、学跳舞踩得地板咚咚响、关起门来炖牛肉吃、不务正业的清国留学生。正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学生群体，鲁迅离开东京去了仙台。[1]张资平在《冲积期化石》第五十六节，用讽刺的口吻写及各种“留学生志士”：或尚形式、好口舌之争，或诋毁同学、背后放冷箭，或荒废学业、爱出风头，或爱漂亮、将头发梳得油光、满口黄牙却懒得刷。[2]许寿裳、鲁迅等第一代留学生留日的时间比张资平等第二代留学生早十多年，但他们却看到了同样的灰暗风景，可见这道风景一直存在于20世纪初的日本。

《留东外史》描绘的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性的关系同样可以通过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留日作家的生活实态得到证实。周作人1906年秋留学日本，1908年4月在住宿处结识女佣（即《留东外史》经常写及的“下女”）羽太信子，1909年3月结婚。根据《周作人年谱》的记述，“由于家境贫困，羽太

---

〔1〕 鲁迅这两篇文章分别收入《朝花夕拾》和《华盖集续编》。相关问题可参阅笔者的《“仙台神话”的背面》一文。见本书附录。

〔2〕 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211—212页。该书初版于1922年1月。

信子没有读过多少书，很小时就被送到东京一个低级酒馆去当酌妇”。[1]“酌妇”即今之所谓陪酒女。郭沫若留学日本的时候已有发妻在国内，但依然与护士佐藤富子同居并生儿育女。郁达夫虽不曾娶日本女性为妻，却是在日本的妓院里失去了童贞。1915 年冬天，十九岁的郁达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就读，寒假考试之后关西一带下了大雪，他耐不住乡间的寂寞，乘火车往东京会朋友。夜班车停在一个小站的时候，他像是被恶魔缠身，半醉半醒之间进了妓院……。他在自传中写道：“第二天中午醒来，在棉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冷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阳光反射的结果，照得那一间八席大的房间，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那些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了两条眼泪。”[2]

结合清末民初在日中国人群体的构成状况和生活形态来看，毋宁说《留东外史》展示的那道灰暗风景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为契机，经张之洞《劝学篇》（1898）鼓吹，20 世纪初叶中国涌起留日大潮，甚至出现父子留学、夫妻留学、全家留学的情形。但是，当时的留学制度本身并不健全。《留东外史》中许多道德败坏、并无留学打算的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运动到官费，就是这种“不健全”的表征。当时中日两国之间没有护照、签证之类的问题，中国人的生活水准甚至略高于日本人，去日本留学轻而易举。郭沫若 1913 年 12 月

[1] 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初版，80 页。

[2] 《海上——自传之八》，原载 1936 年 2 月 16 日《宇宙风》第十一期。引自《郁达夫日记集》，胡从经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7 月出版。

28日从北京乘火车经满洲、朝鲜半岛去日本留学，而留学的事是前一天晚上、即12月27日晚上他大哥的朋友偶然提起的。[1]在这种来去自由的情况下，中国人留日群体势必呈现鱼龙混杂的局面，而亡命客的介入则使这个群体更加复杂。

不仅如此，在进入日本社会之后，这个庞杂的中国人群体又是被边缘化的。

"边缘化"首先意味着被相继打败大清国和沙俄之后国民优越感高涨、蔑视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所排斥。早期留学生出门，甚至有日本儿童尾随其后喊"猪尾奴"。1896年第一批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共十三名，到日本一个月之内即有四人回国，回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了日本社会的歧视。[2]到了1905年，陈天华终于到东京湾的大森海岸蹈海自杀，以抗议日本报刊用"放纵卑劣"一词描绘中国人，警醒国人。后来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遭到怀疑，怀疑的前提即"中国人是低能儿"。

"边缘化"的另一重含义是进入"语言沙漠"。当时去日本留学、亡命或游历的许多中国人并不会日语，因而患上"异国失语症"。

对于进入异国、异文化环境之后语言的意义，《留东外史》有自觉的表现。老留学生周撰在去日本的船上，教几位第一次去留学的中国人如何在禁赌甚严的日本赌博，说："万一骰子收藏不及，被警察拿着了，也不要紧，我们只装作全不懂日本话的。"（第一章）这是自觉地把语言的隔膜作为盾牌或逃路。不过，在日本生活如果真的不懂日语，将会产生心理焦虑。《留东外史》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笔谈场面。一方为来访

---

〔1〕参阅《沫若自传》第一卷中的《黑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沫若文集》第六卷。

〔2〕参阅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第一至第三章，东京·第一书房1981年版。

的日本警察，一方为中国留学生朱镛的父亲——携巨款从无锡来东京放高利贷的朱正章。警察来访而朱镛不在家，只好与朱正章进行笔谈：

> 那警察问了朱正章几句话，见朱正章只翻着眼睛望了，知道是不懂日语，即从怀中拿出个小本子来，在那本子档上抽出枝铅笔，写了几个字给朱正章看。朱正章见上面写着："先生台甫朱正章乎？何为日本来？"朱正章会了意，也拿了枝铅笔，就在小本子上写了个"是"字，又写了"游历"两字。那警察点点头，又写道："冢本平十郎先生之友达乎？"朱正章不懂友达就是朋友，因平日听得说放高利贷是犯法的事，今见警察提起冢本平十郎的名字，以为友达二字，必是凶多吉少，不免惊慌起来，连用铅笔点着"友达"二字，对警察摇头作色，连连摆手。警察见这情形，笑了一笑，再写道："御息子来乎？"（御息子即中国称令郎）朱正章更把息子当做利息，以为是问冢本的利钱来了没有，吓得慌了手脚，疑心警察已全知道了自己的底蕴，特来敲竹杠的，连忙写了个"不知道"，写完把铅笔一掷，扭转身扳〔板〕着脸朝窗坐了，一言不发。警察很觉得诧异，仍写道："何故怒？"朱正章也不理他。警察气忿忿的撕了张纸下来，写了"不知礼仪哉"几个字，往朱正章面前一掷，提着帽子走了。（第十章）

朱正章的焦虑和恐惧即来自语言障碍。在《留东外史》中，因为语言障碍而焦虑、紧张、孤独的在日中国人并不少。女留学生陈蒿发现从当铺赎回来的金手镯上的金子被刨去了一些，想去交涉但日语不通，便让日语熟练的周撰和陈的姐夫李镜泓一起去和当铺的日本人交涉。接着，小说写道："周撰在路上对李镜泓谈论日本小鬼种种欺负中国留学生的事。中国留学生的

日本话程度，多是耳里能听得出，口里说不出。因此每次和小鬼闹起来，分外的怄气。既闹到警察署，日本警察多存心袒护小鬼。中国人日本话说得好的，能据理争辩，警察就不敢偏袒。"（第一百四十八章）在当时的留学生界，"办交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本领，其背景就是语言问题的存在。

就性别而言，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主要由男性构成。他们正值青春期，性压抑是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初到日本时都是二十二岁，郁达夫1913年去日本的时候十七岁，张资平1912年留学日本的时候十九岁。张资平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中直言："鹤鸣和我都在性的烦闷期内进了K市的高等学校。幸得校课繁忙，免了性的诱惑和虐待。"[1]从鲁迅的留日记忆中同样可以发现性压抑的蛛丝马迹。鲁迅留下的文字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但许寿裳的长文《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及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鲁迅到仙台后因气候寒冷每日入浴取暖。仙台澡堂男池与女池之间只有一道矮木壁相隔，洗澡的时候有同学恶作剧，窥木壁对面。于是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便有"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的戏语，并自注云："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另一件是鲁迅对他说最初解剖尸体的时候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留在鲁迅留日记忆中的这两件事尽管不是谈论性问题，但均关涉到女性的身体。

对于处于性压抑状态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日本女性自然成为欲望的对象。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日本是被"女性化"

[1] 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210页。该书初版于1922年1月。

的。不少中国留日学生的留日生活自述中，都有关于日本女性的记忆。青年周作人跟随兄长周树人赴日留学，初到东京、住进伏见馆的第一天，就从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荣子的赤脚受到感动，这感动影响到他后来的思想与人生历程。〔1〕在日本妓女那里失去童贞的郁达夫醉心于日本女性的美，并从风土与文化传统来解释日本女性美的形成，说："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绝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肤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2〕

在男性本位、性观念相对开放、妓文化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满足这种欲望并不困难，于是有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结婚、郭沫若和佐藤富子的同居、郁达夫的嫖妓。类似的事情《留东外史》多有描写。某日，胡庄等人因聚赌被抓，日本警官斥责说："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只我这一署，每月至少也有十来件赌博案；嫖淫卖妇的案，一个月总在二十件以上。现在留学生总数不过四五千人，住在神田的，才千零人，平日就每日有一件犯罪的事发生，不是过于不自爱吗？我真佩服你们贵国人的性情，柔和得好。你们也知道贵国

〔1〕参阅《知堂回想录》第六十六节"最初的印象"。相关问题笔者在《周作人与两位日本女性的纠葛》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论文为日文，载日本《シニカ》1998年七月号。

〔2〕《雪夜——自传之一章》，原载1936年2月16日《宇宙风》第十一期。引自《郁达夫日记集》，胡从经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政府，是因国体太弱，才派送你们来求学，将来好回去整理的么？怎么还这般的和没事人一样哩。”而胡庄回答得振振有辞：“男女之欲，越是文明国的人，越发达。敝国人到贵国来求学，远的万余里，近的也有数千里，至少也须一年方能回去一趟，况都在壮年，此事何能免得？”（第十一章）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与小说人物胡庄并非同类，但胡庄的话可以作为他们行为的解释和开脱。

综上所述，《留东外史》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描绘了民国初年在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处于制度边缘和文化边缘的生命个体在面临种种压迫、失去相应的制约之后如何发生变异，内在的紧张如何通过“性”等原始的生命本能释放出来。尽管叙事过程中多有夸张——例如王甫察集万恶于一身、日本女子那样迅速地与素不相识的人发生性关系都让人生疑，但就小说描绘的世界与在日中国人生活实态的对应关系而言，其真实性不容置疑。《留东外史》虽名为“外史”，但确实具备“史”的品格。

实际上，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表达的对于日本留学的总体认识在当时并非个别。郭沫若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旁证。1910 年前后，郭沫若到成都进分设中学。一位留过洋、到过上海的罗姓同学对他说：“日本我是到过的。日本鬼很穷，他只要你的钱，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学都照例贩卖文凭。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只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学几句下贱的下女话。本来是全无科学常识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外国去，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便跑回来。你想，单是要把外国话学好都还说不上，怎么会有好大的学问？”〔1〕罗姓同学说这段话是在《留东外史》开始创作四年之前，但几乎可

〔1〕《反正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沫若文集》第六卷 184 页。

以作为《留东外史》的一种“提要”。

《留东外史》的真实性得力于著者不肖生本人的特殊经历。所谓“书中所述，得自亲历者十之四，耳闻者十之三，余者为向壁虚构”[1]并非虚言。数年的东京生活使他对日本有广泛的了解，留学生和亡命客的双重身份则使他对留日中国学生和亡命日本的中国人这两个群体的内幕知之甚多。《留东外史》的某些段落甚至具有纪实小说的性质。第十九、二十两章写及孙中山访问日本，结合1913年2月中旬《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来看，时间、地点、人物准确无误。从《留东外史》的叙事可以发现，不肖生为创作这部小说进行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小说第一百章写有人散发传单揭章筱荣、章器隽叔侄二人的短，道：“传单上写了些甚么呢？说起来也是一桩恨事。这传单在当日是无处不有，及至不肖生起草《留东外史》，都被章筱荣用金钱收毁完了。不肖生打听得横滨中国会馆的壁上，还贴了一张，不曾撕毁，不肖生专坐火车到横滨中国会馆一看，果然不错，完全无缺的，粘在上面，兢兢业业的，撕了下来，和那些调查所得的材料，做一包袱裹了。民国六年冬，走湖南岳州府经过，在新堤地方，被一群北方兵士打上轮船，口中说要检查，手里就抢行李，上岸飞跑，那一个材料包裹，也就跟着被掳了去。”小说一百〇二章写几位亡命客聚众滋事，来请他帮助调解，又道：“再说那时不肖生，正是征集《留东外史》材料的时候，凡是团体集会，只要有绍介，可列席旁听，无不参与其中。”正因为如此，《留东外史》才成其为一部经得起实证性研究的小说。小说所具有的影射性，则是这种真实性的直接产物。[2]

---

〔1〕《民国人物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8月版。

〔2〕根据前引成仪则的回忆文章，《留东外史》中影射的人物曾经扬言找不肖生决斗。

二 文化·民国·国民性

不肖生“绌善而崇恶”的态度作为“与恶党宣战”的手段具有反讽性。他是通过略带夸张的展示将“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引起读者的厌恶，从而达到批判与否定的目的。

在暴露“恶党”们恶行丑态的同时，不肖生自觉地寻找“恶党”产生的文化根源。由于“恶党”们具有“亡命客”、“中华民国国民”等社会身份，因此不肖生的思考与批判直接指向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最后归结到中国人的国民性。

《留东外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集中体现在第十五章。在该章中，周撰谋得官费来日本留学，却把才情浪费于吃喝嫖赌，于是他的朋友成连生开导他说：

> 像你这样的资质，在留学生中，也不易多得。若肯用功，甚么伟大人物，你不能做？只是不进学堂，实在可惜你这副身手，这副脑筋。我看现在中国一般聪明的少年，自谓负了点奇气的，都有个毛病，就是不肯就范围读书。这病从那〔哪〕里得起哩？说起来，原因虽多，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好高骛远。养成这好高骛远的性质，就吃了几部历史、几部小说的亏。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说的甚么英雄，甚么豪杰，几个说了他小时候如何用功、有如何的真实学问？不是说出自田间，就是说起于屠肆。用着一般无赖子、玩皮小孩的举动，为他们写色，以为英雄不遇时，举动颠倒，自应如是。小说上更是荒谬了，能荒唐放纵、说几句大话的，能杀人放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便是英雄。英雄二字，被他们糟蹋尽了。〔略〕二十世纪的英雄，决不是无真实学问的人，凭一张嘴，吹吹牛皮，一

枝笔，胡乱涂几句假爱国的话，可以混充的。

在这里，不肖生企图颠覆的是中国历史和古典小说所宣扬的英雄观，只是他的批判没有生发开去。

《留东外史》中的中国人虽然是活动在日本，但中国背景并没有消失。相反，与亡命客直接相关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一直作为另外一种角色存在于作品之中。对于辛亥革命的阴暗面，《留东外史》进行了揭露。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亡命客在日本的堕落本身暗示出的是"革命者"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低下，某些"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趁火打劫、牟取私利则表现出"革命"的残忍。汉人军官范健飞借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之机参加革命、滥杀旗人，为了抢一个旗人女子甚至将其全家杀害。（一百二十一章）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章四爷逃亡日本之后，遭小妾和朋友算计，看破红尘，想遁入空门，对另一位亡命客说："我自己知道，数年来在军队里干的事，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事。""至于国家社会，认真讲起来，像我们这种人，越是死的多，入空门的多，国家越是太平，社会越是有秩序。"（一百二十七章）在《留东外史》中范健飞的故事与章四爷的故事是各自独立的，但不肖生通过这两个故事对"革命"之残忍性的否定却是一致的。

不过，对于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肖生完全认同并引以为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黄文汉被日本军人问及"贵国是清国吗?"的时候断然否定，答道："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华民国。"（十四章）这样看来，不肖生把《留东外史》故事发生时间的上限定在民国元年并让国父孙中山在小说中出现，均非偶然。只有在进入民国元年之后，在日中国人才成其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留东外史》正面写及孙中山是在第十九、二十章，记述的是孙中山 1913 年 2 月中旬的访日。在 20 世纪的中国小说作

品中，最早写及孙中山的也许就是《留东外史》。第二十章对孙中山向留学生发表讲演做了具体描写：

> 那会场楼上楼下，也是一般的挤得没有多少空隙。有些想出风头的人，见孙先生未到，讲台空着，便借着这机会，上场去演说，图人叫好。于是你说一篇，我争一篇，他驳一篇，都好像有莫大的政见，只怕孙先生一来，说不出口，非趁这时机发表不可似的。如此犬吠驴鸣的，闹了两点多钟。孙先生一到，才鸦雀无声。〔略〕孙先生的演说词，上海报纸有登得详细的，难得细写。胡庄听到"中华民国正在建设时代，处处须人，诸君在这边无论学甚么，将来回国，都有用处，决不要愁没有好位置"的话，已不高兴，心想：我们开欢迎会欢迎你，倒惹起你来教训人。你知道我们都是将来回去争位置的吗？未免太看轻了人家的人格。更听的掌声大作，那〔哪〕里还坐得住，赌气走了出来。

这段叙述之中，胡庄对孙中山的抗拒与前面的记述中他对日本警察的抗拒具有同构性。两种抗拒均确认了"恶党"及其恶行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动。日本警察斥责胡庄等人时所谓"贵国政府，是因国体太弱，才派送你们来求学"，表达的正是不肖生本人的思想观念。

基于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不肖生对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政权、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了抨击。《留东外史》第六十六至七十一章是讲述革命志士吴大銮舍命暗杀东京筹安分会会长蒋四立、由朋友接应逃回国的英雄故事，吴大銮坦言："最伤心的就是袁世凯那老贼，专一用这种卑劣手段，对付国人，把国民道德，破坏得一点根株没有。那〔哪〕有一个好人？这样政府作国民的模范，不是一时之患，乃是万世之患！我是决计不在

东京住了。此后尽我的能力，能将袁世凯手下的一般狐群狗党，斩除一个，中国即少了一个制造恶人的模型。若自己没有能力不中用，死在敌人手里，也就罢了。"（六十八章）一副为民捐躯的气魄。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1915年8月23日成立于北京，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力促恢复帝制的组织。在小说第一百〇六章，不肖生则借在东京担任"湖南国民党支部长"[1]的林胡子的口，批评革命意志消沉的亡命客，斥责袁世凯，曰："我真为中华民国的前途着急！若大一个民国，就听凭袁世凯一个人横行霸道。眼见得中华民国的灵魂都没有了。我们顶着民党的头衔，是这样看水流舟的，眼睁睁望着中华民国断送在袁贼一个人手里，千秋万世，也要骂我们全没一些人气。"说着竟然两眼流下泪来。

在《留东外史》中，孙中山的出现与对袁世凯的批判显然是相对应的。在这种对应中被强调的，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自觉性。

《留东外史》对在日中国人的批判进入了国民性批判的层面。小说第六十一章的题目就是"作儿女语一对可怜虫　论国民性许多无耻物"。在该章中，黄文汉与在日本的体育学校留学的郭子兰讨论谋求中国拳术统一，主张联合各省国术教师、通过教育部向全国推行，郭子兰笑道："你太把那些有名的教师看容易了。你在日本住久了，完全忘了中国的国民性。这样的去因势利导，你不给人家打死，就是万幸了。想风行全国，可谓是理想的梦话。"对国民性问题郭子兰仅仅是提及而并未做具体说明，但结合上下文来看他否定的是中国人的山头宗派观念。到了第六十六章"娇小姐医院养病　勇少年酒楼买枪"，不肖生则对"国民性"做了具体的说明。该章写及袁世

[1] 在《留东外史》中不肖生一直使用"民党"一词，而此处无意中用了"国民党"，这表明小说中的"民党"即国民党。

凯收买逃亡到日本的亡命客时说：“他这计策，就是专从我们国民的劣根性上着想出来的。我们国民的劣根性是甚么？就是要钱、要做官。”

当不肖生把“国民的劣根性”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国民性批判具有了政治批判意义。在小说第七十一章，吴大銮批判那些因为恋官而丧失革命精神的“革命志士”时直言：

> 怪道志士一入官场，拿起架子来，比老官僚还要加甚几倍。在他们自己以为是存身份，我却以为不过自招出贫儿暴富的供状来。〔略〕杨度从前在日本的时候，开会演起说来，何等激昂慷慨！孙毓筠充当志士的时候，何等自命不凡！于今竟跑到袁世凯脚下，俯伏称臣起来。杨度还可说他历来是君宪主义，今日算是贯彻他的主张，其无耻不要脸，还有所借口。孙毓筠弄到这步田地，就要掩饰，也不能自圆其说。这样看来，世界上还有靠得住的人吗？蒋四立的伤，都不在要害，还可侥幸延他几年狗命。只是照现在的人心看来，蒋四立就死了也不值甚么。袁世凯底下，像他这样的人，岂少也乎哉。

杨度和孙毓筠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杨度（1874—1932）1903年前后留学日本时曾任中国留学生会会长，1915年8月筹安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他又担任首任会长。在《留东外史》中，他们成为“国民的劣根性”的体现者。

不肖生对民国初期政治现实和官场黑暗的深刻认识在“五四”前后的作家中具有代表性。郁达夫和郭沫若都曾表达过类似观点。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说：“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郭沫若在1929年也曾说：“辛亥革命，这在我们看来并

不是有多么大的光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自民国成立以后是为一部分的人所垄断了。革命的纪念为武汉起义的十月十日所占有，由资本主义所酝酿成的中华民国就好像是八月十五日的月饼所创造的一样。其实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尽了当时的事实。”〔1〕

在上述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国民性批判的背景上，《留东外史》叙述的“英雄故事”具有了特殊意义。作为“恶党”的对立面出现、代表正面道德力量的吴大銮体现了不肖生的人格追求。小说中与吴大銮类似的人物还有奉命到日本买飞机的冯润林。冯润林面对国家驻日官僚的无耻与无责任心依然坚持原则，道：“我若早知官场中办差是这们〔么〕不要天良的，也不承认这差了。”（一百〇九章）林巨章与章四爷谈起这事，称赞说：“于今世界上，像冯润林那们〔么〕实心任事的人，只怕找不出第二个来。”

三　日本风土记

《留东外史》把中国人的故事放在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来叙述，从而使日本和日本人进入小说成为必然。不肖生在叙事过程中也是自觉地向读者传达他所了解的日本以及他对日本的态度。这样，“日本”在环境、人物、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不同层面上同时进入作品。完整意义上的“日本”作为一种角色出现在中国小说中，无疑是始于《留东外史》。《留东外史》呈现的日本具有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真实性，构成了独特的“大正日本风土记”。

---

〔1〕《反正前后》。该回忆录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沫若文集》的时候此段文字有改动。

《留东外史》的故事背景是明治、大正之交的东京和日本，在叙事过程中，小说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称得上绝对真实。

就时间而言，小说写及的明治天皇的死、孙中山的访日、大正博览会的召开甚至节假日均有据可查。在第六十三、六十四章，时间已经到了1914年。双十节，黄文汉等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喝酒说笑高声大语，隔壁便有日本人开窗大骂："豚尾奴不要闹！再闹我就要喊警察了！"一位姓久井的法学博士还带着一位名叫斋藤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前来交涉，指责中国人吵闹影响了斋藤的学习。于是黄文汉发挥其"办交涉"的才能，反驳说："今日礼拜六，各学堂下午都没有课。便是各会社，下午也就停止办公。先生如有意要干涉我们，先生自己不能不站稳地步。今日下午都不上课、不办公，是为甚么？斋藤君一人要用功，旁人不能干涉。旁人于规定的游戏时间行乐，岂有旁人说话的馀地！"[1]查日历，1914年10月10日确为星期六。

不肖生熟悉东京以及整个日本的地理环境，他笔下的人物在这个环境中活动自如。小说第十二章对黄文汉从东京去箱根旅游作了如下描写：

> 这里黄文汉收拾完了，次日清晨，果然穿着草鞋，背着包袱，提着雨伞，步行往箱根进发。平日往箱根，由神奈川坐火车，只要两个多钟头就到了。日本的火车，每点钟走十一二日本里，合中国的七十里的光景。由东京到箱根，以中国里计算不过二百多里。黄文汉这日清早动身，因到神奈川这条路，他走了多次，没有什么风景，便由品川坐电车到神奈川再走。经过平沼程谷，在大船吃了午

---

〔1〕日语汉字的"会社"即"公司"之意。

饭，下午由大船走藤泽到茅崎。天气还早，计程已走了九十零里程。他知道茅崎有海水浴场，便不打算再走了。想寻个相安的旅馆住下，好洗海水浴。

这段描写涉及的海水浴场显然是指茅崎附近相模湾中的海水浴场，与日本近代的人文地理密切相关。海水浴场的建设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文明开化”的标志之一，但东京一带海水浴场的建设并非始自东京，而是始自临近东京的神奈川县的相模湾，即照崎海岸。明治十八年（1885），经陆军军医总监松本顺倡导，海水浴场在照崎海岸开设。[1]箱根之外，小说通过苏仲武、黄文汉的日光之旅对旅游胜地日光的描写，通过张思方的养病对避暑胜地热海的描写，都准确、具体，可以作为“旅游指南”来阅读。《留东外史》写及的会芳楼、锦辉馆等场所或设施，也正是当时在东京生活的中国人经常出入的。会芳楼是一家中华料理店，位于神田的南神保町，明治三十一年（1898）作为横滨会芳楼的分店在这里开业。根据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2]的记述，该店的开业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增加有直接关系。《留东外史》第三十九章，就有中国留学生张孝友在会芳楼宴请日本人的描写。锦辉馆是《留东外史》中的又一个主要场景。小说第三十四章，留学生李锦鸡（本名李铁民，眉目清秀、好搔首弄姿，故称）无聊之时，便到锦辉馆去看“活动写真”。[3]历史上的锦辉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神田，是一家电影院，为当时的时髦处所。永井荷风（1879—1959）1936年底完成的小说名作《墨东绮谭》的开头就写及自

---

〔1〕 参阅芳贺登《东京海水浴场的出现》。收入《明治东京100话》，冲羽根舍1996年3月初版。

〔2〕 东京·第一书房1981年5月初版。

〔3〕 电影传入日本之初被称作“活动写真”。写真即照片，运动状态的照片即为电影，所以“活动写真”这个说法颇为传神。后来叫“映画”。

己40年前在锦辉馆看电影。早期留日学生或者流亡日本的活动家多出现于此。1905年7月中旬孙中山从法国到东京，与汪精卫见面的地点就是锦辉馆。《汪精卫生平纪事》1905年项下记有：“七月十九日孙中山自法国抵东京。与朱执信等人往神田锦辉馆拜会，表示拥护孙中山组织统一革命团体的主张。”[1]

《留东外史》对日本风土民情与日本人生活方式的描绘涉及服饰、住居、饮食、谣曲、相扑、茶具诸多方面。黄文汉旅游到箱根，住在温泉旅馆，一位素不相识的日本军人来闲谈，穿了一身白纱和服却未系裙，黄文汉便心中不快。因为他知道日本人访客不系裙为不敬。中国留学生张思方怕吃生鱼片，日本朋友真野便对他说：“吃日本菜，不吃生鱼，就没再好的东西了。”周撰请女留学生陈毓姐妹到日本料理店吃饭，陈毓惊诧于日本式房屋的精致，周撰便给她们讲起日本式住房与地震的关系。生鱼片端上来，又教她们如何吃。（一百三十五章）中国留学生熊义认识了在美术学校教音乐的日本女子鸠山安子，到安子的住处，安子拿出一把九谷烧茶壶、两个九谷烧茶杯请他喝茶。（一百一十九章）何达武去吉原游廓（东京有名的妓院街）嫖妓，一夜花去十四多块钱（当时官费留学生每月生活费为三十六元），日本妓女也是拿出九谷烧茶具招待他。这些细节并非随手写来。九谷烧在日本是比较高档的茶具，只有这种档次的茶具才与安子的身份或高档妓院的气氛相符。熊义与鸠山安子去日比谷公园散步，电车里遇到刚升任横纲不久的相扑大力士大锦，安子又给熊义谈起相扑（一百二十章）。

当时东京人生活中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活事件与生活细节，

---

[1]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也被不肖生敏锐地捕捉到，并表现在小说之中。小说多次写到的午炮声就是一例。在第二十六章“旧梦重温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种兰因”中，来自浙江的中国留学生张思方借住到日本朋友真野的姑父、东京大户人家山口和夫家。搬来这一天张思方在房间里收拾行李，山口夫人在旁边看——

> 夫人站在一旁看张思方慢条斯理的，一刻儿工夫，检得齐齐整整，拿出一个蒲团让夫人坐。夫人道：“我不坐了，我要去指点他们弄菜。太郎差不多要下课了。”说时咚的一声午炮响，夫人便别了张思方进厨房去。

后来，山口家的女儿节子爱上张思方，“张思方每日上课，节子听得午炮响，便不住的到大门口张望。迎着了，即一同进房”。对于当时的东京人来说，这一声午炮具有重要意义。东京在正午时分打午炮报时始自明治四年（1871）9月9日，这一计时方式的确立起源于当时兵部省向太政官的提案，目的在于培养、加强国民的现代时间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午炮声和海水浴场的建立一样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具有文化意义，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据说，第一次打午炮的时候，有些市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跑出房间。但人们很快适应了午炮声和午炮的时间含义，午炮响后公司休息、学校放学，开始午餐，于是便有诗人写出了颇具幽默感的讽刺诗：“家家筷子响，乃午炮之回音。”山口和夫的家位于桧町，离打午炮的江户城天守阁遗址不远，炮声自然听得更清楚。午炮制度推行了将近60年，直到昭和四年（1929）5月1日，为了节约火药，才将炮声改为汽笛。[1]显然，东京的午炮声成为早

〔1〕参阅柳生悦子《午炮咚——新式时刻认识法》。收入《明治东京100话》，冲羽根舍1996年3月初版。

期中国留日学生的留日记忆之一，通过不肖生的笔进入《留东外史》。

在《留东外史》中，中国“恶党”的恶行之一是嫖妓，因此小说自然而然地写及大正时期日本色情行业的实态。不仅吉原游廓、浅草、涩谷、新桥等妓院集中的地方被小说展示，小说第一集中对黄文汉召艺妓过程的描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描写涉及音乐、歌舞、礼仪等日本色情文化的诸多方面。在《留东外史》的相关描写中，某些细节都可以与日本风俗史著作的记述相印证。小说第十八章“乘人之危张全捉鳖　执迷不悟罗福抱桥”写及的“樱纸”，就是如此。

“樱纸”出现在李锦鸡戏弄罗福的情节中。来自云南的公费留学生罗福有些愚痴，也企图追求日本女学生。某日上午他去找李锦鸡，遇到李与下女苟且，并从李锦鸡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叠粉红色的又薄又软的纸。于是：

> 罗福抽了几张揩了手再嗅，觉得有些香气，复拿了几张纸嗅了嗅道：“好香好香，这纸做甚么用的？怎的这们〔么〕香？”锦鸡一边穿衣服，一边答道：“这纸么，用途大得很，带在身上最好。可以避役，又可以防臭。你插几张在和服的襟口上，些微露点出来，随到甚么地方，不闻见臭气。我是特意买了来防臭的。不过不可拿多了，这纸很贵。”罗福听了，真个分了一半，插入怀中。锦鸡走向前道：“你插的不好，是这样留，一小半在外面，香气才得出来。”罗福即将身子就拢来，要锦鸡替他插好了。

下女在一旁偷笑，罗福却浑然不觉，襟口插着纸得意洋洋出门会朋友。几位朋友听说了这纸的好处，也都争着分了几张插在襟口。最后还是老留学生张全将事情点破：“这纸名消毒奇丽

纸，纯是女人用的，又叫妇人用纸。”这个讽刺性的情节看似荒唐，其实却有生活根据。至少从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女性、特别是日本妓女就使用一种薄、软的纸，用以清洁、避孕。这种纸呈粉红色，近于樱花的颜色，故称“樱纸”。纸质软，使用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影响邻近的人，不会被临近的人注意到，所以又称“桃娜丽”（“桃娜丽”是日语汉字“邻”的发音）。此外还有“和合纸”、“用心纸”、“富贵纸”、“仕舞纸”（日语汉字的“仕舞”有结束、停止、打扮等意思）等叫法。德国人库拉乌斯1907年出版的《日本民族的性生活》，也写及这种纸。[1]显然，不肖生笔下的“消毒奇丽纸”就是那种历史悠久的“樱纸”。前引郁达夫自传中出现的“樱纸”，也可与《留东外史》的描写相印证。

在描绘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展示包括色情文化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留东外史》写及众多的日本人。根据实藤惠秀的统计，在《留东外史》写及的357名人物中，日本人多达117名（男性61名女性56名）。[2]这些日本人遍布日本社会的诸多阶层，从妓女、女佣，到女学生、警察、房东、小业主、放高利贷者，到军人、医生、新闻记者、法学博士，再到真实的历史人物——例如下田歌子、宫崎滔天、山川健次郎、福田英子等社会名流和政界人物。从环境、文化、人物三者的结合来看，《留东外史》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日本形象”。

不幸的是，不肖生在描绘日本风土民情的时候是“知日派”，而在写及日本人的时候则成为“反日派”。

---

〔1〕 参阅藏方宏昌的文章《妓女有避孕方法吗》，收入《史料叙述·江户生活122话》，日本风俗史学会编辑，冲羽根舍1994年4月版。

〔2〕 参阅《〈留东外史〉与其日本观》，载日本《中国文学月报》第十二号，1936年3月出版。此文后来成为《中国留学生史谈》一书的组成部分。

四 “留日反日”的构造

在《留东外史》提供的众多日本人形象中，除了山口节子、中壁圆子少数日本女性之外，受到肯定性描写的仅有山川健次郎、福田英子。

山川健次郎（1854—1931）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1]他出现在《留东外史》第十九章。1913年早春的一天，黄文汉应朋友伏焱之邀，作为翻译前往长崎迎接来访的孙中山，中途遇到胡瑛带着翻译，便随胡瑛顺道在福岛下车，参观山川健次郎创办的工业专门学校。小说的具体描写流露出不肖生对山川健次郎的钦敬之情：胡瑛一行被汽车接到操场上看操，“其时积雪未消，只见满场一片白光，有许多学生正在雪里奋勇习体操。驾车的把车停了，胡瑛等下车，黄文汉走最后。见前面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穿着一双长筒靴，裤脚扎在靴筒里，上身青先生洋服，并没穿外套，竖脊挺胸的冲着北风，站在那里看操。见胡瑛到了，掉转身来，接着行礼。黄文汉知道便是山川健次郎，〔略〕山川健次郎便笑着请大家看操。看了一会儿，一阵极冷的北风吹来，吹得黄文汉几乎发抖。看胡瑛穿的是皮外套，尚不见十分缩瑟。看那山川健次郎，仍是神色自若的站着，并没有移步。胡瑛的翻译、伏焱及两个日本人，都冻得脸上没有了血色，几乎僵了。”在此种描写中，山川健次郎通过与黄文汉等人的对比体现出的是顽强的意志和坦荡的风度。

福田英子（1865—1927）为日本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妇

---

〔1〕 山川健次郎为日本近代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历任九州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并曾担任枢密顾问官。担任东京帝大总长共两次，第一次是1901年6月至1905年12月，第二次是1913年5月至1919年9月。

女解放运动先驱。[1]她出现在《留东外史》的第八十至八十二章。第八十二章的题目即为“老福田演说社会学　黄文汉移情少女花”。该章写黄文汉访福田英子之子、《万朝报》[2]记者福田正平不遇，与福田英子谈话、午餐，用了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福田英子对历史和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她说：

> 世界各国，自立国以来到于今，没有不是经过几十次祸乱的。寻他那祸乱的根由，无一次不是因政府压迫国民太过，国民忍苦不堪，没法，群起来反抗政府。一次反抗不成，牺牲许多生命。政府得了胜利，更加压迫得利害，便激起二次反抗。二次不成，便有三次，三次不成，便有四次。个人拚着流自己的血，非将那残暴政府推翻不可，终久必然是国民得了胜利才罢。但是，人类有一种劣根性，就是想不做事，专吃安乐茶饭。世界上最会吃安乐茶饭的，只有做官一途。每日只是伸着手向国民要钱，不拿钱来，便又用他的手段压迫了。所以第一个残暴政府推翻了，第二个残暴政府又出现了，又凌逼起国民来。国民自是不服，又得大闹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是如此。所以有知识、有眼光的豪杰，一眼看穿了这肇祸的根子，于是“共和国”的名词，就产生于世界。

从“共和”的理念出发，福田英子反对袁世凯做专制总统。不肖生笔下的福田英子生活十分清苦，晚餐主食是又黄又黑的麦

---

[1] 福田英子旧姓景山，1892年前后与福田友作结婚，从夫姓。关于其生平村田静子所著《福田英子——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有详论，岩波书店1959年4月初版。下文提及的福田正平疑为不肖生虚构。福田英子的三个儿子中并无名福田正平、在《万朝报》当记者的。

[2] 黑岩泪香创办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是一份大胆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进步报纸。《留东外史》对待社会的态度与该报的基本方针相一致，有可能受到了该报的影响。

饭，菜只有一小碟萝卜，几片紫菜，一块咸鱼。按时间推算，出现在《留东外史》中的福田英子当在50岁左右。如果说黄文汉对山川健次郎的钦敬是出于对其人格的尊重，那么，对福田英子的钦敬之中则既有人格的尊重又有思想的共鸣。在思想倾向方面不肖生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如果从《留东外史》中寻找不肖生对日本现代思想的接受，那么他接受的似乎只有福田英子的共和思想。他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现实的批判、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批判，与福田英子的共和思想具有内在相通。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曾经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1871—1922），《留东外史》却是持否定态度，通过黄文汉的口骂他“盗名欺世”、“卑贱无耻”。这表明了当时留日中国人对宫崎滔天的一种看法。宫崎滔天本人也许是以“无赖”自居的，甚至孙中山给他题的字，都是“东方之无赖兮惟此公奇”[1]。

钦敬或者共鸣于山川健次郎、福田英子之外，《留东外史》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以自觉的民族意识为基本内容，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侵华直接相关，集中体现在小说第十四章和第四十九章的两个情节。

在第十四章，黄文汉去箱根旅游时住在温泉旅馆“福住楼”，一位名叫中村清八的日本陆军少尉前来拜会，态度傲慢，出言不逊，声称再加十万兵力一年之内可以吞并全中国。于是黄文汉黑下脸来拍着榻榻米斥责道：

> 十年之内，你不能吞并我中国。十年之外，我中国纵不吞并你日本，你日本能立国吗？你日本的命脉，都在我中国手里。中国不弱，你枪炮厂造船厂，有铁用么？（日

[1] 该题辞刊登在1913年2月14日《东京朝日新闻》第5版。

本每年产铁仅五百万吨，仰给于汉冶萍工厂者，年千馀万吨。）中国不弱，你五分之一的国民有饭吃么？（日本产米只能供五分之四，馀多仰给于中国。）中国不弱，你的国民有衣穿么？（日本产棉极少，多由中国运来。）中国不弱，你日本商业有发展地么？这都是你日本命脉所在。中国一强，便成死症。中国瓜分了，西洋各国，不能如中国这样宽厚的待你，也是死症。你既不能吞并中国，中国强，你不得了；中国亡，你也不得了。要中国维持现状的长此终古，你才好过日子。但是维持现状，岂能长久的？我看世界上的国家，最危险最没有希望的，就是你日本。你还得什么意？我是个中国学生，你是个日本军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要寻人闲谈消遣，未尝不可，只是须大家尊重人格。甚么话不可说，何必拿着国家强弱来相较量？如定要争强斗胜，我们不在疆场，就只有腕力的解决！

如此说罢，黄文汉从榻榻米上跳起来要决斗，日军少尉只好赔礼离去。黄文汉本来是不肖生的自况，这段话表达的是不肖生本人的反日情绪。其中对中日关系所作的社会学式解读，表明不肖生对相关问题进行过具体研究。

小说第四十九章写及中国亡命客在靖国神社闹事，通过亡命客之口痛斥日本人。王甫察和胡蕴玉二人某日黄昏到靖国神社游玩，刚进大门就看到两个日本警察拥着三个中国人往外走——

胡女士看那三个人，都穿着中国衣服，甚是齐整，年龄都在三十以内，面目各带了几分凶气，不像个留学生。一边走，一边用中国话骂道："狗入的小鬼，你们敢这般的欺辱我中国人！我中国人，哪一回亏负了你？甲午那一回，我们打了一个败仗，还赔了你们的钱。你们为甚么将

掳来的军器，都摆在这甚么游就馆里来出我们的丑呢！亏你们不要脸，还天天讲中日亲善，分明设这个所在，故意的羞辱我们。我们三个都是当军人的人，决不受你们的骗。恨不得一把火，将这游就馆烧了。这打毁一点儿，算得甚么！拿我们去，我们去就是，便是你们的天皇，我们也不怕。恼了老子们的性子，连皇宫都要捣毁你们的！”

就中国人在文学创作中对靖国神社进行抨击而言，这应当是最早的。甲午战争对两国国民精神、国民情感的影响，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留东外史》中有许多关于日本人的议论。类似的议论或由叙述者直接进行，或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展现出不肖生对日本人的总体认识。这种认识进入到国民性层面。比如小说第三十九章写中国留学生、纨绔子弟张孝友请日本人到高档餐馆会芳楼吃中华料理，便道：“日本人本来小气，既存了个钦敬之心，五脏七孔及周身骨节，都不由得呈出一种媚态来，胁肩谄笑的和张孝友乱谈了一阵。”其他诸如：“日本人受人家的好处，你越是不和他计较，他越以为得了便宜，从不肯十分推让。这种脾气，或者就是他日本国立国的根本也未可知”（第四十三章）；“日本小鬼最怕西洋人”（第九十五章）；“小鬼是最无信义的”（第九十六章）；“日本小鬼最是不肯给便宜中国人占”（第九十七章）；“你不知道日本鬼的性格，是普天下第一种生得贱的东西，你不和他强硬到底，这交涉没有结果的日子”（第一百四十九章）。这些零散的“日本人论”中包含着不肖生所理解的日本人国民性——贪婪、卑贱、无信义、欺软怕硬。这种否定性认识与著者自身的民族意识、反日情绪构成了互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展示日本人国民性的时候不肖生经常采用比较的视角，将中国人与日本人进行比较，形成了一种“国民性比较论”。例如在第四十三章，不肖生写道：“日本

人的脾气，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遇有人款待他十分殷渥的，心中必存着些感激的念头，稍稍自好的人，必不肯多受人的好处。日本普通一般人的脾气，却是不同，你没有好处给他，他不和你多来往，恐怕你沾光了他的去。”

在以上引述中，指称日本人时频繁使用的“小鬼”一词表明了不肖生将日本人“鬼化”（妖魔化）的倾向。在《留东外史》中，日本不仅被“鬼化”而且被“妓女化”，“妓化日本”甚至决定着《留东外史》的叙事结构。在鬼化、妓化日本的过程中，不肖生的“反日”从国家层面、国民性层面进入了文化层面。

《留东外史》直接“妓化日本”，是在第十三、十四章。

在第十三章“伏魔家风情惊老鸨　销金帐露水结同心”中，周撰带成连生到浅草游玩，向成连生介绍说：

> 这浅草，是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淫卖国三个字的美名，就以这里为发祥之地。你试留神看街上往来的女子，那〔哪〕个不是骚风凛凛、淫气腾腾？〔中略〕不晓得日本情形的，必以为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是贞静幽娴的。殊不知那淫卖国的根性，虽至海枯石烂，也不得磨灭。听说那年，下田歌子在妇人爱国会演说，发出个问题，教这些女人回答。他〔她〕说我们妇人爱国，既不能当海陆军，又不能学高等的工业，作个高等技师，应做甚么，才是最有效力之爱国？这些女人听了，有说入赤十字会当看护妇的，有说进女子家政学校，学了〔料〕理家的；有说学妇人科医学的；有说学产婆的。他〔她〕说都不对，只以当淫卖妇为女子第一要义，随说了许多当淫卖妇的好处出来。女子都拍手赞叹。

日语构词法是动词置于名词之后，这段话中的“淫卖”即“卖

淫”之义。红十字会日语汉字写作“赤十字会”。

周撰提及的下田歌子生于1854年，卒于1936年，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前文论及的福田英子亦曾受其影响。1872年十八岁的下田歌子进入日本皇宫当“女官”（地位较高的宫女），成为忠诚的皇室主义者，并且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推广女子教育。1879年结婚之后离开皇宫，但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投身女子教育事业，为了把日本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子培养成贤妻良母，于1881年开办了桃夭女塾（这个塾名显然取自《诗经》的“桃夭”篇），还前往欧美各国考察教育。1898年，为了防妇女劳动问题于未然，同时为了解决有损日本国家声誉的日本妓女海外卖淫问题，下田歌子发起组织了帝国妇人协会并担任会长。1899年创立的实践女学校，即为帝国妇人协会的重要事业之一。该校就是现在日本著名的实践女子大学的前身。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的时候，下田歌子正担任日本华族女学校的学监，她十分关心清国的教育问题。清国官员前往日本考察，也经常拜访她。1902年秋，她还推荐河原操子到上海的务本学堂（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第一所女校）当教习。[1]

下田歌子作为著名教育家，不会在讲演会上鼓励日本女子卖淫。不肖生明白这一点，所以，借周撰之口发上述谈论之后，立即在小说第十四章开头处进行修正，写道：“话说成连生听了周撰一篇话，虽不十分相信下田歌子会如此演说，然知道日本的卖淫政策，是真的，不能说周撰的话全无根据。”这样，不肖生作为小说叙述者在洗净下田歌子的同时，确认了日

[1] 参阅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的记述。东京·第一书房1981年5月初版。下田歌子去世之后日本出现了数种关于她的研究资料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当红女作家林真理子以下田歌子的生平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帝之淑女》。该小说1989年5月至翌年5月连载于《新潮45》，1990年5月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

本的“淫卖国”性质。

基于对日本“淫卖国”性质的认识，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日本女性不贞的故事。“游廓”（妓院街）的艺妓、妓女理所当然地卖淫，在留学生住宿处当“下女”（女佣）的日本女子也动辄与人发生性关系。小说中第一个正式出现的日本女子名叫樱井松子，周撰与她素不相识，但一封情书就勾引到手，第二次见面即开始同居。《留东外史》中的日本女护士亦为变相的卖春妇。在第五十一章中，王甫察去杏云堂医院探视同乡，看上了名叫久保田荣子的小护士。荣子只有十五六岁，杏脸桃腮，粉妆玉琢，王甫察动了染指之心，略使手段，第二日便发生了关系。接着，不肖生解说道：“留学生进医院，嫖看护妇是极普通的事。医生不特不禁止，并希望留学生与看护妇，有割不断的爱情，好在医院里久住。”“若是青山医院，还专一挑选些年轻貌美的看护妇放在里面，以便留学生奸宿。”〔1〕出身于庶民社会的“下女”、看护妇不贞，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小姐亦然。鸟居子爵的女儿鸟居荣子，也被在同文学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周正勋勾引（第三十一、七十四、七十五章）。《留东外史》中的日本女子有职业和阶层的差异，但在“淫卖”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她们与留日、旅日的中国人发生性关系，几乎和握手、鞠躬一样简单、快捷。日本女性的“妓女化”导致了日本国的“妓院化”。所以，在《留东外史》中，民宿、医院甚至电影院，都成了男女发生关系的场所。

---

〔1〕 对日本女护士的类似看法在当时的中国似非个别。周作人发表在1920年10月22日《晨报》上的《排日的恶化》一文中说：“日前在上海报上看见关于留日学生自杀的通信”，“有些报上说是因为和一个看护妇失恋而生的，一位留学生下判语道：‘但日本看护妇即是娼妓淫卖之一种，中国留日的人个个都晓得的，有了钱就可以和他苟合，怎么还会失恋呢？’这种概括的断定，武断的证据，很有专制时代官吏舞文的笔法，实在不是我们受过一点新教育的青年所应该有的。”这位留学生的判语如果不是《留东外史》影响的结果，就可以作为《留东外史》相关描写的注脚。

在中国传统的日本观中，"淫"本来就是日本人的重要特征之一。[1]不肖生对日本"淫卖国"形象的塑造，显然是在同一延长线上进行的。在伦理感觉方面日中两国之间固有差异。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日本人的性观念不同于中国人，日本女性亦无中国女性持有的那种贞节观。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为了积累资本、发展国力不择手段，甚至将女性工具化，派遣海外卖春妇也成为手段之一种。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海外卖春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影片《望乡》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并引起巨大反响，该片的主人公山川阿崎（阿崎婆）等"南洋姐"就是在昭和初期通过民间机构前往南洋卖淫。具有自觉的殖民意识的日本近代著名作家二叶亭四迷（1864—1909）亦将往西伯利亚输送日本妓女作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手段。[2]在当时，甚至日本人自己都发出了"呜呼淫卖国"的叹息。[3]就与历史事实的对应关系而言，《留东外史》对日本国和日本女性"妓性"的展示是写实性的。小说视浅草为"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为"淫卖国"之名的发祥地，也并非偶然。在明治至二战结束前的半个多世纪，浅草一直是东京"风俗业"（色情行业）繁荣地之一，著名的妓院街吉原游廓即位于浅草。甚至在某些道德感较强的日本人看来，浅草也是不洁之处。在佐藤春夫的小说《都市的忧郁》中，"我"（一位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妻子不愿意到浅草公园去演戏，于是"我"批评她："你说你不愿意到浅草去？你是说那

〔1〕参阅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第六章对"淫倭形象"的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2〕关于这个问题王中忱在《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四迷的中国之旅》一文中有论述。文见《越界与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3〕参阅木山英雄在《〈留东外史〉是一部怎样的小说》一文中的考证。文章收入《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大里浩秋、孙安石编，御茶之水书房2002年5月31日出版。

样下流的地方不愿意去吗？”永井荷风是日本近代唯美派、颓废派作家，作品中多写妓女，他在二战中就是经常出入于浅草。代表作之一《墨东绮谭》，就是以妓女为主人公。

《留东外史》用“淫卖国”指称日本、展示日本女子的“不贞”确有现实根据，但是，对于不肖生来说，类似的叙写并非为了丰富“日本风土记”的内容，而是用“揭短”的方式侮辱日本的“国格”，释放反日情绪。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上，中国男性与日本女性之间的性关系被赋予了“国家”、“民族”的意义。《留东外史》中的这样两段描写意味深长。在小说第十六章，周撰拿了国家公费不上课、终日与樱井松子苟且，便有人写讽刺诗贴到他门上。诗云：“女人本是两脚狐，一入女人万事无。可怜祖国苍生血，供养倭姬叫不敷。”这里，周撰与樱井松子的关系被解读为“祖国”与“倭姬”的关系。周撰是以结婚的许诺骗樱井松子与他同居，事后别人问他当初为何撒谎，他回答得振振有辞：“日本鬼欺负我们中国人，也欺负够了，我何妨骗骗他〔她〕。我这种行为止限于对日本女子。凡是上过日本淫卖妇当的人，听了我对松子的举动，无有不说做得痛快的。”（第一百四十八章）在国家问题被引入两性关系之后，性问题并不再仅仅具有生理的意义，民族问题从中凸现出来，骗与嫖甚至成为民族复仇的手段之一，奇特的“性别民族主义”得以成立。在发泄性欲的同时发泄对日本的仇恨，对于留日反日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愉快的体验。《留东外史》在描写中国恶党们类似的“嫖行”的时候间或流露出赏玩的态度，这或许是原因之一。

《留东外史》的“反日”不仅贯穿了国家关系与国民性、伦理观念等不同层面，甚至采取了牺牲道德的形式。义正词严地训斥日军少尉的黄文汉也曾用无赖手段抵抗日本：他故意违反日本法律打赤脚在街上行走，被警察发现，却偷偷扭断木屐的纽带，为打赤脚制造借口，反过来训斥、戏弄警察。在“那

警察那〔哪〕里看得中国人在眼里呢”这种叙述及黄文汉对警察的训斥（所谓“以后对我们中国人，宜格外恭敬些才对”）中，无赖式抵抗获得了民族主义的合理性（第九章）。以“国家”（民族）牺牲道德的倾向在朱锺捉弄冢本平十郎的情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朱锺留学日本时其父来日本做生意，因借款与放高利贷的冢本发生纠葛。后来朱锺带冢本回无锡讨还被同族人骗去的钱款，特意买通一名患性病的妓女引诱冢本，致使冢本患了性病，生殖器烂掉。朱锺吩咐妓女的时候说：“日本鬼是我们的仇人，能害他一个，便报了一个人的仇。”当这种性行为被赋予“国家”的意义、妓女传染性病的行为成为民族复仇方式的时候，国家与民族发生了畸变。不肖生为抵抗日本付出了道德代价。

《留东外史》“留日反日”的形成无疑是甲午战争之后国家利益相冲突、国民感情恶化的产物。而且，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正与中国人反日情绪的高涨过程相重叠。1914 年 12 月 15 日不肖生开始创作《留东外史》，三周之后的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亲手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高潮。《留东外史》正是在中国人反日情绪普遍高涨的时期创作的。

对于不肖生本人而言，包含在《留东外史》中的反日情绪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早在去日本留学之前的 1905 年，他就因为要求公葬陈天华而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以至于被开除学籍。回国之后他给自己养的一条狗取名“甲板”（JAPEN），抗战开始后自己和儿子都投身抗日战争。

五　不肖生的文化身份

不肖生对在日中国人、中华民国、日本、日本人的叙述同

时也是对“自我”的叙述。隐藏在这种叙述背后的“自我”，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但这并非不肖生的全部，《留东外史》中潜存的不肖生的文化心态和伦理观念更具复杂性。

这复杂性首先体现在黄文汉这一形象的塑造上。

黄文汉是《留东外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对于小说结构和叙事过程的意义，他的存在使小说得以表现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孙中山、宫崎滔天、山川健次郎、福田英子等历史人物乃至日本民谣、艺妓文化都是通过他的活动编织起来、进入作品的。《留东外史》采用的是连环叙事方法（类似于《水浒传》和《儒林外史》），人物和故事处于不停的转换之中，小说结构容易流于松散，而黄文汉的存在使小说的结构获得了相对完整性。黄文汉在第四章出现，他与日本风尘女子中壁圆子的爱情纠葛断断续续贯穿了整部《留东外史》。更重要的是，对于不肖生来说黄文汉具有自传色彩。如前人已经指出的：“书中之黄文汉乃作者夫子自道。”[1]黄文汉故事的某些素材即取自不肖生的个人经历。小说第四十六章写黄文汉与日本相扑大力士比武发生争执，脚踢灯柱伤了脚，就是根据不肖生的亲身经历改写。[2]黄文汉这个人物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不肖生的人格理想、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乃至趣味。他文武双全，在日本人面前尽显英雄本色。日本警察、军人、律师被他戏弄、斥责，上场比武打败日本相扑大力士，控制日本女子更是得心应手。不仅在东京嫖，去箱根旅游途中甚至叫来三个艺妓为自己表演，将为首的留下过夜。面对日本人，黄文汉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作为男性，都保持着主动性与主体性，一副“君临”姿态。

---

〔1〕《民国人物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0 年 8 月版。
〔2〕参阅向为霖《我的父亲平江不肖生》。

“黄文汉”的命名具有象征性。《留东外史》中除了真实的历史人物，某些人物的命名并非随意为之。命名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影射性的，即根据被影射者的原名改写。例如“胡蕴玉”来自傅文郁，“蒋四立”暗指蒋士立，“莫廷良”来自民国初期中国驻日本临时代办马廷亮，“海子舆”则是影射袁世凯政府的驻日公使陆宗舆。[1]二是调侃性和象征性的。“周撰”含有“胡诌乱撰”之义，“李锦鸡”之名讽其金玉其表、搔首弄姿，第九十一章又出了一个当过国会议员、流亡在日本、名叫“邹东瀛”的。小说第二章中的一位日本女子品行不端，却名之曰“正子”。第七十八章出现一位丈夫在日俄战争中战死、以放高利贷为生的日本老太婆，不肖生介绍说：“这老婆名叫安子，生性贪酷异常。”“安”这个汉字在日语中本有便宜（廉价出售写作“安卖”）、平静之义，“生性贪酷异常”却名之曰“安子”，是为讽刺。黄文汉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其姓名可以解读为“黄种人·文化·汉民族”的相加，是文化优越感和民族意识的象征物。

“黄”作为姓氏与不肖生的姓氏“向”不无关系。《留东外史》的故事是发生在日本，而在日语中，“黄”与“向”作为中国人的姓氏都读こう（ko）。小说第十九章写黄文汉到长崎住在旅馆，曾经交往过的日本妓女静子来找“黄先生”，小说解释道：“那〔哪〕晓得中国的姓，用日本话发音，相同的就是这黄字的音最多，如姓高的，姓顾的，姓古的，姓孔的，姓幸的，姓胡的，姓龚的，姓向的，姓虞的，还有许多一时间也数不清，虽其中长短音稍有分别，然卒然听去，时常会听错。”所以旅馆的人费了一番周折，才从下榻的许多中国人中找出黄文汉。“老黄”或者“黄先生”与“老向”或者“向先生”一

〔1〕 参阅木山英雄在《〈留东外史〉是一部怎样的小说》一文中的考证。

样，在日语里都称“こうさん”(ko-san)。

结合小说中唯一的一处有关西洋人的描写来看，这个“黄”又具有“黄种人”的暗示性。

《留东外史》仅有一处写及白种人，在小说第五十章“王甫察演说苦卖淫　曹亮吉错认好朋友”。所谓“苦卖淫”并非指卖淫生活自身的苦，而是指以西洋人为对象卖淫的苦。这段叙述通过王甫察的口，转述了在港口城市横滨卖淫、因而不得不经常接待西洋人的日本妓女月子的一段话：

> 月子说中国的厨子及杂役人等，虽龌龊得不可近，然尚是黄色人种，面目没得十分可憎的。并且来的人，十九能说几句日本话，举动虽然粗恶，不过是个下等人的样子罢了。惟有西洋人，身上并看不出甚么脏来，不知怎的，一种天然的膻气，触着鼻子，就叫人恶心。这种膻气，没个西洋人没有。还有那通身的黑毛，一根根都是极粗极壮，又喜欢教人脱得赤条条的睡，刺得人一身生疼的。那一双五齿钉耙的手，最是好在人浑身乱摸，他摸一下，便叫人打一个寒噤。有些下作不堪的，还喜欢举着那刺猬一般脸，上上下下嗅个不了，那才真是苦得〔比〕受甚么刑罚还要利害。

在这段叙述中，西洋人与“黄色人种”相对，并且被“兽化”。与前文将日本人“鬼化”和“妓化”相比，这种“兽化”是在更深层次上的“非人化”，不肖生的人种意识由此体现出来。这种意识可以看作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华夷”观念的残留。

西洋人在《留东外史》中毕竟只是一晃而过，登场人物主要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因此“文”与“汉”二字比“黄”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突

出表现在第一百一十三章的一段描写。章四爷担心某些留学生文字不通于国家不利，另一位亡命客周克珂却认为：“这有何可虑？西洋各国不像中国这么研究文字，日本完全没有文字，不都是极强极富吗?”于是章四爷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 各人立国的根本不同。中国数千年是讲文化的，不能与他们以工立国、以农立国、以商立国的相比较。而且他们也未尝不研究文字。至于日本，不过如贫儿暴富一般的，想和世家大族攀亲，他自己立国的根本，一点也没有。这回欧战终结，无论最后之胜利属谁，世界各国，必渐渐趋重文化。那时日本这种没文字的国家，看他能再有一百年的国运没有？语言文字，关系国家的命运极为重大，怎的说是不可虑的事？

无疑，这里的文化优越感属于不肖生本人，构成了不肖生将日本人“鬼化”、“妓化”的主要心理背景。黄文汉作为“抗日英雄”所具有的自信和威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的优越与“汉”的气派这二者的结合。与此相对应，能够将日本人从“鬼”与“妓”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则是“中国化”。《留东外史》中获得肯定性描写的日本人常常被“中国化”，痴恋中国留学生张思方的山口节子就是如此。张思方初见节子即为其美貌所动，心里想：“我到日本这多年，像这样清雅的姑娘，我还没有见过。他〔她〕脸上一点脂粉也没有，那好看纯是天然的肉色。并且他〔她〕那面貌，绝不像日本女子，就是身材态度，也都和中国女子一样。若是用中国衣服装扮起来，谁也不能说他〔她〕是个日本人。”纯情的山口节子长的像中国人，另一位日本贞女柳藤子之所以成其为贞女，则是因为“从小时跟着他〔她〕父亲，受了些中国教育，颇知道些三贞九烈的道理”。柳藤子与王甫察相识之前依然是处女，被王甫察欺骗失

身之后仍然苦等一去不归的王甫察（第六十章）。类似的描写暗示出一种将日本人“中国化”的逻辑，这“中国化”体现为外在的表象，同时体现为内在的道德感。

衣冠服饰本来是文化符号。山口节子后来在神田的绸缎庄看到一位中国女学生被中国服装打扮得美丽，回到家便要张思方帮她买衣料做中国衣服穿，为此不惜把两枚戒指送进当铺。在《留东外史》的一百六十章（即最后一章），黄文汉从中国回到东京接他的日本情人中壁圆子，小说对他的描写是“一个穿中国衣服的健壮男子”，料理店的日本女招待看到黄文汉也是“觉得中国装束好看”。在这两个情节中，服装都具有服装之外的意义。这种审美观中包含的中国文化优越感不言而喻。这样看来，《留东外史》用“都穿着中国衣服，甚是齐整”描述那三位在靖国神社“抗日”的中国亡命客亦并非偶然。在那个情节中，服装同样承担着确认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功能。

《留东外史》把国家问题与性别问题结合在一起，在性别框架中叙述故事，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暗示为“男／女”关系、并且是“嫖客／妓女”关系。因此，不肖生在黄文汉这个人物的塑造过程中暗示的女性观更值得注意。

从对中国女子的“裹脚”这一封建陋习的讽刺性描写来看，不肖生的女性观自有其进步的一面。小说第五章“肆丑诋妙舌生花　携重资贪狼过海”对中国留学生朱钟的妹妹蕙儿来到东京后随日本女子蝶子去洗澡的情形做了如下描写：

> 蕙儿同蝶子到得浴堂，见蝶子在外面即将衣服脱得精光，蕙儿就很觉不好意思。隔着玻璃望浴堂里面，都是女人，没有穿着衣服的，只得面壁也将衣服脱了。他的脚虽是曾放过的，然小时已将骨头包死，五指都拳做一团，全不曾打过赤脚，又势不能穿着袜子进去。见蝶子已将玻璃门打开，对自己招手，只得一扭一拐的跟着走进门来。不

两步，踏着木板一滑，倾金山倒玉柱，足的跌了一交。红着脸扒了起来，就蹲在板上，不敢再走。弄得一浴堂的女人都停手不洗，望着他一双脚嗤嗤的笑，羞得蕙儿几乎要哭了出来。

在这个场景中，通过小脚确认的蕙儿的文化身份在与日本女子的对比以及日本女子的嘲笑中遭到否定。

不过，类似的进步性在《留东外史》中非常有限。涉及男女关系的时候，不肖生的女性观就表现出传统性与落后性。黄文汉成为不肖生笔下的英雄不仅在于他是“中国人”，同时也在于他是“男性”——不尊重女性、视女性为玩物的男性。作为在日中国人的两大“嫖星”（即“南周北黄”）之一，黄文汉自称到日本“研究嫖学”并且总结出“嫖经”传授他人。中璧圆子是《留东外史》着笔最多的日本女性，她被塑造为从良的风尘女子的典型。身为女性，但她忠诚地维护着男性中心的伦理秩序，完全是黄文汉意愿的执行者。为了获得黄文汉的爱情，听黄文汉说哪一位女子的打扮漂亮，便按照黄文汉说的去打扮，尽力迎合。自己身体不好，便纵容黄文汉与下女苟且。最后，她又随黄文汉回中国。实藤惠秀在谈及《留东外史》中中国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时说：“本来，他们喜欢日本女子，但并不尊敬。悲剧之因在此。”[1]实藤只表达了一半的真实。黄文汉不尊敬日本女子，同样不尊敬中国女子，中国女留学生胡蕴玉也成为他的玩物。“女人本是两脚狐”那首打油诗表现的并不仅仅是对于“日本女性”的态度，而且是对于“女性”的态度。以女性为玩物的黄文汉被写成英雄，而以男性为玩物的胡蕴玉却尽受嘲讽，这种差异显示了不肖生的“男性中心主

[1]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义”观念。不肖生的女性观是超越国籍的。他在写恶党嫖妓时流露出的某种程度的欣赏态度即同样与此有关。

男尊女卑伦理观念在《留东外史》中也承担着民族主义功能，成为不肖生“妓化”日本的心理背景之一。只有在男尊女卑的伦理秩序之中，通过将日本女性化、妓化从而贬低日本这一手段才是有效的。“妓化日本”作为民族意识的表现虽然因为当时特殊的日中关系获得了合理性，但是它作为女性观的表现则是反动的。《留东外史》对下田歌子的嘲讽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包含着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否定。小说第八十二章有对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学校的直接讽刺。黄文汉喜欢上了君子，但觉得君子年龄小、可能尚不懂男女之事，中壁圆子却说：“十五六岁了，你说他还怕不懂得这事？住在东京的女子，又在实践女学校上课，只怕已经开过好久了，哪里会不懂得？”就是说，“在实践女学校上课”和“住在东京”一样成了君子失贞的原因。不肖生也许是认为女子受了教育才变坏（如胡蕴玉），才丑化推行女子教育的下田歌子。

由于同样的原因，《留东外史》写及众多日本女性，却难以发现日本女性的独特之美，没有塑造出个性化的日本女性形象。将《留东外史》展示的日本女性与周作人、郁达夫对于日本女性的认识对比，这种认识的差异性就凸现出来。当“妓化”或者与此相反的“中国化”成为把握日本女性的方法的时候，日本女性成为“妓女”或者“准中国女性”，成为“献身者”，而日本女性自身却被这三者遮蔽了。

不肖生伦理观念的传统性还表现在对忠孝、贞节的注重。王甫察和胡女士这一对男女“恶党”的恶行之一，就是蔑视伦常。小说第五十三章“骂父亲浪子发奇谈　闹脾气军人闯祸”，叙述王甫察骂父，都在王甫察话后的括号中用“不肖生自注”的方式直接表达否定态度。王甫察说：“父亲有甚么要紧！父亲这东西，对我感情好，和朋友一样，亲热亲热没要

紧。若对我感情不好，简直可以不认他！他有什么架子可以拿得！”于是“不肖生自注”曰：“著者曾亲闻其语，几饱以老拳。”王甫察说：“大凡家庭压制，使人不能享自由的幸福，就是这父亲坏事。我小时候，这种苦也不知受过多少。我每次受痛苦，受到极处，恨不得一刀将他攮死，只自恨那时年纪小，没有力气，做不到。”于是“不肖生自注”曰：“著者述此等语，虽自信不为虚构，然已造万劫不复之孽。”小说第九十一章讽周之冕在母亲去世、守孝期间嫖妓，第一百一十六章写名门之女秦次珠与“西崽”胡混，不惜顶撞老父亲，遭熊义训斥，熊义直言“你生长名门，不是不懂礼教的，这般倒行逆施的行为，应是你做的么”？叹息道：“古人说，孝衰于妻子，我看于今的社会，并不必妻子，直可谓孝衰于淫欲。”可见不肖生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伦理主义者。他对某些“恶党”的讽刺与亵渎，也是在伦理的框架之内进行的。著者仇恨在东京为袁世凯卖命的蒋四立，就把他演绎成《水浒传》中的恶人蒋门神的灰孙子；海子舆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著者就把他演绎成日本人大隈重信（1838—1922）的干儿子。前述“妓化日本”、通过侮辱日本女性满足民族复仇心理，亦为“伦理攻击”之一种。

综上所述，不肖生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局部的、有限的批判，但他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体现者，甚至具有文化帝国主义心态。文化身份的传统性一方面承担着民族主义的功能，同时又在民族主义的范畴之外导致了不肖生对“现代”的消极态度。他在《留东外史》开头处叙述自己动笔环境的时候用“尘雾半天，阴霾一室”来形容东京并非偶然，这里面包含着对待大都市东京的态度——一种抗拒、疏离，这本质是对“现代”的排斥。这种态度在小说中通过加藤春子的口骂“万恶的东京”（至少两次）表现出来。这种抗拒态度使《留东外史》难以发现东京这座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东方城市的

现代意义。《留东外史》本应成为都市文学，但最终没有。不肖生在日本找到的感觉，与新感觉派或者革命文学派找到的感觉大不相同。《留东外史》描绘的东京与崔万秋的《新路》描绘的东京具有很大差异，这差异固然与“大正东京”与“昭和东京”的差异有关，但更主要的在于不肖生与崔万秋文化心态的差异。文化帝国主义心态使不肖生与“现代”擦肩而过，也使他不可能去探讨日本文化的异质性。当他使用文化优越感作为抵抗工具的时候，他为这种抵抗付出了代价。

六 文体的多重性

《留东外史》问世之初即被视为“旧小说”并被后来的文学研究者划归“鸳鸯蝴蝶派”，这是理所当然的。它成其为旧小说不仅在于它采用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更主要的在于它容纳了旧小说的多种类型，甚至把异国的人物和风景纳入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范畴之中。

就基本内容而言《留东外史》当属“黑幕小说”（国际性的黑幕），就叙述方法而言则是典型的讽刺小说，而从题材的异域性来看它应当划归“留学生文学”——尽管“留学生文学”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被广泛使用。内容的驳杂以及立意、题材、叙述方法的特殊性，造成了《留东外史》小说类型的暧昧特征。即使是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系列中，《留东外史》也具有异质性。其“鸳鸯蝴蝶”性质不过是“黑幕”的衍生物，而同样作为“黑幕”衍生物的，还有“英雄故事”。

不肖生与恶党之间存在着道德观的对立，因此难以将“绌善而崇恶”的态度贯彻始终。当他忍无可忍、从恶党逃离的时候，即走向才子佳人故事。小说第二十四至二十六章前后，先

是写张全、罗福、朱继霖三位中国留学生打同一位日本下女的主意，丑态百出，接着写秦士林与汪祖经两位男士为女留学生吴品厂争风吃醋，然后叹息道："不肖生写到这里，一枝笔实在污秽不堪了，极想寻一桩清雅的事来洗洗他〔它〕，却苦留学界中，清雅可写的事委实有限。在脑筋中寻来寻去，仅寻了件香艳的事，却喜这事，是看《留东外史》诸君欲急于知道的。"于是，从第二十六章"旧梦重温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种兰因"开始至三十章，写中国留学生张思方与日本少女山口节子的爱情故事。这种转换体现在小说类型上，就是从"黑幕"向"鸳鸯蝴蝶"的转换。

张思方年方十七，美少年，聪颖无比，就读于庆应大学。山口节子年方十六，亦极美。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不想张思方患脚气病去热海养病之际，节子的表兄藤本向她求婚，还污蔑中国人说："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最无天良，最靠不住。"节子年幼无知一时失了判断，再加上父母有心促成，终于和表兄结婚。后来听说张思方因为她的离去急得昏迷，方知上了表兄和父母的当，于是离家出走，为谋生屈尊当下女。半年后张思方与朋友去荒川赏樱，到一个叫做"大正亭"的酒楼午餐，巧遇在那里打工的山口节子。节子哭诉了二人分手后半年间的种种变故，洒泪而去。第二天的报纸上出现了"江户川内之艳体尸"的消息，暗示节子殉情而死。张思方万念俱焚，辞掉官费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仅就这个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而言，将《留东外史》划归"鸳鸯蝴蝶派"作品十分恰当。

英雄故事同样与从恶党的逃离直接相关。第六十六章续写黄文汉帮助苏仲武引诱日本小姐加藤梅子导致梅子住院之后，笔锋一转，道："于今且另换一副精神，写一件英雄事业。不肖生换一换脑筋，诸君也新一新眼界。事情未必果真，做小说的，不能不自认为确凿，是非真伪，看官们自拿脑筋去判断，与做书的无干。"这"英雄故事"即前述吴大銮暗杀蒋四立的

故事。在《留东外史》中，与“英雄事业”类似的打擂比武、武林传奇也是被这样穿插进来的。诸如黄文汉与日本相扑大力士进行摔跤比赛（第四十六章），萧熙寿在三崎座与日本人比柔道（第九十五、九十六章），吴寄盦蛮乡打猎（第九十七章），霍元甲打擂、被日本人害死等等。《留东外史》因此具有了武侠小说的成分。不肖生以《江湖奇侠传》开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其武侠小说的雏形正是在《留东外史》中孕育的。

与小说类型的暧昧性（多重性）相反，《留东外史》“文体”的传统性一目了然。在其叙事过程中，甚至“日本”这个异国都被纳入中国传统小说的氛围之中。

《留东外史》对浅草的描绘是这样的：

> 这浅草是东京名所，秦楼楚馆，画栋连云，赵女越姬，清歌澈晓。虽说没有什么天然的景致，人力上游观之适，也就到了极点。有名的吉原游廓（公娼）即在其内。去年吉原大火，将数十栋游廊，烧个罄尽，从新起造，较前规模更加宏大。铭酒屋，亦惟此处最多；活动写真馆，有一二十处，都是极大的西洋房；料理店、弹子房更不计其数。（第十四章）

在这种描绘中，异国风景的独特性淹没在“秦楼楚馆”、“赵女越姬”之类中国古典小说的套语之中。如果说类似的表达尚且是旧小说语言的惯性造成的，那么小说为中国留学生熊义与日本女教师鸠山安子相遇创造的环境，则体现了不肖生的传统趣味。小说写道：

> 这时正是十二月初间天气，久雨初霁，入夜霜清月朗。大冢地方，有几座小山。熊义住的房屋，有两方面靠

着山麓，山坡上，一望皆是松树，高才及屋，密密丛丛，苍翠蓊郁。〔略〕熊义既是纳闷不过，背操着手，闲闲的向门外走。从霜月里远望这座山时，苍茏一抹，隐隐如在淡烟轻雾中。信步向山麓走去，穿林踏月，渐渐把秦家的事忘了。一个人立在松林中，万籁都寂，但有微风撼得松枝瑟瑟作响。立了一会，觉得没穿外套出来，身上有些寒冷。正要举步下山，忽一阵风来，带着很悠扬的尺八音韵。停步细听，那声音即从松林中穿出，愈听凄切动人。（第一百一十八章）

乍一读来，很难想象这是对东京的描写。熊义循声找到的是吹竹笛的鸠山安子，于是又上演一出才子佳人的喜剧。写景状物是如此，日本女子中壁圆子甚至用潘金莲的口气说话。类似的描写体现了不肖生传统文人审美观念的顽固性。

在东京开始创作的《留东外史》本来具有实行“小说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东京的异文化环境之中。同一时期留学日本的欧阳予倩就是在东京组织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梁启超也是接受日本的影响建立起“新一国之民新一国之小说”的观念。而且，这两位都被《留东外史》写及。小说第十九章提到欧阳予倩在东京演“新剧”（话剧），第一百五十八章写梁启超演讲被人追打。无法确认不肖生是否了解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但他本人并没有表现出创作“新小说”的愿望。

不过，旧形式与新价值并非绝然对立。清末身居日本的梁启超、鲁迅、周作人均用文言写作，却同样表现出自觉的现代性。《留东外史》的文体既有传统性也有现代性，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融和的特征。——虽然其现代性是呈现出“被动”的特征。

《留东外史》的“现代”主要起源于“日本”在三个层面

上的进入。第一是“现代物事”的进入。东京是当时东北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电车、电话、飞机、博览会都已经登场，并且进入了《留东外史》。《留东外史》可能是中国最早写及飞机、空中观览车的小说。飞机第一次在中国起飞，仅仅是不肖生创作《留东外史》四年之前的1910年的事情。第二是日语汉字词汇乃至日语本身的进入导致的语言的陌生化——这一点与第一点具有关联之处。第三是不肖生接受了日本作家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表现在《留东外史》中，《留东外史》因此获得了超越国界的性质——或称之曰“东亚性”。

日语汉字词汇进入《留东外史》是一个必然。当日本事物进入中国小说的时候，指称这些事物的词汇随之进入。这与翻译促成语言的进化表现出相同的逻辑。“活动写真”（电影）、“料理”（饭菜）、“车掌”（乘务员），“代议士”（议员）、“运转手”（司机）、“奥样”（夫人）等日语词汇就是这样进入《留东外史》的。日语书面语本是根据汉字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日语是汉语的殖民地。而当日语汉字词汇反过来进入汉语的时候，语言的“逆向殖民”现象发生了。这种现象随着五四时期中国留日群体写作活动的展开出现一个高潮，《留东外史》即处于这个高潮中。

比日语汉字词汇的进入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本身的进入。如前所述，对于身处日本社会的在日中国人来说，日语是生活与学习的工具，并且是征服日本女子的工具。不肖生的大胆之处在于：将日语文本直接植入《留东外史》。周撰用日语写给樱井松子的情书，黄文汉去箱根旅行的途中召艺妓时唱的日本民谣，都是直接用日语。日文汉字词汇和日语的介入破坏了汉语的纯粹性并将汉语陌生化。

《留东外史》作为留日者在日本开始写作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在明治、大正之交的日本作家中，给予《留东外史》直接影响的是小杉天外。

《留东外史》中有两处写及小杉天外的作品。第一处在第二章。二度留学、刚到东京的周撰听说有一位美貌的日本女学生每天从住所附近走过，便精心打扮了去路上等候。但他忘了当天是星期日，学校不上课，结果无功而返。回到住处，便"闷闷的拿了小杉天外著的コブシ（《拳》）小说翻阅。心想节子以一个有名博士的夫人，多贺子以一个堂堂侯爵的夫人，都为着新庄政男的年少貌美，宁牺牲自己的名誉财产，极力与他勾搭，可见日本女子好色，较男子尤甚。想到此处，益自信以自己这般面孔，在日本吊膀子，绝不至失败。"[1]第二处在第二十三章。学籍挂在明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张全，为了追求日本小姐东条文子，某日特意穿上新校服，戴上方帽子，靴子刷得干干净净，提着书包前往东条家门前等候。与文子相遇之后来到空旷的大久保练兵场，文子打开他的书包来看，里面既不是讲义，也不是教科书，而是两本棋谱《布石精要》和三本小说《魔风恋风》。原来张全是提着假书包装样子。文子问他《魔风恋风》里写的是什么，他尴尬地回答道："不是我的，我没有看过这书。是个朋友托我买的。"接着是这样一段描写：

> 文子翻着《魔风恋风》第二本，见上面画着一个女子背面低头站着，一个男子站在背后握住女子的手，俯着头去接吻，笑着指与张全看。张全到这时分，还有什么客气？旷野无人，天又将黑，便也照那图画的样子，接了个极美满的吻。登时春意融融，实是平生初经之乐。

这里提及的《魔风恋风》和前面提及的《コブシ》，均为小杉天外的小说名作。

---

〔1〕 コブシ不肖生译作"拳"，但这个读音在日语汉字中还可以写作"小节"（即小调、小曲）、"辛夷"等。

小杉天外（1865—1952）出生于日本东北的秋田县，1892年登上文坛。《魔风恋风》1903年2月15日至9月16日在《读卖新闻》上连载，前篇、中篇、后篇分别于当年5月、11月、翌年5月由春阳堂出版单行本。作为“新闻小说”（即报纸连载小说），《魔风恋风》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コブシ》同样如此。这部小说1906年3月至1908年1月在《读卖新闻》上连载，同样是分为前、中、后三篇，1906年10月至1908年7月由龙光阁出版单行本。《魔风恋风》和《コブシ》的成功使小杉天外成为明治后期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1908年七月号的《中央公论》甚至以“小杉天外论”为总题发表了一组评论文章。不肖生1907年留学日本，那正是《魔风恋风》成为畅销书、《コブシ》在报纸上连载并获得众多读者的时候。

在艺术主张方面，小杉天外是一位写实主义者，并且是自然主义者。在《中央公论》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即有人将其与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进行对比。小杉天外的文学主张明确体现在其成名作《流行歌》（1902）的序文中。该序文主张放弃善恶美丑的判断，仅仅按照事物固有的自然状态进行描写，被看作小杉天外的写实主义宣言。在道德观方面，小杉天外具有鲜明的平民主义倾向。他不认为低级的肉欲和行为只有下层社会才有，所谓受过教育、有羞耻感的中产阶级同样有。他在《コブシ》中将博士夫人、侯爵夫人描写成好色者，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不肖生在艺术主张和道德观两个方面都接受了小杉天外的影响——至少是与小杉天外保持着高度一致。前面关于《留东外史》真实性的论述已经证明了不肖生的写实态度，不肖生借周撰之口称日本“淫卖国”时对“大户人家的小姐”的嘲讽，亦与小杉天外对中产阶级的否定相一致。不仅如此，在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方面，《留东外史》亦多有模仿小杉天外作品之处。

张思方与山口节子的“才子佳人”故事中打着《コブシ》和《魔风恋风》两部作品的印记。就身份而言，节子和《コブシ》中的博士夫人、侯爵夫人一样，是来自日本中产阶级家庭。而且，“节子”这个名字显然是从《コブシ》中的博士夫人节子那里借用的。山口节子与张思方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基本结构是：张思方与山口节子相恋，在他患脚气病去热海疗养的时候，节子的表兄藤本出现，节子被骗，与藤本成婚，后来明白真相，以死殉情。这一故事结构与《魔风恋风》故事的基本结构非常相似。《魔风恋风》叙述的是帝国女子学院校花萩原初野的故事。初野在学校创立十周年的演艺会上演出英语剧，风光一时，不巧，就在当天，她骑自行车在校门前与一位青年相撞，摔倒在地上臂骨折。异母兄长不帮助她反而虐待她，她离开家庭独自谋生，又打工又考试积劳成疾，患了脚气型心脏病。好友芳江的未婚夫、东大法科学生东吾爱上她、给了她希望，不幸的是后来东吾被说服，回到芳江身边，初野珍惜自己与芳江的友情，也让东吾与芳江结合，自己终因病重死去。在这两个爱情悲剧故事中，不仅主要人物的三角关系很类似，“脚气病”在叙事过程中的功能则完全相同。[1]此外，《魔风恋风》中的初野擅长英语，而《留东外史》中的张思方正在就读的是正则英文学校。

在萩原初野的故事中，自行车这种当时新兴的交通工具承担着重要功能。初野是骑自行车在校门前与人相撞，从而命运发生变化。无独有偶，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留东外史》中。《留东外史》一百〇五章写中国留学生到公使馆请愿，抗议公

[1] 脚气病在当时似乎是一种符号化的日本疾病。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第一章，多次进行环球旅行的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所患的各种风土病中就有“日本脚气病”。

使馆二等参赞拿留学生的官费讨好日本女子，插叙了驻日公使海子舆与日本女子的爱情故事。海子舆当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看上一位日本女学生。经历了单相思的痛苦之后，终于生出一计。某日，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去上课，路上接近那位女学生时便撞过去。女学生被撞伤住院，他去探望，搭上关系，终于得以成婚。如前所述，海子舆是影射袁世凯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1] 陆宗舆确实曾经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但是否曾用自行车做工具追求日本女子无可考。这个情节很可能是调侃性的虚构，不肖生进行虚构的时候使用自行车这种现代化的道具，应当与《魔风恋风》中初野骑自行车在校门前与青年相撞的情节有关。在当时的日本乃至欧洲，自行车是一种“现代”的标志，《留东外史》数次写及东京杂技表演中的自行车项目。无独有偶，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秋，正在伦敦留学的夏目漱石为了治疗自己的神经衰弱症，也学骑自行车。自伦敦归国约半年之后的1903年6月，漱石在《子规》上发表了“自行车日记”。

《留东外史》与日本近代文学的关系似乎仅限于小杉天外的影响，总体上与当时的日本文坛是隔膜的。不肖生在东京开始创作《留东外史》的大正初期，日本近代文学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尾崎红叶、夏目漱石等人以其优秀作品确立了主流作家的地位，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文学正以其青春气息和人道主义精神像一阵清风吹拂日本文坛。但是，这些并未在《留东外史》中留下印记。在当时的日本作家中不肖生仅仅接受了小杉天外的影响，主要原因应当在于小杉天外的爱情小说与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相似性。除了文学观念、社会认识的基本一致以及小说题材的规定性之外，似乎还有文化渊源

〔1〕 不肖生在《留东外史》第五集结尾处（即第九十章结尾处）对续集内容预告的时候，写的就是“陆公使”。这种笔误证明海子舆的原型确为陆宗舆。

上的必然性。不肖生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尤其爱读《红楼梦》，自称"一生低首拜红楼"。而小杉天外，同样对《红楼梦》情有独钟。[1]

不肖生与鲁迅、周作人都是在明治末年到东京留学，并且是在鲁迅就读的宏文学院读书。他们面对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日本文坛，但周氏兄弟对爱情小说家小杉天外并不感兴趣。其原因显然在于思想状态与趣味的差异。鲁迅的趣味决定着他接近夏目漱石，就像不肖生的趣味决定着他接近小杉天外。周作人曾经谈及小杉天外，1918 年 4 月他在北京大学小说研究会发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也介绍了小杉天外的文艺观，并节译了《流行歌》的序文，但他本人倾心于充满青春气息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白桦派。在这个背景上，《留东外史》对小杉天外影响的接受丰富了近代中日文学的关系。不仅如此，这种接受还表现了鸳鸯蝴蝶派爱情小说渊源的丰富性。本来，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爱情小说创作一方面是古代言情小说传统自身的再生产，一方面与清末西洋小说的翻译具有直接关系。根据周蕾的论述，徐枕亚的名作《玉梨魂》直接受到了林译《茶花女遗事》的启发，[2]这意味着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世界文学"意义——只是这"世界"限于西洋。而小杉天外对不肖生的影响，标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中包含着"东洋"的影响。

《留东外史》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章回白话小说的形式，但是，其文体的传统性由于日语汉字、日语的进入以及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开始崩溃。

---

〔1〕 小杉天外的小说创作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影响。1952 年 9 月 1 日小杉天外以 88 岁高龄去世，《中央公论》十月临时增刊号发表了其遗稿《红楼梦》。

〔2〕 参阅《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第二章的论述，（台湾）麦田出版 1995 年初版。

七 《留东外史》的流行

民国五年（1916）《留东外史》第一集出版的时候，不肖生25岁。当时，同样留日归来的鲁迅正在教育部当科长，周作人还在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当教师。如果抛开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活动不谈，那么不肖生作为留日派作家登上中国文坛实际上早于周氏兄弟。

《留东外史》出版之后获得了庞大的读者群体。小说的出版次数及其仿作的出现足以说明这一点。从1916年5月到1924年10月，《留东外史》正集的五卷就出版了四版。不仅如此，正集的五卷结束之后，不肖生又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里赶写了续集的五集。[1]续集1922年10月初版发行，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即再版发行。十集《留东外史》完稿之后，不肖生立即撰写了《留东新史》三册共三十六章，在民国十三年（1924）七月由上海的世界书局印行。两年之后的1926年，上海的大东书局出版了标明“不肖生撰述”的《留东外史补》。[2]就是说，在1916年之后的大约十多年间，不肖生的创作是在《留东外史》的延长线上进行的。这种持续再生产显然是以读者市场的旺盛需求为前提的，以至于续作基本上流于简单的复制。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作为潜在的作者介入了《留东外史》这一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从中国现代读者形成史的角度考虑，1920年前后并不是一个读者阶层十分成熟的时代。即使是

〔1〕张冥飞在《留东外史》第十集的评校中涉及小说的创作过程，说：“盖前五集以二年余之日力作成，续五集则仅费时八阅月，宜不免于匆促。”“阅月”为书面语，“八阅月”即“八月余”。

〔2〕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图书卡片，原书未见。

《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当时也是应者寥寥——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结果导致倡导者自己化名上演双簧戏以吸引社会注意力。当时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的状况有些类似。根据郭沫若《创造十年》的记载，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初版印了两千部，卖了两三个月也仅仅卖出去一千五百多部。相形之下，《留东外史》的读者市场占有状况则一目了然。

市民阶层的读者状况由于缺乏印数、发行渠道、阅读反馈等方面的资料难以进行具体考察，但知识分子的阅读则留下了文字记录。

当时身处绍兴的周作人就是《留东外史》的读者之一。他1917年2月20日的日记中记有：“晴上午出校至大路师曾画付裱下午得北京十六日函附东京小為替十圓梓生来借去青年及小说月报等十本阅留东外史”，[1]次日的日记中即有“晚阅前书了”的记载。周阅读的显然是《留东外史》初版本第一集，即前二十章。2月25日的日记中又记有“阅留东外史二集了”。一个月之后的3月底，周作人离开绍兴到北京大学任职，到京之后依然没有忘记《留东外史》。民国七年（1918）4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小说研究会做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2]的讲演的时候又谈及《留东外史》。约两周之后的5月2日，周作人“下午往青云阁购留东外史四五各一册”（见当日日记），十二日的日记中又记有“下午得八日家寄书一包内留东外史等三本”。家中寄来的显然是前三册，加上刚买的四、五册，《留东外史》正集五册就配齐了。

---

〔1〕 日记中的“圓”本为日语汉字。“小為替”为日语汉字词汇，指通过邮局进行的小额汇兑。

〔2〕 1918年5月《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收入《艺术与生活》。

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中则有张资平阅读《留东外史》的记载。1918年夏，郭沫若从日本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搬到福冈。某日午后在海边的松林中散步，巧遇来福冈旅游的张资平。到张的住处，看到榻榻米上散乱地放着几本书，其中就有"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他问张"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张却不以为耻，答道："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手腕很不坏啦。"当晚，张资平应邀到郭沫若的住处晚餐。得知郭也是和《留东外史》所写的一样与日本女子同居，便说："你把材料提供给我吧，老郭，我好写一部《留东外史》的续篇。"被写进"淫书"显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当时郭沫若"觉得受了一番小小的污辱"。应当注意的是，张资平是在旅途中阅读《留东外史》。

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亦涉及《留东外史》。1920年夏天夏衍即将赴日留学，当时他身在杭州，年龄为20岁，母亲为他的婚事尚无着落担忧，嘱咐他说："景韩看过一本《留东外史》的小说，说日本的风气坏得很。你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这件事特别要留心!"[1]

上述记载表明当时《留东外史》的读者群体分布在广阔的空间范围。甚至在中国和日本的地方小城它都被阅读着，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传播情形可以想见。当时身为北京大学学生、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的俞平伯，同样是《留东外史》的读者。[2]

《留东外史》的畅销在20年代中后期引发了一场"外史"热。《留西外史》、《留沪外史》、《留欧外史》等以异国生活为

---

[1] 《懒寻旧梦录》，59页，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引文中的景韩是夏衍的表兄。

[2] 俞平伯的"戊午年（1918）别后日记"中即有阅读《留东外史》的记载。见1990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

题材、以“外史”命名的作品相继出现。[1]30 年代初，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冒不肖生之名仿作小说者。[2]

《留东外史》成为畅销书的原因是复杂的。周作人、张资平等留日归国者或留日者对《留东外史》的关心显然是基于对日本和在日中国人的关心，但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获得读者是因为这部小说具备了色情与暴力（言情与武侠、枕头与拳头）这两个具有原型性的小说要素，并且在叙事过程中流露出市民趣味。而从基本内容来看，则是因为小说对“异域”的展示以及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构成的关系。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并导致留日潮的发生，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和留日中国人的生活无疑怀有很大的好奇心。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日本，与日本是隔膜的。《留东外史》初版本的封面就暗示出这种隔膜。那是一幅套色印刷的仕女图，用的是绿、黄、粉红三种颜色，一位绿裙、粉红色上衣的青年女子立在桌前，半伏桌上，一手支颐，一手打开一本书在阅读。桌上摆着一个花瓶，窗外斜伸着几根树枝。这个构思暧昧的封面上画的也许是日本女子，也许是留日女学生，但并无异国气息，仅仅是一幅传统的仕女图。[3]这个“走题”的封面暗示出某种隔膜，求知欲就包含在这种隔膜之中，而这个封面下面的内容就是对这种求知欲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留东外史》的畅销与 1990 年前后《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

---

〔1〕《留西外史》著者为陈春随，新月书店 1927 年 9 月初版。“序”的写法多有与《留东外史》相似处。《留沪外史》为法国驻华领事苏利爱莫郎所著，张若谷翻译，上海真美善书店 1929 年 2 月出版，书名为译者所改定。《留欧外史》为黎锦晖编，中华新教育社出版，仅见 1929 年 1 月再版本。20 年代的“外史热”需专文论述，此处无暇详论。

〔2〕参阅前引木山英雄的文章。

〔3〕与这个封面形成对比的是 1988 年岳麓书社重印的《留东外史》的封面。封面上依然是一位年轻女性，但这位女性身着和服，笑容灿烂，准确地暗示出其“日本女性”的身份。

的中国女人》等作品的流行十分类似。它满足了国门初开之际生活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异国的好奇心。

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以反日为起点的五四爱国运动，是《留东外史》创作的背景同时也是它被阅读的背景。在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反日排日的情况下，阅读“妓化”、“鬼化”日本的《留东外史》无疑是一种发泄反日情绪的好方式。跛子对《留东外史》的批点可以作为旁证。在《留东外史》第四章写黄文汉羞辱日本士兵、宣称“研究嫖学”处，跛子批曰：“强词夺理。但是对外国人说这话却是痛快。”在第十四章日军少尉声言再加十万兵力一年内可以灭亡中国处，跛子批曰：“中国人请洗耳恭听。”在黄文汉对日军少尉的驳斥后面，又批曰：“话虽如此说，只是中国人未必人人能够明白其内容。不然何以专拍小鬼的马屁。”批点者是大众读者的代言人，类似的批点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留东外史》作为一种认识日本、把握日本的文本，引导着中国人对日本与日本人的认识，直接塑造了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夏衍的母亲作为市民阶层的人物对日本的认识，显然就是来自《留东外史》。作为发行量巨大、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的小说，其影响的广泛程度远远不是后来周作人、戴季陶等人的日本论所能相比的。

对普遍性社会心理的满足之外，现代读者群体的形成与现代出版制度（二者相互联系）的建立也为《留东外史》的畅销提供了前提条件。1914 年 3 月《玉梨魂》出版，同年 6 月《礼拜六》创刊，鸳鸯蝴蝶派出现在民国文坛。在这个背景上，鸳鸯蝴蝶派是把《留东外史》作为“拳头产品”推出的。小说第一集出版的时候陈荣广、刘韵琴、张冥飞三人撰写的序文，就表现出此派的营销战略。三篇序文皆为文言写作，高度肯定《留东外史》的价值。陈荣广显然是意识到了这部小说有可能受到责难，因此强调阅读感觉的相对性，说：“吾尝临流而

钓，终日不获一鱼。吾殊以为苦，鱼则以为乐也。苦乐顺其性之自然，而不得谓鱼是而吾非，亦不得谓鱼非而吾是也。自存是非之见，故著书者多落言诠。〔略〕今读不肖生所著《留东外史》，事不必实，情则皆真。其为借酒杯浇块垒，率其伉爽无滞之性以遂其自然。抑或犹不免于是非之见，吾可不问。第以其书有遂于吾性也。故乐而为之序。"刘韵琴感于24岁的不肖生能够写出《留东外史》，断言"其文足传矣"。张冥飞的序篇幅最长，感于国家优秀分子在国外沉迷于饮食男女，叹息曰："国恃人而存。中国之号称为人者乃若此。中果不亡，亦太违反于人情天理矣。放目四观，兽蹄鸟迹，交错于中国。顾安所得人而与之语也。哀哉。"此类评价有广告目的且有朋友唱和之嫌，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是朋友，故知之甚深。

三篇序文之外，小说正文中还有批点与评校。批点、评校贯穿了十集《留东外史》。批点者为跛子一人，评校者的情况则相对复杂。除第二集评校者为成舍我、评校方式略有变化、批眉者为王无为之外，其他九集的评校者皆为张冥飞。批点、评校和批眉构成了《留东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批点者和评校者本来是《留东外史》的"前读者"——出版之前的读者，对于他们本人来说，这批点和评校是一种"阅读"，而对于读者来说，他们的批点和评校则是一种"导读"——引导着大众读者的阅读。跛子作为点评者是《留东外史》的第一位读者，他是作为读者发表感想，其感想亦引导着一般读者的阅读。

八　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冲突

与一般社会读者的欢迎和来自鸳鸯蝴蝶派内部的肯定性评价不同甚至相反，周氏兄弟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对《留东外史》采取了否定和抵制的态度。

1918年4月周作人在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比较分析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小说的发展状况，批判《留东外史》，说："又一方面，从旧小说出来的讽刺小说，也发达起来。从《官场现形记》起，经过了《怪现状》、《老残游记》，到现在的《广陵潮》、《留东外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可只全是一套板。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问他著书的本意，不是教训，便是讽刺嘲骂污蔑。讲到底，还只是'戏作者'的态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鲁文的一流。所以我还把他放在旧小说项下，因为他总是旧思想、旧形式。"[1]这里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旧小说进行了全盘否定。可以认为周作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留东外史》。这不仅是因为他提及《留东外史》、在讲演之前刚刚读过《留东外史》，主要是因为《留东外史》的结构确实"冗长散漫"，"教训"的旨意在小说开头就表现出来，所叙故事有"讽刺嘲骂污蔑"之嫌，不肖生所谓的"与诸君解闷"（第五集结尾处所言）正是一种"'戏作者'的态度"。

三年之后的1921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其中的性描写被某些人批评为"不道德"。第二年（1922）3月，周作人撰文为郁达夫辩护，文中再次批评《留东外史》，说：

> 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

---

[1] 这里提及的假名垣鲁文（1829—1894）为游戏文学作家、新闻记者。生于江户（东京），本姓野崎，幼名兼吉。代表作有《西洋道中膝栗毛》、《安愚乐锅》等。多以游戏笔墨著通俗小说，求趣味与滑稽，在幕府末年至明治初期的日本文坛占有一定地位。周作人这里的评价有片面之处，且与他本人对十返舍一九等作家的推重相矛盾。

> 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但在《留东外史》，其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却不能援这个例，因为那些描写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留东外史》终是一部"说书"，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1]

从1918年到1922年，周作人一直对《留东外史》持批评态度。显然，他对《留东外史》色情性的强调与郭沫若所谓的"以淫书驰名"正相一致。

鲁迅是否曾经阅读《留东外史》无从查考，排斥三角恋爱小说的鲁迅（这种排斥体现在他把张资平的爱情小说概括为一个"△"）也许根本不会有阅读《留东外史》的兴趣。但是，他多次对包括不肖生在内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进行讽刺。在1919年底所作的杂文《有无相通》中，他说：

> 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淌牌""吊膀""拆白"，什么"噫嘻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吁嗟风风雨雨""耐阿是勒浪勠面孔哉"。

随后呼吁说："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文才，大可以译几叶有用的新书。"《留东外史》是当时畅

[1] 《沉沦》。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收入《自己的园地》。

销的“外史”，“吊膀”是《留东外史》故事的主体，而不肖生本人不仅是才子而且是湖南人。可见鲁迅虽然没有指明，但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时候意识到了不肖生及其《留东外史》。在1921年5月5日所作的《名字》[1]一文中，鲁迅明确表示“拒读”鸳鸯蝴蝶派作品。他在1922年10月9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儿歌的“反动”》一文时署名“某生者”，即有讽刺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意思。因为此派作者好用“××生”之类的笔名，比如“海上漱石生”、“天笑生”、“不肖生”等。[2]十年之后的1931年夏天，在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鲁迅说：“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服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段话并非专对《留东外史》而言，但显然包括《留东外史》。

周氏兄弟之外，茅盾、瞿秋白等人都曾对《留东外史》进行过类似的批判。甚至到了1931年5月，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依然指出：“至于坏一点的，例如《九尾龟》、《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的东西，也至今还占领着市场，甚至于要‘侵略’新式白话小说的势力范围：例如今年初版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居然在‘新式学生’之中有相当的销路。”[3]

新文学作家对《留东外史》的批判与陈荣广、刘韵琴、张冥飞等人对《留东外史》的肯定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本

---

[1] 1921年5月7日的《晨报副刊》发表，收人《集外集拾遗补编》。

[2]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在选录鲁迅文章的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解释。

[3] 收人1953年版《瞿秋白文集》。

质上是新旧文学两大阵营的对立。新文学作家不仅要和对新小说构成威胁的旧派小说争夺地盘，其人生态度与文学观念也与《留东外史》等鸳鸯蝴蝶派作品呈现出来的“游戏”态度不相容。周作人当时正热衷于日本白桦派文学，大量阅读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其理想主义心境与《留东外史》的基调不合。作为提倡女性解放、尊重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其女性观亦与不肖生相冲突。对于以歧视、调侃的口吻描写女性的《留东外史》，他必然持否定态度。类似的原因在鲁迅那里也存在。

新文学作家上述批判的合理性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他们对《留东外史》的认识并不全面，某些批判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如前所述，《留东外史》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如果对事实的展示构成了“讽刺嘲骂污蔑”，那么问题不在于小说作者，而在于小说展示的对象本身。张资平所谓的“写实”并非仅仅指《留东外史》的表现手法，还应包括小说与描写对象的对应关系。视《留东外史》为“淫书”或者将其与《九尾龟》相提并论亦无根据。《留东外史》中几乎没有露骨的性描写，与《金瓶梅》相比难以望其项背，与20世纪末出现的《废都》、《上海宝贝》相比则显得十分纯洁。不仅如此，新文学作家完全忽视了《留东外史》中的“新文学”因素。这种因素不仅存在于基本理念方面——例如民主意识、共和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精神，而且存在于形式方面——《留东外史》尽管是采用旧白话小说的形式，但语言高度口语化。在胡适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时候，不肖生已经在小说创作领域进行了熟练的运用。

尤应注意的是，《留东外史》中的某些认识和观念在五四时期的留日作家群中具有普遍性。

不肖生对在日中国人的基本认识与青年鲁迅对清国留学生群体的认识基本相同，并且和鲁迅一样由此进入对于国民性、

国家问题的思考。鲁迅1902年初到日本、在宏文学院读书时经常与好友许寿裳讨论中国民族性问题，结论之一就是“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1]鲁迅比不肖生年长十一岁、早五年留学日本，因此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思考早于不肖生。但是，留日作家中较早自觉地在小说创作中暴露国民劣根性的是不肖生，而不是鲁迅。《留东外史》形象地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中国人置身制度边缘和文化边缘的时候暴露出来的“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不肖生的认识与鲁迅的认识在20世纪初中国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中属于同一系谱。不仅如此，不肖生对于“国民”问题的认识与清末梁启超等逃亡日本的政治家的思考保持着更直接的一致性。《留东外史》开头处对前清亡命客的描述——所谓“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拚着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包含着肯定性的评价。不肖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唤起国民”的一种形式。

在对待辫子、小脚所代表的中国陋习等具体问题上，不肖生也是烦恼着留日者共有的烦恼。早期留日中国人因为脑后垂着一根辫子，所以被日本人称作“猪尾奴”。邹容《革命军》有言：“拖发辫，著胡服，蹁跹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 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蹁跹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ャンチャンボツ（译曰拖尾奴才）者，何为哉？”[2]如前所述，邹容曾剪掉姚监督的辫子。这种行为中显然包含着对辫子的憎恶。由于同样的原因，鲁迅剪去辫子之后才会照相、写诗作纪念。《留东外史》对

[1] 参阅许寿裳《回忆鲁迅》(1944)。引自《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 《革命军》第二章。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27页。

“猪尾奴”同样进行了嘲讽。第十五章“碎石飞刀呈绝技　差神役鬼调佳人”写周撰与成连生到浅草闲逛，适逢有人卖艺，一位中国人在那里摇头耍辫子，围观者齐声喝彩，于是成连生低声对周撰说：“这该死的东西，还靠着这猪尾巴讨饭吃。”中国女性的小脚也是当时在日中国人文化自卑感的一个符号。20年代中期鲁迅写《朝花夕拾》的时候，谈及留学生活还不时写及小脚。留学日本不久，鲁迅和子英一起到横滨接新来留学的同乡，看到税关的日本关吏从同乡的衣箱中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便“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并责怪在场的范爱农说：“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范爱农》）。到仙台医专留学之后，藤野先生就中国女性小脚的询问也使鲁迅感到“很为难”。周作人在20年代所写的《天足》、《闲话四则》、《男子之裹脚》等文章中，则对中国的“小脚文化”进行了激烈抨击。五四时期在东京留学、积极参与新村运动的李宗武甚至给《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写信，说：“近两年来，到东京来的小脚女子，比从前多了。日本人见了伊们，自然要呆呆地瞧一下。因为不曾见过这种样儿，自然很奇怪。如我们中国学生见了伊们，则一定立刻红涨了脸，飞快地走过。伊们自己也自然觉得很不好意思，拼命想装天足的模样；”“小脚女子去留学，实无异把丢脸的照牌，高悬到外国市场。”时任《妇女评论》主编的陈望道在回信中说：“我以为伊们能在外国促起男子丢脸的羞耻心，正是伊们绝大的功绩；”“我们希望以后一切尽是天足，不再有小脚到东京去的热烈，正和希望一般日本留学生不再贩军阀主义从东京来一样。”[1]如前文所述，《留东外史》是通过蕙儿洗澡对小脚进行了嘲讽。这种嘲讽表露的是留日、旅日中国人

---

〔1〕原载1921年9月2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八期。引自《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

的某种集体无意识。

新文学作家之所以看不到鸳鸯蝴蝶派内部不同作家之间的差异、无视《留东外史》中的"新文学"因素，原因在于他们把"鸳鸯蝴蝶派"确认为新文学的对立物。于是鲁迅本人也与《留东外史》中的"鲁迅意识"擦肩而过。

鲁迅、周作人以及郭沫若作为留日派作家对《留东外史》的否定构成了"留日作家群"的内部冲突，该群体内部的复杂性由此体现出来。本来，留日作家应当最容易发现《留东外史》的真实性及其思想价值。周作人为《沉沦》辩解的时候曾引用郁达夫的话——所谓"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但是，他作为在日本住过的人，作为不肖生同时代的留日者，却完全否定《留东外史》。这除了与新旧文学两大阵营的对立相关联的共通性原因之外，也有个人的心理动因。留日者对《留东外史》的排斥之中，应当包含着一种被揭短的恐惧和愤怒。留日时期的周作人就称不上好学生。他是被派往日本学习建筑，但"留学"仅限于在立教大学学习希腊语。和羽太信子结婚之后钓鱼读闲书，学无所成，仅仅是体验了"日本的衣食住"。如果不是后来成为文化名人，只是一个"学生混子"而已。而羽太信子恰恰是《留东外史》进行大量污辱性描写的陪酒女、下女，周作人读到类似的描写难有好心境。无独有偶，《留东外史》中周正勋勾引了日本的大家闺秀鸟居菜子，而周作人记忆深处的一位日本少女也叫菜子，只是姓乾而不姓鸟居。乾菜子让周作人终生难以忘怀，屡次梦见，还因此与羽太信子发生冲突。其笔名之一"子菜"即来自"菜子"，暗示出某种心理隐秘。称《留东外史》为"淫书"的郭沫若是和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结婚，如前所述，女护士在《留东外史》中和下女一样受到嘲弄。周作人与郭沫若对《留东外史》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从反面证明着《留东外史》的真实性与冲击力。

《留东外史》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新文学作家的批判而消失。即使是在新文学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也有肯定包括《留东外史》在内的“黑幕小说”的声音。1918 年 9 月，《东方杂志》发表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对黑幕小说提出批评，曰：“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实写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1〕对此，杨亦曾撰写了《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引用宋春舫“黑幕小说，是小说界的精彩”一语，表示同感，并为黑幕小说辩护。在此文中，杨亦曾认为黑幕小说的诞生符合由传奇派向写实派发展的世界文学潮流，指出：“如《红楼梦》，写家庭的罪恶，半吞半吐，若隐若现，也可说是写实小说。到了《官场现形记》和《留东外史》出来，写实派遂进了一步了。至黑幕小说出现，遂露出写实小说的‘庐山真面目’。”值得注意的是杨亦曾对《留东外史》的历史定位。他强调的是《留东外史》在黑幕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价值与艺术表现方面的“写实”价值。这种评价与周作人等人的评价显然是对立的。〔2〕显然，杨亦曾强调的“写实”价值也就是张资平所认可的“写实手腕”。

不仅如此，《留东外史》在五四时期及五四之后一直对某些新文学作家的小说创作发生着潜在的制约。张资平、老舍甚至苏青，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留东外史》的影响。创造社作家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本身也被认为受到了《留东外史》的影响。陶晶孙在《记创造社》〔3〕一文中称张资平为“真正小说

〔1〕 载《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九号。引用者标点。
〔2〕 杨亦曾的文章发表于 1919 年 2 月 15 日发行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同期发表了仲密（周作人）的《论“黑幕”》和《再论“黑幕”》两篇文章，继续对黑幕小说进行批判。《论“黑幕”》是自《每周评论》第四号转载。
〔3〕 《文坛史料》收录，杨一鸣编，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 1944 年出版。

家”，指出：“创造社的精神为‘意想奔放’。后来国人抱固定因循的思想，至多亦投稿二三于学灯等（沫若先投学灯），或模仿鸳鸯蝴蝶书留东外史之类。”此种认识可以与前引郭沫若的记述中张资平对《留东外史》价值的肯定相印证。1928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创作了取材于旅英中国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二马》。在谈这部小说创作过程的时候他提及《留东外史》，说：

>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于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偏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略〕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来，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三角恋爱永不失为好题目，写的好还是好。〔1〕

老舍的态度流于暧昧。他一方面回避《留东外史》，同时又强调两性题材、三角恋爱题材的价值。不过，这暧昧本身倒是包含着某种公正。苏青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标点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张扬女性意识，并因此博得评论者的喝彩，其实此种调侃式的断句法早在《留东外史》的评点中已经出现。〔2〕

〔1〕《我怎样写〈二马〉》，发表于1935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三期。

〔2〕见《留东外史》第三集的评点，该集评点者为张冥飞。生活在上海滩的苏青是否曾经阅读流行小说《留东外史》，需另做考证。

九　日本人看《留东外史》

《留东外史》作为一部多方面涉及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小说，同样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18年底，志希（罗家伦）在批判旧小说的时候说："《留东外史》一类，稍为比黑幕大观的文章好一点。但是写得秽浊不堪，著者纵不为自己笔墨惜，难道不为中国的民族留一分羞耻吗？我听说日本人看的很多呢！"[1]他所谓"日本人看的很多"不会是无根据的。

根据现有资料，日本人中最早就《留东外史》发表议论的是安冈秀夫。安冈在1926年出版的《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最后部分谈及《留东外史》，说：

> 〔中国人"耽享乐而淫风炽盛"〕由于这样的原因，来到日本的支那留学生因沉迷女色而废寝忘食自不待言，出现身为学生却泰然蓄妾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去今十余年前，有一本在上海出版、后来支那政府下令查禁、叫做《留东外史》的著者不明的小说（有云乃何海鸣之作），大致说来似乎是记述事实之作，主要是以恶意地罗列日本人性的不道德为目的（下田歌子女士等人也被拉出来当见证人），然而通读全篇，那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知不觉地将支那留学生自身的品行不端，特意尽力招供的部分更多，这是滑稽的。[2]

〔1〕《今日中国之小说界》。载1919年1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

〔2〕这段话鲁迅在1926年7月所作的《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华盖集续编》收录）中仅有断续的翻译，且有欠确切处，故这里做了重译。

安冈这段话包含的信息有些混乱。从"著者不明"之说来看他似乎没有读过《留东外史》，但从对《留东外史》内容的描述来看他所谓的"通读全篇"似乎并非虚言。因为下田歌子的出现是在小说的第十四章。安冈至少通读了小说的第一集（即前二十章）。不过，安冈认为《留东外史》"主要是以恶意地罗列日本人性的不道德为目的"、"不知不觉地暴露了支那留学生自身的品行不端"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不肖生对在日中国人不端品行的暴露是自觉的而非"不知不觉地"，安冈误读了不肖生的创作动机。造成误读的原因在于他的国家意识。

关于《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标准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将其注释为"一本污蔑中国民族的书"。实际上该书对中国人并非全是污蔑。该书出版后周作人在相关介绍文章中坦言："我承认他〔安冈〕所说的都的确是中国的劣点，汉人真是该死的民族，他的不长进不好学都是百口莫辩的。"不过，他将安冈秀夫讽刺、揭短的态度斥之为"轻薄卑劣"〔1〕。安冈著作最后一章题为"耽享乐而淫风炽盛"，如标题所示，确有讽刺中国人的成分。安冈认为中国人喜吃竹笋"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象来的罢"。1926年7月，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中讽刺安冈的这一观点，说："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杆和屋里的柱子一样，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年10月8日，已经离开北京到厦门的鲁迅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写《琐记》〔2〕，回忆在江南水师学堂的桅杆，又顺手刺了安冈一笔，说："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

〔1〕《我们的闲话（二十四）》，载1926年7月《语丝》第八十八期。
〔2〕《朝花夕拾》收录。

‘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

耐人寻味的是，《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是一本学术著作，研究对象设定在元、明、清三朝，序言前面所列37册引用书目中并无《留东外史》，但到了全书结尾处，却对《留东外史》展开了批判。

《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1926年4月10日由群芳阁出版发行，鲁迅是7月2日在北京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购得此书。当时《留东外史》正集的五卷至少已经第四次重印，续集的五卷已经再版，三册《留东新史》也已经发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作为“污蔑中国民族的书”与《留东外史》作为“污蔑日本人的书”构成了对立。可以做这样一个假定：当初《留东外史》出版的时候，安冈秀夫不满于它对日本的侮辱，产生以小说为材料研究中国人国民性的想法，并开始撰写《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因此在自己著作的结尾处提起《留东外史》。由于资料缺乏，这个假定是否成立难以证实。果真如此，那么《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民族复仇意义的学术活动，是《留东外史》的衍生物，其中包含的民族意识与《留东外史》的民族意识形成了对立。[1]

鲁迅否定了《留东外史》，也讽刺了否定《留东外史》的安冈秀夫，这样通过双重否定确立起来的立场有些微妙。无法确认鲁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与《留东外史》的一致性，但对安冈秀夫的讽刺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站到不肖生一边。

---

〔1〕关于安冈秀夫的生平与学术活动的资料，仅见于范伯群、泽谷敏行《鲁迅与斯密斯、安冈秀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论之比较》的介绍。文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四月号。据此文介绍，安冈秀夫生于1873年4月4日，1892年毕业于庆应大学，1893年入《时事新报》社，1923年升任主笔。1915年曾出版《日本与支那》。

《留东外史》和《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尽管有民族意识的对立，但在认识方法上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是把性观念作为认识国民性的重要视角。这种认知方法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鲁迅的否定有些武断。这否定本身也许暗示出鲁迅性心理的某种创伤。[1]

安冈秀夫之后，三四十年代依然有日本学者关注《留东外史》。1936年初，以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著称的实藤惠秀发表了前面提及的长文《〈留东外史〉与其日本观》。该文对《留东外史》的出版过程、基本内容、不肖生的状况、小说体现出来的对日本男性和日本女性的看法、小说中展现的日本风俗和日本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论证。与安冈秀夫对《留东外史》的否定相反，实藤惠秀的论证证明的是《留东外史》内容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实藤说：“作者年龄‘廿有四’。看来是十五岁就来到日本的人。〔成为〕‘日本通’是理所当然的”；“东京叙述方面的详细与正确令人惊叹”。实藤惠秀是研究《留东外史》着力最多的日本人，在《留东外史》版本的保存以及相关资料的搜集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2]

日本著名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1年10月发表的《学生生活》[3]也谈及《留东外史》。该文主要探讨民国初年至20年代中国学生生活状态的“不可解”，开头部分以《留东外史》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七章写及的1915年双十节在日中国人的活动为例，以说明“民国初年学生生活不可理解的

---

〔1〕 关于安冈秀夫观点的合理成分，前引范伯群、泽谷敏行的文章也有论述。

〔2〕 关于实藤惠秀在《留东外史》相关资料保存方面的贡献见前引木山英雄论文的论述。实藤的相关研究在西方中国学界亦有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马里乌斯·詹森在论述“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的时候就举《留东外史》为例并谈及实藤的相关研究。“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为费正清、刘广京所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六章，中译本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 日本《中国文学月报》第七十七号，1941年10月出版。

深度”。他指出：“黄文汉是一种豪杰，非常好色，代表了《留东外史》的精神”；“当时的留学生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优秀的社会人物。拥有商人的谋算、军人的勇武、浪子的色欲、政治家的辩才”。武田泰淳对不肖生的关注并不限于《留东外史》。《学生生活》发表三年之后的1945年1月，武田泰淳又发表了短文《中国之武士道》[1]。该文说：“我日前通读大众小说《江湖大侠传》，对武侠进而对埋没在民间的武士道略有省悟之处。这部小说的作者不肖生是以描写留日学生生活的《留东外史》成名的人，比现在的张浪水、包天笑略有见解。”文中所谓的“大众小说”亦可译为“通俗小说”，《江湖大侠传》显然为《江湖奇侠传》之误，“张浪水”为“张恨水”之误。

显然，在对于《留东外史》的理解方面，实藤惠秀与武田泰淳表现出了客观的态度。这种客观的态度不同于周作人、鲁迅等中国新文学作家，也不同于安冈秀夫。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显然在于他们既没有安冈秀夫的那种道德意识与民族意识，也没有中国新文学作家（特别是留日派新文学作家）的竞争心与戒备感。

十 《留东外史》的位置与命运

《留东外史》作为20世纪最早的以异国中国人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所提供的知识内容是任何一部作品无法取代的。它提供的原风景具有潜在的历史阐释功能。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留日记忆”，它确立“自我”的方式与把握日本的方式

〔1〕 1945年1月25日《大陆新报》。收入1979年版《武田泰淳全集》第十八卷。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日关系史上具有“原型”的性质。近代中日两国的交流是以仇恨与对立为起点的。

中国曾经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以文化殖民的方式与日本保持着主／从、师／生关系，但这种关系随着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发生了逆转。在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的日本，中国人成为“猪尾奴”，因此难以与日本这个“他者”建立起同一性，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生命冲动表现为“放纵”和“抵抗”两种主要形式。“恶党”的堕落与不肖生在“耻于不肖”和“流于不肖”两者之间的游移都是“放纵”的表征，而在虚构的权力关系（“人／鬼”关系、“男／女”关系）中获得主体性、凌驾于日本之上，则是一种“抵抗”的方式。

黄文汉这一形象的成立可以说是《留东外史》中中国人“殖民日本”的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之后便是死亡，在日中国人从此不再有类似的自信。不妨将《留东外史》与六年之后郁达夫创作的同样以留日中国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沉沦》比较起来看。黄文汉在日本女性那里高高在上、得心应手，而《沉沦》中的“我”——那位大正中期的中国留学生，就只能怀着“支那人”的自卑感战战兢兢地偷窥日本少女洗澡，失意之后蹈海自杀了。这位“我”的死应当放在黄文汉的延长线上来认识。在旅日、留日中国人的心灵史上，《留东外史》中的“黄文汉”向《沉沦》中的“我”的转换同样具有原型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留东外史》被长期漠视、误解。这集中体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有关《留东外史》的注释中。该注释为：“《留东外史》，不肖生（向恺然）著。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该注释的不实之处一目了然。一是小说叙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民国初年而不是清末，二是小说描写的对象并非仅仅是留学生，还包括流亡日本的许多中国人。这两点不肖生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就交代得十分清楚。也许，该注释的撰写者撰写

该注释的时候连小说的开头都没有阅读。作为与新文学对立的"旧文学"作品，《留东外史》长期被排斥在正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是被作为批判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环境发生改变，包括《留东外史》在内的不肖生的作品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1]但是，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研究未能深入下去。一是《留东外史》篇幅冗长、涉及的问题多，进入它就像进入大海，研究者往往被淹没。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排斥阅读、拒绝读者的作品。小说出版之初是各集先后出版，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阅读不成其为负担，但是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同时面对百余万字的十集（这还仅仅是正、续集）难免困惑。二是小说写及"嫖经"、"赌诀"之类所谓"黄色的东西"，研究者为了获得道德优越感，往往用简单的道德判断取代正面的解读，从而失去进入文本的可能性。甚至视不肖生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的范伯群，也从总体上否定《留东外史》——所谓"格调实在不高"、"至于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性，《留东外史》是失水准的"。沈庆利否定《留东外史》的"书品"，甚至主观地认为小说"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误读和歪曲是《留东外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这与鲁迅、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认知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与实藤惠秀、武田泰淳以及木山英雄等日本学者对《留东外史》真实性的强调形成对比。类似的误解直到李兆忠的《为"嫖界指南"把脉》一文中才有所改变。

---

〔1〕 代表性的论文有三篇：1. 范伯群《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评传》，收入《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2. 沈庆利《道德优越感中的堕落——〈留东外史〉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3. 李兆忠《为"嫖界指南"把脉》，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1期。

第 2 章

“梦”与“肉弹”的文学史

——中日现代作家创作中的互文问题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与日本相关的文学事件中能够与“《留东外史》热”相提并论的只有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一个青年的梦》的中文翻译与传播。与《留东外史》体现出的厌日、侮日、反日情绪不同甚至相反，在对实笃《一个青年的梦》进行中文翻译与推销的过程中，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将实笃视为日本新思想的代表，表现出十分的善意与热情，实笃因之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偶像之一。〔1〕

不过，到目前为止，《一个青年的梦》一直是被“片面地”理解着。这种片面性同时表现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上。

首先，《一个青年的梦》并不是作为孤立的文本进入中国的。考察这一问题，有必要回到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看一看《一个青年的梦》进入中国之初是怎样被表达出来的。众所周知，最早将《一个青年的梦》介绍到中国的是周作人。他在

〔1〕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梦与梦之间——中国新文学作家与武者小路实笃的相遇》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从略。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二月号。

1918年5月发表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中说：

> 日本人从来也称好战的国。樱井忠温的《肉弹》，是世界闻名的一部赞美战争的小说。但我们想这也只是以前的暂时现象，不能当作将来的永远的代表。我们看见日本思想言论界上人道主义的倾向日渐加多，觉得是一件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的少数，还被那多数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1]

周作人的表述中包含着两个文本——被肯定的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与被否定的樱井忠温的《肉弹》。在周作人眼中，《一个青年的梦》是作为《肉弹》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对立在思想和精神的层面上体现为否定战争与赞美战争的对立、人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对这两种倾向他选择了前者。对于周作人来说，《一个青年的梦》所具有的意义是通过与《肉弹》的对立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决定着理解《肉弹》成为理解《一个青年的梦》的必要途径并且是有效途径，“非战”与“好战”的二元对立结构对于解读《一个青年的梦》具有前提性意义。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樱井忠温的《肉弹》似乎尚未进入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虽然它不仅“世界闻名”并且早在实笃《一个青年的梦》被介绍到中国九年之前的宣统元年（1909）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其次，就武者小路实笃本人的思想过程而言，《一个青年的梦》体现的是大正时期他对于战争的态度。但这仅仅是问题

[1]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四卷五号。

的开始。在随后到来的昭和时代，实笃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戏剧性的转变。40年代初，他创作了支持战争的剧本《三笑》。《三笑》是作为《一个青年的梦》的“反文本”出现的，但未曾被置于与《一个青年的梦》的关系中来考察。

有关《一个青年的梦》的研究因此成为“片面的研究”。

樱井忠温的《肉弹》和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都曾与中国新文学发生直接关联，并且被直接、间接地改写、模仿。将二者作为相关性文学事件来认识，梳理二者在中国被译介、被改写的状况，能够发现，前引周作人的表述不仅与清末至民初中国的思想状况相关联，而且成为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国新文学走向的一个“咒语”。中国新文学作家对《一个青年的梦》与《肉弹》的重写，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上意味深长的“互文”现象。[1]

一　两个文本与两种观念

关于樱井忠温及其《肉弹》，《平凡社大百科事典》中有简洁的介绍，且引于此：

> 樱井忠温　1879—1965（明治12—昭和40）。陆军军人，作家。生于爱媛县，1901年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作为松山步兵第22团副少尉出征，参加日俄战争，在旅顺负伤。记录其战争体验的《肉弹》（1906）作为战争文学

[1] 这里是在法国批评家克里斯特瓦和热奈特所界定的意义上使用“互文”概念，意指不同文本之间的转换派生关系、临近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次文本”等等。相关问题参阅秦海鹰《人与文，话语与文本——克里斯特瓦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收入《欧美文学论丛》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杰作而著名，在欧美诸国也被翻译出版。1924 至 1930 年担任陆军省新闻班长，1930 年升任少将，进入预备役。主编《国防大事典》之外有著述多种，1931 年之前的作品收入六卷本《樱井忠温全集》。[1]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肉弹》的创作对于樱井忠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肉弹》出版于日俄战争结束第二年的明治三十九年(1906)，副题为“旅顺实战记”。[2]作品虽然是纪实性的，但樱井忠温用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事实创造了一个“成长故事”——军人在战争中的成长。这个“成长故事”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象征性和原型意义。《肉弹》共二十八章，第一章“战友之血块”为总序，第二章至第二十八章叙述了日本宣战、将士出征、辽东半岛登陆、投入战斗直至战争结束的过程。初上疆场的日军将士坚苦卓绝，力克强敌，最后带着大日本帝国国民的自豪凯旋归国。

樱井忠温曾在攻打旅顺时负伤，身中数弹倒在地上。在俄国兵将刀刺向他的紧要关头，战友击毙俄国兵，使他免于一死。身为数度徘徊于地狱之门、从尸山血海中逃生的军人，樱井忠温深知战争的残酷，并在《肉弹》中进行了相应的展示。书中“惨绝”之类词汇的频繁使用即暗示出战争的残酷性。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视《肉弹》为“一部赞美战争的小说”并不确切，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在自在的层面上，《肉弹》

---

〔1〕 平凡社 1985 年出版，东京。

〔2〕 根据笔者查阅的资料，《肉弹》初版本是由东京的英文新志社出版部发行。1906 年 4 月 20 日印刷，25 日发行。到 1908 年 2 月 15 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行至五十一版。第五十一版为丁未出版社出版，但版权页上发行者、印刷者、印刷所以及出版社地址等与英文新志社出版部的版本完全相同，由此可知丁未出版社即前英文新志社出版部。

中并存着对战争残酷性的揭示与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褒扬。问题在于，在自为的层面上，樱井忠温是把惨烈作为“忠勇”的表征。于是“残忍”走向其反面，出现一个悖论——越惨烈则越忠勇。樱井赞美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中体现出来的“忠”与“勇”。“忠”与“勇”构成了《肉弹》的两大精神支柱。

“忠”的对象是明治天皇代表的日本国。在《肉弹》中，贫病交加的农村妇女深明大义，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米为出征的丈夫壮行，被编入后备部队的士兵宫武藤吾因为不能立即上前线觉得愧对祖国、愧见家人，在寺院宿营时剖腹自杀。宫武动刀之前热泪纵横，低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在樱井忠温的此类叙述中，“天皇·日本国·自我”三者融为一体。而承担这种“溶合”功能的是“忠”。“忠”使个人失去自我意识——或曰使个人自觉地将自我与国家、天皇一体化。“勇”则表现在与俄军的作战中。日军官兵得到动员令的时候已经是“骨鸣血涌”（第二章），上了战场更是勇往直前，以肉身为武器，攻击敌人。“肉弹”之书名由此而来。在《肉弹》中，“忠”与“勇”是同一人格的两个侧面，二者构成了互为因果、互为求证的关系。

以“忠”和“勇”为两大精神支柱的《肉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明治时代日本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1868 年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相应地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国民提出了“忠”与“勇”的要求。1882 年《军人敕语》的颁布和 1890 年《教育敕语》的颁布是这种意识形态建设的代表性事件。[1]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期出现的《肉弹》，正完美地体现了国家对普通国民和军人的要求。樱井忠温本人即体现了明治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人格，而且，他把这种人格对象

〔1〕 关于这个问题小森阳一在《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一文中有详论，载《读书》2003 年十二月号。

化为《肉弹》这部战争文学作品。

必须注意，《肉弹》并非仅仅是作为明治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出现的。它的基本观念决定着它具有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成为国民教科书的可能性。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是日本统治阶层的介入。

《肉弹》1906 年 3 月完稿，乃木希典阅读书稿之后为樱井题写了“壮烈”二字，大隈重信、大山巌都为该书作序。经皇宫侍从武官长冈泽精男爵之手，该书甚至被送到明治天皇面前。明治天皇是日本国的代表，乃木希典、大隈重信、大山巌则为当时日本的军政要人。乃木希典（1849—1912）是日俄战争的名将，战争爆发四个月之后的 1904 年 6 月被任命为陆军大将，前往旅顺指挥长达四个多月的攻城作战。他的长子胜典、次子保典都是在日俄战争中战死。战争结束后的明治四十年（1907），乃木受赐伯爵爵位，并升任军事参议官。《肉弹》亦数次写及乃木希典，最后一章“死中再生”记述明治三十八年（1905）元旦日军攻克旅顺，笔墨饱含激情：“号称苏伊士以东第一金汤之城的旅顺大要塞——这俄国赖以作为侵略东亚策源地之城，终于抵挡不住皇军长时间的威猛攻击，敞开城门，守将亲自来到乃木将军旗下乞命。”对于乃木希典来说，阅读《肉弹》的过程是在精神世界重回辽东战场的过程。“壮烈”二字是他对该书内容的概括，也是他本人的感慨。大隈重信（1838—1922）是文人而非武人，对日本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明治后期日本的政治生活都曾发生重大影响。他创办早稻田大学，提出“东西文明融和论”，将日本定位于“对于东洋来说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来说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的重要位置。[1]在为《肉弹》所作的序文中，他把日俄战争的

[1] 《新日本论》。

胜利归结于“大和民族的本色”——军纪严肃，上下融睦，殉君殉国，献身牺牲。他还把樱井忠温创作《肉弹》定位为“着战争文学之先鞭且大获成功”。大山巌（1842—1916）是日本明治、大正两代的元帅、陆军大将，甲午战争中攻打旅顺、威海有功，升任陆军大臣（明治十八年），日俄战争时担任满洲军总司令。明治四十年（1907）受赐公爵爵位。他为《肉弹》写的题辞比较短，曰：“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实为近世接觏之壮观、而其激斗血战、莫如旅顺攻击、樱井中尉、躬当其冲、叙而记此、明白详悉、状况如目、一读之、足想见忠勇将卒之丰采、其益于后人、果若何也、因出此数语、以弁简端。”[1]

明治天皇与乃木、大限、大山等军政要人的介入将《肉弹》完全纳入皇国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同时将其纳入了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流程。加上日本媒体的大量介入，于是形成了一场官民共谋、配合默契的军国意识形态广告运动，推进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当时日本的主要媒体几乎都介入了《肉弹》的宣传活动，《肉弹》的影响扩展到整个日本社会，并且渐渐被定位在“国民教科书”的位置。这可以举《北国新闻》和《爱媛新闻》的两段评论为例。前者云：“吾人常言国民贵重精神教育、窃愿绍介此书于教育家、而从事于普通教育之小学教员诸君、尤为急当人各一编也”；后者云：“〔樱井忠温〕今挥创犹未愈之左手起稿作画、描写此大惨剧之实况、而与我国民以新记忆、以成此著作、诚战捷凯旋之好纪念、又精神教育之良资料也。”[2]《肉弹》中的汉字均注有假名，[3]这种出版形态本身具有社会学意义，体现了出

---

〔1〕黄郛译文，引自《肉弹》中文译本。宣统元年（1909）元月新学社（北京）出版。

〔2〕黄郛译文，黄译《肉弹》书后所附日本各报刊的相关评论多达三十篇。

〔3〕给日语汉字注假名类似于中文中的给汉字注拼音，便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阅读和理解。

版者将该书大众化的愿望与读者对象设定的广泛性。换言之，注假名是将《肉弹》国民教科书化的实践形式。

以《肉弹》为核心的军国意识形态的广告运动并非仅仅局限于日本国内，而是扩展到世界范围。《肉弹》出版之后立即被翻译为英文，“大和魂”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东京《时事新报》所载《轰动世界之名著》一文有介绍说：

> 《肉弹》已算入世界最大著述之一。欧美读书社会之好评。啧啧人口。咸谓可比笃尔斯笃意伯爵所著之西巴士多笃尔战记、共垂不朽云。英国皇帝陛下。爱读此书。意谓欲学日本国民勇壮浓厚之精神。莫善于读此书。遂介绍此书于皇族近臣之间。故今则英国上流交际社会中。成一最大之话柄。淑女绅士。咸有以不读《肉弹》为耻之风。
>
> 德国皇帝陛下。命侍从武官传旨谕译者新金斛尔大尉曰。德文肉弹。务速译成。能早一日出版。朕甚厚望焉。[1]

这则消息具有纪实与广告的二重性，是纪实性的广告也是广告性的纪实。1908 年初，大隈重信将精装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肉弹》同时送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当年 4 月 22 日，罗斯福在白宫给樱井忠温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说已经将《肉弹》珍藏于自家的藏书室，并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阅读了书中的几章。他认为该书能够在国家有难之时鼓舞青年人的奉公精神。在信中，罗斯福还向樱井忠温和日本陆海军表示钦敬之意。《肉弹》因此成为当时日美两国精神交流的媒介。

《肉弹》及其围绕该作品的媒体宣传活动，集中体现了明

---

〔1〕 黄郛译文，引用者重新标点。日文出处不详，当在 1908 年前后发表。

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出现，因此构成了对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动”——即对《肉弹》的反动。这种“反动性”具体表现为国家观、生命观、战争观的对立。

与《肉弹》表现的对天皇、国家的忠诚不同，《一个青年的梦》对国家持否定、批判与怀疑的态度。该剧的情节正是以对国家的否定和怀疑为基点展开的。在第一幕，“不识者”带“青年”去野外参加各国亡魂召开的和平大会，双方进行了如下对话：

> 不识者　这世界上为什么有战争呢?
> 青年　想来就因为有许多国家的缘故。
> 不识者　这样说，没有国，便没有战争了。
> 青年　差不多，就是如此。
> 不识者　这样说来，你不想去掉战争么?
> 青年　虽然有点想，但人类还没有进步到这地步。[1]

《肉弹》中至高无上的“国家”在这里被相对化了。在写于1916年12月的《一个青年的梦》“自序”中，实笃从正面展开对自私的国家主义者的批评，说：“我以为法人爱法国，英人爱英国，俄人爱俄国，德人爱德国，是自然的事；对于这一件，决不愿有所责难。不过也如爱自己也须同时原谅别人的心情，是个人的任务一般，生怕国家的太强的利己家罢了。”而《肉弹》的作者樱井忠温正是一位“国家的太强的利己家”，

[1] 鲁迅译文，《鲁迅全集》第十二卷收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后同。

《肉弹》中的大和民族优越感正是通过敌视俄国和蔑视中国建立起来的。[1]

与对国家的怀疑相对应，《肉弹》表现的基于忠君爱国思想的"勇"（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个体生命的残忍）在《一个青年的梦》中被否定。在第一幕亡魂召开的和平大会上，亡魂登台叙述的是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痛苦。亡魂五声称自己"单想将战争如何可怕，战争因为傻气才会存在的事，说给人知道"，"教那些自以为不会死在战争上的人，知道战争的可怕，而且知道死在战争上，是没有意思的事"，进而指出："以好战国出名的日本的天皇明治天皇御制里，仿佛有四海都是同胞，何以会有战争这般意思的歌，我也这样想。我的意见，以为那样滑稽武士的死法，是傻到万分。"这里讽刺了武士之勇，甚至表现出从天皇御制里发现非战思想的愿望。

《一个青年的梦》被创作出来的1916年1月至10月，正是为《肉弹》作序、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大隈重信担任日本首相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青年的梦》与《肉弹》的对立不仅是抽象的观念层面上的伦理精神、人格精神的对立，并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当时《肉弹》受到普遍认可的日本社会，《一个青年的梦》作为《肉弹》的"反文本"必然受到冷遇。事实上《一个青年的梦》确实被漠视了。这从武者小路实笃的自述中即可窥见。1922年前后，实笃在回顾自己创作历程的时候谈及《一个青年的梦》不止一次表示失望，说："自己希望《一个青年的梦》能被当时的许多人阅读，但那希望落了空"；[2]"写了那个剧本，以为能够促使世间的人们进行些许的反省，但剧本并没有那样的力量。撒下的种子也许在陌生的

---

[1] 相关问题参阅笔者在《"肉弹"伦理学》一文中的论述，载《读书》2004年四月号。

[2] 新潮社1922年版《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四卷"序"。

地方生根发芽了”。[1]这与“《肉弹》热”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一个青年的梦》表现的和平反战思想是一种寂寞的思想，一种孤立无援的思想。实笃终于是“无能为力者”。[2]

清末中国人的日本留学热促成的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使两国文化界进行即时交流成为可能。《肉弹》作为当时轰动世界的畅销书，立即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并很快被翻译为中文。宣统元年（1909）——即《肉弹》出版的第四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给樱井忠温写信的第二年——正月，《肉弹》中文译本分别由新学会社和武学编译社在北京和东京同时出版发行。译者是同盟会会员黄郛。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钱塘人，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归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国民党政府外交总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值得研究但却长期受到大陆学界漠视的人物。[3]受漠视的原因显然在于其政治属性与“亲日派”色彩。这一点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相关注释中即可看出。[4]实际上，黄郛对中国社会的某些独到见解曾经引起鲁迅的共鸣。1918年12月黄郛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由上海

---

〔1〕 自传体长篇小说《某男》，新潮社1923年版。

〔2〕 “无能为力者”是1915年前后武者小路实笃给自己及其同人们下的定义。他在1915年2月创作了剧本《无能为力者同人》，在同年3月写的一首诗中说：“自己为无能为力者／但是，是总要做点什么的人。／他们也是。”“无能为力者”是实笃自己造的词（日语汉字写作“未能力者”），意即“有做好事的意愿但没有能力”、“对于他人或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参阅《某男》178—179节的叙述。

〔3〕 张学继所著《黄郛传》是笔者所见大陆第一本黄郛研究专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黄郛的生平可参阅该书。

〔4〕 《鲁迅全集》注释将黄郛定义为“政学系的政客，亲日派分子”，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见第一卷346页。

中华书局出版，鲁迅阅读之后撰写了《随感录·五十四》[1]。在冯玉祥和台湾史学家沈云龙的描述中，黄郛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学者型政治家。[2]

关于何以翻译《肉弹》，黄郛在"译者趣意"中有详细说明。"译者趣意"共五段，每段都以"吾读是书而有感于是，吾译是书"收尾，排列整然，一气呵成。使黄郛"有感"者共五项，依次为：日军官兵互敬互爱、精诚团结；日军士兵不怕死；日本国民深知身与国之关系、团结一心鼓舞士气；日本教育培养青少年敌忾心成功；天皇通过召见樱井忠温鼓励国民，上下一心。——就基本评价而言，黄郛在这里对从天皇到将校到士兵、平民的所有日本人进行了褒奖。不过，这种褒奖证明的并不是黄郛的"亲日"或"媚日"，相反，证明的是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五节"趣意"上的眉批依次是："我国将校看者"；"我国兵卒看者"；"我国国民看者"；"我国教育家看者"；"我国当道看者"，均与眉批下面的内容相对应。显然，黄郛翻译《肉弹》是带着明显的现实目的，希望中国从上到下各阶层的人们各自仿效对应阶层的日本人，从而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

"译者趣意"之外，黄郛在译文之前另列有"读者注意"三条，其中第二条云："是书不滥加圈点。其加圈点者。均系译者有深意处。幸勿略而读过焉。"综观书中圈点处（包括眉批），多为人名、地名、事件的简单提示。但在第十四章樱井忠温批评中国人的地方，黄郛均做了圈点。樱井忠温将中国人看作"为金银故而生命亦可献上之支那人"，进而批评道：

---

〔1〕 此文收入《热风》。

〔2〕 《冯玉祥自传》第一卷"我的生活"第三十、三十一章均涉及北伐前后的黄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沈云龙《近代史料考释》中《记民五黄克强致黄膺白的一封信》、《黄膺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二文亦可参阅，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6月，台北。

“噫、彼等乃亡国之愚民而贪婪无厌。唯知金银之是尊。忘却其极大之利害得失关系。日俄交战而荒芜彼等之田园者。果何为哉。噫、此等事固不待言。彼等决无感觉者也。”黄郛对此的圈点无疑具有警省国人之意，希望国人变为“有感觉者”。颠倒原著正、副标题，将书名翻译为“旅顺实战记”，应当具有提醒国人“国民意识”的用意。《肉弹》中译本书后附有三十篇当时日本各地报刊《肉弹》评论的汇编，足见黄郛不仅对《肉弹》一书本身感兴趣，并且关注日本社会对该书的反应，翻译之前进行了充分准备。

黄郛对待《肉弹》的认识尽管打上了大隈重信的印记（“有感”的第一条与大隈“序”中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体现的主要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取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开始寻找生存之路，建设民族国家，富国强兵同样成为基本理念。这是黄郛诸人对《肉弹》发生共感的心理背景。黄郛所褒扬的日本国民送军队出征时的“祈战死”，正是梁启超曾经关注的。此前的1899年冬天，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被上野公园新兵入伍的壮观景象和“祈战死”的标语所感动，并撰写了《祈战死》一文。当时留学日本的青年鲁迅同样是尚武精神的推崇者。1903年所作的《斯巴达之魂》就是赞美斯巴达将士的勇武，以激励中国青年。鲁迅在文章的小序中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1]甚至后来成为实笃介绍者的周作人，辛亥革命之前亦曾写过褒扬尚武精神的文章《论军人之尊贵》，声言“今世界文明诸国，无有以不教民战者”，视军人为“国家之保险行”、“国家之资本家”、“国家之救世主”、“国家之司命神”，得出“今以身列戎行，出足以卫社

[1] 此文初发表于1903年6月15日、11月8日东京《浙江潮》第五、九期，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

褀，入足以耀乡里，其机之巧，其计之便，无逾是矣"的结论。[1]这种对于富国强兵、尚武精神的追求与国民性改造思想直接相关。黄郛通过对《肉弹》的圈点、批注表达的对国民之麻木的批判，正与同一时期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相同。仙台鲁迅对国民之麻木的清醒认识，恰恰也是来自以日俄战争为题材的幻灯片上的中国人。显然，无论是对于梁启超来说、对于黄郛来说还是对于青年鲁迅来说，明治日本的时代精神和日本人的国民性均成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重要参照。

在《肉弹》的中译本中，译者黄郛的"译者趣意"和"读者注意"之外另有序、跋三篇，作者分别为胡惟德、庄蕴宽、陆光熙三人。从序、跋中可以看出时人阅读《肉弹》时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与译者黄郛基本保持了一致。庄蕴宽提醒读者意识到日俄两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相争，说："此何地也、乃有此战、使吾国有军事职者、读之而增愧愤、庶几终为弱者之胜哉。"陆光熙痛述中国之弱、之耻，说："吾友黄君郛。有赤血之好男子也。以其血泪译此肉弹。吾读而爱之。夫此书在日本人视之则为肉弹。在吾人视之则为血泪。此书实含有我国民无数之血泪。今日读是书而不耻且羡、而血不沸泪不下者。必非中国男子。吾愿献此书为我朝野父老子弟养血之剂。"

《肉弹》中译本宣统元年（1909）正月二十一日初版发行，至宣统三年（1911）五月，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即发行至第五版。国外总发行所武学编译社位于"东京四谷区坂町百十四番地"，国内总发行所新学会社位于"北京琉璃厂西首路南"。可见《肉弹》显然拥有一个不小的读者群体，而且其读者分布在较大的范围之内。到了三四十年代，《肉弹》依然在被中国读者阅读。1930年4月，邹韬奋（1895—1944）在《生活》周

---

[1] 原载1910年7月26日《绍兴公报》。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刊上发表了《读〈旅顺实战记〉》[1]，从三个角度对《肉弹》进行阅读：一、俄国何以战败；二、日本何以战胜；三、日本人如何看中国人。邹韬奋将日本人的战胜归结为“不怕死不避死”，并指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以及这种蔑视与残杀、侮辱中国人的关系。邹韬奋的阅读显然是在黄郛等人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关注的问题与基本价值趋向均与前人保持着一致。1946年出版的张剑慧所著《辰子说林》中的《老将哀音》亦谈及《肉弹》，肯定为《肉弹》作序的乃木希典，说：“其人虽刚愎愚顽，而尚有若干忠直之气。此种气质，求之于现代日本军人中，已不可复得。”[2]

因为“有感”而翻译《肉弹》的黄郛留学日本期间即与蒋介石交往甚密，共同创办《武学杂志》。《肉弹》的国外总发行所武学编译社显然与《武学杂志》社有直接关系。黄郛归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1933年5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并担任教育总长。这种特殊的经历有可能使其对《肉弹》的共感直接影响到国家意识形态。

《一个青年的梦》是在《肉弹》中文译本出版十年之后的1919年被鲁迅翻译为中文。如同在明治末年、大正初年的日本社会《一个青年的梦》必然地与《肉弹》发生关联并且是作为《肉弹》的“反动”出现的，在1909年至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中译本《一个青年的梦》与中译本《肉弹》构成了同样的“反动”关系。将二者置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来看，这种“反动”则更加清楚。在《一个青年的梦》被介绍到中国两

---

〔1〕此文发表于1930年4月27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20期，收入《韬奋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2〕《辰子说林》2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该书最早是在1946年2月作为“新民报文艺丛书”之一由南京新民报社出版。

年之前，《新青年》二卷一号（1916 年 9 月 1 日出版）刊载了程师葛与陈独秀的通信，两封信象征性地体现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军国主义与人类主义的对立。程师葛在信中公然说："中西国民强弱不同之故虽多，而中人爱和平，西人尚武勇，实足为其总因，故窃谓德之军国主义，最适宜今日之中国。彼佛之慈悲，耶之博爱，与夫社会党之非战，说理虽高，不宜实现。"而陈独秀认为："以今之中国而言，军国主义殊未得当。若夫慈悲、博爱、非战诸说，为人类之最高精神，然非不武之被征服民族，所可厚颜置诸脑、出诸口。"[1] 在这个思想背景上，《一个青年的梦》与《肉弹》这两个文本的中文翻译首先不是一个文学事件，而是一个思想事件。周作人是基于和平主义、人类主义立场肯定《一个青年的梦》而否定《肉弹》，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对新村运动的共感——在实笃那里新村运动的提倡本来也是其和平思想的逻辑结果。蔡元培、陈独秀等五四精英和周作人一样，同样是认同《一个青年的梦》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理念。于是，《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宣传活动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发生了关联。这种"人类意识"与黄郛等人对《肉弹》"强兵"观念的共鸣体现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构成了对比与对立，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对立状态与复杂性在这种对立中呈现出来。

在新文学运动的范围之内，《一个青年的梦》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理念。建立"国民文学"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代表性的表述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2]。此文提出的"三大主义"的第一条即为："曰推倒雕琢的阿谀奉承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上，陈独秀所谓的"国民"显然不同于国家主义者（或军

---

〔1〕 引自《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出版。

〔2〕 1917 年 2 月《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

国主义者）所谓的“国民”。当陈独秀们对《一个青年的梦》的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精神产生共鸣的时候，“国民文学”就具有了“非国家”（至少是将国家相对化）的意义。耐人寻味的是，反对战争并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国家的《一个青年的梦》的中文译文，最初恰恰是发表在《国民公报》上。[1]与黄郛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相比，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是在不同的纬度上建立“国民”观念的，在建立“国民”观念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对国家主义保持着戒备。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比陈独秀倡导的“国民文学”更接近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甚至到了“回到民族主义”[2]之后的1925年，周作人谈及“国民文学”的时候依然强调：“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这个结果是凡本国的必好，凡别国的必坏，自己的国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争战是天下之正义，而犹称之曰‘自尊心’。”[3]

与实笃在日本的寂寞完全不同，《一个青年的梦》对五四时期与五四之后的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鲁迅翻译《一个青年的梦》的五年之后，依然有人翻译《一个青年的梦》。1924年7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七期发表了陈嘏翻译的实笃戏剧《某画家与村长》，该剧实际上是《一个青年的梦》第三幕的第一场。译者从《白桦之森》中翻

---

〔1〕《一个青年的梦》是从1919年8月15日开始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连载，至当年10月25日该报被查封。同年11月鲁迅将译稿校订之后分四次发表于《新青年》。

〔2〕周作人在1925年1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九期上发表《元旦试笔》，声称“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

〔3〕《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作于1925年6月1日，同年7月1日《语丝》第三十四期发表。

译了这个短剧，并在"译后记"中介绍《白桦之森》和实笃，说："武者先生的文学道德久为世人所共识。这篇短剧，很能看出他文学的趣向和艺术上的技能。"在实笃精神的传播过程中，《国民公报》、《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发挥了作用，与此同时，由于相关作品被编入中学国语教科书，与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其获得了制度化的存在方式，影响力得以渗透到中学生阶层。进入30年代，随着日本的入侵，《一个青年的梦》对于中国人与中日关系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一个青年的梦》提供的思想作为纯粹的思想活动，在逻辑的层面上具有超前性与合理性，体现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丰富性与开放性。但是，当它被作为一种认知日本意识形态、把握日本社会的材料的时候，它显然没有《肉弹》所具有的那种真实性。如果说《肉弹》真实而又鲜明地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本质与社会意识形态，那么《一个青年的梦》所包含的则仅仅是日本社会中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倾向。而且，对于贵族家庭出身、"不懂世事"的武者小路实笃本人来说，这种非战思想是起源于对死亡的原始恐惧，缺乏社会内涵。换言之，实笃的反战思想是一种本能性思想而非社会性的思想。[1]但周作人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周作人、鲁迅、陈独秀等五四精英通过《一个青年的梦》来认知日本的时候，不仅在历史－社会的层面上陷入唯心主义，并且误导了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近代日本国家本质的认识。

当时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没有为和平主义—人类主义思想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环境，相反，提供的是促使这种思想崩溃的环境。果然，和平主义—人类主义思想的崩溃很快到来。这种崩溃的表现形态首先在于《一个青年的梦》的鼓吹者周作

〔1〕 实笃反战思想的形成与内涵是一个有待专文探讨的问题，这里仅做简要说明。

人本人在“五四”进入落潮期的1923年有条件地认可了军国主义。他在《还不如军国主义》一文中说：“我不是国家主义者，但如有人提倡军国主义，主张以武力对外解决一切，我倒是赞成他的，因为他还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中国向来吃亏，都因为没有实力；倘若有实力，则‘伏见丸’早晨在长沙闹事，中国舰队就可在晚上开往长崎马关去，更何劳赵省长之函电呼吁。所以提倡军国主义，比较的还是正当的办法，虽然我个人决不加入，也决不愿小儿们去受军国民教育。”[1]不久他从世界主义者缩小为亚洲主义者、进而缩小为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相通性与互为生产性在这里充分表现出来。这种崩溃的另一种形态，就是30年代日本开始侵华战争之后孙俍工对实笃《一个青年的梦》的改写以及中国版《肉弹》的诞生。

二　孙俍工的“实笃情结”

在鲁迅、周作人、蔡元培等思想主将级的知识人之外，五四青年中年轻一代的孙俍工（1894—1962）应当被看作受实笃及其《一个青年的梦》巨大影响的代表人物。关于这种影响，孙俍工本人在1931年圣诞节所写的《续一个青年的梦》的“自序”中说：

> 我在往昔尝读武者小路先生著的《一个青年的梦》，没有一次不唏嘘流泪的。人类不幸而有惨无人道的战争，人类何幸而又有这反对那惨无人道的战争的作家武者小路

[1] 初发表于1923年7月19日《晨报副镌》，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先生。武者小路先生在这一部书里以悲天悯人的胸怀，用艺术表现的手腕，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及战争发生以后直接间接人们所受的荼毒，实表现无余了。故我底感佩有如此。

我常把这部书当作世界人类底福音，对着我底学生宣传，其重要的语句，我既编进了我底《中国语法讲义》例句中，而其自序及《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并选入了我和仲九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我敢自信：我对于武者小路先生底这部著作不但以前是尽过了相当的宣传责任，而且以后将要尽着我能尽的力尽量宣传的。我并敢自信凡是我底学生只要是真心听过我底讲授的，对于武者小路先生这一部著作总多少有点影象。[1]

此处所言“向学生宣传”一事发生在20年代初期，当时孙俍工先后在长沙与上海的吴淞中学等处担任国文教师。《中国语法讲义》1921年5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至1926年3月5日即发行至第五版。该书的不少例句是取自实笃《一个青年的梦》、《一个青年的梦自序》以及周作人的《日本底新村》。《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共六编，为孙俍工与其同事仲九合编，1922年8月开始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编者在该读本的卷头语（写于1922年8月1日）中说：

全国出版界中，国语文底选本，似乎还不少，但编次较有条理而适于中学程度用的，究有几种？严格地回答这问题说一种都没有，也未始不可。因此，教授国语文的，只好自选教材了。〔中略〕我们现在担任吴淞中学国文教授，所谓国语文教材困难这一问题又急切地压迫着我们了。

〔1〕《续一个青年的梦》1—2页。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9月印行。后文的引用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我们为免除这困难计，就勉强地草率地编了这一部书。

这套教材以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大纲》为依据进行编写，卷头语之后即附有该大纲。大纲第一项“目的”的第一条为：“人人有迅速阅看国语书报的能力，以启发思想；并且了解现代思潮的大概”，并在第三项“教材”部分将教材分为“读本”和“看书”（一般阅读）两种，强调读本的重要性，说：“读本是选集形式内容都好，可作作文模范的文章，学者须精读研究。”孙俍工与仲九在卷头语中声称该教材的“选材标准，是内容真实而不背时代精神，形式合法而充分表现个性”。与实笃相关的五篇文章在这种前提下进入读本，意味着这五篇文章体现了时代精神，有助于学生了解现代思潮。入选的五篇文章分别是：《访日本新村记》，《一个青年的梦序》，《与支那未知的友人》（此三篇收入第二编）；《日本的新村》，《新村底理想与实际》（此二篇收入第三编）。这样，通过孙俍工的努力，《一个青年的梦》与新村运动体现的实笃精神与民国教育实践发生了直接关联，实笃的反战思想在中国获得了制度化的存在方式。该读本1922年8月初版发行之后，仅至1926年9月就连续五年发行到第五版。“实笃精神”在中学生阶层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这种以教科书为中介的制度化影响与《新青年》杂志的非制度化影响是在不同的读者阶层中进行的，构成了互补。

孙俍工对实笃的共鸣与其本人的状况密切相关。孙俍工是工学会（成立于1919年2月9日）成员，当时在《工学》月刊上发表文章，倡导工读主义，赞同新村运动。《工学》一卷五号[1]上即有他与周作人的讨论《“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

[1] 1920年3月28日出版。

论》。工读互助活动与新村运动具有内在的相通，显然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同样收录了《访日本新村记》等三篇文章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第二编，也收录了《评工读主义》、《新青年宣言》、《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等文。文章较多入选该读本的叶绍钧，也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并成为新村会员的人。[1]

《中国语法讲义》和《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还展示出"实笃精神"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内在关联。《中国语法讲义》的序言为陈望道（1890—1977）所写，这位陈望道正是一位早期社会主义者。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入中央大学就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月归国。192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并应陈独秀之邀参与编辑《新青年》，同时发表文章，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他最早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22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他的介绍文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底创立》并翻译了该同盟的"规约草案"。《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的卷头语结尾处也提及陈望道，说："我们很感谢陈望道先生供给我们一点有益的意见。"该读本与陈望道的关系和编者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者的关心又相一致。被选入第一编的《老了》（作者署名MW）一文，就是肯定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的奋斗精神。该读本的第四编甚至收录了《社会主义底意义及其类别》一文。

孙俍工对"实笃精神"影响的接受与宣传并非仅仅表现在教学活动中，也表现在其同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1924年孙俍工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海的渴慕者》，集中的十八篇作品作于

---

[1] 笔者所撰《周作人与〈新村〉杂志》一文涉及叶圣陶与新村的关系。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二期。1920年一月号《新村》杂志"新入会员"栏有叶绍钧的名字。

1921 年至 1924 年初，[1]那正是孙俍工感动于“实笃精神”的时代，而且，该小说集的出版者民智书局正是孙俍工与仲九所编《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的出版者。

以《一个青年的梦》与新村运动体现出来的“实笃精神”为背景阅读《海的渴慕者》，不难发现一个根本的相通之处——以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怀疑、对国家的排斥为基本内容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无政府主义精神。在《海的渴慕者》中，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怀疑与对国家的排斥导致了社会反叛角色的出现。该集第一篇小说《疯人》的主人公是一个疯子，但叙述者通过小说中人物悟生之口对疯子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说：“这样的社会，所给人们的教训，除掉疯狂，简直不能容别的什么存在一点；但是这类的人底意志已经降了一级了……”；“我们简直可以说，现在人们所认为疯人的，——这疯人，我以为是人类本来的，真的，心里底发现，这是地底肖子，这是好人；不但是好人，而且可以说他们是‘达天德’的圣人。他们的人生观很真确！至当不移！现在的人们，就是不自以为疯，却梦梦然过了一生的人们，都是把他们，他们底自己建设在一个极虚伪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实在不稳固得很！”而在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第二幕中，那个因为反社会遭警察追捕的乞丐，恰恰是认为“这世间是立在谬误的基础上”。显然，《一个青年的梦》中的乞丐到《疯人》中转变为疯子，成为孙俍工的代言人。在这种转换中，实笃转换为孙俍工，或者说孙俍工与实笃一体化了。小说集中的另一篇小说《海的渴慕者》（小说集即以该篇命名）中那个愤世嫉俗、赤裸着身子在荒草中、在大海边徘徊的男人，则被人们视为“乞丐”。这位“乞丐”严厉批

[1] 该小说集中的作品大都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第一篇《疯人》文后注明“一九二一，二，二四。在长沙”，而夏丏尊的“序”写于 1924 年 3 月，由此可见该小说集是 1921 至 1924 年初的作品。

判黑暗的社会与“野兽似的”人们，对自称保护他的“国家”进行了彻底否定，说：

> 你吗？我诅咒你！万恶的国家！你也是踏破我底头我底胸口、我底手足，全身，使我出血的。保护？你看我多少的血是为你流掉的！你底职务就是使我，而且大多数人流血麽？流血成了你底正谊！你岂不是为流血而才存在的？万恶的你，我诅咒你，我厌弃你如同厌弃秽浊一样！我愿你永离现世不得再见天日底光如同恶魔一样！我愿世界上永远也看不见你底影子，永远也听不见你底名字的声音！

在这里，《一个青年的梦》对国家的认识被重复表达的同时，“乞丐”也与《一个青年的梦》第二幕中那个总是说些“不三不四的社会主义的话”的乞丐融为一体。小说集《海的渴慕者》中的疯子与乞丐作为现存社会的批判者和国家的否定者，与实笃笔下的乞丐承担着相同的功能。

孙俍工在小说的主题和角色设置方面对实笃的模仿，还体现在同样编入《海的渴慕者》中的另一篇小说《神已祝福了他了》之中。《神已祝福了他了》是一篇将抽象的理念人格化的寓言小说，角色共有三个，分别是“爱”、“魔”、“神”。这种角色安排与《一个青年的梦》第四幕十分类似。《一个青年的梦》第四幕的开头部分，“魔”就是与“神”作对，企图灭绝人类。这里虽然没有“爱”的角色出现，但从魔对释迦牟尼、耶稣怀戒备之心来看，“爱”也是一个潜在的角色——生命之爱、人类之爱本来是佛教、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在《神已祝福了他了》中，“魔”与“爱”是对立的，而对立的本质则被描述为“国家”（政府）与无政府的对立——“魔”在黎明前将“爱”杀害，宣布“爱”的罪状：“宣传无政府主义，煽惑人

民，扰乱社会。”但在“神”的最后宣判中，“魔”则成为“政府”的代表。“神”这样宣布“魔”的罪状：

> 魔，你在世界里散布虚伪的道德，巧立政府底名目，使人们奴仆于你底威严底下，而不自以为不义。你把人们享有的生活、幸福，聚集于你底一身，使劳动者为你做一生的工作，而不能免于饥饿以死，而不自以为不义。你把人们底生命看作草芥、土梗一样，使他们为你个人底私欲，粉碎他们底颈臂，而不自以为不义。你颠倒了我神底意志！你把诡诈当作了正谊，你把战斗当作了和平，你把惨酷当作了慈仁，你把嫉妒当作了坦白，你把私见当作了公理；你事事同人道主义反对，你还要损害我神底使者爱！魔，你在世界所行的罪恶，实在已充满着地球上，地球再不能负载得起你底罪恶了！

而在《一个青年的梦》第四幕中，恶魔正是利用“寄生在爱国心里的霉菌”挑起国家之间的战争，使德大、日大、俄大、法大等以“为国家”的名义为非作歹。世间的罪恶主要是国家的罪恶——这是《神已祝福了他了》与《一个青年的梦》共有的逻辑。只是与后者相比前者更乐观一些。在《神已祝福了他了》最后，“魔”被“神”赶往黑暗之中，“爱”则依靠“神”的力量得以再生。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由于孙俍工是在“实笃精神”的影响之下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一直与《一个青年的梦》保持着深层的、散在的“互文性”。小说集《海的渴慕者》出版七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对于国家、战争、和平等问题的关心促使孙俍工续写《一个青年的梦》，于是《续一个青年的梦》出现了。

孙俍工在《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初版发行两年之后的1924年赴日留学，入上智大学就读，研究德国文学。为习德国文学而留学日本是否与对实笃的崇敬有关，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1928年回国，任复旦大学教授，1930年担任中文系主任。1931年第二次留学日本，但赴日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于是愤然回国。关于当时的心境，孙俍工本人这样说：

> 这一九月十八沈阳城头流血的初夜，我还在武者小路先生底贵国京都狮子谷做着甜蜜的理想的梦，送号外的叮当的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惘然了！一夜都睡不〔着〕觉，使我频频地忆起了武者小路先生《一个青年的梦》。〔中略〕以后三数天中送号外的叮当的铃声不绝于途，辽吉黑三省人民底血跟着那铃声飞溅，同时我底心头的血也跟着那铃声涌沸，我底人类命运底恐怖也跟着那铃声盘旋，怎么了！一个青年底梦，终竟成为一个梦么？世界人类真没有一个人认识和平女神底美的么？世界人类真没有一个人把真心献给于和平女神的么？怎么了〔?〕连产生这作品的日本民族也轻视这作品底价值么？[1]

在这段表达中，应当注意的不仅是孙俍工对实笃的难以忘怀，更主要的是对"人类"、"和平"等理念的执著。但是，孙俍工从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中知道："日本人战争底中毒很深，虽有十个武者小路先生，虽有十部这样的《一个青年的梦》也不能挽救"。"九一八事变"发生十天之后的9月29日，他愤然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回国之后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依然使他记起实笃《一个青年的梦》，于是开始创作《续一个青年的梦》。[2]现

---

〔1〕《续一个青年的梦》"自序"。

〔2〕同上。

代中日文学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互文"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作为"续作"，孙俍工的《续一个青年的梦》在形式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进行了自觉的模仿。

《一个青年的梦》对国家和战争的批判精神在《续一个青年的梦》中得到了自觉的继承。如孙俍工在谈及创作动机时所言："武者小路先生这作品终是反对战争的名著，自有它底不可磨灭的处所，日本人底思想与行动虽然与此相距甚远，实非武者小路先生这作品之罪，我何不把他底非战的精神继续发扬一下呢！"

在形式方面，《续一个青年的梦》尽管是六幕剧，比《一个青年的梦》多了两幕，但完全采用了《一个青年的梦》的叙事结构。两部作品结构的一致性体现在以"青年"和"不识者"的漫游为主干展开故事和"戏中戏"的运用两个方面。在《续一个青年的梦》的序幕中，不识者在夜间来到寺院，将在灯下读书的青年带出，于是故事展开。——这与《一个青年的梦》的开场完全相同。不同只在于，在孙俍工笔下"从前那青年现已蓄着仁丹胡须"。《一个青年的梦》最后一幕的场景是"戏棚"，《续一个青年的梦》最后一幕的场景则是"戏园"。看完演出之后，"不识者抓住青年，从窗口掷出。幕下"。这一点两部作品亦完全一致，甚至舞台说明也只有个别字和标点符号的差异。青年与不识者之外，"鬼魂五"与"美的女人底魂"等《一个青年的梦》中原有的角色在《续一个青年的梦》中的出现，也增强了原本与摹本之间联系，使二者达到了框架与人物的统一。在让剧中人发表大段演说、通过剧中人表达自己的理念方面，两者都表现出鲜明的"观念剧"特征。

不过，在戏剧艺术的层面上，《续一个青年的梦》远在《一个青年的梦》之上。一是它的结构更紧凑，与《一个青年的梦》结构的松散、随意不同。"随感式"本是实笃文学创作

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也体现在《一个青年的梦》的创作中。《一个青年的梦》共四幕，是实笃在1916年1月至10月间分四次断续写成的，除了精神理念的一致之外，各幕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实笃本人也在1916年底为单行本《一个青年的梦》[1]所作的“自序”中坦言：“这个剧本，从全体上看来，还不能十分统一。倘使略加整顿，很可以从这剧本分出四五篇的一幕剧来；也可以分了一幕剧，在剧场开演。全体的统一，不是发展的，自己也觉得不满足，而且抱愧。”而《续一个青年的梦》不同，它是孙俍工在1931年11月23日至12月23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情节的发展、场景的转换、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十分紧凑。这种情节的一致性、渐进性，集中体现在第四、第五幕中。第四幕共有三场，场景分别是：中国一古城门口，古城内十字街头，交涉署前。青年在这里看到的是进入中国的日军的暴行。第五幕依然是分为三场，场景分别是：空中，朝鲜都市一车站，吉林东亚旅馆门口。青年离开中国之后看到的是日本人如何通过特务、警察和报纸造谣，挑起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冲突，实施“驱鲜杀华”的策略。这种完整性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所没有的。

《续一个青年的梦》尽管是对《一个青年的梦》的模仿，但由于作者身份与境遇的差异，这种模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形。与戏剧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一致不同，两个剧本的精神联系则复杂得多。

与实笃在《一个青年的梦》中所持的纯粹人类主义立场不同，孙俍工的人类主义立场中已经更多羼入了民族主义立场。这与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愤然回国、怀着自觉的中国人意识开始创作直接相关。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一个重心的转换——

[1] 洛阳堂1917年1月26日初版。

《一个青年的梦》中的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在《续一个青年的梦》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国家的压迫——具体说就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压迫。《一个青年的梦》表现的是“国家之罪”，而《续一个青年的梦》在表现“国家之罪”的大前提下着重表现了“日本国之罪”。这里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国家与战争被合理化的可能性。当中国和朝鲜作为国家受到日本的侵略、当中国人和朝鲜人作为国民被日本人屠杀的时候，作为国民以战争的方式保卫自己就是必然的。果然，在剧本完成之后所作的“自序”中，孙俍工尽管强调自己的续作“与武者小路先生底思想矛盾冲突的事是不会有的”，但接着又说：

> 我虽然从早以来就深深佩服武者小路先生所说“血腥的事我想能够避去多少，总是避去多少的好”的话，但是在“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的贤明的日本国民还没有一种合理的举动表现在人类之前的时候，就是“将人不当人的事，……不合理的压迫别人的事，夺了别人底独立和自由当作奴隶的事，用暴力压服的事”还没有从世间消灭以去的时候，谬然说着“将互杀改了互助，将相憎改了相爱，将记仇改了记恩，将骂詈改了赞扬，将仇敌改了朋友”（参阅原著第三幕第二场）的话，也是不会有的，总之，我不敢隐瞒了我底悲愤的心情不说出我要说明的话！

这种意识已经远离甚至颠覆了五四时期周作人、蔡元培等人的纯粹人类主义立场。国家与战争在这种颠覆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继承与颠覆的并存标志着孙俍工人格的分裂——即人类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分裂。

在孙俍工对《一个青年的梦》的续写过程中，鲁迅译本发挥的功能值得注意。《续一个青年的梦》“自序”中的相关引文

与舞台说明均为鲁迅译文或者对鲁迅译文的改写，在这个意义上，该作品是对实笃原作的续写同时也是对鲁迅译作的续写。在续写鲁迅译作的意义上，《续一个青年的梦》同样取得了成功。这不仅在于其熟练、自然的白话语言没有鲁迅“硬译”的生涩，更主要的在于他将鲁迅的“国家比喻”在舞台上形象化了。在实笃的原作中，国家是被拟人化的——日本变成“日大”、俄国变成“俄大”等等，而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的“译者序”中将国家比喻为遮蔽、蒙骗人的“鼓”，说：

>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的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1]

这种“鼓子”的比喻到了孙俍工《续一个青年的梦》第一幕的舞台上，即具象化为“演坛上一只国底鼓子”。青年问：“国底鼓子，放在演坛上有什么益处？”不识者回答：“就是在那里面弄出来的把戏。就是因了国底鼓子依然存在世界上，所以要开自卫会的。”田鸡鬼等从中爬出，于是世界充满罪恶。

《续一个青年的梦》的诞生标志着实笃在五四至30年代初的中国影响的深远，也标志着这种影响的终结。它是中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年代人类主义—世界主义崩溃之前的回光返照。

---

[1]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1920年1月《新青年》七卷二号初发表，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三 “战争文学”与中国的“肉弹”

对于中国新文学作家来说，日本的入侵带来的民族生存危机迫使他们把思考的焦点向国家、战争、民族等问题集中，《续一个青年的梦》即折射出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文学主题上的投影。几乎是在《续一个青年的梦》问世的同时，有关“战争文学”、“国防文学”的提倡与讨论也在文坛展开。随后，“国防文学”的倡导引发了两个口号的论争。

殷作桢所著《战争文学》可谓当时特定环境中鼓吹战争文学的代表作。该书1935年11月作为大风社（该出版社在杭州）“大风文库”的第六种出版，著者在书中回顾中国与西方战争文学的历史，否定欧战前后的“非战文学”，并将欧战前后的“非战文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以法国的罗曼·罗兰、俄国的库卜林、挪威的波衣尔为代表；第二类是“急进的非战主义”——以法国的巴比塞、德国的凯拉曼为代表。对于第一类，著者评价说：

> 他们是十足的人道主义作家，他们虽然反对战争，但他们是站在于人道主义的立场，用和平主义的温情态度，来祈祷战争停止，和平实现的。他们哀泣着人类为大战而受难，痛恨人类之悲惨的与斗争的本能，希求全人类人道主义精神的复活。他们的温情主义的梦，和现实世界隔离得太远了。他们尽管在梦中祈求，现实是铁一般的生硬，战争继续进行着，杀气弥漫了全世界。他们的此种非战态度是徒然的，他们的非战文学只有在大炮炸弹之下粉碎。

殷作桢在讨论非战文学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实笃《一个青年的

梦》，尽管《一个青年的梦》同样是欧战的产物并且风靡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不过，这里对非战文学精神特征的概括却完全符合《一个青年的梦》。《一个青年的梦》正是“温情主义的梦”，实笃等人也是“在梦中祈求”。在五四至3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想脉络中，殷作桢的这段表述实质上构成了对“实笃精神”的否定。

基于对“战争的二十世纪”的基本认识，在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武力侵占东北四省，建立傀儡政府，夺取殖民地市场，企图暂时缓和本身的矛盾”这一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后，殷作桢说：“我们得想出一个办法来，怎样的去消灭战争。毫无疑义的，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我们要用革命的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根据这一理论而出发的战争文学，才是现阶段所需要的革命文学。”于是，“战争文学”获得了民族与正义的合法性。

《战争文学》一书的印刷形式为文库本，正文部分仅47页，约一万五千字。严格说来它仅仅是一篇单独印刷的论文，称不上一本书。不过，封面设计充分展示了“战争文学”的战斗精神——封面上淡红色的水印图案为古代战车、战船、跃动的虎以及战马上挥刀的士兵。书后所付“大风文库目录”中的十一册书中，半数左右与战争有关，如《将来大战与中国》（蒋坚忍著），《国家总动员》（徐培根著），《空袭与防空》（吴口夫译），《生物战争与种族保存》（董聿茂著），《太平洋军事地理》（蒋震华著）等等。由此看来，大风社的命名以及该丛书“大风文库”的命名或许是取汉高祖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义。在当时“大风起兮云飞扬”、国难当头的年代，“猛士”为国家和民族所急需。

“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是与殷作桢“战争文学”的倡导同时进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最后基本上统一在鲁迅与郭沫若的解释。鲁迅在

《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1]中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总口号，将“国防文学”等等作为总口号下面的具体口号，郭沫若则将“国防文学”扩大为“国防文艺”，并将“国防文艺”理解为“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2]。这都得到了茅盾等人的认同，论争基本平息。[3]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各类文学史著作多有论述，无须重复，应当探讨的是两个口号与“战争文学”的关系。

殷作桢提出“战争文学”之初，即遭到两个口号论争参与者辛人批判。辛人的文章，就是《论当前文学运动的诸问题》[4]。辛人文章的最后结论是对鲁迅观念的认同，但其论述却是通过对殷作桢《战争文学》的批判展开的。辛人彻底否定了殷作桢的《战争文学》，说：

> 这位著者站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战争主义底立场上。主张我们也应该有“战争文学”，但这“战争文学”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
> 这一点是重要的。一切的法西斯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文学和战争的不可分离，因为他们站在最反动的立场上。他们可以用极国民的、极民族的口号，但那口号底内容却只是非常狭隘的少数者底利益。当然，我们知道这位著者是没有资格作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理论家的。但我们在上面证明过，而且现在更要来作进一步证明：他是站在帝国主义

〔1〕原载1936年7月1日《现实文学》第一期。

〔2〕《国防·污池·炼狱》，原载1936年7月10日《文学界》第一卷第二号。

〔3〕茅盾的回应文章参阅《关于〈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给本刊的信》，载1936年7月10日《文学界》第一卷第二号；《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载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一卷第三号。

〔4〕文载1936年8月1日《现实文学》第二期。辛人即陈辛人，广东普宁人，时为东京左联成员。

者底利益上承袭着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理论的。

最后，辛人将《战争文学》界定为“鼓吹内战，掩饰亡国的汉奸文学”。

由于殷作桢在政治理念上持反苏反共的立场、认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客观上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形成，因此辛人的批判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不过，辛人认为殷作桢是“站在帝国主义者底利益上而承袭着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理论的”，完全否认殷作桢的民族主义立场，则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辛人回避了殷作桢对于战争之必要性的强调，因此其批判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在逻辑的层面上，辛人实际上认同了殷作桢对战争之必然性的强调，问题只在于对“战争”与“战争文学”理解上的差异。“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间产生了论争，但两个口号与“战争文学”之间的论争并未真正形成，原因显然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战争文学”的成立是无法否定的，只是这种“战争文学”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具体化为“抗战文学”。仅限于两个口号而言，二者之间具有差异并且产生了论争，但在表明“战争文学”之成立这一点上完全一致。这种一致也是二者与殷作桢“战争文学”的一致。在对战争的有条件认可方面三者达到了统一。与理论层面的一致性相对应，抗战时期文学创作实践中出现了褒扬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剧作家集体创作的第一部抗战剧本《保卫卢沟桥》以及丘东平的报告文学《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等，均属此列。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非战文学”占主流的时代，那么，30年代则是“战争文学”确立的时代。

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能够代表“战争文学”的实绩并与樱井忠温的《肉弹》构成潜在“互文”关系的，是包起权以抗战为题材的同名剧本《肉弹》。

剧作集《肉弹》1939年1月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作为“抗战戏剧丛书之六”印行，收录了《肉弹》和《寒衣曲》两个抗战题材的剧本。《肉弹》为独幕剧，剧情是：国军飞行员程万里和新婚妻子华苦心关心国家命运，投身抗日斗争。程万里曾经击落数架敌机，华苦心也在积极排练、准备为抗战募捐义演。当日，程万里出门值班，华苦心在家排练，防空警报响起，又有日军飞机前来轰炸。华苦心与琴师黄老板、好友林志芳目睹涂有青天白日标记的机群起飞迎战日军飞机，其中的一架陷入三架日机包围，寡不敌众，撞下两架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天空中敌机遁逃，地面中国民众欢呼。随后，收音机里传来女播音员的声音：

> ……最后一件报告。最后一件报告。我们的空军战士程万里，程万里先生，和敌人拚了。撞了敌人的两架飞机。程先生他自己也同时和他的飞机为国牺牲了。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向为国殉身的程万里先生致敬，致无限的敬意！

最后，剧情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结束。

《肉弹》中的国军飞行员程万里是被“肉弹化”的。他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地面民众的反应就是：“一个肉弹！一架拚了鬼子的两架！”《肉弹》这个剧本原来的剧名为《苦心》，与《寒衣曲》合在一起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改为《肉弹》。包起权将国军飞行员“肉弹化”并且改作品名为《肉弹》是否与樱井忠温的《肉弹》有关无从查考，但作品名称的相同标志着价值取向的一致。“肉弹”一词在中国与日本的两部作品之间建立起精神联系，成为理解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关键词之一。

两个“肉弹”文本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自然生命的伦理

化与由此而生的国民身份的确立。

在“肉弹”行为中，自然生命本身在被否定的过程中获得了高度的伦理价值——忠勇。得到程万里殉难的消息华苦心恸哭不已，好友林志芳安慰她。剧本是这样设计的：

> 林：（流着同情之泪。不，应该说是为了忠勇的战士而伤心。）程先生为国牺牲，正该愉快，姊姊，请求你不要悲伤你自己了！

剧作家在这里强调的“忠勇”，正是樱井忠温笔下参加日俄战争的日军官兵的精神本质与人格表象。

对于程万里来说，“国民身份”（即“为国牺牲”）的确立构成了“忠勇”这一伦理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点。剧作对于“国民”身份的强调在有关华苦心的描写中体现得更为充分。面对自己的好友林志芳，华苦心表示自己“决不发愁。只是青天霹雳，一时〔控〕制不住我的感情”，并拿出一封珍藏在首饰箱中、不曾给丈夫看过的信，念道：

> 余谨以至诚，向亲爱的祖国宣誓：
> 一、不二心——以身许国，终身不二。
> 二、不自私——鼓励丈夫，为国尽忠。
> 三、不爱钱——夫死恤金，全数捐公。
>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元旦国民华苦心敬誓

华苦心在这里以“国民”的名义宣誓就像樱井忠温笔下的日军官兵作为日本国民为国家作战。

不过，尽管在强化个人的“国家－民族属性”方面与樱井忠温的《肉弹》达成了一致，但包起权的《肉弹》包含着樱井忠温的《肉弹》不存在的人类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包

起权的《肉弹》中，爱国主义精神与人类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国家观念避免了向国家主义、非理性的方向发展。这体现在程万里和华苦心关于“爱”与“爱国”的对话：

> 华：爱是天赋的一种本能，与生俱来的。他的宇宙，不应该划的那么小，而是应该更发扬光大起来。从爱己做到爱人，从小我做到大我、从一个民族做到全世界的人类。
>
> 程：（对她的老生常谈，不感兴趣。）你这些话，我已听够了。
>
> 华：可是从这个耳朵里进去，从那个耳朵出来。
>
> 程：我该听从你的话。我们的长官也这样训戒我们，我们应该爱民族，爱国家，这不是狭义的爱国思想，也决不是帝国主义那种企图侵略弱小民族的爱国思想。我们最高的目的，应该是爱护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

这种人类主义精神也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学理论家们所注重的。体现在郭沫若那里是在肯定“炼狱式爱国主义”的同时对“污池式爱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体现在辛人那里则是对“民族危机底国际性”的强调和对“狭义的国民主义底谬误”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依然在“战争文学”中延续着。

四 《三笑》：实笃的自我颠覆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类意识与国际主义精神到了抗战时期依然在中国延续，但是，以《一个青年

的梦》和新村运动促进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人类主义精神的武者小路实笃，进入30年代中期之后却否定了非战精神，转而支持战争。收录在《牟礼随笔》和《大东亚战争私感》[1]两册随笔集中的文章，就集中体现了他的此类观点。到了战争后期，他甚至创作了对于《一个青年的梦》来说具有"反文本"性质的五幕剧《三笑》。

《三笑》开始创作于1943年9月初，当月15日前后完成。创作的时代背景中有两个事实需要注意。一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正在进行，二是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8月25日至27日召开于东京）刚刚结束。剧作中出现的老演员野中信一跳"浦岛舞"的场面即来自"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文艺演出。实笃在《关于〈三笑〉的上演》中说："此前在文学报国会大会的演出中看到幸四郎的浦岛舞，对幸四郎怀有十分的好感，所以有了想那样写的愿望。"

"大东亚文学家大会"是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于1942年5月26日，为战时日本文学艺术家的组织，直属日本内阁情报局。该会成立的目的即在于"集结全日本文学家之总力，确立表现皇国之理想与传统的日本文学，配合皇道文化之宣扬"。[2]而武者小路实笃作为该会戏剧文学部部长创作的《三笑》，确实充分表现了当时日本的"时代精神"——即对于"八紘一宇"的"大东亚共荣"理想的认同与赞美。剧中人驼背画家野中英次对盲诗人野村广次说："实际上，如果不怀着亚细亚一体的精神进行合作，亚细亚就会在世界的生存竞争中失败。反过来说，整个亚细亚如果达成一致，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英美对此深怀恐

〔1〕 前者1939年3月由讲谈社出版，后者1942年5月由河出书房出版。

〔2〕《社团法人日本文学报国会定款》"总则"第三条，引自关西大学国文学会《国文学》第七十号，1993年12月出版。

惧。正因为他们恐惧，我们才要实现这个理想。”这正是实笃企图通过戏剧形式向台下的观众乃至全体日本国民发出的声音。与反战是建立在对国家的否定和怀疑这一立场上相一致，对战争的认同则是建立在对于国家的肯定这一基础上。在剧作结尾处盲诗人野村广次也放声高唱：

亚细亚之民族哟
合而为一
互爱
互助
建立一个大国
成为世界的支柱
建造一个
谁都不能侮辱你
谁都仰视你的
殿堂

这种对于“大东亚”理想的认同，构成了实笃对日本发动的战争采取肯定态度的前提。野中英次的台词表达了实笃本人对战争的认识。野中英次说：“这次战争是不得已的战争。是必须打胜的战争。”剧本取名“三笑”，即包含着对于日本军队全面胜利的渴望。实笃在《关于〈三笑〉的上演》中对此有如下具体解释：

就《三笑》的上演提笔，一方面觉得惭愧，但我想买了此书阅读的人是对我感兴趣的人，所以也会对《三笑》感兴趣，因此也会对我关于该问题的想法感兴趣。

三笑这个题目来自虎溪三笑。我想，看演出的人、读剧本的人都会明白，最后一场三个大人在笑，所以取了这

个名字。

但是，如果我说三笑就发音而言与三胜相同、包含着暗示空战胜、陆战胜、海战胜的比喻，人们会惊讶于这种牵强附会。但我取名的时候觉得那是个有好兆头的名字，这是事实。[1]

与这种构想相对应，实笃在《三笑》中安排三位青年分别担任三种角色：野中信敏（驼背画家野中英次之子）的理想是当海军，成为“海鹫”；西岛胜造（小说家西岛次郎之子）晕船，不适合当海军，所以志愿当陆军，成为“陆鹫”；而信敏的朋友小野寺因为身体虚弱，便想成为战斗机设计者。他已经构想出名为“弹丸飞机”的武器，这种飞机能够飞行五六个小时，不携带任何武器，因为它本身就是武器。它飞过去是为了撞击敌人的飞机，从而获得空战胜利。

尤应注意的是“三胜”中的“空战胜”。武者小路实笃在1943年秋天用戏剧创作的形式提出“弹丸飞机”的构想意味深长。“弹丸飞机”实际上是在二战末期投入使用的导弹，1943年则是希特勒加速导弹研发的时期。[2]就日本方面而言，二战结束之前日军的神风攻击队队员驾驶飞机，或者驾驶安装了驾驶舱、由人操控的鱼雷、炸弹，前往撞击美军舰船，都是“弹丸飞机”作战方式的现实化。士兵在驾驶“弹丸飞机”冲向敌人的时候成为名副其实的“肉弹”，于是樱井忠温宣扬的“肉弹”精神在实笃笔下复活。在某种意义上，《三笑》就是40年代初的《肉弹》。不仅如此，如同“天览”成为《肉弹》的荣耀一样，立志当“海鹫”的野中信敏也渴望类似的荣耀。他对胜造说：“我

〔1〕“三笑”与“三胜”的日语发音相同，故有此说。

〔2〕德国研制成功V1（复仇者一号）导弹是1944年6月9日，四天之后的6月13日用于攻击伦敦。

有个大胆冒昧的想法。想到我们的功劳或许能够达于天听，就是死了也行。”（第四幕）[1]实际上，早在昭和十三年（1938）1月发表的广播剧剧本《乃木将军》[2]中，实笃就肯定了军人乃木的基本理念。包含在《一个青年的梦》中的对于自然生命的尊重，只有在小野寺考虑“弹丸飞机”操纵者的安全、“即使撞上去生命也是安全的”的时候，才残留着一点蛛丝马迹。

在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系列中，《三笑》直接构成了对于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的否定。这种否定不仅表现为反战思想与赞美战争这种主题的对立，并且表现在“文本”的关联性方面。这种“文本”的关联性是通过实笃的另一部剧作《妹妹》建立起来的。

40年代初创作的《三笑》与1914至20年代中期的实笃作品保持着直接的“互文”关系。如实笃本人所言：“这里出场的主人公，与我从前写的《爱欲》、《画室主人》等的主人公是同一人，我想也可以说是那些作品的后续故事。〔中略〕而且把同样是我旧作的《妹妹》主人公野村带进来了。野村是在战争中失明的画家，即不能作画成了诗人。”[3]《三笑》与《爱欲》、《画室主人》的关系暂略，这里把目光集中在它与《妹妹》的关系。因为《妹妹》是作为《一个青年的梦》的“前文本”存在的。

《妹妹》创作于1914年12月31日至1915年2月4日，[4]即实笃创作《一个青年的梦》一年前。剧作叙述的是一个家庭悲剧故事：年仅二十八岁、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野村广次在战争中双目失明，画家的梦彻底破灭，生活也要靠妹妹静子照料。他和妹妹的生活费主要由叔叔提供，不幸的是叔叔任职的

〔1〕被天皇看到谓之“天览”，被天皇听到谓之“天听”。

〔2〕载当年1月出版的《现代》第十九卷第一期。

〔3〕《作为作者谈〈三笑〉》，初载1943年10月初《三笑》公演手册，引自小学馆版《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十四卷“解说·解题”。

〔4〕该剧本最初发表于1915年3月1日《白桦》六卷三号。

那家公司老板的放荡儿子看中了美丽的静子，致使静子面临痛苦的抉择——如果答应对方的求婚等于牺牲自己，拒绝则将叔叔、哥哥以及自身推入绝境。悲剧故事由此展开。《妹妹》本质上是一部揭露战争残酷性的作品，剧作中的野村广次用自己口述、妹妹笔录的方式创作小说，以控诉战争："我是盲人，我是在战争中成为盲人的。〔中略〕我是在再过两三天就要完成一幅画的时候被征召的。我讨厌在那种时候被征召，可是我无力抵抗。妹妹哭了，我也哭了。可是，我必须参加战争。我上了战场。我曾经是个大非战论者，厌恶杀人的男人，而且对于被人杀死无比厌恶的人。我曾经对国家进行战争感到不满，我把那意见告诉了朋友。"（第一幕）《一个青年的梦》在《妹妹》之后被创作出来并非偶然，它是实笃张扬反战精神的必然结果。二者作为反战剧本具有相同的精神品格。精神的一致性导致了《妹妹》中的个别角色在《一个青年的梦》中复活——《一个青年的梦》出现的那位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画家，显然与《妹妹》中的盲人画家野村广次的形象不无关联。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妹妹》也是在《一个青年的梦》的延长线上被接受的。[1]

但是，如前所述，大约三十年之后，当盲人画家野村广次出现在《三笑》中的时候，却成为一位用唱歌、跳舞的方式赞美战争的诗人。从旧作品中复活的人物表现出与旧作品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随着立场的转变，同样的场景也传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军人出征是《三笑》和《一个青年的梦》共有的场景，这一场景在《一个青年的梦》中是被否定的。在《一个青年的梦》第三幕第一场，当满载出征军人的火车开过的时候，画家与村长感到的是"异样"，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日本人

〔1〕《妹妹》的中译本为周白棣翻译，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周白棣在"译者赘言"中谈及田汉对武者小路实笃的认识及其用《妹妹》作为讲授日语的课本。出版者在书前"小引"中也褒奖武者小路实笃的人道主义精神。

那样高呼“万岁”，画家甚至想起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去的，可是不回来了”。[1]而到了《三笑》第二幕，驼背画家野中英次听到飞机的声音知道那是“为国家而战的人乘坐的”，送儿子上战场的决心更加坚定。在《三笑》中，军歌声也成为渲染舞台气氛的“道具”。《三笑》对《妹妹》的颠覆本质上是对《一个青年的梦》的颠覆。与这种颠覆相伴随，曾经与《肉弹》对立的实笃站到了《肉弹》一边。

实笃由反战向美化战争的转变是在“国民身份”确立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同时还有1936年的欧洲之旅中他所体验到的黄种人的屈辱感。[2]换言之，实笃的“大东亚”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由于他放弃了大正初期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转而认同甚至鼓吹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三笑》也不再像当年的《一个青年的梦》那样寂寞。相反，剧本立即进入了当时的国家宣传运作。《三笑》的创作本来是由于艺文座（剧团名）与中央公论社编辑藤田的约稿，完稿之后实笃立即交给藤田，艺文座投入排练。10月3日至11月7日在帝国剧场举行第一次公演，并引起反响。实笃在《观艺文座的〈三笑〉》中说：“报纸评论方面给予《三笑》极大的厚意之外，虽为平淡之作，但观众中高兴的人很多，代为宣传的好像也不少，观看的人超过预想，对此感到满足，也稍微感到有点奇怪。”

实笃作为曾经以《一个青年的梦》和提倡新村运动登上中国五四新文化舞台，带给中国思想界以广泛影响，因此，在日本进行侵华战争的时候创作赞美战争的《三笑》，显然无法将“中国”排除在意识之外。也许是这种潜意识在起作用，“中

〔1〕参阅《鲁迅译文集》第二卷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译日语汉字“汽车”为“汽车”，不确。日语汉字“汽车”义指火车。

〔2〕关于这个问题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多有论及，这里不再重复。

国”也以复杂的形态出现在《三笑》中。

在《三笑》中，实笃支持的战争限于以英美为对象的“太平洋战争”。因此他通过剧中人的口怒斥罗斯福、丘吉尔。而对于正在进行的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实笃一直在回避。不仅如此，他还把对中国的善意通过剧中人之口表现出来。作品第三幕出现了一个“支那人”与小说家西岛次郎见面、要求翻译其作品的情节。对于作品曾经被大量翻译到中国的实笃来说，这个情节显然包含着潜在的与中国人对话、与中国人和睦相处的愿望。果然，提及此事时盲诗人野村广次说：“今后有必要与支那友好相处。那比什么都好！亚细亚之中互相理解、携手前进的话，天下没有什么可怕的。”

进入《三笑》的不仅有现实中国，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三笑”这个剧本名称就是取自《庐山记》中的“虎溪三笑”这一历史典故。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法师送客以不过寺前虎溪为约，因过溪则虎哮。在《三笑》第三幕，驼背画家野中英次与盲诗人野村广次就“东洋的魅力”进行对话，二人将此概括为“无止境的快乐与纯真”与“充满生命感的、跃动的、谁都能从心底发出笑声式的”，并举大雅堂的《虎溪三笑图》为例。《观艺文座的〈三笑〉》一文在1943年12月1日发行的《马铃薯》[1]上发表的时候，实笃选大雅堂的《虎溪三笑图》作为该期《马铃薯》的封面画，并作了如下解说：

> 我在《三笑》中说大雅堂有一幅名为“虎溪三笑”的好画的时候，这幅画浮现在脑海里。
>
> 这幅宽五十七点三厘米、高一百三十五厘米的杰作我不曾看过，但看过的人感佩于这幅精彩的画，而我感佩的

〔1〕《马铃薯》为当时新村的机关刊物。

是其松散随意、特别是在桥上摊开两手大笑的男子。我觉得大雅堂的味道在此充分展示出来了。

这座桥上的和尚是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法师。他平时不过虎溪，但送陶渊明、陆修静的时候谈得入迷，不觉之中过了桥。三人省悟过来放声大笑。这幅画画的就是这个有名的故事。据说过了桥往这边看的是陶渊明，朝向对方的是修静。与其说画的是正在笑的场面，不如说像是在画将笑未笑之间。总之是宏大。〔后略〕

后人以慧远法师的故事绘《虎溪三笑图》是表现儒释道三者的和谐，而当武者小路实笃把"三胜"的军国主义理想嫁接到中国的"三笑"一词中的时候，他所谓的"东亚"被置于一种怪异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形式之中。在这里，被侵略的现实中国与被用作工具的中国陷入分裂状态，与此同时实笃本人也陷于身份的分裂——作为日本国民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同时作为文化人认同中国价值，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战争合理性的根据。

在中日两国交战、两国国民因之处于对立状态的情形下，支持战争的实笃对中国怀有的善意缺乏现实依据，因而是无效的。这种善意已经不可能像《一个青年的梦》和新村运动体现出的人类主义精神那样引起同时代中国作家的共鸣。相反，在两国国民各自确立了明确的"国民"身份的状况下，实笃支持战争的态度必然造成与中国作家的冲突。事实上，早在创作《三笑》六年前的1937年10月，巴金就在题为《给日本友人》的信中对纵容甚至支持战争的武者小路实笃提出批评。而且，巴金的批评恰恰是从孙俍工的《续一个青年的梦》提起的。他说：

一九三五年元旦后一天在你家里，你的一个年轻友人

从东京拿了孙俍工著的《续一个青年的梦》来，那个青年怒气冲天地说了许多话，你在旁边附和着。你们的论调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你的话比较温和。那时我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你们的谈话，但我也明白你们的愤怒是因为孙君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对贵国军阀侵占东北四省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而起的。孙君把书寄给武者小路氏，是因为他还尊敬《一个青年的梦》的著者，他还信任白桦派的领袖作家为中国的友人，如武者小路氏一度所自称过的；他诚恳地诉于人道主义者的武者小路氏的良心，希望他出来对这危害人类繁荣的野蛮势力加以抨击。然而武者小路氏却在罪恶之前沉默了。这个非战论者辜负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任。这还是两年前的事，最近听说武者小路氏更继山川均、林房雄之后而为军阀、政客张目。连武者小路氏也变到这样的地步，无怪乎自由主义者的室伏高信会成为军阀的爪牙，而高唱“非迅速战胜中国不可”了。[1]

如果说巴金的这封信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武者小路实笃献给中国人的那个美丽的“梦”的破灭，那么，1938 年中国版《肉弹》的诞生与 1943 年实笃通过《三笑》的创作过渡到认同樱井忠温的《肉弹》体现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则标志着中日两国作家在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不得不离开当年的人类主义立场，从而失去同一性。

---

[1] 此信写于 1937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5 日，分别发表于 11 月 7 日、21 日《烽火》第十、十二期，收入《巴金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这封信是写给武田武雄（1903—1986）的。1934 至 1935 年巴金与武田武雄有过密切交往，藤井省三在《东京外语支那语部——在交流与侵略的夹缝中》（朝日新闻社 1992 年出版）中对此有详论。信中提到的室伏高信（1892—1970）为日本右翼文人，当时主持《日本评论》的工作，实笃支持战争的随笔集《牟礼随笔》中的文章最初就是发表在《日本评论》上。

第 3 章

婚姻·生殖·亚洲共同体

——佐藤春夫《亚细亚之子》的周边

本书第一章曾经写到：1918 年暑假，张资平得知郭沫若在与日本女子同居，便要求郭提供资料，供他写“《留东外史》的续篇”。但张资平后来不曾创作《留东外史》续篇，郭沫若也没有成为张资平小说的主人公。不过，二十年之后的 1938 年，郭沫若和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故事却被佐藤春夫（1892—1964）写成了“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与郭沫若一起进入《亚细亚之子》的不仅有其妻子、子女，还有郁达夫。

佐藤春夫作为日本近代著名作家，用《田园的忧郁》（1918）、《更生记》（1929）、《女人焚死》（1951）等杰作确立了自己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艺术性、影响力而言，《亚细亚之子》与上述作品有天壤之别，但是，《亚细亚之子》包含着上述作品所没有的复杂性。这复杂性来自于如下诸方面：历史事实与作品中的虚构之间的关系；作品作为大东亚故事与当时刚刚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的关系；作品作为大东亚故事同时又是作为家庭故事和女性故事的多面性；作品把握中国、处理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方式；作品与佐藤春夫价值体系之间的关联；等等。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对该作品的反应，则显

示出两国作家在确认自己身份的过程中日益扩大的差异性与对立性。

一 "亚细亚之子"的诞生

《亚细亚之子》发表于1938年三月号《日本评论》，基本情节是：流亡日本的汪（即郭沫若）被中国政府派往日本的郑（即郁达夫）策动，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回国参加抗战。回国不久汪意识到自己被政府和郑欺骗、利用，便决然前往日本占领下的北中国，以日本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设立医院，为百姓服务。妻子安田爱子（即郭沫若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和儿女们也来到中国，和他一起为大东亚共荣的理想而工作。"亚细亚之子"指汪与爱子生下的中日混血儿，作品中的点题之处是爱子对儿女们说的一段话：

> 你们，不应自认为支那人，因为你们仅仅是父亲的儿子；而且，你们不应自认为日本人，因为你们仅仅是母亲的儿子。你们是亚细亚之子。是的。在日本出生、在日本成长、接受日本的学校教育的亚细亚之子。将来——说起来也只是不远的将来，你们的使命日益重大。[1]

显而易见，佐藤春夫在1938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创作《亚细亚之子》，是为了配合日本军国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具有自觉的意识形态目的。

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公然、直接的关系，大概

〔1〕《亚细亚之子》发表之后六十余年间没有中文翻译，笔者的译文见本书书后附录。

是《亚细亚之子》在战后日本学术界受漠视（或曰被回避）的原因所在。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学者很少有人论及该作品，讲谈社1966至1970年间出版的十二卷本《佐藤春夫全集》甚至将该作品排除在外。[1]中国文学研究者伊藤虎丸（1927—2003）曾经论及该作品，但进行了全面否定。这可能是出于对军国主义文学的排斥，也可能有“为贤者讳”的意图——维护佐藤春夫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过，《亚细亚之子》作为一篇对于佐藤春夫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不应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就佐藤春夫与《亚细亚之子》的关系而言，有两个基本事实应当注意：第一，佐藤春夫创作《亚细亚之子》的时候“七七事变”刚刚发生半年，由日本军国政府操纵、利用作家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尚未成立。与40年代初太宰治、森本薰等人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要求、为阐释“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精神而创作《惜别》、《女人的一生》等作品不同，佐藤创作《亚细亚之子》具有自发性和主动性。退而言之，如果不具有这种自发性和主动性，那么他与官方就有更密切的关系。第二，《亚细亚之子》发表之后，被该作品影射、诋毁的人物之一郁达夫立即撰写了痛斥佐藤春夫的文章《日本的娼妇与文士》，发表在《抗战文艺》第四号。但是，佐藤春夫面对郁达夫的斥责没有丝毫反省，相反，他将《亚细亚之子》略作修改并改题为《风云》，收入三年之后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2]在《风云》中，他公然把“郑”改为“郁”。这两个事

〔1〕 关于何以未收录该作，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曾经向该全集校注者牛山百合子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容量的问题”。此种回答即使是真实的，那也表明全集编辑者没有意识到《亚细亚之子》对于佐藤春夫的特殊意义。参阅铃木正夫《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关于佐藤春夫的广播稿〈向老朋友呼吁〉》，载《横滨市立大学论丛》第53卷一、二期合刊，2002年3月出版。

〔2〕 《风云》，宝文馆1941年8月出版。

实说明：对于佐藤春夫来说《亚细亚之子》并非即兴之作或简单的迎合时局之作，佐藤创作《亚细亚之子》具有必然性和特定的心理背景。寻找这种必然性，该作品与佐藤春夫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之间的多重关系就凸现出来。

在一般的意义上，《亚细亚之子》首先是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作为“关于中国的作品”，《亚细亚之子》与佐藤春夫固有的“支那趣味”具有内在关联。

在日本近代作家中，佐藤春夫是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的一位，这种兴趣始自其少年时代。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正在进行中的昭和十六年（1941）十月，佐藤春夫的随笔集《支那杂记》由大道书房出版。在为该书写的序言《からもの因缘》[1]中，佐藤详述了自己与中国的因缘。根据文中所谓“自己开始片段地了解支那是早在三十年前”，可以知道佐藤春夫在明治末期的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解中国。这与其尊重汉学的家庭传统直接相关。佐藤春夫出生于日本本州岛南部纪伊半岛和歌山县的一个世袭的医生之家，到他父亲那一辈已经是第九代行医。他的父亲将祖传的事业发展壮大，在老家新宫町（现在的新宫市）开了一家私立医院。这是一个尊重汉学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怀有浓厚的“支那趣味”。父亲不仅向他谈论“睡狮”中国，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必然以此国土为中心运行”，而且写得一手好汉诗。这位痴迷唐诗的日本人甚至从黄莺的鸣叫声中听出唐诗的韵味，写出“黄莺鸟唱出唐诗的婉韵”这种奇句。佐藤春夫说：“自己的支那趣味可能是近祖的意志，是父亲教育的结果。”[2]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歌、小说等等）的爱好成为佐藤春夫“支那趣味”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他写

---

〔1〕从此文的内容看，からもの可写为汉字“唐物”，即中国之物。

〔2〕以上引自《佐藤春夫全集》第十一卷571—576页，讲谈社1969年出版。

作《李白传》[1]，编译中国古诗《支那历朝名媛诗钞·车尘集》[2]，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集《玉簪花》[3]。

大正九年（1920）六月底，二十九岁的佐藤春夫开始为期三个多月的第一次海外旅游，去的就是台湾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等地。如同日本学者森崎光子指出的，这次台湾、厦门之旅的远因是"支那趣味"、"南方憧憬"（虽然近因是家庭问题引起的烦恼）。[4]实际上，佐藤春夫当时曾经有到中国小住的打算。[5]六年之后，昭和二年（1927），佐藤春夫到上海、南京等地旅游，受到郁达夫、田汉的热情接待。以这次旅游中的见闻、体验为素材，佐藤春夫撰写了《曾游南京》、《秦淮河画舫纳凉记》、《忆西湖之游》等文章。[6]

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关心构成了佐藤春夫"支那趣味"的主要内容。佐藤春夫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对中国文坛的关心从他成名之时就已经开始。郁达夫、田汉都是在1920年前后与他相识，1927年10月，田汉甚至成为他的短篇小说《一旧友》[7]的主人公。1934至1935年间，佐藤春夫与增田涉一起编译了《鲁迅选集》。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佐藤又作为顾问参与了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8]的编辑工作。

---

〔1〕 发表于1918年七月号《中央公论》。

〔2〕 昭和四年（1929）武藏野书院刊行，十九年之后的昭和二十三年（1948）又以此为基础编成《玉笛谱》，由东京出版株式会社刊行。

〔3〕 大正十二年（1923）8月新潮社刊行。

〔4〕 关于佐藤春夫的第一次海外旅行，参阅森崎光子的《佐藤春夫与台湾·福建之旅》，收入《作家之亚细亚体验》，日本·世界思想社1992年7月版。

〔5〕 关于此事参阅田汉《蔷薇之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一节的记述，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5月初版。

〔6〕 均收入大道书房1941年10月版《支那杂记》。

〔7〕 发表于1927年十月号《中央公论》，后改题为《人间事》，收入《风云》，宝文馆1941年8月出版。

〔8〕 这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鲁迅全集，出版于1937年2月至8月。中国国内版《鲁迅全集》出版于1938年8月，比改造社版晚了大约一年。

佐藤在《〈故乡〉译后记》[1]中称鲁迅的《故乡》具有杜甫的诗情。显然，他发现了《故乡》与杜甫诗歌在人道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精神方面的一致性，并且用自己的感觉在唐诗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建立了联系。

应当注意，在佐藤春夫这里，东洋意识是作为“支那趣味”的重要背景存在的，“支那趣味”与亚洲想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佐藤把握中国的过程中，“亚洲”（或者“东洋”）这一概念承担着整合功能，将中日两国一体化。这一认知方法也体现在佐藤春夫对中日两国诗歌传统的认识方面，代表性的文章就是《东洋人的诗感》[2]。这虽然是一篇短文，但分析的是东洋人与西洋人把握自然的不同方式及其这种差异在诗中的表现，提供了“东洋－西洋”对称（对立）的框架。在“东洋－西洋”这一二元结构的框架中，王维、韦应物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和日本古典《万叶集》一起被纳入“东洋”之中。

在佐藤春夫认知中国新文学作家的过程中，“亚洲”（或者“东洋”）的概念同样是重要的。这典型体现在他对周氏兄弟的认识上。1936 年 10 月 19 日凌晨鲁迅去世，当晚佐藤春夫得到消息，连夜撰写了纪念文章《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在此文中，他把鲁迅解读为“伟大的东洋的文学者”、“纯粹的东洋人”，表现出鲜明的“东洋”意识。在文章结尾处他说：“几年来就想请鲁迅到日本来，以追求东洋人的精神。为着一般的日本人起见，想以实例来显示伟大的人物即在现今也不一定全出自西洋的这种自觉。然而这个希望归于泡影了。”[3]在这里，与对东洋诗歌的解读一样，鲁迅被“东洋化”，而且是被

---

〔1〕 发表于 1932 年一月号《中央公论》。

〔2〕 作于大正十五年（1926）2 月，发表于当年三月号《日本诗人》。收入《佐藤春夫全集》第十一卷 149—150 页，讲谈社 1969 年出版。

〔3〕 文章发表于 10 月 20 日《东京朝日新闻》，中文稿章特字译，收入《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用以在与"西洋"对应的架构中确认东洋人的价值。1941 年，在评论周作人的时候，佐藤春夫强调周作人与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关系，将周称作"有日本之魂的文人"。[1]即周氏兄弟作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均被佐藤春夫"亚洲化"（东洋化）。

对于佐藤春夫来说，有关中日两国文化连带性的认识与"亚洲意识"这二者是共生的、互动的。也许是这种"亚洲意识"的内在驱动，佐藤一生的五次海外之行都是在亚洲的范围之内。[2]

在佐藤春夫的创作中，《亚细亚之子》并非第一篇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处理殖民问题的作品。至少在早于《亚细亚之子》十三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女诫扇绮谭》[3]中，佐藤春夫已经开始处理殖民问题。这篇小说的题材是取自 1920 年台湾之旅的见闻，作品中的台湾女子不愿意嫁给日本人，为情人殉情而死。藤井省三在解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世外民'的反抗精神就是台湾知识阶层共通的反日感情，作品对被土沙掩埋的安平废港的描写并非如岛田谨二所说的是为了表现'风景美'、'异国情调'，而是被征服、被异族统治的台湾的象征"；"《女诫扇绮谭》是一篇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说，它可能是日本文学家以殖民地台湾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最倾向于台湾人民族主义精神的作品。"[4]

上述佐藤春夫长期怀有的"东亚意识"、对殖民地问题的

---

〔1〕《日华文人的交流》，发表于 1941 年 5 月 22 日《东京朝日新闻》。

〔2〕除了 1920、1927 年的个人旅行，1938 年 5 月佐藤春夫曾到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朝鲜和满洲采访，当年 9 月随军到武汉等地，1943 年 11 月又到马来亚、爪哇岛进行为期半年的采访。

〔3〕当年五月号的《女性》杂志发表。

〔4〕《关于台湾的日本文化界之意识形态——佐藤春夫〈女诫扇绮谭〉中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外国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主办）1992 年第四期。

关心，无疑构成了《亚细亚之子》的心理背景。佐藤是将亚洲想象作为把握世界、把握中日关系的方式，对于他来说，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创作《亚细亚之子》具有必然性。《亚细亚之子》是佐藤春夫固有的“亚洲意识－东洋意识”的延续，包含着佐藤具有稳定性的观念。郭沫若不过是继周氏兄弟之后又一位被佐藤春夫“亚洲化”（东洋化）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同时也是继田汉之后成为佐藤春夫小说主人公的又一位中国新文学作家。

当然，固有的“东亚意识－东洋意识”与“东亚－西洋”结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1938年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佐藤春夫通过《亚细亚之子》表现出来的“东洋意识”确实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功能性和结构性两个层面。

对于1938年的佐藤春夫来说，“亚细亚意识”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担着抵抗、进攻西洋的功能，因而被“工具化”。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该作品的主题歌《东天红》中——所谓“亚细亚的长夜，迎来黎明”，“无知的西人尚在梦中”。《亚细亚之子》毕竟是为时局而作并且服务于时局。作品发表于《日本评论》杂志这件事本身并非偶然。《日本评论》的前身是1926年创刊的《经济往来》，自1935年十月号改刊名为《日本评论》，积极配合日本的扩张政策。负责人室伏高信（1892—1970）是当时日本有影响的理论家，其思想中包含着日本主义、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复杂因素。反战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转向”时期的许多杂文，就是在《日本评论》上刊出（后来收入《牟礼随笔》）。[1]

---

〔1〕室伏高信担任该刊负责人至1943年。1944年该刊适应战时体制改名《经济评论》，1946年六月号恢复原名。战后因批判占领军政策两次遭GHQ（占领军司令部）镇压，1951年六月号停刊。室伏本人战后也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

与这种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相关联，佐藤春夫“东亚意识”的内在结构发生了变化。佐藤的“东亚意识”中本来存在着两个互相关联的结构——与“西洋”对立的亚洲，以及亚洲内部的日本与中国。在1938年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佐藤春夫来说，虽然在与“西洋”对立的层面上日本与中国同样被纳入“亚细亚”之中、中国和日本的差异被掩盖，但在中国和日本构成的“亚细亚”（东洋）内部，在中国和日本二者之间，日本的主体地位被确立起来。现实的中国不再是景仰的对象，而成为贬抑的对象，中国被佐藤春夫解读为没落文化的代表。这集中体现在《亚细亚之子》结尾处的象征性描写——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建造日式建筑，来到工地的“汪”[1]发表议论道：

> 风习也罢其他的什么也罢，新东西一旦进入新的地方，一段时间内比在原地更加繁盛。这是原则。看看植物学、细菌学吧。一旦那段时间过去之后，则是真正能够结实地附着在土地上的全新品种之类的东西能够正式地繁荣、发展下去。日本文化也同样会进入这里的土地、风靡起来。不，现在已经那样。为了日本而高兴，或者为了中国而忧虑，都不恰当。因为这是暂时性的自然现象。在不久的将来，真正适宜于风土、共鸣于人类正义感的事物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发展起来。

不言而喻，发表此种议论的“汪”不过是佐藤春夫的代言人。在这幅美好的图景里，佐藤春夫对日本的殖民行为进行文化解读，把侵略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在风土、文化观的层面上赋

[1] 这个“汪”当然是佐藤春夫虚构的“郭沫若”。

予日本以领导“东亚”对抗西洋的合理性。佐藤视现实中国为被自然法则淘汰的落后国家，遵从的逻辑类似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作品中身为中国人的“汪”完全成为日本意识形态的执行者——所谓“下定投身于日本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北支开发的决心”。这样，所谓的“亚细亚”转换为“日本”的代名词，“亚洲意识”成为打着亚洲旗号的“大日本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佐藤春夫的“亚细亚”具有反西洋与反中国的二重性。他在创作《亚细亚之子》之后创作歌颂靖国神社和太阳旗的诗歌[1]，甚至抛弃公元纪年法、改用日本历纪年法，均与此有关。此时的佐藤春夫本质上是“日本主义者”。[2]对于那些“亚细亚之子”来说，“中国”仅仅存在为两种形式：自然意义上的“血缘”与文化意义上的“语言”。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着二分之一中国人的血并且学习汉语、用“流畅的”汉语在通州问路，他们就完全是作为日本人来到通州的土地上。

《亚细亚之子》所表现的文化优劣观与同一时期佐藤春夫的思想体系完全一致。对中国的贬低在几乎是同一时期写作的《大陆与日本人》一文中有更明确的表达。在此文中，佐藤春夫提出了“我等非东夷”“支那非文化国”的逻辑，说：“金元等蛮族看到往昔多少拥有些许文化时期的支那——中国，简直像乡巴佬来到江户一样感到眼花缭乱、轻易地身败名裂的事情是很可能有的。但是，现在今天的日本人进出支那大陆，毋宁

---

〔1〕 这些诗歌均收入诗集《东天红》。

〔2〕 佐藤春夫成为“日本主义者”与进入30年代之后日本的全面扩张密切相关。同为“亚洲主义者”的保田与重郎（1910—1981）在1940年出版的《佐藤春夫》（弘文堂书房）中就指出：“在那次事变〔七七事变〕之前，被命名为那个时代的日本主义者、遭受反民族主义性质的人民战线派批判的，是佐藤春夫。而且，领先将文学家的国家意识付诸行动的组织‘新日本文化之会’的组织者，也是佐藤春夫与中河与一。”

说像是城里人向乡下移动。”进而指出：

> 〔中国〕唐宋明清算是文化国，但是，可以断言中华民国没有文化。〔中略〕明清文化当然传来我国。乾隆可能是支那文化凋落之际的芳香。从那以后，称得上文化的东西连影子都看不到。[1]

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支那之文化于本国枯死而将于吾国开花结果。唯其如此，吾等有权利且有义务进出大陆，于彼处树立文化。”甚至是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汉字，在佐藤春夫这里都被日本化。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日本曾经有学者基于对中国的蔑视提出“汉字废止论”，而佐藤春夫对此持相反态度，发表了《汉字废止不可论》[2]。不过，佐藤所谓的汉字并非中国的汉字，而是“日本的汉字”。他在《汉字奖励小论》中明言：“汉字决非中华民国之文字，乃堂堂现代日本之文字。我们祖先以此获教养，以此思考，以此述志，以此表心迹。”[3]对于佐藤春夫来说，“亚洲价值”的成立是借助于“中国价值”向“日本价值”的转换完成的。这样，他在文化价值判断与“进出大陆”的合理性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从佐藤春夫将千余年间中日两国固有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华夷变态”思想的投影。事实上，佐藤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冈仓天心（1862—1913）观点

---

〔1〕此文最初收入大道书房1941年10月版《支那杂记》。引自《佐藤春夫全集》第十一卷578—579页。讲谈社1969年出版。在此文的“支那非文化国”一节中，佐藤春夫提及日本著名的亚洲主义者冈仓天心的中国观，并表示认同。

〔2〕发表于1936年十月号《日本评论》，收入《佐藤春夫全集》第十一卷。

〔3〕发表于1936年6月3日《东京朝日新闻》，引自《佐藤春夫全集》第十一卷“校注”。

的一致性。在这里，传统的"中华"概念被本质化、抽象化，其中的地域性因素被消除，转化为纯粹的价值。[1]"夷狄观念"本来是大中华意识的变种，而在佐藤春夫这里被夷狄化的却是中国。这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夷狄化过程形成了对应。

《亚细亚之子》的创作表明，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佐藤春夫作为日本文士与日本军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并且是双向的。佐藤春夫对日本军国政府侵华、扩张政策的配合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本军国政府的扩张也成为他重构文化理念、实践"亚洲想象"的机会。他扮演的是"军国政府共谋者"的角色，但在这种扮演中作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失去主动性和独立性，政治与文化、政治家与文士实现了两相情愿的结合。

还应注意的是，佐藤春夫不仅将自己的亚洲意识、日本意识、文化观念完整地表现在《亚细亚之子》中，还将纯粹的个人情感隐隐约约地投影在该作品中。他给郁达夫取名"郑"也许与其台湾之行有关。1920 年 7 月台湾旅行期间佐藤春夫去了厦门等地，陪同他的是一位姓郑的台湾人。两个人的日语和英语都是半通不通，在失去语言自由的旅途上佐藤春夫感到了异乡人的寂寞。[2]也许是那次记忆有些灰暗，所以在影射郁达夫的时候顺手让郁姓"郑"。他在作品中虚构了"汪"（郭沫若）与"郑"（郁达夫）的"情敌"关系，也与其个人感情体验不无关系。在《亚细亚之子》中，汪出逃回国后泛舟西湖，发现

---

〔1〕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茂木敏夫的论文《东亚的中心·边缘构造及世界观的变化》，贺雷译，收入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七辑《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 月出版。"华夷变态"为德川幕府的儒学者林春斋提出，意为现实中国已经由中华之地转变为夷狄之地。"华夷变态"是日语表达，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华夷换位"。

〔2〕参阅森崎光子的《佐藤春夫与台湾·福建之旅》。收入《作家之亚细亚体验》。日本·世界思想社 1992 年 7 月版。

自己北伐时期的情人成了郑的第二夫人住在西湖之畔、孤山之麓，这成为他转变态度、决定向政府和郑复仇的转折点。西湖与女性的情节显然是来自郭沫若《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篇》以及《孤山的梅花》等作品对相关事件的记述。郭沫若在1921年5月和1924年3月曾分别与友人成仿吾、允臧游西湖，允臧还向他讲述了自己在西湖后的花坞遇到一位美女走进别墅的故事。但郭沫若并不曾因女性问题与老友郁达夫发生冲突。相反，因为同类事件与师友发生冲突的正是佐藤春夫本人。1917年已婚的佐藤春夫与年长自己六岁的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相识，爱上了谷崎的妻子小林千代（当时谷崎一方面冷落千代，一方面暗地里与千代的妹妹圣子保持情人关系），并在1921年3月与谷崎绝交。佐藤春夫1926年与谷崎言归于好，1930年8月与小林千代结婚。这就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广为人知的“让妻事件”。此种复杂的感情纠葛在佐藤春夫心中留下了创伤。当他在郭沫若与郁达夫之间虚构出“情敌”关系的时候，他本人心灵深处某种阴暗的潜意识便暴露出来。

二　郭沫若：归国的忧郁

1937年7月27日下午，从神户港驶来的加拿大邮船“日本皇后号”在上海港靠岸，从日本出逃的郭沫若就在这艘船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专程从南京赶往上海迎接，三天后国民党当局取消了十年前签发的通缉令，并为郭沫若举办盛大的欢迎会。报纸广泛宣传，《归国杂吟》也在8月初的《新民报》上刊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的背景上，郭沫若的归来被作为“抛妇别雏赴国难”的故事广泛宣传。

但是，这种宣传简单化了郭沫若与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掩

盖了郭沫若从"去国十年"到"投笔请缨"的心理转换过程中的个人因素。

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甲午战争（1894—1895）、"二十一条"（1915）、"九一八"事变（1931）、"七七"事变（1937）是四个标志性的事件。郭沫若1914年留学日本、1928至1937年7月底流亡日本，后三次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都是身在日本。必须注意的是，三次事件发生时他的反应各不相同。1915年5月，即郭沫若留学日本的第二年5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郭沫若与吴鹿苹、叶季孚几位热血青年基于爱国义愤，于5月7日连夜回国以示抗议。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同样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不仅没有回国，甚至没有激烈的反抗举动，而是沉溺于考古学研究。与1915年的激烈相比，1931年的郭沫若是"消极"的。本来，"九一八"事变作为日本军队对中国全面入侵的开端，激发了在日中国人的爱国义愤。如前一章论及的，孙俍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愤而回国，并在回国之后创作了《续一个青年的梦》。郭沫若的"消极"与孙俍工的激愤也形成了对比。

"消极"的背后是郭沫若"国家体验"的变化。

在郭沫若的"国家体验"中，1915年5月回国的挫折具有"成长仪式"的意义。三位青年满怀爱国热情离开日本回国，但当他们乘船到上海的时候，袁世凯却已经向日本屈服。他们在客栈里住了三天，只好颓丧地返回日本。[1]此事在青年郭沫若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二十二年过去，1937年在潜逃回国的船上，他依然记起这件事。7月24日，即出逃日本的前一天，郭沫若步鲁迅的诗韵写了激越、悲凉的"又当投笔请缨时"，26日，即离家出走的次日，郭沫若在船上想起这首诗并

[1] 参阅《创造十年》。

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 细细考虑起来，真的登了岸后，这诗恐怕是做不出来的。民四（一九一五年）"五七"回国时的幻灭感，在兴奋稍稍镇定了的今天，就像亡魂一样，又在脑际飘荡起来。那时因日本下了哀的美顿书，我抢忙地回国，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凯已屈服矣。
>
> 一支用了十几年的 Parker 自由水笔，倒的确和着家室一同被抛在日本了。
>
> 但是，缨呢？如有地方可以请来，该不会是以备吊颈用吧？[1]

"又在脑际飘荡起来"意味着此前多次飘荡于脑际。换言之，1915 年 5 月受挫之后，那个在他脑际飘荡的"亡魂"势必引起他对统治者与国家关系的思考，引起他对政府的怀疑与疏离，给他带来幻灭感。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这种国家内部的冲突更尖锐地摆在郭沫若面前。一方面他强烈地意识到"我是中国人"[2]，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被"中国"驱逐的"中国人"，蒋介石政府的通缉令使他与国家的距离比十五年前留学初期更远。当时他即使有回国的愿望也没有回国的权利，回国意味着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而且，他不会忘记十五年前回国后的教训。

郭沫若将"国"与"统治者"分而述之的态度，在对待"国防文学"的认识中明显表现出来。1936 年，国内文坛讨论

---

[1] 《由日本回来了》，引自《归去来》154—155 页，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三十五年(1946) 5 月出版。

[2] 1928 年 8 月初流亡到日本的郭沫若曾遭东京警事厅拘捕，获释之后依然受监视，自云"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参阅《郭沫若年谱》上卷，龚继民、方仁念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

"国防文学"的时候，郭沫若在东京听了任白戈对相关情况的介绍，声称"对'国'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1]。与此相对应，驻日使馆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同样对郭沫若持疏远态度。根据殷尘的记述，1937年，封禾子（凤子）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三天的演出，分别请驻日大使许世英、郭沫若和日本作家秋田雨雀讲演。而通知发出之后，大使馆的官员却回答说："既有郭鼎堂先生在内，大使是不预备来了。"殷尘评论道："他葫芦里的药不说已可使人明白了几分：因为大使是政府的命官，鼎堂先生是尚未取消通缉的流亡者啊。两人先后在一起讲演岂不是笑话。"[2]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无论是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言，还是就中国统治者的状况而言，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相比并无本质区别，蒋介石政府签发的郭沫若通缉令依然有效。然而，郭沫若却一改1931年的消极，"抛妇别雏"踏上回国之途。显而易见，如果不能认为1937年的郭沫若比1931年的郭沫若更爱国，那么，郭沫若1937年的回国除了"爱国"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结合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生存状态来看，毋宁说1937年"别妇抛雏"回国行动中的个人心理动因更重要。

对于郭沫若来说，1928年2月底被迫流亡日本意味着个人价值的丧失。这种丧失体现为经济贫困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流亡日本之初，创造社每月一百元的资助是他的主要生活保障，但1929年2月创造社被封，生活费从此断绝。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写作、翻译，依靠出卖文稿和他人的接济维持生活。与此同时，日本警察也一直对他进行监视、跟踪。一个因为被通缉而流亡国外、经济上陷于贫困、甚至丧失

[1] 臧云远：《东京初访郭老》。

[2] 《郭沫若归国秘记》，25页。

了人身自由的外国人，并且是中国人，在日本社会自然无地位可言。年近不惑的郭沫若就这样陷入了“中年危机”。

对于曾经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北伐战争中风云一时的郭沫若来说，这种“价值丧失”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实际上，他在流亡日本不久就想回国，1929 年年底写给容庚的信即谈及回国问题，说：“归国恐尚非其时”，“梦想将来如有机会”。1932 年冬天写的一首五律，集中表达了郭沫若有国难归的沦落感。诗云：“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乍惊清貊损，顿感泪痕幽。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人欲归上路，冰雪满汀洲。”[1]在价值丧失、有国难归的折磨中，郭沫若开始变得神经质。“排名事件”的发生即应看作这种神经质的表征。1933 年 11 月四卷一期的《现代》杂志开始连载郭沫若的《离沪之前》，因为此文排在了同期发表的周作人的《苦茶随笔——性的知识》后面，郭沫若便在给叶灵凤的信中表示不满，以至于《现代》编者杜衡、施蛰存给郭沫若写信解释。[2]尽管郭沫若在给杜、施的信中声称“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但事实上表现出的是一种“价值丧失”之后的褊狭。

周作人的访日和郁达夫的访日，则直接强化了郭沫若的流亡意识和失落感。

1934 年暑假周作人前往日本探亲。7 月 11 日出发，15 日到东京，两周之后郭沫若来访。周作人 7 月 30 日日记记有：“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3]这是郭、周二人第一次见面。次日，郭沫若便带着儿女们去千叶的海边过

---

〔1〕手迹见《郭沫若遗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6 月版。

〔2〕1934 年 1 月 10 日致杜衡、施蛰存，见《郭沫若书信十二封》，孔海珠辑注，载《百花洲》1981 年第一期。

〔3〕此事龚继民、方仁念所编《郭沫若年谱》增订版未记入。天津人民出版社。显然是因为当时周作人的日记尚未公开。

暑假，住到 8 月 10 日。此间的事情被郭沫若写成日记体散文《浪花十日》（浪花为海边渔村的村名），8 月 6 日的部分涉及周作人：

> 午前徐耀辰来信，说启明先生欲一见，问几时可回市川，以十号前后回去的消息答覆了他。启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启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启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启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启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宴〕会招待之记事。
>
> 意趣很郁塞，十时顷负鸿儿出交信，淑子相随。在街头遇着前天来寓的那位刑士，他说了一声“今天天气好”。[1]

不平之情跃然纸上。这一节的结尾部分是两句诗：“举世浮沉浑似海，了无风处浪头高。”郭沫若所谓的“浮沉”可以理解为周作人的“浮”与自己的“沉”，也可以理解为自己当年的“浮”与眼下的“沉”。还应注意的是这篇日记的第一段：“昨夜做一奇梦，梦见在南昌的东湖边上受死刑，执枪行刑者为我的一位朋友。”将这个梦与“三日”部分所记“回寓后看见有两个穿黑羽纱洋服的人在垣外探头探脑地窥伺，一肥黑而多髭，一苍白而尖削，一眼便知其为刑士。心中颇不快”结合起来看，郭沫若当时心理状态中的“迫害狂”病征就显露出来。

8 月 10 日从浪花回到市川，14、17 日郭沫若两次与周作人见面。周作人 17 日日记记有：“上午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

---

〔1〕《归去来》96—97 页，北新书局 1946 年 5 月出版。

君未成，郭沫若君亦来同往千驮木町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钵の木洋食田中氏夫妇为主人。"[1]郭沫若此日依然难有好心境。他不仅无法回避与周作人的对比，随周前往拜访的田中也会引起他不愉快的回忆。

田中即田中庆太郎（1880—1951），是文求堂的老板。文求堂是一家销售并印行中国书籍的书店，1861 年创办于京都，1901 年迁到东京，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贡献颇大。但因为版税等问题，郭沫若认为自己是受了剥削与伤害。在回国后不久写的《在轰炸中来去》中，他谈自己流亡日本后为了生计出书受挫，说：

>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求燕京大学，求中央研究院，也同样没有发生影响。没有办法，只好去求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圆的板〔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种书是很难望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七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圆老头票到手。[2]

这段话中提及的事情发生在 1931 年夏天。客观上田中庆太郎是帮助了郭沫若，毕竟是他接受了国内的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拒绝的书稿。但当时的郭沫若处于走投无路、因为个人价值丧失有些神经质的状态，未必能够意识到商业活动与慈善活动的区

---

〔1〕此事龚继民、方仁念所编《郭沫若年谱》增订版亦未记入。

〔2〕《归去来》231—232 页，上海北新书局 1946 年 5 月出版。

别，因此觉得自己受了伤害。[1]同样与田中庆太郎相识、对田中与郭沫若的关系知之甚深的殷尘，甚至认为郭沫若"有些憎恨这个'田中救堂'"。殷尘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写及田中的吝啬与贪财，有如下记述：

十年来，鼎堂在居留日本的过程中，除非万不得意〔已〕，偶尔向他去商量一二次外，他是不常去的。此外就是关于印行他的著作事件，因为这对于救堂是有利的，普通每版五百部，抽版税一成五，（就是百分之十五）可是鼎堂的名著虽是轰动一时，却不见他们再版，难道五百部都竟销不完吗？这是很使他疑心的一件事，记得前年——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我和鼎堂去看他的时候，适巧他们家里因为儿子田中震二之丧，都不在店里，却给我们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使鼎堂气得饭都吃不下似的，那就是被我们检到一部没有贴上版税的《卜辞通纂》，当时鼎堂为了十年来的感情不愿意丧于一旦，所以没有发作，他当时又说：

"在我刚把《两周金文辞大系》纂成的时候，也就是我在日本生活最窘困的时候，我不能忘记他以三百元买我这一束稿子，使我能在日本立足，识我于稠人之中，那不能不说救堂是个世故很深而具有锐利眼光的人。有一次他曾想把他的大女儿嫁给我，他千方百计地设法，想怎样来解决我是一个有妇之夫的重婚问题，为了这，有一个时期他的一家同我非常的接近，非常的亲热，常常叫他的儿子

〔1〕 关于田中庆太郎及其与鲁迅的交往，陈福康在《鲁迅与田中庆太郎》一文中有详论，收入《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不过，陈福康用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关系比喻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的关系，认为郭与田中有"深厚的友谊"，显然不确。

到市川来，甚至他的大女儿也常常来。后来，当他发觉'重婚'是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对我冷淡许多了。往常如遇有印书的事情接洽时，那老头子都是亲自来的，现在却叫他的大儿子来了。"[1]

这里有关《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事宜的叙述与前引郭沫若在回国之后所写的《在轰炸中来去》中的记述并不相同。合理的解释是当时他身在日本，不得已忍气吞声。郭沫若随同自己钦羡并感到不平的周作人去见田中庆太郎，其心境可以想见。

郁达夫访日是1936年底，改造社设宴招待，郭沫若应邀作陪。对于自己与郁达夫在日本地位的高低，郭沫若本来就很在意。王任叔（巴人）在《记郁达夫》一文中曾经用略带夸张的笔调记述郁达夫在日本的高知名度，说："是他，这郁达夫，在日本人名大字典上，地位比郭沫若还高。'郭沫若就是这样妒忌我郁达夫的'（达夫亲自对我这么说）。"[2]此文发表后郭沫若立即撰写《再谈郁达夫》[3]，否认王任叔的说法。但是，结合对待周作人的态度来看，王任叔的说法至少揭示了郭沫若的部分真实心理。在郁达夫作为政府官员受款待、自己作为贫困的流亡者作陪的情况下，郭沫若不会有好心境。事实上，郭沫若当时留意的是"座场"——郁达夫所受接待的级别。他在《达夫的来访》一文中写道："分乘了三部汽车，把主客全部十一人（有些社员没有参加，连坐汽车来接我的S都没在），运到了一处日本料理店，但那是什么店名，是在东京的那一个方角，都不曾问及。只是照那座场看，达夫所受的

〔1〕《郭沫若归国秘记》，137—138页。
〔2〕文载《人世间》1947年10月1日、12月1日第二卷第一期和第二、第三期合刊，收入《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文载1947年11月15日《文讯》月刊第七卷和第五期，收入《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是中等优待。"[1]

同样是留日派作家，周作人、郁达夫来到日本受到尊重，而自己穷愁潦倒。相比之下郭沫若失去了心理平衡。基于此种个人生活体验，他在国民性的层面上对日本人进行了彻底否定。在前引《在轰炸中来去》一文中，郭沫若在谈及自己流亡期间与日本政界、学界的关系之后说：

> 说到日本的官吏，日本的学者们，他们最初只把我看成落水鸡，把我的著作看成水中的鸡粪。然而待到他们的元老称赞，西欧的学术界也产生了反响的时候，他们便刮起目来了。真真是透顶的势利。
>
> 势利的民族，我怕日本人要算是世界第一。一些研究中国学问的所谓"支那学者"，连中国文都还读不断句，而他们的心目中却彻底地藐视中国人。

对于郭沫若来说，这样的日本终于成为"死也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2]。

将郭沫若1937的回国与上述生活境遇、心理背景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归国行动对于郭沫若来说所具有的多重意义。这里有国家原因（包括爱国和被政府"借重"），也有个人原因。归国行动作为对日本的背离，其中包含着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与拒绝日本国民性之阴暗面的二重性。对于郭沫若来说，作为个人，在经济贫困、自由丧失、个人价值崩溃之后为

---

〔1〕《归去来》133—134页，北新书局1946年5月出版。

〔2〕此为郭沫若在1936年6月所作《痈》一文中所言，见《归去来》115页。1936年5月下旬郭沫若的右胸侧长了一个小疖子，郭沫若有些悲观，在写于6月2日的《痈》中说："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是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归国杂吟》中的"欣将残骨埋诸夏"一句与这种愤懑之词显然具有内在关联。

了重建自我的价值，回国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即使没有“七七”事变的发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

上述分析并非为了否定郭沫若回国行为中的爱国主义因素，相反，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郭沫若与国家的关系。如果说 1915 年的归国是基于青年人单纯的爱国冲动，那么二十年后的归国行为中则包含着对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统一性的深刻体认。此时的郭沫若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价值与国家的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个人价值丧失之后面临着价值重建的郭沫若来说，当时必须处理的是自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回国之前他对动员他回国的殷尘说的两段话是最好的注释。他说：

> 我如今虽流落在日本，靠了一枝笔也维持过了十年，今天无声无息地回去，政府若再加以落寞，我自己虽不气馁，可是人家要笑我了。我又何必走此下策呢。〔略〕
>
> 虽是我的去志已经决定了，不过我还有些畏怯，因为今后我的出路，仍就〔旧〕是毫无把握的。中央政府是否有抗日的意思，到了现在还不见确实声明过，民众运动至今还没有完全解放，而民众的意识似乎也很销沈，到现在我还没有在报上看见上海和各地的民众有什么积极的运动，所以这次回去，政府能不能容我，果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略〕还有两重危险，也是不能不预防的！因为我的地位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倾向政府，群众就会骂我是投降了，倾向群众，政府就可立刻加我的罪名。所以一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些事未免感到棘手。〔1〕

〔1〕《郭沫若归国秘记》，54 页、121 页。

归国动因中的个人因素，构成了郭沫若归国前后苦闷彷徨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在回国之后，他也未能摆脱这种苦闷心境。1937 年 7 月 30 日上午，即回到上海的第四天上午，郭沫若与两位朋友去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于立忱即于立群的姐姐，当年 2 月由日本归国，终因对现实绝望于 5 月自杀身亡，留下了四句绝命词：“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郭沫若这样表达自己站在于立忱墓前的感觉：“我有点害怕，立忱所走的路，似乎暗示着了我自己的将来。”[1]这种感伤和惆怅给当时与郭沫若见过面的夏衍留下了深刻记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夏衍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郭沫若回国”中关于当时的情形仍然有这样的回忆：“有点使我觉得不解的是沫若讲得很少。冒着险回到祖国，渴望了多年的抗战终于实现了，这不是他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么？为什么会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惆怅的神色呢？我想，他一定是牵挂着现在滞留日本的安娜和几个孩子吧!”[2]夏衍发现了郭沫若的惆怅，然而对惆怅之因的把握并不全面。

国家意识的自觉性与复杂性导致了郭沫若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由对抗转向妥协。1937 年 9 月 24 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郭沫若。穿着深灰色中式长袍的蒋介石和郭沫若握手，郭沫若感到蒋介石的手“分外的暖和”。在随后写的《在轰炸中来去》一文中，郭沫若写道：

> 蒋先生的态度素来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觉地手足便要战栗，但他对我总是格外的和蔼。北伐时是这样，十年来的今日第一次见面也依然是这样。这使我特别感觉慰适。

---

〔1〕《回到上海》，《归去来》167 页。

〔2〕《懒寻旧梦录》，377 页，三联书店 1985 年出版。

> 我也同样地感觉蒋先生的精神比从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脸色异常红润而焕发着光彩，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当时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见过些西安事变后的蒋先生的像，觉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战以来的局面不用说是异常繁剧的，念到蒋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暗地怀着几分的忧虑。但这忧虑，完全是杞忧，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经证明了。〔1〕

对于当年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来遭通缉的郭沫若来说，这个转变是本质性的。作为个人考虑自我与政府的关系，这种和解是面对日本侵略者时中国人的和解，也是结束国外流亡生活回国的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和解。从此，郭沫若在国家、自我与大众这三者之间建立起同一性，回到“国家”的框架之内重建自己的价值。这种转变影响到了郭沫若后半生处理个人与体制之关系的方式，从其建国后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到蛛丝马迹。鲁迅与郭沫若的差异之一，正是与体制的关系。一个是在反抗体制的过程中确立自我，另一个则相反。这种差异的形成与郭的流亡体验不无关系。

郭沫若的这种心理真实并未在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中得到真实的表现，相反，佐藤春夫在《亚细亚之子》中用虚构的方式将回国抗战的郭沫若从“中国”分离出来，叙述道：“聪明的汪很快就觉察到自己被蒋介石巧妙地复了仇，对于做工作将他带回国的老朋友郑也产生了被欺骗的愤怒”；“每件事，汪都痛感到自己的回国完全归于失败，与此同时，他也感到对郑的不信、对蒋的愤慨已经让他难以忍受，暗自发誓要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这种一厢情愿的虚构与事实的对立，实

〔1〕 引自《在轰炸中来去》第十节，此节为据《蒋委员长会见记》一文改写。

质上是战时两国作家国民本质的对立。郭沫若不仅自己没有与日本人合作，甚至动员滞留日军占领下的北京、有可能被日本利用的周作人南下。

不过，在逻辑的层面上，佐藤春夫的虚构中暗示出的郭沫若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关系却是真实的。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拥有“通缉”的权力，同样拥有“借重”[1]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无论是在郭沫若回国之前还是回国之后都没有改变。与此对应，对于郭沫若来说，“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归宿，同时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和工具。通过回归祖国他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

三　安娜及其投影

郭沫若出逃日本的直接受害者，无疑是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这位因为与中国人结婚取名郭安娜的日本女性。在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关系中，佐藤作为日本女性展示出崇高的人格力量。

日本女性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影响构成了近代日本影响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形式、一个侧面。代表性事件是羽太信子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佐藤姐妹与创造社成员的关系。羽太信子作为一位静冈县出身的陪酒女、小厨娘，不仅成为周氏兄弟决裂的导火线，甚至直接影响到周氏兄弟后半生的命运。创造社是五四时期两大著名文学社团之一，而佐藤姐妹成为两位创造社成员的妻子——姐姐嫁给郭沫若，妹妹嫁给陶晶孙。这些看似偶然的、个别的家庭生活事件背后，存在着中国人留学日本、日

[1] “借重”一词出自1937年5月郁达夫致郭沫若的信，所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引自《郭沫若归国秘记》74页。

本侵华等历史背景，涉及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伦理意识、文化观念等问题。

不过，与世俗化、市民性的羽太信子相比，同样是和中国留学生结婚的佐藤富子表现出了教徒式的崇高性。

佐藤富子（1895—1994）出生在日本东北的宫城县，父亲是牧师，她本人也献身慈善事业，从仙台到东京的圣路加医院当护士。因为拒绝父母为她安排的婚事、与国内有妻室的郭沫若同居，父母与她断绝了关系，将她从户籍中除名。与郭沫若的同居生活带给她的是贫困与颠沛流离。20 年代初随郭沫若回到中国之后，由于郭沫若离开家庭参加革命，她在语言不通的异国带着孩子受尽煎熬，而在随郭沫若逃亡回到日本之后，生活依然贫困。更有甚者，1933 年，流亡中的郭沫若嫖妓染上性病，并把病传染给她。尽管如此，她却把所有的宽容给了中国丈夫。“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她觉察到郭沫若想回国，作为日本人，她知道如果丈夫逃走留给她的将不仅仅是贫困和几个孩子，但她没有阻拦，并且在郭沫若出逃的前一天晚上给丈夫以忠告。关于此事，郭沫若在日记体散文《由日本回来了》“七月二十五日”部分是这样记载的：

> 昨晚，安娜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戒告过我。她说：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
> 你这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
> 你，苦难的圣母！[1]

郭沫若出逃之后，灾难落在佐藤富子的头上。家中遭警察搜

[1] 《归去来》148 页。

查，她本人也被抓进警察所，受到刑讯逼供。后来，为了养活郭沫若留下的五个孩子，为了使子女受正常的教育，她租地种，借钱盖房子卖，甚至去黑市贩卖东西。[1]——这些是发生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战前日本。

自我与家庭的关系和自我与国家的关系一样，构成了郭沫若出逃前后的另一种心灵冲突。作为国民还是作为父亲，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妻儿——两种冲突体现为不同身份的挣扎与不同价值的选择，给郭沫若造成了更大的痛苦。他最终出逃日本、返回中国，代价是妻子儿女被抛在敌国、成为牺牲品。道德评价的两难由此出现——“抛妇别雏”的郭沫若作为国民是优秀的，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是失职的甚至是残忍的。这与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家累”滞留北京的周作人形成了对照。

出逃之前的犹豫、徘徊表明郭沫若并非铁石心肠。他担心自己走后妻儿遭邻里讥讽，动身之前特意制作卡片向邻里散发，并且向驻日使馆提出了安家费、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要求。[2]在归国的船上开始写作的《由日本回来了》一文中，他说：“妻儿们为了我的走，恐怕要受麻烦的吧。这，是使我数日来最悬念的事件。”回国之后他依然无法忘记被自己“抛”在敌国的妻子。

不过，“国家”很快成为郭沫若心灵的“逃路”——如同他在现实的空间从日本逃回中国。这体现在他对吴履逊离婚事件的解读之中。

1937年9月，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前往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前线考察、访问。在南京，朋友真如告诉他一个上海“一二八的炮手”吴履逊和日本妻子离婚奔赴华北前线的故事。郭沫

---

〔1〕关于郭沫若出逃日本之后佐藤富子的生存状态，泽地久枝在报告文学《日中之桥：郭安娜与陶操》中有详尽的记述，文载《文艺春秋》1981年四月号。

〔2〕参阅《郭沫若归国秘记》第二十节。

若将此事记入《在轰炸中来去》[1]一文，这样叙述道：

> 这，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戏剧材料，我现在略略提供一些素材出来，希望在闹剧本荒的现剧界能够有人把它剧化。
>
> 吴履逊是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生，广东人，身体魁梧，年纪只有三十左右。“一二八”时是旧十九路军的团长，在“一二八”的当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出第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在闸北向日本军人放出第一发大炮。
>
> 旧十九路军云散后，他游历过欧洲，在前年，又重莅日本，我是那时和他相识的，也和他的夫人见过几次面。他的夫人很爱他，他也很爱他的夫人。不久他们便回广东去了。
>
> 今年我回上海的当时，履逊刚好由庐山下来要回广州，在上海又曾聚首过一次。那时他告诉我，说他很关心他的夫人，又说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生产了。回广州后曾来一信，报告着那第三次的生产又是一个男孩。
>
> 相别不久，全面抗战的局面便展开了。没想出仅仅两个月的辰光，他竟和他的夫人离了婚，跑上华北的最前线去。
>
> 离婚，据真如说，是双方合意的。在他们的离婚的筵席上，真如曾为他们作证人。二男一女是由他的夫人带去了。
>
> 履逊夫人在当席说过这样的话：履逊，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候，正是你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

[1] 此文作于1937年9月下旬，当年11月1日作为“抗战文艺小丛书”之一由上海抗战出版部出版。

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承继着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这，可不是一场悲壮剧吗？

履逊是尽可以留在广州尽着他的职守的，然而他却上了华北的最前线，这心情是值得我们酌取的。

在夜色茫茫的园子中听到真如告诉我这段故事，我自己一面感觉兴奋，但一面也感觉会心的微笑……

——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是绝对不会亡的！[1]

由于郭沫若本人是将妻儿抛在日本回国，因此真如对他讲述这个故事不会是无目的的。而当郭沫若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对于他来说则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从中感到的不应仅仅是兴奋，还应有安慰。将自己对象化在这个故事之中，国民关系对家庭关系的取代便能够冲淡对妻子、儿女的愧疚，于是“爱国”成为心灵避难所。不仅如此，当他在回国当年的12月决定把对于立忱的感情转移到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身上的时候，日本妻子郭安娜便渐渐地从他的记忆中隐去。[2]

在当时的交战国关系这一特殊背景下，佐藤富子作为日本女性所承受的心灵痛苦易于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所遮蔽。实际上，在当局策动郭沫若独自出逃的时候，也已经将佐藤富子和几个混血儿作了牺牲品。

佐藤富子作为与郭沫若出逃事件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是以此事件为题材创作《亚细亚之子》的佐藤春夫必须面对的。在对佐藤富子的把握中，佐藤春夫表现出一目了然的二重性。如前所述，佐藤春夫在《亚细亚之子》中把“安田爱子”作为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让她扮演了“亚细亚之

[1] 《归去来》222—224页。文中的“合意”为日语汉字词汇，意为“商定”。

[2] 参阅《洪波曲》的相关记述。

母”的角色。同样应当注意的是，日本女性（即安田爱子）作为女性在建构“亚细亚”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功能，安田爱子作为作品的主角使《亚细亚之子》成为一个“女性故事”。换言之，《亚细亚之子》是一个“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女性故事”。

就思想本质而言，佐藤春夫用《亚细亚之子》建构的“亚细亚”在近代日本“亚洲想象”的谱系中并无特殊之处，较之于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说即可明白。同样，这种“亚洲想象”在特定的时代承担意识形态功能、服务于军国主义方面亦无特殊之处，较之于武者小路实笃的《三笑》即一目了然。与思想本质的一般性相比，佐藤春夫建构“亚细亚”的方式——通过异国婚姻、生殖、混血来建构——具有特殊性。换言之，《亚细亚之子》作为“大东亚故事”的成立是通过“女性故事”完成的。

不过，将女性“工具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亚细亚之子》中，“安田爱子”作为女性也获得了正面的、自主性的存在。《亚细亚之子》展示的爱子是一位坚忍、有主见的日本女性，同时又是一位痛苦、善良、多愁善感的女性。她怀着崇高的理想把自己的孩子定位为“亚细亚之子”，同时，担心丈夫是借“奉公”之名回国与从前的女性相会又使她夜不能寐。佐藤春夫不仅褒扬她的优秀品质，让他成为诗人石川啄木的爱好者、阅读石川的诗集，[1]并且让她回到故乡与老父言归于好。这样，被中国丈夫抛弃、在中国抗战舆论界的叙述中被遮蔽的佐藤富子，终于在《亚细亚之子》中借爱子获得了认可与肯定。随着“女性佐藤富子”形象的确立，《亚细亚之子》

[1] 石川啄木（1886—1912），生于岩手县，与佐藤富子同为东北人，同样性格倔强，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佐藤春夫在剧作中设计安田爱子阅读石川啄木诗集的场面应当具有某种暗示性。

作为一部表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暂时脱出了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佐藤春夫作为女权作家的本来面貌显露出来。

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佐藤春夫的“日本人”立场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女性观。佐藤春夫是一位对女性怀有悲悯情怀的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相比他类似于“哀妇人”的周作人，完全不同于郭沫若——郭沫若在两性关系方面是自以为享有“豁免权”的。佐藤春夫在大正十一年（1922）所写的《女性与崇高美》一文中说：“无论是从男性那里还是从女性那里，发现崇高美的事一次都未曾有。就女性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与崇高美相反的、近似于可怜之美的美，倒是时常看到。那就是她们表现母性的时候。这样，当可怜之美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看上去可能就会有崇高感。”[1]这种对于女性的理解显然投射到了表现出伟大母性、由可怜而崇高的安田爱子形象身上。在佐藤春夫的小说创作中，“自然”是一个被反复阐释的关键词，而“女性”则是一个可以与“自然”相并列的关键词。前期短篇代表作《阿绢兄妹》（1918 年发表）写一位农村妇女贫困的生活状态，与《田园的忧郁》齐名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更生记》（1930 年出版）以贵族出身的女子的精神和心理为描写对象，在战后创作的短篇名作《女人焚死》（1951）中，主人公 E 子的身体甚至成为“日本”的隐喻。

佐藤春夫对女性心境的体察、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还表现在其文学欣赏中。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洞庭刘氏”的喜爱就是如此。“洞庭刘氏”的典故见于冯梦龙编撰的《情史》卷二十四，曰：

---

〔1〕 发表于同年一月号《妇人公论》。收入《佐藤春夫全集》第十一卷，1969 年出版。

洞庭刘氏。其夫叶正甫。久客都门。因寄衣而侑以诗曰。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来得一过。岁岁寄郎身上服。丝丝是妾手中梭。剪声自觉如肠断。线脚那能抵泪多。长短只依先去样。不知肥瘦近如何。

在作于1920年前后的《洞庭刘氏》[1]一文中，佐藤春夫引用该段文字之后说："吾为该诗爱读者。第五句以下尤妙，可谓才情兼备。"这种对诗中表现的与功名富贵无关的市井生活的肯定背后，是对独处女子孤寂心境的体察与同情。对女性的同情直接影响到佐藤春夫的生活。前述"让妻事件"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起因于对被谷崎润一郎冷落的小林千代的同情。

以佐藤春夫小说有关女性的叙事及其与女性的关系为背景，可以发现《亚细亚之子》提供的"爱子／汪"的故事结构并不是个别的。爱子与汪的关系与"刘氏／叶正甫"、"E子／S·K"的关系具有同构性。在这些关系中，前者作为女性都是遭到男性背叛、漠视或抛弃的牺牲品。不同只在于汪（郭沫若）对爱子（安娜）的背叛中出现了国家因素，包含着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背叛。爱子在佐藤春夫的笔下出现有必然性，她是佐藤春夫提供的女性形象系列中的一位，处于洞庭刘氏、阿绢等女性形象的延长线上。在这个延长线上，后来又有《女人焚死》的主人公E子等人。

如前文所述，郭沫若在讲述了吴履逊离婚的故事之后，表现出了用戏剧的形式呈现吴履逊故事的冲动。实际上他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近似于创作的行为。无法确定佐藤春夫创作《亚细亚之子》是否与郭沫若对吴履逊故事的叙述有关，但显而易

[1] 收入随笔集《艺术家之喜悦》，大正十一年（1922）3月金星堂出版，另见《佐藤春夫全集》第十一卷，讲谈社1969年出版。

见的事实是，佐藤春夫将郭沫若与日本妻子的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客观上《亚细亚之子》对郭沫若故事的叙述与《在轰炸中来去》对吴履逊故事的叙述构成了潜在的对话。与郭沫若将吴履逊与日本妻子生的中日混血儿界定为“永远是中国的儿女”相对应，佐藤春夫将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生的混血儿界定为“亚细亚之子”。面对同类事实，他们同样表现出将家庭生活意识形态化的逻辑，但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他们用同样的逻辑表达了互相冲突的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

不过，尽管表达了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但在将女性的身体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来运用这一点上，佐藤春夫与郭沫若表现出一致性。佐藤富子的故事摆脱“郭沫若式”或者“佐藤春夫式”的国家意识形态框架、被作为纯粹的女性故事叙述出来，是在四十年的岁月过去之后。1980 年前后，日本女作家泽地久枝数次采访佐藤富子，撰写了报告文学《日中之桥：郭安娜与陶操》[1]，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根据该文的记述，郭沫若在《由日本回来了》中有关出逃之前探身到蚊帐中吻别安娜的描写被佐藤富子称作“创作”，佐藤富子一直对郭沫若穿着睡衣出逃这一行为表现出的对她的不信任耿耿于怀。面对泽地久枝，老年的佐藤富子说：“我野狗一样的一生。说悲惨的话确实是悲惨，但那也是因为我的愚蠢。”在大连机场的细雨中她拄着拐杖来给结束采访工作离去的泽地久枝送行，泽地握着她的手说“好凉啊”，她的回答是“我身上冷心里也冷啊”。“野狗”与“冷”这两个词汇揭示了与郭沫若的婚姻对于佐藤富子的真实意义。于是，这位历尽坎坷的日本女性终于从“苦难的圣母”或“亚细亚之母”之中浮现出来。也许，因为是面对日本女作家，暮年的佐藤富子才这样吐露心声。

---

[1] 《文艺春秋》1981 年四至五月号连载。陶操即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与同为创造社成员的留日中国作家陶晶孙结婚，故称。

四 “亚细亚”的终结

回到《亚细亚之子》的另一重要人物——郁达夫的化身“郑”。郁达夫出现在《亚细亚之子》中具有悲剧性。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留日派人士中，受佐藤春夫影响最大者当为郁达夫。1923年郁达夫在《海上通信》中说：“在日本现代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略〕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1]1936年11月，郁达夫在相隔十多年之后重访日本，不止一次到佐藤春夫家中拜访，并随佐藤春夫去改造社。就是在去改造社那天晚上，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邀请林芙美子、木村毅等作家给郁达夫开欢迎会，并派车去请郭沫若来作陪，于是断绝往来十多年的郁达夫和郭沫若得以见面。[2]这次会面是在“七七”事变发生、郭沫若出逃日本八个月之前，仅仅过了一年，佐藤春夫在《亚细亚之子》中就牺牲个人友谊、从个人的亚洲意识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对两位中国作家进行了侮辱性描写。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他将郁达夫写成策动郭沫若回国的间谍人物，有可能置郁达夫于危险境地。实际上，郭沫若的出逃与郁达夫仅有间接关系，出逃主要是郭沫若的友人殷尘、钱瘦铁、金祖同以及中华民国驻日使馆有关部门筹划的。抗战胜利后殷尘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对此作了详细披露。1947年10月，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也就

---

〔1〕 载1923年10月《创造周刊》第二十四期。

〔2〕 参阅小田岳夫的《关于郁达夫的回忆》，原载《文学青春群像》，日本南北社1964年出版。中文译文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众说郁达夫》，译者为刘克申、奚必安。

有关事实进行说明，指出：“佐藤春夫的揣测，其实完全是误解”；“关于我的回国，达夫虽然有着一些间接的关系，但对于直接的策动是毫不相干的”。

《亚细亚之子》在《日本评论》上发表的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从福州去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任设计委员。当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理事和《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亚细亚之子》发表之后郁达夫很快得到了消息，佐藤春夫的诋毁引起了他的愤慨，5月9日，他写了一篇痛斥佐藤春夫的文章，发表在5月14日出版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第四号。此文就是《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在《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中，郁达夫揭露佐藤春夫的政治用心，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时也拙劣地使尽了挑拨我们违反领袖，嗾使我们依附日本去作汉奸的技巧。”进而否定了佐藤春夫的人格，指出：“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伎了。”

郁达夫的抨击并非仅限于佐藤春夫个人，而且指向佐藤春夫背后的日本文化。他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明言：“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决不能与世界各伟大民族相并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断定日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放一点异彩的运命。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从此郁达夫心目中的佐藤春夫形象彻底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抨击佐藤春夫的同时肯定了秋田雨雀、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日本作家的良知，说："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地。"这与包起权《肉弹》中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同，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超国家"思想的显现。

与郁达夫面对《亚细亚之子》时表现出的愤激形成对比的是，《亚细亚之子》发表之初郭沫若基本上保持着沉默。直到1947年10月，即《亚细亚之子》发表九年之后、郁达夫遇难两年之后，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1]一文提起《亚细亚之子》，说："我现在倒感悟到了。佐藤春夫的那篇小说，说不定和达夫的遇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达夫写成间谍，而把我的回国归到达夫的策动，这可能是代表着日本官宪的意见"；"日本人是很褊狭的，而且复仇心很顽强，达夫如那样被误解，日本宪兵要不甘心他，那真是近情近理的事了。是这样，我们竟直可以说：佐藤春夫把达夫杀害了！"郭沫若在文章中对小说基本内容的概括尚准确，但错把发表该作品的《日本评论》写成了《中央公论》。不知他本人当时是否已经读过《亚细亚之子》，他文中所谓的作品"后来并且电影化了的"也有待确认。

在当时战争背景下，与《亚细亚之子》相关的事件并非仅仅是一般性的文学事件，而是和国家之间的情报活动纠缠在一起。不仅郭沫若的出逃日本是由国民党政府策动并提供经费，《亚细亚之子》引起郁达夫等人的注意也与文化情报工作有关。根据郭沫若的记述，当时在武汉最初看到《亚细亚之子》的是崔万秋，因为崔万秋在国际宣传处服务，通过特殊关系经

[1] 发表于1947年11月15日《文讯》第七卷第五期。

常可以看到日本的报纸杂志。郭沫若说的应当是事实。崔万秋曾经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有直接交往，熟悉日本的情况。根据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的记述，1937年"七七"事变刚刚发生的7月中旬崔万秋到驻日使馆任职，并且参与了帮助郭沫若出逃的工作。全面抗战开始后崔万秋回到国内在国际宣传处做有关日本的文化情报工作，1938年3月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列名发起人，1939年3月1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36号，即载有崔万秋的介绍文章《战时日本文坛动态》。日本著名反战诗人绿川英子（1912—1947）在华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期间，就曾在崔万秋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对日科担任对日广播工作。

与此对应，佐藤春夫对郭沫若有关情况的熟悉程度以及对郁达夫日本之行目的的推测，亦耐人寻味。《亚细亚之子》具有虚构与写实的二重性。作为"大东亚共荣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个虚构的故事之中包含着许多有据可查的情节或细节。"郑"的黄昏来访，"汪"出逃之前用日语片假名给最小的孩子留言，吻别无法入睡在蚊帐中看书的日本妻子，逃出家门不远遇到送报纸的等等，都有来历。郁达夫黄昏访郭宅等情节来自于佐藤春夫本人的了解（他是当晚宴会的参加者），而其他细节则暗示出一些细节之外的问题。这些细节与郭沫若在《由日本回来了》、《达夫的来访》等文章的记述相同。《由日本回来了》写毕于1937年8月1日，8月16日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47期。此文被日方翻译为日文，发表于当年11月18日发行的《改造》"上海胜利纪念临时增刊号"上。佐藤春夫是在战争状态下密切关注郭沫若的动向，获得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对于"日本主义者"、主动配合"大陆进出"的佐藤春夫来说，此种行为的主体显然已经不是纯粹的"作家"，而是具有"官方"的性质。郭沫若所谓的"代表着日本官宪的意见"应当是一种有根据的推测。至少在郭沫若本人的叙述中，佐藤

春夫已经被赋予某种官方身份。郁达夫尽管在郭沫若的出逃事件中承担了传递信息的工作，但相关事实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被披露出来。[1]而佐藤春夫在当时即认定郁达夫1936年底的访日与郭沫若的出逃有关，并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公之于社会。在这里，文学创作已经转化为战时情报工作的一种形式。

《亚细亚之子》发表一个多月之后的1938年5月1日，佐藤春夫作为文艺春秋社特派员前往朝鲜、满洲和华北采访，并且到达北京。根据保田与重郎的记述，佐藤春夫在北京与周作人的见面对于促使周与日本人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周作人的"附逆"是从1938年2月9日参加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开始的。不过，在参加了那次会议之后，他基本上没有具体的"附逆"行为，而是依然处于"闭户读书"的状态。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佐藤春夫与他见了面。保田与重郎在《佐藤春夫》的"事变与文学家"一章中，记述了1938年5月19日日军进入徐州城之日他与佐藤春夫在北京的情形，然后说："周作人等人协力于我国的事业是在那之后。〔略〕事变发生以来周氏一直闭门不出。就是说，是佐藤氏最初将周氏拉了出来。会面是以研究支那文学的竹内好为中介、而非根据公共机关的意向。周氏不用说是在东京访问过佐藤氏的老朋友。"郭沫若与日本的协作对于佐藤春夫来说仅仅是与事实相反的幻想，而周作人客观上的协作倒是满足了佐藤春夫的愿望。这显然是他在三年之后的1941年将周作人称作"有日本之魂的文人"的重要原因。当年9月，佐藤春夫又响应日本内阁情报部的号召，作为"文学家从军海军班"的一员与另外21名作家从军去武汉。这样，其"亚细亚

〔1〕关于郁达夫与郭沫若回国的关系，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在《郁达夫：悲剧时代的作家》一书第五章"郭沫若的归国与郁达夫"中有详细考证，研文出版1994年7月。

意识”与对军国主义政府的配合以更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那时候武汉刚刚被日军攻陷（国民党军队8月25日撤出武汉），佐藤春夫在武汉为诗集《东天红》写“自序”，在“自序”后面郑重地注明“戊寅秋汉口从军之晨　佐藤春夫记”。《亚细亚之子》开头处的主题歌，也被贯以“东天红”的题目收入该诗集。显然，这首诗的题目成了诗集的名称。[1]佐藤春夫郑重其事地在武汉为自己的诗集写序的时候，郭沫若等人刚刚逃离武汉前往长沙，郁达夫正经湖南汉寿、福建、香港等地逃往南洋。佐藤10月中旬回到东京之后，撰写了《我的从军记》，同样发表在《日本评论》（十一月号）。

《亚细亚之子》尽管是宣扬“亚细亚”理念，但郭沫若、郁达夫的回应方式表明了“亚细亚”的终结。这一方面是因为佐藤春夫的“亚细亚”本质上不过是“大日本”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郁达夫作为当年在日本体验了弱国子民的悲哀（集中体现在短篇小说《沉沦》中）的中国人、作为现在被侵略的中国的国民，不可能认同佐藤春夫的帝国主义意识。相反，与曾经拥有亚洲意识的孙中山、周作人不同，郁达夫虽然留学日本但并未形成“亚洲意识”。《亚细亚之子》的诋毁性描写，则强化了他的民族意识——与“亚洲意识”相抵触的民族意识。

怀有“支那趣味”的佐藤春夫曾经以其文学成就和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博得中国新文学家的尊重，他是被及时介绍到中国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2]被介绍的过程与中国新文学的成长过程相伴随。1921年10月16日，留学日本的田汉第二次前

---

〔1〕“东天红”是日语汉字的写法，意思即为汉语的“东方红”，该诗集1938年10月5日由中央公论社刊行。

〔2〕根据实藤惠秀的统计，30年代之前作品在中国被翻译五篇以上的日本近代作家共十五人，佐藤春夫名列其中。见《中国留学生史谈》第二章。

往拜访佐藤春夫（第一次拜访未遇），特意郑重地穿上高师的制服，并借了别人一双鞋。鲁迅、周作人于20年代初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1]收日本作家十五人的三十篇作品，佐藤春夫的作品就有四篇。筹划过程中的1921年8月29日，鲁迅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又佐藤春夫似尚应添一篇别的也。"[2]1928年10月佐藤的小说《一旧友》发表，田汉随后撰写了《从佐藤春夫的〈殉情诗集〉》，就小说做说明，并翻译佐藤的《殉情诗集》"自序"，一同发表在1928年2月9日《中央日报》副刊《摩登》。[3]甚至崔万秋的长篇小说《新路》中在东京留学的女主人公，都是在阅读佐藤春夫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骄傲的女性》。1934年出版的中文版佐藤春夫作品集《田园的忧郁》[4]收录了佐藤春夫的代表作品，并附有佐藤的画像、评传和年谱。佐藤春夫在中国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

但是，在佐藤春夫进入以《亚细亚之子》为标志的"军国文人"时代之后，类似的情形就不可能再出现了。如前所述，郁达夫的《日本的娼妇与文士》结束了对佐藤春夫的崇敬和与佐藤的友情，甚至否定了佐藤的人格以及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写此文八个月之后的1939年2月，郁达夫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一文中对战时日本作家进行分类，又将佐藤春夫划入"为高压与生活所迫，不得已而转向，或以走狗自甘的帮凶作家"[5]。1940年，同样被纳入战时体制的《读卖新闻》试图促进战时中日两国文士的交流与沟通，组织两国作家

---

〔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6月出版。

〔2〕《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3〕现收入《田汉在日本》，小谷一郎、刘平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4〕中华书局出版，李漱泉译。

〔5〕原载1939年2月15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六期，引自《郁达夫文集》第七卷66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

进行通信。当年6月间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笃的通信就是这样出现在《读卖新闻》上。[1]郁达夫同样是《读卖新闻》的约请对象之一。因为他与佐藤春夫曾经有过的密切关系，他们二人自然是最合适的一组，但《亚细亚之子》和《日本的娼妇与文士》的发表标志着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关系的终结。郁达夫最后是与新居格通信。郭沫若在抗战胜利后甚至将佐藤春夫看作日本官方的代言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

不仅如此，被佐藤春夫视为"有日本之魂的文人"的周作人，本质上依然是"儒家文化中心论"者。[2]而周作人的侄子周丰三作为真正的"亚细亚之子"（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之子），也在周作人与日本"协力"之后的1941年3月24日自杀身亡。周丰三的自杀作为一个历史性事实，对佐藤春夫的文学想象构成了直接的颠覆，标志着"亚细亚之子"的终结。

《亚细亚之子》在佐藤春夫这里所具有的"终结"意义，还在于它包含着对鲁迅的颠覆性认识。

在《亚细亚之子》中，汪尽管是郭沫若的替身，但佐藤春夫在叙述汪的故事的过程中显然是带着关于鲁迅的记忆。在作品的开头部分，前往日本留学的汪富于文学天赋、满腔诗人热情，但没有选择文科专业而是选择了医学专业。朋友们感到惊奇，汪便解释说："为了拯救中国的未来，医学更重要。"佐藤春夫作为鲁迅崇拜者和鲁迅作品的翻译者之一，无疑深知"弃医从文"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的意义，因此，这里汪的"弃文从医"显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变形，并且颠覆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意味深长的是，1941年《亚细亚之子》改题为《风云》收入同名小说集《风云》的时候，不仅影射郁达夫的"郑"被改成了"郁"，影射郭沫若的"汪"也有一处被改成了

---

[1] 这两封信由笔者译为中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三期。
[2]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第四章进行详细论述。

"鲁"。[1]可见佐藤春夫确实通过作品中的"汪"表达了对鲁迅的认识。对"弃医从文"的颠覆背后是对医学之实用价值的强调与对意识形态之形而上价值的否定。在《亚细亚之子》中的另外一处，佐藤春夫的这种价值取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关于汪回国之后由抗日者向日本合作者的转变，作品叙述道：

> 自从俄国的现状使他从长期怀有的俄国式共产主义之梦中醒来之后，汪摆脱了试图依靠意识形态拯救民众的幼稚的知识分子习性，明白了使民众幸福的并非意识形态，只有事实。就是说近期的逆境给了这位诗人现实的洗礼。因为意识到意识形态无可无不可、必须在现实中让民众安然的理由，所以现在能够下定投身于日本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北支开发的决心。

按照这种逻辑，"弃医从文"的鲁迅表现出的也是"试图依靠意识形态拯救民众的幼稚的知识分子习性"。这种否定之中包含着日本式的实用主义精神。因为同样的原因，佐藤春夫在《亚细亚之子》的第一节把北伐战争初期"汪"的身份改写为"军医长"（郭的实际职务是政治部宣传科长）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流露出用实用之术否定意识形态的潜意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佐藤春夫一方面否定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又强调"日本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这种自相矛盾暴露了佐藤"亚细亚"的虚幻性，其背后是强烈的日本优越感，即意识形态无用，但日本的意识形态有用。

上述对鲁迅逻辑的间接否定之外，佐藤春夫在《亚细亚之

[1] 这是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考证。铃木认为佐藤有可能是在改变作品题目的时候将"汪"改成了"鲁"，中途改变想法、恢复原状时漏掉了这一处，但铃木没有追究"鲁"的含义。参阅本章第一节的第二条注释。

子》中还让“汪”发表了如下见解：“鲁迅本来并不是具有社会意识的思想家。说起来，他是企图使支那民众自古以来的生活中原有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生活状况获得新生的肤浅的思想家，绝对没有基于近代意识的意识形态。”这里表达的并非郭沫若的观点。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当夜，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即撰文《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给鲁迅以崇高评价。[1]11月3日在东京参加鲁迅追悼会发表演说，他把鲁迅置于孔子之上，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在国际间的功勋，是孔子没有的，鲁迅先生之死能得着国际间伟大的追悼，这在中国是空前的一个人。”[2]显然，所谓“肤浅的思想家”的观点属于佐藤春夫本人，体现了战争初期佐藤春夫鲁迅观的变化。这种评价与鲁迅逝世时佐藤所谓的“伟大的东洋的文学者”的评价具有很大差异。佐藤春夫“转向”之后思想意识的变化体现在这种差异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他被郁达夫看作“娼妇”亦具有逻辑的合理性。

五　“国家化”的婚姻

如同《留东外史》生动展示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副产品之一是为数众多的中国男士与日本女性建立起多种形式的关系。[3]堕落性的嫖宿是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婚姻。周作人、郭沫若、蒋百里、陶晶孙等人都是娶日本女子为妻。即使

---

〔1〕原载当年11月10日《质文》月刊二卷二期，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

〔2〕《郭沫若年谱》上卷329页。

〔3〕民国时期具有留日背景的知名人物中多有以日本女性为妻妾者。相关问题可参阅《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王晓元编撰，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是在视日本为“淫卖国”的《留东外史》中，也有中国男性与日本女性建立起美满婚姻的故事。来自四川的留学生熊义备受无教养的中国女子秦次珠的折磨，不得已与秦解除婚约，却在日本女子鸠山安子那里找到慰藉，带着安子回了四川。小说主人公黄文汉也是在民国五年（1916）携中壁圆子回国，到云南当了两年差之后替唐督军当驻京代表，圆子为他生了两个很好的儿子，受人羡慕。按照《亚细亚之子》的逻辑，黄文汉的两个混血儿也是“亚细亚之子”。

婚姻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之一种，历来承担着家庭之外的社会功能。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都是发挥婚姻的社会功能，将民族关系嵌入婚姻关系之中，使婚姻承载超个人的历史内容。中国男性与日本女性的婚姻作为国际婚姻，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这种婚姻本身是“国家化”的，并且存在着被进一步“国家化”、在特定时代承担更多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佐藤春夫用“婚姻”和“生殖”消弭中日两国的国境线、建构“亚细亚”，体现出的是同样的逻辑。

不幸的是，佐藤春夫的幻想毕竟只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在两国交恶的时代，作为中日跨国婚姻当事人，首先面临身份的分裂。就郭沫若和安娜而言，他们都无法在配偶者一方的国家中找到“母国”的感觉。在中国佐藤富子语言不通，失去自由与快乐，而日本对于郭沫若来说仅仅是“妻国”，是他因为诸种原因“死也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双方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具有统一性、能够共享的国家认同感。

更为不幸的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之间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中，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婚姻尽管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在大多情况下都被国家化、意识形态化，从而受到否定。早在1918年前后，民族利益的冲突对中日家庭的波及就已经出现。郭沫若的回忆录《创造十年》有如下记述：

原来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中日军事协约"，曾经闹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风潮中还有一个副产物，便是有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认为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激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时候和安娜已经同居了一年有半，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和夫产后已经五个月了。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更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乡间，"武力"的滋味我倒还没有领略过。

《创造十年》完稿于1932年9月上旬，写作该书的时候郭沫若正流亡日本。

前述吴履逊与日本太太的离婚事件，无疑是这种"强迫离婚事件"的延续与变形。类似的事件还有同样发生在抗战初期的蒋百里与其日本妻子的故事。该事件冯玉祥在其自传第三卷《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有记载。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娶日本女子为妻。五四时期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有少量译作，曾任东三省总参议。袁世凯称帝后蒋百里追随反袁的蔡锷，任云南护国军参谋长。1916年蔡锷死后从事军事研究，著有《军事常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参议员，1938年9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1月4日在宜山病死。关于蒋百里的死，冯玉祥是这样记述的：

周先生对我说："在宜山蒋百里住在他们楼上，他住在楼下。百里回来还能说话，他的日本太太要给他打针，蒋百里说等医生来再打。这位日本太太说，先打针好。结

果日本太太替他打了针，就再也不能说话，没两天就故去了。”周说这话，他总觉得，蒋百里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他的日本太太是说过的：“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1]

这位向冯玉祥转述蒋百里之死的周先生与蒋百里同事，共同负责陆军大学。无论是在周先生的叙述中，还是在冯玉祥的叙述中，蒋百里之死都被暗示为“日本妻子谋杀具有抗日精神的中国丈夫”的故事，在谋杀过程中夫妻关系转换为彻底的国民关系。这与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一样是战争状态下基于民族立场对“中日家庭”的解读。

对于“中日婚姻”的排斥（亦即对于“亚细亚家庭”的排斥）并非仅仅来自中国一方，而是更早地来自日本一方。本质上这种排斥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在个人生活中的体现。这在佐藤姐妹与郭沫若、陶晶孙的婚姻中典型地表现出来。佐藤富子和郭沫若同居的消息传到家中的时候，比她小四岁的妹妹佐藤操的最初反应是“漠然”与“厌恶”，家庭和亲戚之间因此发生纠纷——所谓“家里出了和支那人结婚的女儿，愧对祖先”。不幸的是佐藤操自己不久也爱上了十岁时随父母到日本生活，日语好过汉语，风度翩翩多才多艺的陶晶孙，也要和“支那人”结婚。大正十三年（1924）3月3日是日本的女儿节，陶晶孙和佐藤操特意选择这一天在仙台结婚。佐藤操的父母依然反对，亲戚们经佐藤操的母亲授意，来到佐藤操工作的女学校宿舍当面进行谴责：“出生在佐藤这种门第的家庭，有教职也有社会地位，究竟为何要嫁给支那人？”最

[1]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第二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109页。

终拒绝出席婚礼。[1]

在中国的语境中，郭沫若“抛妇”、吴履逊离婚、蒋百里之死都是作为“亚细亚之子”故事的反面出现的。“亚细亚家庭”的破裂从另一侧面证明着“大东亚”的虚幻性，证明着佐藤春夫的一厢情愿。面对同样的事实，中日两国的文人终于无法找到相同的感觉。

在女性被塑造为亚细亚之母的状况下，亚细亚的终结就是日本女性的终结。事实上，在上述故事中日本女性都成为牺牲品。当郁达夫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佐藤春夫相提并论的时候，他与《留东外史》的日本观（所谓“淫卖国”）达成了一致，日本女性又一次在否定的意义上成为日本的喻体。

对于佐藤春夫来说，《亚细亚之子》作为“殖民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他用极其主观的方式把郭沫若、佐藤富子作为自己观念的执行者，将自己的社会理念、文化理想、甚至将自己的生活感觉、潜意识投射到作品中去。投射在《亚细亚之子》中的佐藤春夫是分裂的，将对他人国家观念的解构作为建立自己国家观念的方式，贬低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强调日本意识形态的指导功能，鼓吹“亚洲意识”而又固守“国民意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而又贬低现代中国，悲悯女性的同时又将女性工具化为“亚细亚之母”，都是这种分裂的表征。

观念内部的分裂与矛盾性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表现。《亚细亚之子》具有明显的概念化倾向，作为文学作品艺术上并不成功，与《田园的忧郁》等杰作相比甚至可以说有些拙劣。从笔调来看佐藤春夫创作该作品的时候心态不稳定，故行文啰嗦，表达有暧昧之处，给人以躁动不安、草草了事之感。

---

[1] 参阅泽地久枝《日中之桥：郭安娜与陶操》。

第 4 章

文化与帝国主义

——中日战争状态下的“儒家文化中心论”

1943 年 8 月 25 至 27 日，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在东京召开。在 27 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日方代表、知名作家片冈铁兵（1894—1944）做了题为《扫荡反动权威——确立中国文学之请求》的发言，发言记录刊载于日本文学报国会会刊《文学报国》第三期。[1]片冈氏所欲扫荡之“权威”为何人？引起种种揣测。当年年底，胡兰成（1906—1981）在《中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周作人与路易士》，指出片冈铁兵所谓的“反动权威”即周作人，并为周作人鸣不平。于是，周作人在 1943 年 3 月 20 日发信给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1891—1952），[2]要求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以“洁身引退”相威胁，并怀疑此事与其弟子沈启无（1902—1969）有关联，

[1] 昭和十八年（1943）9 月 10 日发行。片冈发言记录的中文翻译见于 1944 年五月号《杂志》，译者陶晶孙。陶氏将标题译为“扫荡反动作家”，不确。日语汉字的“大家”在指称个人的时候意为大家、权威、大师等，与“作家”是两个概念。

[2] 久米正雄为日本文学报国会第一任事务局长，1944 年 3 月 31 日退职。继任为中村武罗夫。

将沈逐出师门。1944年4月末片冈铁兵给周作人写信，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并表示道歉，这场延续了将近十个月的冲突才画上句号。

此次冲突多为中国新文学研究者所论及，但是，两个重要背景或者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或者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两个背景就是下文将要详细论述的中日文化协会的文化活动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政治主张。伦理批判的绝对性导致此次冲突的真实含义被遮蔽。实际上，在近代中日作家关系的历史中，这场发生在战争状态下的冲突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它起因于周作人提出的"中国思想问题"，发难者又是持"皇国世界观"的日本作家，因此冲突的本质是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文化正统性的对立。

一 "树立中心思想"

周作人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是在1940年12月，半年之后的1941年7月17日，他以"督办"的身份在伪教育总署举办的"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席班"上发表"精神讲话"，讲演的题目是《中国的国民思想》。在讲演的开头部分他说："我所说的，是极平常的，没有新的东西，不过是我个人多少年以来想出来的一点问题，就是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究竟是什么？它的优点与劣点究竟在哪里？"进而指出："中国的国民思想，现在已经到了病得很重的时期了，非请医生检查不可，必须明了那〔哪〕部分健全，那〔哪〕部分不健全有毛病，这是很重要的。"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的国民思想"进行了如下阐述：

中国国民的思想，说来说去，无论人喜欢不喜欢，根

本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孔孟的思想。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孔子是中国人，他的学问特别高，思想特别好，可以做我们的代表，无论什么人，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他的根本思想完全根据于孔子的思想，即是所谓儒家的思想。这是二千年以来，由种种方面可以看出来的。

儒家的思想那〔哪〕一点最重要呢？简单地说，就是利人——这是我假定的名称——对于他人，对于民众，要给他幸福，为民众谋福利，这时中国古今的中国国民思想，也就是儒家的思想。我从前念过四书，记得孟子里有一段，讲禹稷。禹是治水的，"三过其门而不入"。治水是禹的责任，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被水淹死，就是禹自己的不好，如同禹淹死这个人一样。稷是种田的，天下只要有一个人挨饿，就是稷自己的不好，如同稷叫这个人挨饿一样。所以禹稷都是圣人的心理。再如孟子与梁惠王讲仁政——所谓王道——孟子说得很简单，只要人民不饥不寒，年老的人有绸衣可穿，有肉可吃，等到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然后办学校，申以孝悌之义，这就是王道。[1]

一年之后的1942年夏天，周作人又到"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席班"上发表"精神讲话"，讲演的题目是《树立中心思想》。题目与前一年不同，但内容依然是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半年有余，"大东亚"问题自然是身为傀儡政府教育督办的周作人无法回避的。他说："去年十二月以前，一切一切都以中日事变为契机，但在十二月八日以后，大东亚战争开始，于是中日事变成了微末的节目，一

〔1〕 引自《教育时报》第二期，1941年9月1日出版。

切的问题又当重新的检讨，而以东亚解放为我们最大的目标了。"不过，所谓"大东亚的思想"完全被他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他说：

> 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再进一步去研究，大东亚主义的思想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的思想之内。
>
> 儒家思想最高的原则是在利人，即是己饥己溺。别人没有吃饱，就等于自己没有吃饱一样，甚至于好像自己使他饿死的，所以必须去救他，使他同我一样的可以吃饱。别人被水淹了，就等于自己被水淹了一样，甚至于如同自己使他淹死的，所以必须去救他，使他同我一样的可以生存。[1]

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己饥己溺"完全是他在一年前的讲话中所述禹稷故事的"同义反复"。在承认"大东亚主义的思想"是"中心思想"的同时将其纳入"儒家的思想"的框架，于是所谓的"树立中心思想"实质上依然是"树立儒家思想"。"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在被转换为"儒家思想"的同时被消解了。

周作人面对中等学校教员一再宣扬"儒家思想"并非偶然，这是他40年代初期的文化观念在教育工作中的实践与贯彻。40年代初期，周作人的文化观念正是围绕"儒家文化中心论"展开的。五篇对此进行正面阐述的文章即写于1940至1943年间。这五篇文章是：《汉文学的传统》(1940年3月)，《中国的国民思想》(1941年7月)，《中国的思想问题》(1942年

〔1〕 发表于《教育时报》第八期，1942年8月1日出版。

11 月),《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1943 年 4 月),《汉文学的前途》(1943 年 7 月)。[1]前述两篇"精神讲话"就是以这五篇文章阐述的思想体系为背景的。

在当时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国土沦陷、平民生灵涂炭的特殊历史时期,周作人的"儒家文化中心论"是作为"民族主义文化观"存在的。这种文化观中的民族意识可以归纳为两个要点。一是自觉的中国人认同感——即第一次讲话中所谓的"孔子是中国人",《汉文学的前途》一文及其"附记"中所谓的"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2]二是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被周作人表述为儒家的"仁"。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引用阮伯元的《论语论仁论》,强调"仁即是把他人当作人看待",指出:"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迫切,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确如柳存仁所说,周作人这是"利用儒家的老招牌,为人民大众争取生存权力"[3]。在当时的背景下,周作人对"仁"的强调实质上是对"非仁"的日本入侵者的责难。根据当时受地下党派遣在北平工作、与周作人多有接触并在被日军逮捕后得到周作人营救的高炎的回忆,周作人当时在与他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对于日寇侵略行径的不满,说:"人民生活不安定,谈不到建设。"[4]这种不满同样是基于对"仁"的精神的追求而发生的。

"儒家文化中心论"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文化观"意义,

---

[1] 五篇文章均收入《药味集》,新民印书馆 1944 年 1 月初版发行。

[2] 关于该问题笔者在《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文章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 年第三期。

[3] 《知堂纪念》,收入《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7 月出版。

[4] 高炎《再谈周作人的几件史实》,原载《文教资料》1986 年第四期,收入"周作人研究"书系《国难声中》卷,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出版。

在周作人1941年4月的访日和1943年4月的南行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

1941年4月6日，周作人率领伪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前往日本，出席在京都召开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议。京都的活动结束之后，14日到达东京。在19日离开东京回国之前的五天中，他先后出席日本文部大臣的招待宴会，参加伪东亚文化协议会前会长汤尔和的追悼会，甚至到海军医院慰问日军伤兵。在追悼汤尔和的致词中他谈到日本对于中国的“模范”意义，说：“五十年来，我国的知识阶级，无不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然而最近数年，却为别一种文化思潮所推动，以致相互间发生了这次莫大的不幸。”

不过，日本之行表面的风光未必能够掩盖周作人内心的灰暗与寂寞。去东京之前十二天的3月24日，周作人的侄子周丰三（周建人之子）在家中用周作人保镖的手枪自杀身亡。周丰三的自杀被看作对于伯父出任伪职的抗议。[1]难以确定当时周作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出任伪职与侄子自杀的关系，但此事无疑在他心中留下了浓重阴影。与此同时，访日过程中周作人一直处于日本军方人士的监督之下。作为对近代日本的国家本质具有深刻认识、20年代即视日本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的知日派文人，他难免感到屈辱。当时在改造社任职、目睹了周作人访日活动的高杉一郎晚年有如下回忆：

> 某日，山本实彦在星冈茶寮举办了改造社欢迎周作人访日的宴会。我坐在末席上、仅仅是远远地看过去，与山本比肩而谈的周作人那能乐脸谱一样苍白的脸上表情几乎是静止的。“这个人是精神贵族！”——当时我就这样想。

---

〔1〕参阅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收入《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 另一天，周作人在帝国饭店举行了记者会见。每当新闻记者中有人提出非常露骨的问题，周作人身边坐着的日本陆军上校便抢过话题："关于这一点由我来回答。"周作人仅仅是几乎面无表情地默然旁听。会见结束之后，有人出于对那位厚颜无耻的上校的反感，甚至说"周作人也终于落入日本军队的手心了吗?"但周作人本人也许只是平静地居高临下俯视军人和新闻记者双方。[1]

如果可以认为周作人的沉默与苍白表情暗示出他对自己傀儡身份的认知，那么，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与钱稻孙前往汤岛圣堂参拜就是意味深长的。[2]参拜是在到达东京第三天的16日上午进行的，回到北京之后，周作人撰写了《汤岛圣堂参拜之感想》一文，在文章中说：

> 亚洲古来曾出二圣人，是为孔子与释迦，佛法本是宗教，教化所及，寺院遍于东亚，盖无足异，若儒家所说但是旧道德，而影响亦及于国外，不为种族地域所限，则孔子视释迦为尤难矣。窃思孔子之教大抵只是一个仁字，此与释氏之慈悲近似，但后者推至究极，而前者则止于中庸，此固可云不彻底，唯其可贵处亦即在此。〔中略〕孔子之道，庶几为救时之良药，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民间多文庙，今又得至汤岛瞻礼圣堂，知孔子影响之远大，深希望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

---

〔1〕《回忆周作人》，《野草》（日本）第五十一号，1992年2月1日出版。山本实彦（1885—1952）为改造社社长，大东亚主义者，《大鲁迅全集》即由此人筹划出版。文中的能乐为日本的传统戏剧形式之一种。

〔2〕汤岛圣堂，日本规模最为宏大的孔庙，位于东京汤岛，江户幕府的学问中心。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中损毁，1935年重建。

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也。[1]

这种表达与其在汤尔和追悼会上所言“以日本为模范”有所不同。以孔子的影响达成东亚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取代了对日本“模范”地位的认可。对于周作人来说，此次参拜本质上是确认“儒家文化中心论”的形式之一。在当时受压抑的状态下，这种参拜具有心理补偿、维护文化自尊心的意义。通过参拜汤岛圣堂，周作人确认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和“中国文化人”身份。这种身份的确立与其访日过程中的官方身份构成了复杂的、互为讽刺的矛盾关系。

1943年4月5日，两个月前被免去督办职务的周作人前往南京就任汪伪政府国府委员之职。10日自南京去苏州游览，11日前往马医科巷瞻仰俞曲园故居春在堂，又去锦帆路拜谒章太炎的墓。对于1926年8月曾经在《语丝》上发表《谢本师》、公开与“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运动”、支持“讨赤”的章太炎划清界限的周作人来说，这次拜谒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第二年（1944）3月所写的《苏州的回忆》一文中，周作人说：

我又去拜谒章太炎先生的墓，这是在锦帆路章宅的后园里，情形如郭先生文中所记，兹不重述。章宅现由省政府宣传处明处长借住，我们进去稍坐，是一座洋式的楼房，后边讲学的地方云为外国人所占用，尚未能收回，因此我们也不能进去一看，殊为遗憾。俞章两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却都别有一种特色，俞先生以经师而留心新文学，为新文学运动之先河，章先生以儒家而兼治佛

[1] 此文初发表于1941年6月刊行的《斯文》二十三编第六号，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

学，倡导革命，又承先启后，对于中国之学术与政治的改革至有影响，但是晚年却又不约而同的定住苏州，这可以说是非偶然的偶然，我觉得这里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中略〕我以为在苏州应当有一个江苏大学，顺应其环境与空气，特别向人文科学方面发展，完成两先生之弘业大愿，为东南文化确立其根基，此亦正是丧乱中之一切要事也。[1]

这段话传达出的信息有许多种。拜公开“谢”过的老师的墓是向老师回归的仪式（对于周作人来说这种回归至少在1937年写回忆文章《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的时候已经开始），当周作人把章太炎的生涯描述为“以儒家而兼治佛学”的时候，这种回归本质上就是向“儒”与“佛”的回归。对于在“五十自寿诗”中自称“半是儒家半释家”的周作人来说，这种回归是本质性的，兼有自我确认的成分。拜谒章太炎墓和参拜汤岛圣堂一样，成为周作人确认儒家文化中心地位的实践形式。“为外国人所占用，尚未能收回”一语与概括时局的“丧乱”一词，更明确地流露出对日本占领者的不满，[2]将这种不满与下文在丧乱中确立文化根基的主张来看，周作人用传统文化救国救民的构想凸现出来。正是在从苏州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他在伪中央大学发表了讲演《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在认识40年代初周作人以“儒家文化中心论”为中心的文化观念方面，1941年的东京之行和1943年的南京之行

---

〔1〕《苏州的回忆》，初发表于《艺文杂志》二卷五期，1944年5月刊行，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十卷。

〔2〕徐淦在《忘年交琐记》一文中已经谈及此种不满。文见《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均具有标志性意义。

就任伪职之后，周作人的身份陷入分裂状态。一个是“督办”、“委员”——忙于赴宴、开会，甚至慰问伤残日军士兵、穿上军服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一个是教育工作者——宣扬“儒家文化中心论”并企图以此为主体建立“中心思想”。两种身份之间构成了互为颠覆关系——作为臣服于入侵者的伪“督办”却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民族自主性的文化观念，作为在逻辑上必须协助占领者进行奴化教育的“督办”转换为唤起民族主义文化精神的宣传者，民族主义文化观念颠覆了“督办”身份。关于提倡“儒家思想”的针对性以及《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的写作，周作人在1946年夏天接受国民党法庭审判的时候进行解释，说：“日人的新民会，兴亚院要奴化中国人思想，要以大东亚建设来消灭中国，另外树立中心思想。我之作是书是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是为民族求生存，我这本书是关于道德仁义方面的，可以给自己的子女看的。”〔1〕在1949年写给中共负责人的信中他重复了同样的内容，说：“这是在三十一年冬天所写的，其时兴亚院新民会等正热心于替中国人建立一个中心思想，不用说那是想用大东亚新秩序做中心的，我的文章便是对此而发。”〔2〕60年代初写回忆录的时候又说：“这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本来这种驴鸣犬吠的运动，时至自会消灭，不值得去注意它，但在当时听了觉得很是讨厌，所以决意来加以打击。”〔3〕此类表述并非完全是自我标榜。

---

〔1〕 1946年7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周作人的笔录。引自“周作人研究”书系《国难声中》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2〕 《周作人的一封信》，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二期。

〔3〕 《知堂回想录》第一八〇节。

当周作人以中学教员为对象、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将儒家思想作为沦陷区的“中心思想”进行树立的时候，“教育督办”身份成为他宣扬自己思想观念的工具，伪教育总署的机关刊物《教育时报》成为其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场所。周作人在国民党高等法院受审的时候坦言：“我们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可伪；政府可伪、教育不可使伪。因此苦心维持，以激发青年人爱国热情，抵抗奴化教育。”[1] 在1964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谈及就任伪职的动因，他又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2] 就是说，“教育”成为其就任伪职的出发点之一。事实上，周作人在就任伪职之后将“教育”的权力与文化精神的宣传结合起来了。周作人此类叙述的真实性不应怀疑。而且，不仅教育督办是统管教育界的职位，周作人正式就任伪职、接受的第一份聘书也是大学里的职位（1939年1月12日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结合前述两次讲演来看，周作人确实是在自觉地对沦陷区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教育。无独有偶，《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同样是一篇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为对象的讲演稿。

就任伪职的周作人在文化观念上并未臣服于日本占领者，并且利用教育行政资源向青年学生宣传自己的文化观念。他与日本文士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即存在于“儒家思想”的民族主义性质之中。

---

〔1〕 1946年7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周作人的笔录。引自“周作人研究”书系《国难声中》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2〕 见《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年出版。周作人所谓的“别个人”指缪彬。

二　思想问题与民生问题

日本文士中最早对周作人的“思想问题”提出质疑的并非片冈铁兵，而是哲学家谷川徹三（1895—1989）。地点是汪伪政权的“首都”南京，时间在片冈发言五个月之前的1943年4月初。这涉及到周作人提倡“儒家思想”的另一个文化背景——汪伪政府的傀儡文化观念。这种傀儡文化观念的具体执行者，就是伪中日文化协会。

伪中日文化协会成立于1940年7月，发起人为褚民谊，汪精卫担任名誉理事长，是汪伪政权配合“大东亚战争”的文化机构。1941年元旦，该会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中日文化月刊》，刊名为汪精卫亲笔题写。1943年元旦，即片冈铁兵“扫荡”周作人的八个月之前，汪伪政府考试院院长、伪中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江亢虎在《中日文化月刊》当年第一期发表了“本会两周年纪念演词”，题为《大东亚战争与中日文化协会之使命》。这篇“演词”在理解汪伪政权傀儡文化的本质方面具有代表性。在演说词中，江亢虎认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开始之后取得的胜利“为大东亚开一新纪元”，进而从文化的角度对“大东亚战争”进行定义，说：

> 在这胜利声中，和胜利以后的局面里，我却觉得我们文化人，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使命非常的特殊，责任格外的重大。因为大东亚战争，不仅是武力的战争，而实在是文化的战争，一方英美势力的驱除，象征着西洋文化的没落，一方南洋各殖民地的解放，表示着东洋文化的抬头。

他认为中日两国文化“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完全相同，这三分之二以上中日完全相同的，可以名为大东亚文化”。基于此，他提出了“大东亚文化四个原则”：第一是“大东亚文化是反唯物主义”——“精神是物质的主脑，物质是精神的工具，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第二是“反功利主义”，第三是“反个人主义”，第四是“反霸道主义”（即以东洋的“王道”反西洋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略加对比即可发现，这四项原则正与后来片冈铁兵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相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孔孟之道同样成为江亢虎的论据。在论述“反功利主义”的时候江亢虎说：“孟子说的：上下交征利，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真是一语道尽。大东亚文化可拿董仲舒两句话作代表，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论语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宋儒朱陆虽有异同，对此意见完全一致，这不但是君子小人的分野，而且是人与禽兽的关头。”这与周作人以“儒家文化”为中心“树立中心思想”、并将强调“生存”的价值表现出相反的价值取向。

江亢虎发表“纪念演词”三个月之后的1943年3月底4月初，伪中日文化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3月30日至4月4日）。日方向大会派遣了文化使节团，著名汉学家盐谷温（1878—1962）任团长，团员多为当时日本文化界名人。在4月2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日方使节团成员、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部长谷口吉彦说：

> 在东亚，我们都共同站在击灭英美的阵线之上，文化运动是战争运动，是思想战争。是文学、学术、艺术以及各方面的思想战争。中国古〔代〕学者有言：要打破山里的盗贼容易，要打破心里的盗贼则难。我们所听到中国情形，中国人崇拜英美思想很浓。除上海南京外，其他各地是否如是。〔略〕英美思想本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中

国古代学者讨论性善与性恶问题，欧美思想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可谓是性恶而造成此次的战争。但中国与日本之古来思想是善的。东方的精神主义对西方的物质主义，东方的灭私奉公主义，对西方的个人功利主义。这是东洋文化思想与西方文化思想不同之点。〔略〕希望中国有一定的决心，就是要打破英美的思想。

这种观点几乎是江亢虎“纪念演词”的翻版。无论是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文化思想战争”，还是反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强调灭私奉公，谷口的观点都与江亢虎的“四原则”相一致。没有根据认为谷口的发言是受到江亢虎的影响，决定着这种一致的，无疑是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积极协作这一根本出发点。

不过，谷口的上述观点招致了广东代表林朝晖的异议。林朝晖说：

关于如何击灭英美势力。我们中国与日本，同是东亚的大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的进步，很快的击灭英美的势力，我们中国受英美经济的压迫，思想的迫胁，一部分的人民，除生活问题外，不知思想与文化是什么？故以之击灭英美势力是很困难的问题。思想可支配战争，但在中国，生活可支配思想。我曾经询问一般人民，中国参战后有否感想，民众以为是影响于生活，至知识阶级方面之回答约可分为三种。一为英美思想之支配，因为英美到底不会战败，从而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一为中国前途担忧，一为民众的生活问题。对这三点，我认为第一点是交还租界，肃清英美思想势力。第二点是用政治势力来推动思想。第三点是民众生活之改善。语云，衣食足而知礼节，最先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日本是思想支配环境，而在中国是环境支配思想。

林朝晖在这里强调的“民生问题”正是周作人所谓“生存”的翻版。在这个意义上，林朝晖、谷口吉彦二者观念的对立与周作人、片冈铁兵二者观念的对立具有同构性。印证了这种同构性的，是日方代表、法政大学哲学教授谷川徹三对林朝晖的反驳。谷川徹三说：

> 广东代表所说的话，我很有些感觉，此次乘飞机到上海，途中曾阅周作人的中国思想问题。中国的思想只要安居乐业。但这思想就成问题，此问题之解决，本人之意在于此次战争之如何解决。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欧美说日本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其实日本在平安朝时代约有二百年的和平，在江户时代约有三百年的和平，此长时期的和平时代实为英美所无，中国方面的城墙很大很高，亦为从前常战争作防御的表现。此次战争，不是日本本身的问题，实是世界的问题。〔略〕总之，我们彻底认识此次战争意义，非决心迈进达到胜利不可。[1]

周作人就这样被纳入了讨论会的主题。当谷川徹三把问题与周作人联系起来的时候，“思想问题”具有了更广泛的普遍性。不仅如此，“思想问题”也是谷川徹三此次中国之行中思考的焦点，中国之行结束之后回到东京，他给《朝日新闻》写了一篇关于南京会议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回顾中日文化大会》。[2]

谷口吉彦、谷川徹三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和后来片冈铁

〔1〕 以上引文引自《中日文化月刊》第三卷二、三、四期合刊，1943年4月出版。

〔2〕 此文发表于昭和十八年（1943）4月20日《朝日新闻》。谷川徹三是一位东洋主义者，“七七”事变发生后三次到中国大陆旅游、考察，1940、1942年分别出版了《东洋与西洋》（岩波书店）、《东洋与西洋·续篇》（近藤书店），将世界历史置于东洋与西洋对立的框架中来认识。其子谷川俊太郎为日本著名现代诗人。

兵提出的要求完全相同，即要求中国人放弃物质生活需求、放弃基本的生存权以贡献于日本领导的“大东亚战争”。这种要求与江亢虎文化主张的一致性，意味着周作人与谷川徹三的对立亦即与汪伪政权“奴隶文化观”之间的对立。伪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的会议结束之后继续利用行政资源、借助体制的力量在沦陷区面向青年学生发起征文活动，宣传其“奴隶文化观”，以达到毒化民众思想、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的目的。[1]

事实上，谷川徹三的发言很快就为周作人所了解，并引起周作人的不满。华北沦陷区作家徐白林1943年8月下旬曾前往东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他的《夜访武者小路先生》一文有如下记述：

> 记得在开文学者大会前一二日，在一个宴会席，我曾经和先生同桌坐着，先生曾问我：
>
> “听说周先生因着谷川君的谈话而不满意？”
>
> 我回答是：
>
> “倒并不是吧。不过在第二期的艺文上，周先生有一篇文章是提到这个事情的。”
>
> “我听说这个事以后就告诉谷川君，他也大为吃惊，原来是新闻记者瞎记的，和他原来说的意思不同，谷川君也觉得抱歉。”
>
> “也并不成为什么问题吧。”
>
> “不过藉此能引起周先生多写文章倒也好。”武者小路先生说完了，笑了。

---

[1] 当年夏天，伪中日文化协会以“大东亚战争期内中国文化界应负之使命”和“决战下中国青年应有之觉悟”两个题目分别向大中学生征文，并将获奖文章刊载于《中日文化月刊》。见该刊第三卷八、九、十期合刊。

关于此事，我所感到的是文坛相互间的消息真可以算是灵通之极，谷川先生的批评，周老先生立刻能知道，而周先生的不满意，武者小路先生又不知如何也立刻就晓得。〔后略〕[1]

甚至身在东京的武者小路实笃都知道了周作人的不满，可见周作人的不满确实已经产生，谷川徹三的发言引起了连锁反应。不过，徐白林所谓“第二期的艺文上，周先生有一篇文章是提到这个事情的”恐为记忆之误。《艺文杂志》1943年第二期即为该杂志八月号，头篇为周作人的《关于日本画家》，文章并未提及谷川徹三。徐白林所指的应当是第一期（即七月号）的《艺文杂志》。该期为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周作人的《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此文亦未曾提及谷川徹三，但讨论的是民生问题和思想问题，而且文章结尾处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说明：

末了觉得又须加上一点蛇足的说明，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中国文学思想之一种观察，应用的范围自然就以中国为限。自然科学的定理世间只有一个，假如有了两个，其中之一必将证明为假，若在人文方面便可以容得不同，不好用了一条定例去断定一切，所以论中国的事情，其结论即使正确，其通行范围亦姑且限于本国，不当以此结论妄去应用于外国事情之上，亦不可以外国之结论拿来随便应用。

必须注意，此文本是1943年4月13日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讲演

〔1〕 引自《艺文杂志》1943年12月号（第一卷第六期）。

时的讲稿。发表讲演时伪中日文化协会的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九天，周作人正在南行途中（4月5日离开北京南下当月17日回到北京）。结合此间周作人的活动状况来看，可以认为他发表讲演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谷川徹三对他的批评，上面这段话是针对谷川徹三的批评而言。4月6日抵达南京的当天傍晚周作人曾去拜访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伪宣传部长的招待晚宴结束之后回到住所，又有樊仲云、王古鲁来访。褚民谊、樊仲云均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很有可能对周作人谈起会议内容以及谷川徹三的批评。不仅如此，4月9日下午周作人还应邀出席伪中日文化协会的座谈会。

武者小路实笃或者谷川徹三未必看到了所谓“新闻记者瞎记的”文章（当为《中日文化月刊》上的会议记录），即使看到也不懂中文，因此与徐白林谈话时所谓的“和他原来说的意思不同”只能理解为善意的回避与辩解。实际上，以当时日本国家意识形态为背景来看，谷川徹三对周作人及其《中国的思想问题》的质疑具有暗示性，这场未能充分展开的批判是片冈铁兵“扫荡”周作人的预演。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对立，决定着周作人与忠诚于皇国文化观的日本文士的冲突不可避免。富于戏剧性的是，南京会议结束之后谷川徹三与同为日本使节团成员的武者小路实笃旅游到北京，4月18日在八道湾与周作人见了面。

三 “片冈发言”的含义

1943年3月底、4月初的南京会议与8月下旬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是当年中日文化界的两个重要会议。不过，日本文士在南京是客人而在东京是主人，作为主人在发言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这也许是

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批评远较谷川徹三的发言激烈的原因之一。

片冈铁兵的发言在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会上提出，发言记录又是刊载于日本文学报国会会刊《文学报国》，这并非偶然。只有将“片冈发言”置于日本文学报国会及其会刊《文学报国》的背景上来考察，才能理解其含义。

关于日本文学报国会，日本学者樱本富雄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大东亚战争”中的文学家们》[1]一书有全面解说，这里仅作简要介绍。1936 年 7 月，日本内阁情报委员会成立。第二年 9 月，随着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内阁情报委员会升格为日本内阁情报部，三年后的昭和十五年（1940）12 月 6 日，情报部又升格为内阁情报局。内阁情报局作为统管战时文化事业和大小媒体的中央情报机构，其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搜集与实行国策之基础相关的各种情报、从事报道和鼓动宣传”，二是“依据国家总动员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处理报纸及其他出版物”。[2]日本文学报国会作为战时日本文学艺术家的一元化组织，是在内阁情报局指导下于昭和十七年（1942）5 月 26 日成立的。同时，该会的成立还与大政翼赞会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接相关。大政翼赞会是昭和十五年（1940）10 月 12 日在第二届近卫内阁主持下成立的国民统治组织，首相近卫文麿担任总裁，以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完成国家国防体制”为宗旨，强化一党专制，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6 月解散。昭和十六年（1941）12 月 8 日日本向美英宣战，激发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两周后的 12 月 24 日，大政翼赞会筹划的“文学家爱国大会”召开，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多达四百余名。就是这次大会提出了成立日本全国一元化文

〔1〕 青木书店 1995 年出版。

〔2〕 “情报局官制敕令”第 846 号。

艺家组织的决议。[1]

日本文学报国会作为具有特殊官方背景和时代背景的文化组织，其"会章"第二章"目的及事业"第一条开宗明义，曰："本会设立的目的在于：集结全日本文学家之共同力量，确立显现皇国之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皇道文化之宣扬。"从这种目的出发，会章第四条"本会为达成前条之目的从事如下各种事业"的第一条即为"确立作为皇国文学家的世界观"。从1942年11月开始举办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以及昭和十八年（1943）8月20日创刊的《文学报国》，都是该会的"事业"。《文学报国》创刊号上的"创刊辞"首先引用了会章第二章"目的及事业"的第一条，总结了该会成立一年多的工作，并且对一些作家提出批评，指出：

> 现在依然残存着醉心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迷梦、束缚于文学的国际性以及文化的自主性等等、不能摆脱过去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文学家。而且，如果发生那些文学家的思想动向与文学活动在达成"集结全日本文学家之共同力量"这一预定目的方面构成本会事业发展上的阻拦与障碍的情形，我们必须以本会的名义挺身排除障碍、开拓道路，以此向天下阐明本会成立的意义。[2]

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扫荡"，正是在上述背景上发生的。他在《扫荡反动权威——确立中国文学之请求》的发言中说：

---

〔1〕据内阁情报局第五部第三科（主管文艺的科）"社团法人日本文学报国会设立经过报告"。引自关西大学国文学会编辑的《国文学》第七十号，1993年12月出版。

〔2〕引自《文学报国》创刊号第一版。

> 余之议题虽为“中国文学之确立”，其实问题尚更狭隘，仅以中国和平地区内，基于渝方政权分裂下之中国特殊情形，而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吾人若不先行注意中国之特殊情形，即难透视中国之动态，吾人对中国代表诸君协力大东亚战争之热情与阐发大东亚建设理想之努力，自不胜敬仰。〔略〕关于此人的姓名，余尚不愿明言，总之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诸君及吾人建设大东亚之理想，系一种崭新之思想，亦即青年之思想，欲将东亚古老之传统以新面目出现于今日历史之中，确乎只有精神肉体两俱沉浸于今日历史中之青年创造意志，方能完成其艰难工作。〔略〕诸君之文学活动沿着新中国创造之线，然彼老大家则毫不考虑今天之中国呼吸于如何历史之中，被置于如何世界情势之下，唯其独自随意的魅力来丰富的表现，暗嗤诸君，而于新中国之创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为诸君与吾人前进之障碍，积极的妨害者，彼为在全非破坏不可之妥协的偶像，彼不过为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与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的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而已。〔后略〕[1]

这种批评是不点名进行的，因此批评本身具有某种模糊性。半年之后，当片冈受到周作人的追逼不得不进行正面回答的时候，便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 请你想起在改造社文艺杂志登载的大作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之一节，原文云，他们要求生存，他们生存的道德，

〔1〕 陶晶孙译文，引自1944年五月号《杂志》。

不想损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圣人那样损己以利人云云。这样说起，讲到乱的那一节话，当时鄙人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发表那篇演说，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只以此奉告，该文作者的先生当能立即觉到鄙人以何者为问题，为何者所棘刺也。读了《中国的思想》全文，熟读上述之一节，假如不曾感病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角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分组会议上，作那样的演说。假如中国人虽赞成大东亚之解放，而不愿生存上之欲望被阻害，即中国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思想成为一般的思想，则在此战争上中国之立场将何如乎。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慄然。不赌个人的生存之战争可能有乎？不牺牲个人之欲望而愿赢得战争既不可能，然则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或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处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文章之批评不可为文章之表面所眩惑，虽是平稳的言词，而在其底下流动之物，必可感知其出于平稳之上，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乎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1]

信中所谓的"只以此奉告"表明片冈对当时周作人思想状况的了解不限于《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

显然，片冈铁兵是遵照《文学报国》"创刊辞"的基本精

[1] 引自《知堂回想录》第一八二节。

神、以“皇国之传统与理想”为据对周作人展开批判。当他把周作人定义为“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与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的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的时候，周作人即成为《文学报国》“创刊辞”所批评的“醉心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迷梦、束缚于文学的国际性以及文化的自主性等等、不能摆脱过去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文学家”。以片冈铁兵的批判为标志，周作人与“皇国文学家的世界观”发生了直接的、对立性的关系。

片冈的发言揭示出周作人的“儒家思想”与“大东亚意识形态”之间的“反动”关系包含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大东亚战争的现实要求中国人抑制生存欲望、分担痛苦与周作人所强调的“要生存”（“仁”）之间的矛盾。片冈请求“确立”的中国文学乃是中国人压抑生存欲望、承担痛苦以配合大东亚战争的文学。第二层面是文化主导性问题，即在“大东亚”的框架中以何种思想为“中心思想”。片冈强调“建设大东亚之理想，系一种崭新之思想”，与周作人将“大东亚主义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的范围之内大不相同。这种批评从反面印证了“儒家文化中心论”的民族主义文化观性质。

比较而言，第二个层面的冲突涉及“大东亚共荣圈”内部一些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当时日本的扩张并非仅限于军事层面，文化的扩张同样在进行。追求军事霸权的同时，日本同样在确立文化的正统性与主导性。在古代臣服于中华文明、近代以来又受到英美文明冲击的日本，急于摆脱“文化附属国”地位，在文化上“长大成人”。在这个意义上，对军国主义的配合这种外因式的解释无法说明日本文化界人士配合战争行为的全部。文化侵略不仅构成了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一翼，甚至成为一种目的。前一章论及的佐藤春夫在战争中使用日本纪年法、在文化层面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合理化，就是来自日本文化界内部的“文化帝国主义”冲动的表征。日本文学报国会更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他忠实地执行了“皇国文化观”并将其付诸批评实践。周作人在给久米正雄的信中所言“鄙意发言者虽为片冈氏，唯其责任当由贵会负之也”[1]，完全符合事实。

如果说片冈对周作人的批判行为中具有某种个人性的话，那么这种个人性本身也显示了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对日本文人所具有的控制力——片冈是作为由普罗文学作家“转向”（改变思想方向）而来的帝国主义作家向“人道”发难的，这样，其发言在指向周作人的“生存”与“仁”的同时，也指向自己曾经有过的无产阶级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片冈铁兵是一位具有特殊经历和背景的日本作家，20年代中期曾经作为新感觉派作家及理论家活跃于日本文坛，20年代末期加入旧劳农党和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192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钢丝绳上的少女》以下层民众的生活为题材，表现出向普罗文学转变的征兆，192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绫里村快举录》则是直接取材于农村生活。1930年5月因第三次关西共产党事件在大阪被捕，一年后被判处两年徒刑。1932年4月入狱，第二年9月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随后出狱。1938年9月作为“笔部队”成员随军来中国，成为积极配合“大东亚战争”的帝国主义作家。1943年11月上旬“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通过了所谓的“大东亚宣言”及五项原则，日本文学报国会为配合此次大会组织作家用文学创作的形式宣传“大东亚宣言”及五项原则，片冈铁兵同样列名小说部执笔候选人。片冈对于周作人的批判作为其“转向”之后配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行为之一，表明了战争状态下日本文化的政治属性。周作人所谓“转向的人比

[1] 《一封信》，引自《杂志》1944年四月号。

平常人更为可怕，文人也不例外”[1]，揭示了片冈铁兵作为“转向”作家的政治化程度。[2]

周作人与片冈铁兵等人的冲突展现出中日两国文士“大东亚想象”的差异性。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曾经有过短暂的“亚洲主义时代”，但1924年底对北京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进行批判的时候公开否定了亚洲主义，说：“孙逸仙先生的主张我觉得很有道理，但他的亚细亚主义我不能赞同，因为这也是空的（若是外交上的辞令，那自然又当别论），我不是作反帝国主义的实际运动的人，但我的思想总是回到民族主义的路上来了。”[3]因此，他在十五年后迫于时局、重拾“大东亚”话语的时候，自然面临着第二次自我否定的矛盾。消解这种矛盾的方法，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东亚”思想的主体。在他此时的表述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大东亚主义思想”互相赋予对方以正统性。不仅如此，当年被他否定的孙中山也成为他“亚洲主义”的根据。日军攻陷新加坡的时候他在《东亚解放之证明》中说：“本来大亚细亚主义原是中国旧有的思想，远在四五十年前中国知识阶级恐惧西洋各国的侵略，主张学日本变法自强，联合日本，保全东亚，后来孙中山先生提出大亚细亚主义，即由于此，其根基是颇深远的。”[4]这里肯定的“孙中山”因为“儒家思想”的介入显然不同于1924年他所否定的“孙中山”。

---

〔1〕《知堂回想录》第一八二节。

〔2〕片冈铁兵作为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20年代末即受到中国作家的注意。刘呐鸥翻译的《色情文化——日本小说集》收录了片冈的《色情文化》，并以该篇篇名作为小说集的名称，第一线书店1928年出版。

〔3〕《外国人与民心》，载1924年12月9日《京报副刊》，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639页。

〔4〕《教育时报》第五期，1942年3月1日出版。

四 “儒家”的相对性

“思想问题”是1943年南京、东京、北京三地中日文化界的核心问题，而周作人则因“儒家思想”的倡导成为焦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种以“生存”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既不同于汪伪政权以否定中国人的生存权为前提的傀儡文化主张，又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皇国文学家世界观”相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抵制日伪奴化教育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儒家思想”倡导者的周作人是一位“文化抗日”者。正因为如此，对他的批判才几乎是同时发生在南京与东京两座城市。无论是1946年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还是在1949年写给中共负责人的信中，周作人都以倡导“儒家思想”为据为自己的汉奸罪行辩解，并非强词夺理。周作人受审之时，沈兼士、徐祖正等约七十位文化界人士向高等法院呈词，为周作人辩护，亦将围绕“思想问题”的冲突作为周作人“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的证据。徐祖正等人甚至说：“观此，周氏既被伪组织所歧视，复被敌寇目为潜在之敌人，由此可证周氏未通谋敌国、危害国家委系属实。”〔1〕建国后某些研究者对于周作人之文化抵抗的简单否定，显然不符合谷川徹三、片冈铁兵等具有军国主义意识的文化人的实际反应。〔2〕

不过，如果因此全面肯定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倡导，那又将问题简单化了。日本侵略者的“不仁”与中国人的“生

---

〔1〕《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引自“周作人研究”书系《闵难声中》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2〕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一文中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三期。

存"之间的冲突以及日本文士的拒斥在一般的意义上证明着周作人"儒家文化中心论"的民族主义文化观性质，却并不涉及"周儒"（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把周作人宣扬的"儒家思想"称作"周儒"）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问题。以周作人的就任伪职为背景解读"周儒"的内部结构并考察它是如何发挥功能的，问题的另一面就会暴露出来。

对于40年代的周作人来说，"儒家"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年代中期，他就通过对"儒家"、"儒教"、"萨满教"等概念的区分来强调"儒家"的价值。[1]40年代初期，周作人在阐述"儒家"概念的时候继续表现出将这一概念相对化的倾向。这相对化主要采取了内部的拆解与外延的扩大两种形式。他在1940年所作的《道德漫谈》一文中说："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并声称这种矛盾态度来自"儒家的矛盾"，认为"儒家的矛盾"并非全由后人造成，"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2]。这就意味着周作人所肯定的"儒家"必然是分裂的、局部的、片面的"儒家"。同时，泛化"儒家"成为周作人将"儒家"相对化的另一种形式。在写于1942年底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他一方面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中心思想"，"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同时又指出："盖在没有儒这名称之前，此思想已经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为专业之后也还标榜儒名，单说儒家，难免混淆不清，所以须得在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种儒家思想。"在《我的杂学》（写于1944年上半年）中他说得更明白："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

〔1〕相关问题可参阅《青浦子爵之特殊理解》、《萨满教的礼教思想》、《乡村与道教思想》等文章，均收入《谈虎集》下卷。

〔2〕引自《药堂杂文》，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出版。

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周作人通过消解“儒”固有的规定性，获得了对“儒”进行重新组合、重新定义的权力。

如周作人自己所强调的，他所谓的“儒家思想”“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种儒家思想”。他在一系列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引录《孟子》卷四“离娄下”等典籍、讲述禹稷“己饥己溺”的故事，原因即在于此。周作人同时将这种思想表述为“仁政”或“为民”。他屡次将禹稷“己饥己溺”的故事与《孟子》卷一“梁惠王上”、阮伯元《论语论仁论》关于仁政的论述并列起来，就是基于这种逻辑。

周作人“儒家思想”的建立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分离与取舍完成的。他在《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这篇假借“文学”之名讨论政治道德的文章中说得明白：

> 关于政治道德中国本来有两种绝不同的思想，甲种早起，乙种后来占了势力，可是甲的根本深远，还时常出现，于是成了冲突。简单的用假定的名称来说，这可以说甲是一切都为人民，乙是一切都为君主的主张。

进行这种区分之后他褒前者而贬后者，并将《孟子》“尽心下”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其主要论据。

那么，周作人所谓“为君的思想”具体所指为何？在1945年底所作的《道义的事功化》一文中他再次论及“两种思想”，指出：

> 为君的思想可以三纲为代表，据《礼记正义》在《乐记疏》中引《礼纬含文嘉》云：
>
> “三纲为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在孔子的话里原本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关系是相对的，这

> 里则一变而为绝对的了，这其间经过秦皇汉武的威福，思想的恶化是不可免的事，就只是化得太甚而已。这不但建立了神圣的君权，也把父与夫提起来与君相并，于是臣民与子女与妻都落在奴隶的地位。

这样，周作人通过对"神圣的君权"以及由此衍生的父权、夫权的否定，将儒教道德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忠"、"孝"两种观念从其倡导的"儒家思想"中分离出去。换言之，"周儒"是剔除了"忠"、"孝"两种价值观的"儒家思想"。这种剔除与周作人对宋儒的一贯否定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对于已经就任伪职、在行政权力的层面上背叛了国家政权的周作人来说，决定着这种剔除的个人因素一目了然。"忠"的缺席为他的附逆留下了道德空间，对于他来说具有心理补偿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的建立成为周作人自我安慰、自我辩解的一种形式。于是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分离具有了虚伪性。这种虚伪性是发生于"周儒"的内部。

在异国入侵将"民"高度国民化、并且外在性地将"君"与"民"一体化的状况下，"民"与"君"的分离、"民"与"国家"（与君一体化的国家）的分离——这二者具有相通性。而"民"一旦被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并被置于入侵者的统治下，"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在日本入侵者不是实行"仁政"而是压迫、杀戮的情况下，缺乏实践性与可能性的"儒家思想"（"为民的思想"）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思想，甚至包含着功能转化的危险性——在接受现存异国统治秩序的情况下求"仁政"，意味着只要有了"仁政"，异国的统治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认为周作人提倡"仁"是向日本侵略者献"治安策"、"于皇军的'长治久安'自

然也是有利的"，[1]张泉认为周作人提倡"儒家思想""实在有着维护既存统治现实的用意"，[2]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治安策"层面与"民族主义文化观"层面的并存，表现出"周儒"的两面性。

40年代初作为"儒家思想"提倡者的周作人所具有的悲剧性是多层面的。面对日本入侵者，他拿起"儒家"的旧武器来进行文化层面上的抵抗，但与制度层面上的妥协、合作相比，这种抵抗软弱无力甚至有可能被后者遮蔽、被后者赋予相反的意义。当他对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进行再生产的时候，日本人的统治现实与周作人本人身份的分裂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分裂、暧昧、包含着歧义与矛盾的思想。在"国家"以及与此相关的"忠"等伦理价值被从"儒家思想"中剔除之后，"儒家思想"本身便在被相对化、片面化的过程中变形，向"奴隶思想"接近。文化的被动性以及文化面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奈，在周作人的"儒家思想中心论"的倡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片冈铁兵等帝国主义作家面对的周作人也许是一个缺乏真实性与现实性的"文化敌人"。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半年前的1936年11月，周作人曾经指出："一盘散沙似的中国民族近来略略养成了一点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这都是受日本之赐。"[3]然而，在40年代有关"儒家思想"的论述中他恰恰回避了最一般性的国家、民族观念，回避了人的制度属性，将人片面化为文化、思想的符号。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是其长期怀有的"文化国家观"。[4]

---

〔1〕《周作人传》46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2〕《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78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3〕《谈东方文化》，初载1936年12月2日《立报》，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724页。

〔4〕关于周作人的"文化国家观"笔者在前引《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一文中亦有涉及，这里不再重复。

五　民族意识的再生产

尽管"周儒"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但"儒家文化中心论"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文化观性质，使得相关事件成为当时沦陷区某些中国文化人确认自我身份、反思新文学传统的契机。在日军占领的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地下共产党人，就是在此时介入了周作人与片冈铁兵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潘汉年领导的地下党组织主持的《新中国报》、《杂志》等报刊对于相关事件的评论与报道。

1944年4月11日的《新中国报》发表了社论，题为《所望于批评者》。社论说："今日在中国人的立场坦直实言，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即中国人今天可能单独负责做事的范围殊狭，从而所能产生的责任感亦自薄弱。船津辰一郎先生最近曾批评中日两国国民的异同谓：'日本国民对于国家责任感，比较中国国民普通而热烈。'这是事实。但中国人对于国家是否当真缺少责任感，这是值得慎重细味的问题，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条件自然是立足于天下乃匹夫的天下。我们深信苟中国而得完成中国人之中国的理想，则其责任感必然自行产生，因此希望每一个爱护中国的人士，于其善意的批评与指示之外，能于中国得以发挥其创意与责任感的一点上，多多尽其协力。"[1]社论撰写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在日本入侵的状况下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几乎是与这篇社论的发表同时，四月号《杂志》（4月10日出版）"文化报道"栏刊载了三条与周作人有关的消息。第

[1] 引自1944年五月号《杂志》。

一条为即将在5月成立的中国文学协会拟请周作人担任会长，第二条为周作人向沈启无发出“破门声明”，第三条内容如下：

> 知堂老人为去年在东京召开之东亚文学者大会席上片冈铁兵大骂中国之老作家事，于三月二十日函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请转告片冈，说明演说中所谓中国老作家是否即指知堂老人，以及此项演说是否由于某示意。知堂函中并声明请片冈“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答复”。

随后的五月号《杂志》编辑了一组“关于老作家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片冈发言的中文翻译，周作人的《破门声明》、《一封信》、《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一封信的后文》等五篇相关文章，还有陶晶孙的《关于大东亚文学者》，以及《新申报》、《大陆新报》对这一事件的讨论，《新中国报》的社论亦在其中。该期“编辑后记”说明道：“占本期不少篇幅的是一个月来‘文坛动态’一栏，搜集了‘中国文坛之现状座谈’及‘老作家问题’的许多文献，因为以上两端是本年文坛要事，所以不惜以十余页的地位来刊载。”四十年过去之后的1986年，《新中国报》、《杂志》的这些举动与潘汉年等地下共产党的关系才被披露出来。[1]地下共产党是在民族意识这一点上与已经“附逆”的周作人达成了一致，并推动了此种民族意识的传播。

---

[1] 参阅沈鹏年、杨克林的访谈《袁殊同志谈周作人》，原载《文教资料》1986年第四期，收入“回望周作人”书系《国难声中》。访谈结尾处写道：“袁殊同志说，当年《新中国报》和《杂志》上公开反击日本片冈铁兵、声援周作人的斗争，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

陶晶孙的《关于大东亚文学者》一文原载4月16日《新申报》。他在文章中不仅要求"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并且呼吁中国作家继续进行新文学运动，说："五四运动以来，文学界的热闹，总算可以算中华盛事，白话文呀，新小说呀，笔战呀，各会各社各派各志各刊，鸳鸯蝴蝶，大小报，书局商店飞絮销。不过静心一想，五四运动当初的志愿，白话文学的推销，应该走向我同胞民众去使他们之中产生许多读者和作者，白话文学成为吾全民众之文学，这些工作现在完全停止，虽说因为有外部牵累，使我不能进行，不过这也免不了文士们之不努力。""我希望我们同志不要忘记培养新文学，培养新文学不要忘记叫谁来培养。"[1]

"扫荡反动权威"事件在1944年上半年的日本文化界同样引起了关注。日方除了片冈铁兵的回复之外，武者小路实笃和长与善郎也受文学报国会之托写信给周作人表示安慰。日方请实笃和长与二人写信可谓用心良苦，因为此二人均为白桦派作家，与周作人有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实笃在信中说："今天受人之托写信。如果是你的事情，日本人最先想起的是我，所以虽被委以棘手之事，对此我反而感到光荣且感自豪。""我想我比其他人更了解您的心情，亦多有同感。""这次的事情事实上是你胜了，所以你如果改换心境、为了中国的年轻作家、为了中日两国的文化积极工作，我将感到欣喜。"[2]他们当年本是共同怀有以新村为标志的人类主义理想的"同道"，如今却要为"思想问题"的分歧被动发生联系，这也象征性地标明了中日现代作家从"共感"转向"分离"的现实。

表面看来确如武者小路实笃所说，是周作人获得了这场冲

[1] 原载4月16日《新申报》。

[2] 引自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文献一束"，筑摩书房1978年出版。

突的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毋宁说，中日两国文化人的思想冲突仅仅是被搁置了。暗示出这种“搁置”的，正是1944年五月号《杂志》的“一月来文坛动态”专栏。

“文坛动态”专栏共有两项内容。“关于老作家问题”的一组文章之外，是“中国文坛之现状鼎谈会”的谈话记录。“鼎谈会”是由《大陆新报》主办，参加者为陶晶孙、内山完造和草野心平。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座谈又涉及“思想问题”。主持者在座谈中说：

> 我以为中国浪漫精神的勃兴，就目前的现实考虑，当然非以汪先生的理想为中心不可。现在上海的文学者们，于其文学根底的精神中，怀有怎样的悲愿和理想？中国文学活动的中心精神是什么？颇愿究明。唯有明白了之后，彼此始能反省觉悟，进而作建设性的交流。可是现在我们都不大明白，这是我们着急的所在。

《大陆新报》为日系报纸，座谈是用日语进行的。此种言论期待的显然是江亢虎宣扬的精神——那种精神本是所谓“汪先生的理想”的延伸。对于希望明白“中国文学活动的中心精神”的日本人来说，周作人倡导、并已遭到日本文士的质疑和批判的“中心思想”（亦即这里所谓的“中心精神”），在这里被回避了。周作人所谓“不为种族地域所限”的儒家思想在这里依然受到限制。

中国和日本尽管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但存在着根本的思想差异。1940年，周作人在倡导儒家思想的同时曾经撰写《日本之再认识》，对此进行阐述，说：“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本来的神道，这一直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

情，上层思想界也包含在内。”[1]发生在战争状态下的有关“儒家思想”的冲突，正是起因于这种思想的根本差异。在当时国家对立的背景下，力图建立文化正统性的日本文士们完全不可能怀着宽容的文化态度对儒、佛、神道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调和。这样，所谓的“大东亚文化”如果不是“日本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的代名词，就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层面。

---

[1] 此文作于1940年12月27日，初发表于1942年1月《中和月刊》三卷一期。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

第 5 章

自画像中的他者

——太宰治《惜别》研究

1906 年 3 月，26 岁的鲁迅（当时的名字还是周树人）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回东京，带着藤野严九郎先生亲手修改过的解剖学笔记和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在鲁迅一年半的仙台生活（1904 年 9 月至 1906 年 3 月）中，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1874—1945）成为他最为珍贵的记忆。39 年过去，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在进行的 1945 年初，日本作家太宰治（1909—1948）以鲁迅的仙台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小说题目就是《惜别》[1]。这样，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仙台留学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转换为战时日本的文化产品。

《惜别》是太宰治应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而创作的，这个事实使作品具有成为“御用小说”、“国策小说”（即为了配合国家政策而创作的小说）的可能性。不过，太宰治本人在《惜别》初版本“后记”中说：“〔这是一本〕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面的请求我也总有一天会尝试创作、

〔1〕 朝日新闻社 1945 年 9 月 5 日出版。

搜集材料和构思早就在进行着的小说"；"我必须在此说明，这件工作完全是出于名叫太宰的一个日本作家的责任而自由完成的，无论是情报局还是报国会，都未曾说过一句制约我写作或者提醒注意、使事情复杂化的话。而且，我完成此书之后提交官署，原封不动、未遭任何修改即获通过。也许应当说朝野一心吧，这决非是我个人的幸福"。这种表达与作品创作的外部条件、创作过程有背离之处，未可全信，但太宰本人的具体状况也证明这段话表达了部分真实。就是说，战争末期鲁迅在《惜别》中的复活是由"公"的因素（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私"的因素（太宰本人的创作冲动）共同促成的。在这一"复活"过程中，外在于鲁迅的"日本"和"太宰治"必然内在化于《惜别》的鲁迅形象之中，从而导致鲁迅被重塑。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文化经典，在被重塑的过程中势必对"日本"和"太宰治"的话语权力构成制约——即太宰治无法随心所欲地"塑造"鲁迅。

"日本—太宰治—鲁迅"三者构成了一个具有互动关系的文化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东亚、国家、作家的自我、鲁迅的文化身份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本章试图对此进行考察。

一　抵抗与认同的二重性

昭和十八年（1943）11月5至6日，日本政府主导，汪伪政府、伪满洲国、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等六方代表出席的"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帝国议事堂（即现在的国会议事堂）召开，[1]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该宣言认为"大东

[1] 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S.C.鲍斯是作为观察员出席。

亚战争”发生的原因在于“美英为了自己国家的繁荣压迫其他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对于大东亚采取贪得无厌的侵略和榨取，企图实现其将大东亚变为自己隶属的图谋，以至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安定的基础”，号召“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将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期待着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建设大东亚，进而确立世界和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下“五项原则”：

> 一、大东亚各国协同确保大东亚之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
>
>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自主独立、奉献互助敦睦之果实，确立大东亚之亲和；
>
> 三、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其传统、发扬各民族之创造性、弘扬大东亚文化；
>
>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的前提下紧密合作、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大东亚繁荣；
>
> 五、大东亚各国积极发展与各国之友谊、废除人种歧视、加强文化交流、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进步。[1]

此前一年半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积极配合这次大会，筹划将该宣言与“五项原则”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向各位作家发出了请求，并承诺提供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十分优越的条件——支付采访调查费和稿费、提供印刷用纸等。太宰治作为知名小说家自然成为这一文化任务的承担者之一，1944 年 1 月底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文学报国会分派了将大东亚五大宣言小说化这一困难工作，我想这也是为了国家，现在暂将其

〔1〕《大东亚共同宣言》，同盟通信社出版部昭和十九年（1944）4 月出版。

品的出版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二十天之后的1945年9月5日。

从文学报国会与《惜别》创作的关系以及《〈惜别〉之意图》来看，太宰治确实是作为日本军国政府的“御用作家”进入创作过程的。但是，在《惜别》中，太宰治从不同角度颠覆了这种“御用作家”身份与官方给定的“亲和”主题。

这种颠覆首先是通过小说人物田中卓对同为小说人物的“记者”的否定完成的。

“这是在日本东北地方某村开业的一位老医生的手记。”——《惜别》是这样用全知角度的叙事开头的。显然，这个角度的叙述者是作家太宰治本人。不过，在这个仅有一句话的开头之后，叙述角度立即由“全知”转换为“自知”——即通过四十年前与鲁迅同班并密切交往、现已垂垂老矣的老医生田中卓之口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田中老医生之所以开始回忆、写记录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故事的“手记”，是起因于当地某新闻社记者的来访。几天前，当地新闻社的一位胡须满面、脸色灰暗的中年男记者前来就留学仙台医专时期的鲁迅进行采访，表示要写“日支亲善之美谈”，“为了东洋民族之总亲和，以之作为新年读物”。元旦过后，当地报纸果然开始连载那位记者以老医生忆旧的形式撰写的《日支亲和之先驱》。记者的报道引起了田中老医生的不满，老医生说：

> 那里出现的周先生、恩师藤野老师以及我本人，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像是别人似的。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关紧要，但是，看到恩师藤野老师、周先生被写得与我心底的影像完全不同，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痛苦。〔中略〕现在，只是对藤野老师、周先生感到十分抱歉，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即将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也未尝不可的年龄，如今我认识到，把心底的影像准确地描画下来传达给后人，并非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我倒也并不是为了给那家

报纸连载的文章《亲和之先驱》泼冷水。那种怀有社会的以及政治性意图的读物，用那样的写法也是不得已吧。[1]

这段描写中显然包含着政治讽刺因素。关于这一点，早在70年代初神谷忠孝就指出，《惜别》用“胡须满面”、“脸色灰暗”、“咄咄逼人的语调”之类的表达对“记者”进行非正面的描写“包含着太宰治对大东亚会议的消极批判”。[2]80年代浦田义和表达了类似的认识，指出：“将此新闻记者解读为情报局大概不会错”，“从这里能够读出作者‘我’的位置与对情报局的抵制”。[3]确实，太宰治要叙述的是不同于“怀有社会的以及政治性意图的读物”的鲁迅故事。

将新闻记者看作情报局的化身当然有根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新闻记者”正是借助太宰治本人成为情报局的，因此同时也是另一个太宰治。在新年到来之前带着文学报国会的介绍信前往仙台进行实地采访的，不是别人，而是太宰治本人——这位当时三十六岁、面色憔悴的男士。因此，老医生田中卓对记者的拒绝实际上是在太宰治自身的精神世界内部发生的——个人性的太宰治对作为接受官方创作指令的太宰治的拒绝。这样，小说开头处叙事角度的转换（“记者”向“田中卓”的转换）就并非仅仅是小说技巧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太宰治试图将对鲁迅的认识从官方视角转向民间视角，从外部视角转向内部视角——即从“记者”的国家意识形态视角转向“老同学”的个人视角。所以，当“记者”因为当年的周树人后来成为大文豪而欲将其作为“日支亲善之美谈”的主人公

---

〔1〕《惜别》出版之后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本书的引文为引用者所译，译自《太宰治全集》第七卷，筑摩书房1976年4月20日出版，后不另注。

〔2〕神谷忠孝《〈惜别〉》。此文写于1973年10月，引自《作品论／太宰治》，东乡克美、渡部芳纪编，双文出版社1974年6月初版。

〔3〕《太宰治——制度·自由·悲剧》112页，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年3月出版。

时，“老医生”立刻说：“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即使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尊敬他。”显然，对于《惜别》来说，“当事人的手记”这种形式本身不仅仅具有形式意义，同时具有思想意义。

在《惜别》的具体描写中，对官方给定的“亲和”主题的抗拒采取了讽刺性的形式。就客观事实而言，清国留学生鲁迅、日本教授藤野先生与日本学生“我”这三者的亲密关系在逻辑上适宜于表现官方给定的“东亚之亲和”这一主题（事实上它也确实包含此种因素），然而，太宰治却将这种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界定为三人由语言的不自由而生的自卑，从而将这种关系卑俗化、相对化。在《惜别》中，藤野先生讲一口难懂的关西土话，出生在东北某小镇、满口方言、寡言少语的“我”（田中卓）几乎因为方言问题发生心理障碍，鲁迅身为外国人日语更难免磕磕巴巴。“我”这样解释自己与青年鲁迅和藤野先生三者的关系：

> 〔藤野〕老师是一口浓重的关西土话，尽管为了掩盖似乎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是，连外国人周先生都能听出那种特别的语调，那么讲课的时候依然是羼杂着关西土话的。这样看来，后来这位藤野老师与周先生、我三个人结成的亲密同盟简直不过是日语不标准者气味相投的结果。这样一说心中凄惨起来，但是，那也许是太不严肃的推论。

太宰式的幽默、讽刺与阴暗在这段描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段描写中，藤野先生、周树人、“我”三者的国籍问题被语言问题消解，于是国家之间的“亲和”同时被消解。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太宰治对于官方给定的主题的拒绝是相对的。太宰治尽管表达了上述政治讽刺态度，但最终并未否

定、而是接受了“东洋”这一概念。他在将自己与青年鲁迅、藤野先生三者的“东亚友好关系”卑俗化、相对化之后，又在这种关系中发现出新的意义。“我”（田中卓）这样说：

> 事实上，在那之后，我们三人的同盟中有过对于超越日语不自由小组之观念、超越“对劲儿”的某种宏大之物的信任和追求，但此种宏大之物为何物？我实在不太明白。是所谓的互相尊敬？是邻人爱？或者应当叫做正义？不！我觉得是将那各种心情全都包含在内的某种隐隐约约的、更大的东西。或许，藤野老师常说的“东洋本来之道义”与其相符。实在是不太明白。

这里对于超越“语言自卑”之上的“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肯定，与“大东亚”观念发生关联并且获得了很大程度的一致。在后来的描写中，太宰治甚至让藤野先生表达了“我认为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的观念。

一方面对官方给定的“东亚亲和”主题持拒绝态度，一方面在基本倾向上认同了“东洋”的概念。这是一种矛盾的、二重的态度，太宰治游移在这两种态度的夹缝之中。否定了官方给定的“独立亲和”之后从个人性的视角叙述“东洋”，意味着太宰的“东洋”具有更多的私人性与自发性。他在《惜别》中使用“东洋”这一概念而没有使用“大东亚”的概念，或许暗示了这种抗拒与自主性。太宰治是在另一层面上追求“鲁迅的真实”、进而建构“东亚”的。

二　对待中国的态度

不谙汉语亦未曾到过中国的太宰治为了创作《惜别》，开

始全面了解鲁迅与中国人。如前所述，阅读《大鲁迅全集》、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以及杂志《东亚文化圈》等成为他了解鲁迅与中国人的重要途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研究专家实藤惠秀（1896—1985）有如下回忆：

> 太宰治的小说《惜别》由朝日新闻社出版是在1945年9月5日。
>
> 在此大约半年之前我经常有机会与作家小田岳夫先生见面。有一次，二人走在银座，看到有“国民酒场”的广告牌挂出来，便急忙去排队。等了很久之后，得到的不是一壶清酒，而是一杯葡萄酒，两个人面面相觑，大失所望。
>
> 小田先生多次说：“太宰为了了解留学生的事情，想见你。”“那就见吧。”尽管答应了，但是忙于监管勤劳动员、到疏散地去看家人，最终拖了下来。
>
> 那时，我应杂志《东亚文化圈》的请求，将《留日学生史谈》在每一期杂志上连载。这虽然没有达到写作有信心的《留学生史》的程度，但配以完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之后得到的材料，试图写成轻松的读物。集中精力构思《惜别》的太宰治似乎是爱读此作。[1]

太宰治经过努力对中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关于当时的情况，从1942年前后开始与太宰治交往的菊田义孝有这样的回忆：“太宰先生为了写《惜别》，好像查阅了有关支那的各种材料，那时候他开玩笑似的说：‘我最近可是成了了不起的支那通’。我想，可以说他这样在查阅中国思想等资料的过程中，

---

〔1〕《中国留学生史谈》“后记”，东京·第一书房1981年5月出版。

出版，同时也翻译为支那语。”[1] 可见出版一方也是明确地将读者设定为中国人。这种自觉的“读者意识”尽管与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背景与文学报国会的基本构想有关，但主要还是由太宰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惜别》是一部为了翻译成中文而创作、出版的小说。

“不卑视中国人”的立场与期望中国人“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的创作意图，决定着太宰治对待鲁迅、对待中国的基本态度——这就是藤野先生表达的那种包容了互相尊敬、邻人爱与正义等内容的“东洋本来之道义”，以及藤野先生在教诲田中卓的时候所说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欺侮支那人。仅此而已”。这种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惜别》把握鲁迅的方式与把握中国的方式。

《惜别》中的青年鲁迅最初是以怀着自卑感的孤独者的形象出现的。入学不久他独自一人乘船前往仙台附近的旅游胜地松岛旅游，自称没有故乡、飞来飞去的候鸟，甚至刚刚与他相识的日本同学田中卓也立刻意识到“这位留学生好像十分喜欢‘孤独’一词”。青年鲁迅的孤独与自卑并非仅仅是个人性的情绪，而是国家、民族地位的折射，因此他与田中卓之间才有如下的对话：

> “您家乡是哪里？”我〔田中卓〕坦率地问。
>
> 对方露出奇异的笑容，无声地看着我的脸。我感到几分茫然，再一次问道：
>
> “是东北吗？是吗？”
>
> 对方的脸色突然不高兴起来。
>
> “是支那。您不会不知道！”

---

〔1〕 6月26日致菊田义孝，引自《太宰治全集》第十一卷。

“啊啊。”〔略〕

“今后好好相处吧。支那人，您讨厌支那人吗?”稍微有些脸红，一边笑一边说。

这种描写体现出太宰治对于“支那人”自卑感的深切体察。在近代以来持续侵略中国、蔑视中国的日本社会，对于“支那人”之自卑感的了解应当是日本人的一种常识，但太宰治的了解无疑与其对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以及实藤惠秀相关著述的阅读有关。在《藤野先生》中，“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以致招来日本学生的怀疑。实藤惠秀的《日华学堂之教育》一文，则有早期中国留学生上街被日本儿童围呼“チャンチャン”(蔑称，一说意为“猪尾奴”)的记述。[1]

关于给青年鲁迅的“支那人劣等感”以直接刺激的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惜别》均有叙述。不过，太宰治对事件的结果采取了与鲁迅的记述不同的处理方法——写匿名信的学生干事矢岛成为忏悔者。作品这样叙述：

藤野先生委托矢岛君查找嫌疑人，并嘱咐他今后照顾周先生。也许是矢岛君毕竟拥有可以称作东北人道德中特有的洁癖性这种素质，或者是从他信仰的基督教中感悟到了反省的美德，忽然哭起来，坦白说写那封信的人就是他，对这次愚蠢的误解深表歉意，提出辞去干事之职。

随后，这位矢岛直接前往鲁迅的住处向鲁迅道歉。叙事者田中

〔1〕此文刊载于《东亚文化圈》第三卷二期，后来成为《中国留学生史谈》的第三章。这一期《东亚文化圈》经小田岳夫之手寄到太宰治手中。参阅前引《中国留学生史谈》“后记”。

卓不仅用矢岛的忏悔消解了鲁迅的劣等感，还对矢岛作了如下评价："后来试着与那位被误解为乡村公子的矢岛君相处，也只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如周先生何时就仙台人所做的批评，仅仅是'怀有东北大诸侯的责任感，固执己见'"；"我甚至想，公然给周先生写那种极不合适的信，决非认为支那人劣等、表示侮辱，相反，那实在是包含着对于支那俊才的敬畏心情"。另一位在矢岛之前担任干事、怀疑鲁迅给俄国人当侦探并进行监视的津田宪治，最终也被太宰治叙述为"最爱周先生的人"。在为鲁迅举办的小小送行会上，津田宪治唱着歌突然转身痛哭起来。送别会是在田中卓的住处举办的，参加者除了田中卓、房东及其十岁的女儿，就是矢岛与津田。如果说送别会是青年鲁迅仙台留学生活的结束，那么《惜别》中的送行会则赋予了鲁迅的仙台生活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这种构思的用意何在？结合《〈惜别〉之意图》与太宰本人对鲁迅自卑感的认识来看，只能认为，太宰治是用这种方式抚平青年鲁迅心灵的创伤。现实生活给青年鲁迅造成的心灵创伤，在太宰治的虚构中被抚平。

太宰治是将鲁迅作为中国人来界定的，他对于鲁迅的友善态度自然同时表现为对待中国的态度。他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同，就是基于相同的心理结构。对鲁迅的友善与对三民主义的认同，构成了太宰治"中国情结"的两个基本层面——这两个层面在《惜别》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惜别》中的青年鲁迅被塑造成"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与田中卓住在松岛旅馆的时候，鲁迅对田中谈起清末中国，说："义和团之乱不仅使列强各国，甚至使支那民众看清了清朝的无能。为了保持支那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灭清兴汉的革命——这种思想澎湃而起，先前流亡海外的孙文已经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以之作为支那革命的旗帜指导国内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也多半成为'三民主义'的热烈信奉

者";"那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之中,我本人最容易理解的是民生这一条。总是在自己眼前浮现的,是自己少年时代三年间那悲惨的身影。为了治好父亲的病每天来往于当铺柜台和药店柜台之间,相信自称名医的骗子的话,转来转去四处寻找平地木与原配的蟋蟀之类"。当青年鲁迅被写成"三民主义的信奉者"的时候,太宰治对青年鲁迅的善意与其对三民主义的认同重叠在一起。在《惜别》中,不仅是鲁迅,那位自命不凡的日本学生津田宪治也是孙中山的赞美者。他对田中卓侃侃而谈:"日本政府,对于这些留学生的革命思想,现阶段嘛,好像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形式,可是,日本民间的义侠之士,主动支援这场运动。你,可别吃惊!支那革命运动的领袖、名叫孙文的英雄,早就隐藏在名叫宫崎什么的日本侠客家中啦。孙文,记住这个名字为好!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听说有狮子的风貌!只要是这个人说的话,留学生也是全部听从!绝对信赖。"[1]

更有甚者,藤野先生在太宰治的导演下也认同三民主义、主张"支那之保全"。这样,三民主义便获得了明确的现实政治性。藤野先生是这样说的:

> 家乃不可思议之物。那个家庭如果说是地方名门有些夸张,嗯,是当地有历史的家庭。而且,到了现在似乎依然受到当地人的信赖。我想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个人可以各自展示自己的面貌。关于支那的革命思想我知之不深,不过,我想,那叫做三民主义的,是建立在民族的自决——不,或者可以称作自愿的那种东西之上的。说到民族自决,难免礼貌、冷淡的感觉,自愿是为了家庭兴旺最

[1] 这里的宫崎指宫崎滔天(1871—1922),宫崎当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 值得高兴的现象。我希望是各民族历史的开花结果，并不需要我们事无巨细管闲事。几年前东亚同文会成立仪式在东京的万世俱乐部举行——当然，这也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情——那时候，近卫笃麿公被推为会议主席，进入审议该会的目的、纲领的议程，革命派支持者与清朝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相对峙互不相让，一时间让人觉得该会会因此分裂。那时候，主席近卫笃麿公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主张支那革命的高见也罢，支持清朝防止列强分割的高见也罢，毕竟是对于他国的内政干涉，于本会之目的无助。但是，双方高见之目的，均在支那之保全，故此，本会以"支那之保全"为目的如何？严肃的发言吸引了满场听众，两派对此均无异议，在一片喝采声中目的获得通过，从那以后成为我国对支国策。我们在此之上不是也没有什么需要多说的了吗？

这里对于民族自决、自愿以及"支那之保全"的强调，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可以理解为对中国人愿望和中国领土完整的尊重。藤野先生本质上是太宰治理念的代言人，因此三民主义成为太宰治理解的中日关系的基点。由此看来，藤野先生那句"不要欺侮支那人"意味深长。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观，它是太宰治理解的儒家道义和基督教精神的通俗化、具体化。川村湊认为"这里没有任何与中国人、日本人之关系相关的积极性的东西。在日中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只能为中日两国的关系准备出这样的答案，这无非显示了太宰治中国观、'大东亚'观的极端贫弱"[1]。得出这种结论，显然是因为川村湊没有认识到这句话背后存在着的伦理精神。

---

〔1〕 川村湊：《〈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原载《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1991年四月号。笔者的中文译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7月。

太宰治“创作意图”中“不卑视中国人”的观念在《惜别》的实际创作中得到了贯彻，《惜别》也因此获得了中国人的正面回应。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离家出走、投河自尽，一位名叫黄天霸的中国人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文题就是《惜别——悼太宰治》。文章提及《惜别》，说：“正因为是在战争末期创作的，其中才包含着对于沾染了狂气的统治阶级的不满意的想法。虽然就材料本身而言不能说运用自如，但创作态度谦逊诚实，几乎看不到傲慢自大的日本人的优越感。”[1]

三 “洁”与“忠”的观念

《惜别》是以日中关系为潜在的、背景性的框架，因此，在这部作品中，通过日本人之口表达对中国的态度与通过中国人之口表达对日本的态度在逻辑上是相表里的。不言而喻，作品的主人公青年鲁迅必须承担表达日本的功能——应当注意，这里的青年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宰治的代言人。

鲁迅去仙台留学的1904年9月，日俄战争已经进行了大约半年，他对日本的态度和对日俄战争的态度具有相关性。鲁迅对日俄战争持肯定态度，说：

> 今年二月，日本气势昂扬地向北方的强大国家俄罗斯宣战，日本青年勇赴战场，议会全票通过庞大的战争经费预算，国民忍受着一切牺牲、听到每天号外的铃声就沸腾起来。我觉得这场战争没有问题，日本人能胜。国内这样

[1] 原载1948年6月20日《中华日报》文化专栏，引自《太宰治论集》“作家论篇·别卷”，ゆまに书房1994年出版，原文为日文。此文还提及太宰治另一篇根据《聊斋志异》“黄英”创作的短篇小说《清贫谭》。

充满活力，不会失败。那是我自己的直觉，但与此同时，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自己被非常耻辱的心情压倒。对于这场战争各人也许会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这场战争也是起因于支那的软弱无力。如果支那哪怕是仅仅具备统治自己国家的实力，这次的战争也就不会发生，看上去这简直像是为了保全支那的独立而请日本来作战，这样想来，对于支那来说这难道不确确实实是不体面的战争吗？日本青年在支那国土上勇敢作战、流着宝贵的鲜血，同胞们却隔岸观火似的漠然旁观，其心理我难以理解。

青年鲁迅眼中呈现的日本形象是强健、充满活力的，这种强健、充满活力与中国的无力、漠然构成对比，也成为鲁迅自卑感的主要起因。

在观念的层面上，青年鲁迅眼中的日本形象是以“洁”与“忠”为焦点建立起来的。

《惜别》中的青年鲁迅意气风发地踏上日本国土，立即倾倒于日本“独自的清洁感”。他这样对田中卓讲述自己初到日本时的体验：

我本人在明治三十五年、二十二岁那年二月，平安地从横滨港上岸。日本！这就是日本！想到自己即将能够在这个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甚至去德国的愿望之类都消失净尽。我想，确确实实，那种不可思议的解放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人生中——支那完成重建的日子另当别论——此外恐怕是不能再次体验的。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略〕后来，每当清晨在东京街头散步，看到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头上顶着崭新的毛巾、扎着袖口忙忙碌碌地用掸子掸纸拉门

> 的样子、觉得那沐浴着朝阳、可爱、紧张的姿态才是日本的象征、甚至觉得突然间理解了神国的本质。借助于最初在横滨通往新桥的火车上瞥见的风景我轻易地理解了与其相似的刚健的清洁感。要言之，恰到好处。[1]

这里所谓的“清洁感”是《惜别》的关键词之一，在太宰治笔下具有道德意义。给周树人写匿名信的矢岛之所以能够从忏悔中完成自我拯救，原因之一就是“东北人道德中特有的洁癖性”。而在《〈惜别〉之意图》中，“洁白”也和“独立亲睦”一样，成为太宰治自定的创作态度的两个修饰语之一。

在《惜别》中，鲁迅在褒扬日本人的“清洁感”的同时，也不止一次礼赞儒教。他在与田中卓对话的时候明确指出：“日本人的思想全部被统一在忠的观念。”与“洁”相比，“忠”在《惜别》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发挥着决定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的功能。“幻灯事件”发生之后，本来相信科学救国的鲁迅决定离开仙台，对田中卓说：“看到我的同胞，想法改变了。我马上回国。看了那场面，已经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国民众依然处于那种懒散萎靡的状态啊！友邦日本在举国勇敢作战，〔他们〕却充当其敌国的侦探，那种家伙的想法我不知道，嗯，多半是被金钱收买了吧。比起叛徒，聚在周围麻木地参观的民众们那愚蠢的脸更让我难以忍受。那是现在支那民众的表情。依然是精神问题。对于现在的支那来说重要的不是身体的强健。那些围观的人不是都体格健全吗？这更使我坚信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医学并非紧要。精神革新！国民性改造！”那么，如何进行这种革新和改造？鲁迅接着说：

---

〔1〕 文中的新桥为车站名，当时从港口城市横滨乘火车到东京是在新桥车站下车。

不得不做。既然看到那些同胞的表情，已经不能再左顾右盼。日本的忠义一元论，不也就是这个吗？是的，我终于能够领会那种哲学。回国之后首先为了改革那些民众的精神发起文艺运动。

这样，日本的忠义一元论哲学成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药方，对这种哲学的领会成为鲁迅仙台生活的终结点。

结合"领会忠义一元论"这一终结点来看，太宰治让十岁的日本女童在鲁迅的送别会上出现也成为一种暗示。如前所述，送行会是在田中卓的住处举办的。田中卓租住的是一位中年木工家的房子，而这位木工的兄长正在日俄战争的战场上与俄军作战。鲁迅常来田中处闲谈，因此与房东家熟悉起来。某一次，木工家十岁的女童请鲁迅帮助修改她写给伯父的慰问信，那封赞扬为天皇和大日本帝国英勇拼杀的日本军人的慰问信得到了鲁迅的赞赏并引来鲁迅的叹息。田中认为鲁迅是为信中的"忠义之赤心"而慨叹，鲁迅则由此得出"日本人的思想全部被统一在忠的观念"的结论并与田中展开上述讨论。这样，送别会上十岁女童的出现即具有双重象征性——象征着儒教的"忠义之赤心"，同时象征着日俄战争的胜利。

《惜别》中的"洁"与"忠"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但二者统一于日本人的国民性，并且同样与日俄战争直接相关。《惜别》在写及 1905 年 5 月 27 日日军击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取得空前的海战胜利的时候，重述了鲁迅眼中清晨东京街头的风景。这种重述并非偶然，而是在"独自的清洁感"与日本的胜利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实际上，在构思《惜别》之初，"洁"与"忠"就在太宰治的观念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太宰在《〈惜别〉之意图》中明确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仙台镇，作为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民间旅馆居住下来之后，他逐渐地开始理解了真正的日

本的姿态。正值日俄大战激烈进行之际，接触到仙台人们的爱国炽情，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他也曾数次惊异、感奋。他本是心中燃烧着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的俊才，但与眼前所见的日本的清洁、活泼的姿态相比较，想到自己国家疲惫的老态，心情几近绝望。〔略〕清洁感，这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来自何处？难道不是日本家庭的深处隐藏着那美的根源？——他开始这样思考。或者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没有例外地拥有在他的国家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称作理想也可以）。”当太宰治把“洁净”作为信仰的形容词的时候，“洁”与“忠”一体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青年鲁迅对“洁”与“忠”的礼赞也是太宰治《〈惜别〉之意图》的具体化。

青年鲁迅对“洁”与“忠”的礼赞，本质上是太宰治本人“日本想象”与“东亚想象”的方式，也展现出太宰治发现并重建“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文化构想。藤野先生曾教导田中卓说：“可以认为，中国保存着好的传统，所以革命的气概从那传统的继承者中产生出来。中断的仅仅是形式。家风或者国风，其传统是决不会中断的。应当称作‘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潜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延续。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们东洋人都连接在一起。可以说背负着共同的命运。”当田中卓将“忠”看作来自中国的观念的时候，“忠”便超越了国界，成为“东洋本来之道义”的重要内容。这样，太宰治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了“东洋”。

“洁”与“忠”成为太宰治“日本想象”与“东洋想象”的支柱，体现了太宰本人对于日本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川村凑论及“清洁感”的时候指出：“太宰在这里不仅‘误读’了鲁迅，而且误读了‘日本’自身。被‘清洁感’这种情绪化的词汇所描述的日本显然仅仅是极其表层次的东西。”实际上，太宰治有关“清洁感”的表达即使“误读”了鲁迅，也未必误读了“日本”自身，“清洁感”所描述的日本也决非仅仅是表

层次的东西。

周作人在《惜别》中的出现，意味着太宰治借青年鲁迅之口对儒教的赞美有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周作人在《惜别》中至少出现过三次。鲁迅在松岛与田中卓相识的时候，就对田中说："你很像我的弟弟。"在小说后半部分，鲁迅与田中卓谈论文艺的功能，不仅重复了这句话，并说："他从小文章就写得比我好得多。嗯，现在我想，今后向弟弟请教，不妨兄弟合作，一点一点的进行文艺翻译。"而当鲁迅最后决定结束仙台的留学生活回国的时候，又对田中说："不管怎样，暂且回国，也和弟弟商量，一起发刊文艺杂志。那杂志的名字，今天——就是现在，也完全决定了！"杂志的名字就是《新生》。鲁迅留学仙台的时候周作人尚未去日本，而鲁迅写《藤野先生》的1926年已经与周作人"失和"，《惜别》与周作人完全没有关系。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周作人曾在1940年前后大力宣扬"儒家文化中心论"，并因此与片冈铁兵冲突。如果太宰治是在了解周作人文化主张的前提下"篡改"鲁迅、借鲁迅之口礼赞儒教的，就可以认为他是自觉的将儒教作为中日两国共有的道德基础——亦即"大东亚"的基础。当这种道德通过鲁迅之口被确定为"日本素质－日本精神"的时候，日本对俄罗斯的胜利就是被暗示为"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胜利。

日本人不卑视中国并且为了中国与俄罗斯作战，鲁迅也要用日本的忠义一元论哲学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显然是太宰治构想的"东洋图景"，也是他希望借助《惜别》被译为中文传达给中国读者的基本理念。

四　传记・小说

《惜别》因过多注入了作者的个人因素而成为太宰治的自

画像——这种观点作为战后日本学术界的共识长期存在着。1956年，竹内好在《花鸟风月》中批评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表现出用鲁迅最为厌恶的风花雪月的手法处理鲁迅的倾向，并谈及《惜别》，说："不过，由于风花雪月适合日本人的心性，例如，即使是乍看起来与风花雪月相反的太宰治的《惜别》，我感觉到的也确实是风花雪月。这又是肆意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出来的鲁迅形象——说是作者的自画像更好。例如作品中的鲁迅礼赞儒教之类，即使未曾读过鲁迅留学时代的文章，但仅是晚年的文章，也清楚地写着是想反抗儒教的秩序才去日本留学。尽管如此，却固执而又勉强地对此视而不见。"[1]确如神谷忠孝、藤井省三等学者指出的，被视为日本鲁迅研究第一人的竹内好的这一观点成为日本《惜别》论的原型，给后来的《惜别》研究以很大影响。尾崎秀树在60年代初期发表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与两部作品》中同样认为："太宰治误以为通过描写过去的自己——被政治伤害的青春能够使《惜别》获得丰富的成果。那尽管是起因于他对鲁迅的理解水平低，但实际上是因为在鲁迅这里政治与文学的问题与太宰治那里政治与文学的状况是完全隔绝的"；"《惜别》中的鲁迅是作为太宰治急于描绘自画像、严重变形的鲁迅形象被归纳出来的。其原因之一在于太宰治中国认识的肤浅"。[2]70年代奥野健男沿袭这种观点，认为作品是"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3]到了90年代，川村凑依然认为："《惜别》中的鲁迅终究不外乎太宰治的'自我'。这正与'大东亚'最终不过是'日本'自身的同义语这一历史

[1] 初发表于1956年十月号《新日本文学》，引自《竹内好全集》第二卷，筑摩书房1981年出版。

[2] 文载1961年八月号《文学》。

[3] 《惜别·解说》，新潮社1973年出版。

较之于对儒教的批判，鲁迅对道教的批判更彻底。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在九年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2]太宰治准确地把握了鲁迅的此类道教批判思想，《惜别》中青年鲁迅与田中卓讨论忠孝问题的场面就暗示出太宰治的准确性。青年鲁迅认为"日本人的思想全部被统一在忠的观念"，田中卓反问："忠孝的思想不是从贵国传到日本来的吗?"于是鲁迅展开了他的日中思想比较论，指出中国的"忠"不过是"孝"的接头词，并说：

> 日本人接受了祖先传下来的好的教养。出于本能似的，仅仅选择、摄取了支那思想的健全部分吧。在日本，支那好像是被看作儒教之国，但支那乃道教之国。民众信仰的对象不是孔孟，而是神仙。长生不老的迷信。但是在日本，不老不死的神仙说之类根本无人理睬。

这种描写无疑是基于太宰本人对鲁迅道教批判思想的深入理解。不仅如此，在作为《惜别》"演习之作"的《竹青》中，太宰治同样表现出尊"孔孟之道"而反道教的思想。

太宰治的《竹青》对蒲松龄的《竹青》进行了改写，明显的改动之一是故事的结局。原作中的男主人公鱼容自由地来往于尘世／仙界之间、生／死之间，而在太宰的《竹青》中，鱼

[1] 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引自《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2] 《小杂感》，最初发表于1927年12月27日《语丝》周刊四卷一期，引自《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读，《惜别》提供的礼赞儒教的鲁迅形象揭示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而且，《惜别》中的鲁迅对儒教的礼赞并不是绝对的，相反，他在礼赞儒教的同时也将儒教相对化了——指出"日本人的爱国心过于天真"并且对儒教的"孝"展开批判。与此同时，在对鲁迅"孝道"批判思想的理解中，太宰治准确地把握了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惜别〉之意图》中即有"打算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树人曾经非常喜欢儿童）等出现在小说中"的表达，到了作品中，不仅有前述日本女童的出现，还有鲁迅在松岛座看演出、为舞台上出现的儿童感动得流泪的场面。

太宰治在理解鲁迅方面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在鲁迅与杉田玄白（1733—1817）之间建立了联系。"田中卓"这样回忆青年鲁迅："〔他〕曾多次重复说东洋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科学。说日本的飞跃也是由一群兰医拉开了序幕。如果不早日消化西洋的科学，支那尽管无知地醉心于老大帝国的自赞，也只能渐渐地重复邻近的印度的命运吧。〔略〕支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必须抛弃自我沉醉、首先与西洋的科学和暴力作战。进行此种作战，他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知识精华之外别无他途。听说面对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首先敲响警钟的是被称做兰学的西洋科学。自己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1]这样，清国留学生青年鲁迅被太宰治"杉田玄白化"了。杉田玄白是江户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其《兰学事始》等著作给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福泽谕吉以及明治维新以直接影响。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及留日时期怀有的理想，说："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

〔1〕 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与中国、荷兰之外的国家发生贸易、文化关系。此时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科学、西洋医学分别被称做"兰学"、"兰医"。

过三次以上的自杀体验，因此被称作“自杀专家”。[1]最终死于自杀说明从前的自杀未果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出于生死选择的艰难，“惜别”一词就包含着这种艰难。太宰治的最后一部作品《Good-Bye》（原文是用日语片假名书写）恰恰是处理离别的。小说是应《朝日新闻》的连载要求而作，太宰治在为用作连载预告而写的“作者的话”中说：

> 唐诗选的五言绝句中有一句“人生足别离”，我的一位老同学将此句译为“唯再见乃人生”。确实，相逢时的喜悦瞬间即逝，而别离的哀伤浸透心底，即使说我们平时生活在惜别中也不为过。
>
> 以“Good-Bye”为题，说是现代绅士淑女的别离百态过于夸张，但如果能展现种种别离的情景，将感荣幸。[2]

这段话中出现的“惜别”二字显然被太宰治理解为生活的本质。可惜，《Good-Bye》尚未写完太宰治就对人生说了“Good-Bye”。也许，《惜别》中太宰治个人性的投射首先是从对“惜别”这个词的共感开始的。

还应注意的是，竹内好等人的否定或藤井省三的肯定都是在“真实性”的层面上展开的。他们对于《惜别》的评价尽管不同甚至相反，但在以真实存在的鲁迅为批评标准这一点上遵从着相同的逻辑，并无区别。这样一来“何为鲁迅的真实”这个前提性的问题就必须追问，而一旦“鲁迅的真实”处于游移的、有待确定的状态，《惜别》的“失败”或“成功”也就被

---

〔1〕 武田泰淳在《座谈·太宰治文学谈片》（1956年）中说：“〔他〕曾多次想死，是自杀专家。我认为那作为文学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引自《太宰治论集》第二卷“作家论篇”，ゆまに书房1994年出版。

〔2〕 引自《太宰治全集》第十卷，筑摩书房1977年2月出版。此文在太宰治去世之后和作品一起发表于《朝日评论》第三卷第七号（1948年7月1日发行）。

相对化了。实际上，“青年鲁迅的实像”与“太宰治的自画像”构成了《惜别》中青年鲁迅的两个层面。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惜别》中的鲁迅命名为“太宰鲁迅”——就像日本学界把竹内好所阐释的鲁迅命名为“竹内鲁迅”一样。

“太宰鲁迅”呈现为“鲁迅／太宰”的二重结构，结构的二重性与《惜别》“传记／小说”这种体裁的二重性直接相关，并通过“纪实／虚构”的表现方法具象化。这一点并未被持实证主义批评方法的竹内好、藤井省三等日本学者明确地意识到。本质上他们均把《惜别》这部“传记小说”仅仅作为“传记”来阅读，这种阅读方法本身存在着偏颇。颠覆与虚构（或曰捏造）对于传记来说是不当的，而对于小说来说却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自觉地意识到《惜别》的“小说”成分，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将会发生改变，对太宰治的理解才能摆脱“真实／虚假”的圈套贴近太宰治。正是通过颠覆与虚构，太宰治挣脱了“鲁迅的真实”，将“自我”多侧面地投影在《惜别》之中。换言之，《惜别》中的“太宰自画像”成分是通过“小说”这一手段完成的。

“小说”的虚构成为太宰治传达自己理念的形式。这在情节安排上的典型体现，是对于匿名信事件和幻灯事件的处理方式——太宰治的处理与鲁迅的自述不同。竹内好在《惜别》出版的第二年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太宰治“对鲁迅所受的屈辱共鸣不足”[1]，这显然是因为他对《惜别》进行了简单化的阅读，未能意识到太宰治的动机。实际上，太宰治的处理方法并不意味着他“对鲁迅所受的屈辱共鸣不足”——小说开头已经有对于鲁迅“支那人自卑感”的精彩描写，而是意味着太宰希图用“小说的虚构”抚慰鲁迅心灵的伤口。

---

[1] 《〈藤野先生〉》，初发表于1947年二月号《近代文学》，引自《竹内好全集》第卷，筑摩书房1980年出版。

毋庸讳言，在"传记"与"小说"之间太宰治未能获得彻底的自主性。尊重史实的愿望与改变史实的冲动未能和谐地统一起来。对于试图表达自己理念的太宰治来说，面对鲁迅这个巨大的存在，这种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惜别》的"失败"、艺术上的不足即来自体裁自身的矛盾——"传记"与"小说"的冲突。确如藤井所说，太宰读鲁迅读过了头，所以小说开头鲁迅那冗长的自白才几乎成为《朝花夕拾》中某些文章的翻版。这也是竹内等批评家所批评的"饶舌"的成因。《惜别》中冗长的自白不仅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与生动性，而且与作品本身对鲁迅"日语不自由"的描写相抵触。太宰治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在青年鲁迅的冗长自白之后让"田中卓"作如下说明："在那松岛旅馆，当时二十四岁的留学生周先生对我大致讲述了上面这些事情。当然，并非周先生在那天夜里一个人这样长时间地按照先后顺序讲演清国的现状与自己的身世等等，而是将其稍微喝了点酒之后与我谈到凌晨的各种事情组合起来，又多少补充了我后来得到的知识，像上面这样归纳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惜别》的"失败"或许并不在于"篡改"了鲁迅，而在于"篡改"得不够充分。

"惜别"从藤野先生题写在照片背面的两个字经过38年之后转换为太宰治的一部长篇小说，这种转换是一个历史隐喻也是一个文化隐喻。对于"大东亚之亲和"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抵抗与间接认同的双重关系，"传记"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二者的交织，"自画像"与"他者面影"的重叠——所有这些构成了《惜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与御用文化组织文学报国会和鲁迅这两个巨大的他者的对话中，太宰治借助于大胆的想象和颠覆创造了独特的"鲁迅"——与"竹内鲁迅"不同但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太宰鲁迅"。

在大约五十位小说家提交的写作计划中，被日本内阁情报

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选中的共有六位的小说创作计划，而太宰治的《惜别》得以入选。[1]入选固然与太宰治的知名度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日本官方希望利用鲁迅这个与日本具有特殊关联的中国著名作家为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服务。但在太宰治的写作实践中，“大东亚战争”仅仅是作为“空袭警报”出现的，并且只出现了一次——小说开头处田中老医师开始写“手记”的时候，说：“这些日子东北一带总是响起空袭警报，令人惊恐，但是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我这间朝南的书斋里即使没有火盆儿也温暖如春，我有快乐的预感，写作好像能够顺利进行，不会因为敌人的空袭而受阻。”这位回避“大东亚战争”的老医师在空袭警报声中回述日俄战争、让青年鲁迅提着灯笼参加为庆祝 1905 年元旦日军攻克旅顺而举行的游行，暗示出太宰治对于日俄战争与日中战争之差异的认识。对于认同三民主义、主张“不要欺侮支那人”的太宰治来说，回避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奥野健男在新潮社版《惜别》的“解说”中指出：“《惜别》的著者在那样的时期具有果敢地以总体上是叛逆者的鲁迅为题材的勇气，而且想方设法对鲁迅进行善意的描写，在作品中大胆表达自己的主张、思想、爱好。今天重读，尽管偶尔有时代的奴隶语言出现，但从根本上把握了日中关系之核心。”确实如此。

---

〔1〕关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操作过程与执笔候选人的状况，相马正一《评传／太宰治》（筑摩书房 1985 年 7 月出版）第三部第三章与樱本富雄《日本文学报国会·大东亚战争下的文学家们》（青木书店 1995 年 6 月出版）第五编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

结语 “国民时代”的作家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都是在国家意识强化、民族主义精神高涨的大背景下展开自己的话语行动。在民众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作家不可避免地被“国民化”，于是成其为“国民作家”。“国民”的内在规定性、话语行为主体与这种内在规定性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决定着话语行为的基本内容。

如前所述，平江不肖生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留东外史》于民国初年在东京开始创作。——这一事实在多重意义上均具有“原型”性质。无论是它对在日中国人心态的揭示，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还是通过黄文汉以及武侠故事表现出的尚武精神。尤其是作品表现出的鲜明的反日、侮日态度，不仅是甲午战争之后日中两国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在国民感情层面上的折射，而且显示出中国现代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与日本扩张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情感被同为留日派作家的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孙俍工拥有，并在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的 30 年代被留日者更理性、更具体地表达出来。1936 年初，郁达夫在《雪夜——自传之一章》中说：

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对圈子里夺利争权的皇帝之

> 子孙，若要叫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哪〕一国去住上两三年。印度民族的晓得反英，高丽民族的晓得抗日，就因为他们的祖国，都变成了外国的缘故。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能够坦白到象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1]

如第四章所引，同年年底，周作人在《谈东方文化》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认识，指出：“一盘散沙似的中国民族近来略略养成了一点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这都是受日本之赐。”[2]日本的侵略是现代中国“国家想象”的主要材料，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主要是以日本为指向的。这种精神投射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思想活动以及生活形态之中，除了《留东外史》的创作，另有孙俍工《续一个青年的梦》与包起权《肉弹》的创作，有周作人“儒家文化中心论”的提倡，甚至有平江不肖生的投身抗日、送子参军（空军）、父子两代在空中地面与日本入侵者进行“立体作战”。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个事实悲剧性地象征着近代日本的侵略行为与中国人国家意识觉醒、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之间的

〔1〕 载1936年2月16日《宇宙风》第十一期，引自《郁达夫日记集》，胡从经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 初载1936年12月2日《立报》，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724页。

直接关系。更大的悲剧性在于，该曲的词作者田汉和曲作者聂耳均曾留学日本，而且，聂耳是溺死在东京附近的海里。

日本现代作家在思想状态、情感状态方面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起因于国民身份的差异。他们是作为在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中率先获得成功、并因此展开对外扩张的日本国的国民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樱井忠温创作《肉弹》，佐藤春夫创作《亚细亚之子》并作为“笔部队”成员往中国前线（以及东南亚）采访，武者小路实笃放弃和平主义理想、创作支持战争的《三笑》，片冈铁兵维护“皇国文化观”，所有这些话语行为本身都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工具，因此具有帝国主义文化的性质。

在中日两国进入敌对状态之后，两国国民的民族意识各自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指向。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中日两国文学关系的特质。1938年5月下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作家民族主义精神高扬的结果，同时该协会也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文学的对立物出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趣旨》首先指出抗战开始之后中国文艺阵营与其他文化部门相比显得沉寂，然后说：“反视敌国，则正动员大批无耻文氓，巨量滥制其所谓战争文学，尽其粉饰丑态、麻醉民众的任务。”在此背景下，与日本作家群成为“笔部队”相对应，中国作家的笔也“枪”化了：“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1942年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与30年代日本作家的“笔部队”一脉相承，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文学报国会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二者构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称性结构。

本书展示的是国民意识的对抗在中日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两国文学关系中的具体存在形态。这种对抗发生在现实政治、文化观念、文学表象等不同层面。《留东外史》与《续一个青年

的梦》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直接批判，《亚细亚之子》对日本扩张的美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抨击，是发生在现实政治层面。而围绕“儒家文化中心论”的冲突，则是发生在文化观念的层面。佐藤春夫还对日本的扩张进行文化解读，在文化的层面上赋予日本的扩张以合理性，而郁达夫在抨击佐藤春夫的文章中，也将矛头指向日本文化，斥之为“抄袭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意识在文学叙事层面上的转换——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性别）、语言等文学元素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为国家的隐喻，承担着特殊的叙事功能。在樱井忠温的《肉弹》和包起权的《肉弹》中，军人的身体化为“肉弹”在死亡中获得的意义，是通过这种死亡对于国家（各自的国家）的价值建立起来的。身体所具有的暗示性在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中被发挥到极致。在那里，以中国男性为夫的日本女性的身体被比喻为亚细亚的母体，在混血儿的血液中中国与日本也完成了融合——融合为“亚细亚”。与此不同，在中国作家平江不肖生这里，日本妓女的身体成为反面的隐喻——《留东外史》为了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将日本这个国家“妓化”。郁达夫的《日本的娼妇与文士》虽然是一篇檄文，但其将失去“操守”（政治操守与文化操守）的佐藤春夫等日本文士指为“娼妇”的比喻，与《留东外史》的将日本“妓化”体现出同样的逻辑。不过，如果抛开比喻中的政治因素、仅仅就对于女性的态度而言，不肖生与郁达夫的比喻方式中则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性别歧视，这不同于尊重女性、将女性崇高化的佐藤春夫。语言问题在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这篇作品中，日语和汉语都被作为“国家”的象征物而获得了语言之外的意义——对于郭沫若与佐藤富子所生的混血儿来说，既会说日语又会说汉语与血管里流着两国人的血一样，成为“亚细亚之子”的主要表征。

在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发生过程中，留日派作家显然承担着举足轻重的功能。这种情形的发生与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基本状况有关。1928年，郭沫若在谈及中国新文坛的时候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1]此言不虚。郭沫若本人和周氏兄弟、郁达夫等新文学健将与被视为旧小说作家的平江不肖生均留学日本，并且都是在日本开始文学生涯。不仅如此，中国最早有影响力的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成立于日本，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留东外史》是在日本开始创作，五四时期主要两大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成立于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

留日派作家扮演的角色是双向的。一方面，作为"日本"的叙述者，他们将来自日本的影响转化为文化精神表现在中国新文学中（如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周作人和孙俍工的人类主义精神），并展示日本的风土民情与社会生活形态（如《留东外史》以及本书无暇论及的崔万秋的《新路》等等）。近代以来留日学生的日本认识成为中国人日本认识的主体，以其"日本论"在社会上发生了广泛影响的戴季陶和周作人均为留日者。另一方面，留日者也被置于日本人的目光中、被日本人叙述。郭沫若和郁达夫以及田汉等人成为佐藤春夫《亚细亚之子》、《一旧友》等作品的主人公，鲁迅的仙台留学生活被太宰治创作成长篇小说《惜别》，就是被日本人叙述的结果。正是以双向活动的留日作家群为中介，20世纪初叶以来中日两国文学的广泛交融与"互文"现象大量发生。不仅新村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两国共时性地被倡导，孙俍工续写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创作了《续一个青年的梦》，日本作家或作品甚至作为"角色"出现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在徐祖正20

[1] 《桌子的跳舞》。

年代创作的剧本中剧中人阅读的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在崔万秋写于30年代初的《新路》中，中国女留学生阅读佐藤春夫的小说《骄傲的女人》，并且在旅途中与带着情人的武者小路实笃相遇。

新文学作家中的留日派尽管在现代中日文学交流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功能，但其心灵历程却是悲剧性的。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将他们置于多重矛盾之中，他们直接承担、切身感受着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近代中国的衰落给国民心灵造成的痛苦在他们这里达到极致。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自1896年，这与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相关，中国留日学生从一开始就是怀着弱国子民的心态进入日本的。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为了让同胞们记住日本报纸污蔑中国留学生时使用的“放纵卑劣”四个字，在东京南郊的大森海岸蹈海自杀。此事给国人的心灵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当时在湖南读书的少年平江不肖生（那时的名字还是向恺然），都因为参加要求公葬陈天华的学潮而遭学校开除。留学仙台的青年周树人的那种“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的意识，郁达夫的《沉沦》表现出的病态的自卑感，均为陈天华心态的延续与变形。国民情感层面的歧视和日本的侵略一样，成为中国人“留日反日”现象普遍发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是首要原因。五四之前中国的大规模反日斗争多为留日者发起，本书论及的平江不肖生、郁达夫、郭沫若、孙俍工乃至周作人，都处于这个“留日反日”的谱系之中。

与一般中国人的反日相比，中国留日者的反日具有多重悲剧性。这悲剧性不仅在于日本在本应出现合作者的群体中培养了异己力量、与此同时众多留日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变得灰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对立的出现使中日两国丧失了一条建立共通价值与共通观念的重要途径，进而直接影响到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这种悲剧性集中体现在“东亚”意识的消亡与《一

附录一

亚细亚之子

（“黎明东亚画谱”电影故事）

佐藤春夫/作　董炳月/译

主题歌

你看！东天燃起红霞
风雷激荡亚细亚
云在奔腾，千片，万片
希望，悬挂于光之征矢

月残星影疏
寄生于黑暗中之百鬼
渐渐淡去了身影
亚细亚的长夜，迎来黎明

远方传来，八纮一宇的脚步声
国在黎明处
亚细亚的理想终将实现
无知的西人尚在梦中

百鸟歌天地
人人皆弟兄
王道乐土在
东海红日升

一　过去的事情

汪某出生于江南名城杭州附近钱塘江畔的豪农之家，是大地主的独生子。到了收割庄稼的季节，交租米的佃户们出出进进，家里便热闹得如同过节一般。从上海某中学毕业之后，他便与几位互相欣赏、境遇相似的年轻人商谈，立志成为将来支那建设的栋梁之才，互相鼓励着来日本留学。在船上，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想学的专业。——有的想学法学，有的想学文学，有的想学医学，还有选择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绘画的。汪某选择的是医学，这让朋友们吃了一惊。因为他本是一位富于文学天赋、满腔诗人热情的青年，许多人都认定他会选择文科专业。汪某解释说：自己的天赋也许在文学方面，但是为了拯救中国的未来，医学更重要。本来立志和汪某携手并肩走文学道路的郑某最失望，但最后由于选择了同一地方的高等学校，还是感到满足。汪某和郑某与其他前往东京的人在门司[1]分手，进入鹿儿岛的高等学校。由于脑袋聪明，汪的学业精进，很快就会说日语，而且风度翩翩、聪慧清秀。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大学的时候来到东京，风度翩翩且学资宽裕，再加上受到教授们的信赖等等，很快就成为看护妇们青睐的对象。有人说“支那人”的身份乃白璧之瑕，于是便有人说：如果不是支那

〔1〕 门司为港口，位于日本本州岛和九州岛之间的关门海峡的南侧。——译者注

有“一”中过去的一部分都应当出现在这里。这些断断续续的印象后面还有归纳说明的机会。）屋外是落叶在晚秋的寒风中飞舞的、月亮挂在西天的夜晚。另外有在月光中乘坐汽车来汪家拜访者。是一位穿着黑色外套和西服的支那绅士，年龄与汪相差无几。一会儿，他站到汪家贫寒的门前用司机的手电筒确认汪的门牌，进屋。应客人之声而出、来到玄关[1]处的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汪的长子或次子。他接了客人的名片进去递给父亲，坐着的汪看了之后立即站起身，亲自来到玄关处迎接客人。来客是当年携手并肩来日本留学、其后很长时期成为文友的郑——刚才还回忆起的男人。两个人看到对方，立即——

“久违！”

第一句话是用祖国的语言打招呼，接着客人用流利的日语说：

“来得突然，心里说你可别出门。虽然担心但还是来了。”

“哪里。我外出的时候并不多。”

“我想也是这样。”

“看上去你精神不错。”

“托你的福。最近还可以。”

来客在玄关处坐下来，一边解皮鞋的鞋带儿一边与主人进行上述对话。主人汪从外套上面抚摸着客人的肩，一副无限感慨的神情。汪把客人领进铺着榻榻米的房间。

“安安静静的。住的不错啊。”

“好坏说不上，能遮风挡雨就够了。只是从现在开始冷起来，门和隔扇都关不严，不好过。”

“夫人和孩子怎么样？”

“都是老样子。刚才出去开门的是老二。”

---

〔1〕 日本人把房屋正门的入口处称作“玄关”。——译者注

意料之外的重大问题。尽管如此，由于离开中国已经很久，无法判断事态，这让他感到寂寞。

“鲁迅本来并不是具有社会意识的思想家。说起来，他是企图使支那民众自古以来的生活中原有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生活状况获得新生的肤浅的思想家，绝对没有基于近代意识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由于他身在本国，处于现代支那的浪潮中，所以做着那样大的工作。”

汪抓着长子像训导一样地谈论，心中则自己说给自己听：无论如何，依然是有必要回支那。然后立即抱起最小的孩子玩耍。

* * * * * * * * *

汪的妻子某日接受警官的询问，就不在家的丈夫的近况被问及各种事情，其中多为与日本人的交际、与支那本国的交通等等相关的事情。关于前一年年底来访的郑，查问得最多。二十年来的老朋友、文友这种程度的回答对方并不满足，追问最近的来访是为了什么。她也未弄清郑的真意，如实相告说那是她不巧去当铺、不在家的时候的事，而且丈夫什么都没有说。汪在日本不搞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十年来已经证明了的。大致情形没有可疑之处，现在却有了这种事。该不会有什么间谍的嫌疑吧。荒唐无稽的事情。她想说汪不是那种出卖妻子国家的人，但话到嘴边意识到不必说多余的话，便沉默。这时警官方面随和地说：

“好吧。我们相信你。即使做了支那绅士的夫人，也依然是优秀的日本女性，不认为你是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的人。不过您先生的思想我们不能理解，所以拜托您，请仔细注意他的日常生活。万一有了即使是很小的不能理解的行为，也请向我们通报。互相合作多注意吧。万一出现了错误，结果是您也会失去身为五个孩子之父的丈夫。所以，这方面您如果不慎重考

虑的话，我们会感到为难的。”

警官说了这些谜语一样的话，又询问近来家庭的经济状况等等，所以她立即拿出去当铺时的账单作为证据，又让对方看了空空如也的衣柜。

警官点点头，问：“此外从中国往这里寄钱之类的事情绝对没有吗？”

“应当没有。我不知道。”

* * * * * * * * *

警官来访的两三天之后，从学校回来的次子看到哥哥在父亲的书斋里和父亲谈话。这是少有的。哥哥被弟弟开门时门上悬铃的响声吓了一跳，急忙从父亲的书斋里跑出来。看到是弟弟，说：

“怎么回事？原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妈妈回来了。你啊，爸爸正等着你回来。快，趁妈妈没回来，到父亲那里去。”

弟弟把刚刚脱下来准备擦的旧皮鞋扔下，急忙向父亲的房间跑去。

“爸爸！我回来了。您喊我吗？”

“嗯。你，为什么不和哥哥一起从学校回家？”

“是——今天最后一节课老师停课，我就去图书馆看书。书太有意思了，被书吸引住了，连哥哥回来的时间都忘记了。”

“是这样。好吧，坐在那里。今天本来有事情要让你也和你哥哥一起听，你回来晚了，我着急，已经对你哥哥说了，现在单独对你说。虽然是分开说，但内容完全一样。兄弟俩如果不时时和睦相处可不行。去学校或者放学回家，只要没有今天这样的特殊事情，尽量一起回家为好，安全。”

“明白了。”虽然回答了，但这位高等学校的高材生还是为父亲特意喊他过来进行这种像是教导小学生似的训话稍微感到茫然。

信，但他写这封信却用了一夜。与其说是写文章用了一夜，不如说是为下决心花了一夜功夫吧。他先用支那文写，然后试着翻译成日文，接着又写了划掉，划掉又写，最初有二三十页的东西，但是抄着抄着，原稿上没有划掉的部分也被省略，最后缩短成了两三页。又重读一遍之后，直接装入信封。接着将身边的纸屑、撕碎或揉成一团的信收拾进字纸篓，暂且将封起来的信放进抽屉，最后又一次坐到桌前，用片假名[1]写起短信来："爸爸有急事，到远方去，短时间内不在家中。但并没有死，所以，等你长大的时候一定回到家里来。我回来之前，好好听哥哥和妈妈的话，健康地长大。"写完又涂掉了。接着把给孩子母亲的信重新封在信封里，扔进刚才的抽屉。这样流露出安心的样子，走出房间。走过走道，打开纸隔门。像是卧室。蚊帐中妻子在残灯下读杂志。两个大孩子在别的房间，这个蚊帐中包括四岁的老幺在内的十岁以下的三个孩子横七竖八地熟睡着。妻子像是没有觉察到汪进到蚊帐里来，继续读杂志。汪把孩子逐个看了一遍，最后特别把目光停在甜甜地睡着的最小的孩子的脸上，慢慢地凝视着，拿起孩子的小手试了试脉搏。现在，妻子拿着正在读的杂志的手长长地伸出去，闭上了眼睛。汪凝视着妻子的脸，在妻子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将枕边的电灯关上，抽身出了蚊帐。他又一次来到书斋，把一直穿着的竖条粗格睡衣脱下来，换上挂在墙上衣架上的白底蜡染单和服，穿着那身单和服像白色的影子一样匆匆地出了房间。先是仰望天空做了两三次深呼吸，突然注意到庭院一角开着的白色花朵，走近花朵把脸贴在花朵上嗅着花香，又站到庭院另一处的一个小水池的边上看着水池。在池边，他将不知写着什么的一卷纸烧掉，又把池水浇在上面。（大约两只金鱼在游

---

〔1〕片假名为日语的楷体字母。儿童认识的汉字少，可以通过假名的读音明白意思。——译者注

终于走了，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安。他们去上学。在房间内、院子中走来走去找爸爸的幼儿最后若有所失地在池边喂金鱼。与汪在车中看到的幻影相同。汪的妻子爱子带着幼儿来到院子里，凝视着池边燃烧后的纸留下的灰烬，完整地回想起今天早上丈夫的举动，去打扫丈夫空空如也的房间。次日，大儿子问报童前一天的报纸为何没有投递，明白了父亲确实已经离去。桌前挂着日历。爱子发现了抽屉中丈夫的信，特意不看放在一边。

从幼儿翻日历能够知道汪出逃之后已经过了两三天，其间，汪在上海上岸的情景在爱子的幻想中浮现等等。放学回家的归途，车站与家之间的田间小道上，身穿制服的一高生、汪的长子和次子一边走一边谈论父亲的事情。妈妈可能什么都没发现吧，已经到了该说明的时候了吧，等等。“你去说！”“你说为好。”——互相推让。最后，长子把数日前被父亲喊去以及父亲与他们谈话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在幻想中又一次描绘了在上海上岸的汪的身影，默默地站起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了几天前发现之后放在那里的信，开了封。先浏览给自己的那一封，几乎没有表情地读完，又装回信封。将给孩子的信反复读了好几遍，多少受了感动的样子。喊来两个大儿子，给他们看父亲的遗书。[1]次男把正在玩布娃娃的最小的妹妹抱到妈妈身边，给她看爸爸的信，幼儿天真无邪，一字一句读爸爸的信。

妈妈对两个大儿子讲述父母过去（本稿第一节开头处讲述的内容）的基本情形，让他们听，讲到父亲对民众的爱心，教导他们做配得上那样的父亲的孩子，又讲述母亲过去的不容易，让他们不要辜负了母亲的辛劳，作为父母，促使他们担负

〔1〕 原文如此。——译者注

起对相邻但宿命般关系恶劣的日支两国人的使命。你们，不应自认为支那人，因为你们仅仅是父亲的儿子；而且，你们不应自认为日本人，因为你们仅仅是母亲的儿子。你们是亚细亚之子。是的。在日本出生、在日本成长、接受日本的学校教育的亚细亚之子。将来——说起来也只是不远的将来，你们的使命日益重大。你们的爸爸不满三十岁就已经有了领导支那知识阶级的地位。希望你们在数年之内为完成你们的使命充分活跃！——母亲这样教导孩子们之后，抱着最小的孩子走出门去。初秋的郊外。

* * * * * * * * *

爱子来的地方是警察署。她与几天前和她谈过话的特高科[1]的人交谈着。

我是为了汇报丈夫汪失踪的事来的。两三天前，一早从家里出去就没有回来。本来以为是和平常一样早晨出去散步，结果到了傍晚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回来。以前，去东京的时候，因为工作方面的情形一两天不回来的事情也有过，所以也没有太在意。今天知道了大概十天前和两个大孩子谈话的事情，在桌子的抽屉里发现了这封信。——说着将信拿了出来。警察将她扣留下来审问，同时知道了汪早就在上海上岸的事实，便追问她是否曾经为汪准备路费、行装。弄清了她确实未曾准备，所以调查目标转向平日与汪有过交往的人，向各个方面派遣工作人员调查路费的来源成了当前的问题。

（以上姑且作为上卷）

---

〔1〕“特高科”是特别高等警察科或特种高等警察科的简称。主要负责思想管制的部门。——译者注

三　出逃日本之后的汪

汪出逃之后在战云密布的上海下了船、以郑为首的两三个朋友到码头迎接，他知道通缉令已经取消。次日就急忙去拜访国民政府的要人，政府对他表示欢迎，告诉他已经为他准备了重要的位置。就这样他被作为抗日宣传的工具使用。蒋介石得到了报十年前旧仇的好机会。他利用汪的笔力，让他履行那种必须中伤、诽谤他所爱的妻子的国家的公务。如果不服从这一任务就必须被作为汉奸判处极刑。为他举办的盛大欢迎会。欢迎他的人是支那的精英、人民战线的一派。人民战线是从策略上考虑作为国民党极左和共产党的缓冲派而设置的一派，因此虽然两方面都有热闹的捧场，但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势力的泡沫式的存在。聪明的汪很快就觉察到自己被蒋介石巧妙地复了仇，对于做工作将他带回国的老朋友郑也产生了被欺骗的愤怒。十年前在北伐军阵营中倾慕他的她，现在被郑包养着，成为郑的第二夫人，住在西湖之畔、孤山之麓、林和靖旧居附近。汪访问故乡归途偶然发现，这加深了他对郑的怨恨。在怀念已久的西湖中泛舟，进入里湖的时候，他从一座小巧别致的新房的圆窗中看到了一位美女的侧影，觉得似曾相识，开始注意，后来去寻找知道那是郑的别墅。不久，汪知道这女子是十年前对他山盟海誓的北伐军中的她，目瞪口呆。她成了老朋友的妾，这种事情纵使是日本的娼妇也不做。这样，从此以后的很多日子，他都感到日本女子、特别是被他丢在日本的爱子的真心与深情。每件事，汪都痛感到自己的回国完全归于失败，与此同时，他也感到对郑的不信、对蒋的愤慨已经让他难以忍受，暗自发誓要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

* * * * * * * * *

在此期间，皇军的北支战线稳步前进、取得成功，上海战线也渐渐往有利的方向展开，杭州湾登陆作战成功，等等。在此之前，汪预测上海方面皇军的活动，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杭州附近将会燃起战火，便把祖上传下来的土地卖给了郑。他是觉得守着那片土地麻烦，即使便宜也还是换成钱放着。郑完成了把汪策动回国的使命，从蒋那里得到了比十年前通缉汪时的悬赏金多几倍的钱。他相信现在用那笔钱买下汪的土地体现了对汪的友情，把从蒋那里得到的钱全部给了汪。汪的内心深处流露出会心的微笑。因为他心中有了重大的决定。

* * * * * * * * *

汪渐渐地开始领会当初根本不相信的皇军开发北支的真意。这是基于他通过爱妻对日本人普遍气质的理解。自从俄国的现状使他从长期怀有的俄国式共产主义之梦中醒来之后，汪摆脱了试图依靠意识形态拯救民众的幼稚的知识分子习性，明白了使民众幸福的并非意识形态，只有事实。就是说近期的逆境给了这位诗人现实的洗礼。因为意识到意识形态无可无不可，必须在现实中让民众安然的道理，所以现在能够下定投身于日本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北支开发的决心。郑作为土地费给他的钱可能全部用做这项工作的资金了。北支一带，现在首先在通州附近建设医院吧。在领导当地的知识分子实行自治制方面，他的名气和势力也是具有号召力的吧。日本是一个只要说实话、只要有诚意，昨日之抗日急先锋转向今日之亲日派也给予承认的种族，汪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有了在这里闯出一条血路的决心。

汪断然来到北支，投身到日本的军民中。而且在这里把分别以来的一切写信告诉东京的妻子。相当于诀别信数倍的

最小的孩子说。所以大家都大笑起来。直接地表现了所有人的希望，所以有趣、快乐。那天夜里，爱子梦见汪被蒋介石手下的军人当做汉奸捆绑起来用青龙刀砍头，惊醒过来。她完全赞同丈夫决定经营贫民病院的宏伟计划，期待着早一天作为助产护士进入丈夫的医院，用自己掌握的职业技术帮助丈夫实现其理想。不过，丈夫的信中虽然很少、但还是提到了十年前北伐军中仰慕他的少女的传说。想起这些，在夜中独守空房的她难以入眠。“莫非他是抛弃我和孩子们回国？装作一心奉公、建功立业的男子汉的样子，实际是想和那个年轻女人再会？”且疑且怨女人心。

庭院里樱花已经盛开，樱花之外的树甚至也开满了樱花，在金鱼游动着的池畔被父亲抱着。——做着这样的梦甜甜地睡着的幼儿的脸是初夏黎明时分被父亲神情凝视着的那个儿童的脸。

母亲告诫在父亲走后互相激励、比从前更加努力、经常在桌前坐到深夜的儿子健康第一。

长子与次子互相商量，决定申请去支那语夜校读书。

母亲说本来就常常欠交的学费会因为上夜校更加不足，问是出于怎样的目的突然决定学习支那语，于是孩子们回答说：为了顺利地去北支、为实现父亲的目的增添力量，有必要学习支那语。原来他们是计划兄弟二人向北支引进日本文化，所以提议父亲设立日本语学校。为了在支那研究日本文学，将未为社会所用的青年学生、将在日本进行支那文学研究而成为无用之长物的众门生作为这日本语学校的教师来使用，使相互间的文化研究更加深入，那是不错的吧。——这是青年们富于青春气息的文化开发方案。而且，他们希望能够证明自己拥有初级日语教学的相应资格，为了获得那种资格，才急于学习初级支那语。妈妈赞赏他们的志向，但现在的生活状态是连供他们上夜校的那一点钱都没有，毫无办法。欲答不能的苦心孩子们并

非不懂。曾经商量是否找一找当家庭教师的机会，叹息说即使有那种机会、那样做能挣到钱，但费时间，所以也就无暇用辛苦挣来的钱去读［支那语］夜校了。干脆从一高退学怎么样？母亲训斥说你们还年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着急不行。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为了实现目标应当更加考虑的地方并不少。妈妈也不是没有考虑对策，只是为了将来的空想拿眼前的现实做牺牲最不值得。再好好考虑一下。母亲说。不远处的停车场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母亲侧耳倾听，母亲深情地说：

“啊，我离开故乡已经多少年了？听到这汽笛声想回去看一看啊。带着从中国寄来的信，回去一次，到爷爷跟前去道歉吧。爷爷今年就七十岁了，我该回去见一面。”

这样说着爱子突然归心似箭，并且看到了一缕希望。

“是啊，明天早上也行，我到爷爷那里去。为这些年的不孝向他道歉吧。我和你们的爸爸结婚爷爷生气，不过，如果看了这封信，也许会原谅吧。”

* * * * * * * * *

在东北小城的车站下了火车，小城外面白雪覆盖的村庄中的贫困之家浮现在爱子的眼前。这个车站和贫困之家等等是后来她去走访的地方。她先是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哥哥，恳求哥哥，与哥哥商量是否可以和从前她与汪结婚的时候向她提婚但被她冷漠拒绝的那个人——那人曾经是哥哥的朋友——见面。哥哥不能理解爱子的心情，问为什么现在想见那个人。

“我想爸爸与我断绝关系一定是为了那个人的情面。所以，那位要是能够给我调解、我向父亲道歉，不是最好吗？如果他说现在见我这种人会添更多的麻烦，我也就死心了。”

“是啊。这一点我也弄不明白，只是这不是站在这里谈谈就能解决的。到我家里来谁也不会有什么话说吧。好了，别再说什么今夜去住旅馆，住到我家来。啊，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的他。所有这些被地方的报纸报道，村里的话题进而在县内传开。爱子没有办法，只好让父亲和哥哥领着，挨家挨户向村里的乡邻们道谢、告别。从与老父亲的和解、与村人给孩子们的支持中获得勇气的爱子回到东京，与大儿子等商量是否接受金钱。大儿子、二儿子想不出解决办法，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想来'多收广施'是最好的上策。再说大家也不是施舍、搞所谓的慈善，这体现了北支开发的民意。理应真心感谢、接受。然后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作为谢恩、报答。"

"爸爸如果在的话绝不会接受。"

"那种见解是从常说的中国式的面子中来的，决不是日本式的。"

"嗯，还是大大方方、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才是日本式的，也有风度。"

"道理怎么讲都可以。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大家就会高兴的吧。"爱子解决了问题。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去北支的日子。

到东京车站迎接父亲的日子，长子和次子用流畅的北支口语述说着再会的喜悦和对北支的希望。（最好有适当的对话。这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援助，否则是不可能的。这里省略。）

东京春天的游览项目结束，那幼儿被父亲抱在怀中，汪的一家告别美丽而又令人怀念的日本。还有，晚春的一天在须磨、明石[1]，汪夫妻回忆起二十年前选择这里作为新婚旅行之地，谈论着，等等。从神户上船。（希望濑户内海的风景借助摄影机的努力把日本风景的美广泛地传向海外。）

下车登船，海上顺风，一路平安。一家人经过朝鲜进入支那。（火车沿途支那风光的实景，比起文章的描写电影画面的

[1] 须磨、明石均为地名，在神户往西海滨的铁路线上。——译者注

效果应当更大。希望以此完成使内地人认识支那的使命。）

进入通州的街道。下了车徒步走着。所到之处家家门前飘扬着太阳旗。随风传入耳朵的声音是听惯的，好像是《君之代》。这里有一群驻足静听许久的旅人。这群人中的青年代表大家问行人：

“那歌曲是日本的国歌吧。”

提问是流畅的支那语。

“是的。那是《君之代》，这次是海军进行曲。”

回答是美丽的日本语。

“确实。为什么今天都把日本的国旗拿出来?”

“今天不是日本的海军纪念日吗?”

“喔。已经五月二十七日了。在旅途中连日子都忘记了。”

相视而笑。不言而喻，这群旅人是汪一家，向行人打听的是大儿子。

* * * * * * * * *

简朴但坚固的支那房屋中，一个房间，崭新的医疗器具闪着光，刚才在路上看到的那些人在房间内四处打量着。近处传来木工铁槌的声音等等。

“就在这后边，去看看吧。是日式房子，所以日本的木匠在施工。”

“住房做成日本式的?”

“不，不是住房。是打算用做日本文化教室，所以我想还是日本式房子好。房屋与风土有关系，所以在这里的土地上也许还是中国的房子好。那一点必须考虑，但不管怎样，也不是马上建成，一点一点修改下去的过程中会弄好的吧。风习也罢其他的什么也罢，新东西一旦进入新的地方，一段时间内比在原地更加繁盛。这是定律。看看植物学、细菌学吧。一旦那段时间过去之后，则是真正能够结实地附着在土地上的全新品种

之类的东西能够正常地繁荣、发展下去。日本文化也同样会进入这里的土地，风靡起来。不，现在已经那样。为了日本而高兴，或者为了中国而忧虑，都不恰当。因为这是暂时性的自然现象。在不久的将来，真正适宜于风土、共鸣于人类正义感的事物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发展起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虽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还是从容地让自然的法则——称作'神'也可以——来支配吧。"

"爸爸，我记得什么时候离开东京的家的时候，您说自己是不懂佛也不懂神的人。听了您现在说的这些话，您好像已经是找到神了。"

"是吗？"

父亲这才像神一样笑了。于是——

次子和长子从父亲的左右仰视父亲。年轻的支那女护士走过来说什么。汪点点头走向诊室。两个儿子跟着父亲走进诊室，又说：

"我们去工地看一下。"

"是吗。现在还都是柱子，带着图纸去看更容易明白吧。"

父亲说着递过卷成一卷的纸，对护士说：

"你带他们去工地。"

汪又喊住正要出门的儿子：

"在工地监工的是爸爸的朋友，过去在东京的大学学习工科的人。记住这一点，要有礼貌。"

工地就在旁边的田里。新梁柱已经组合起来，屋顶上装饰着祭神驱邪幡和涂着红漆的高把酒桶。

监工立刻看到了汪的长子，并且打招呼：

"什么时候到的？"

"刚才。"

"您抓紧看一看吧。不好意思。"

"听父亲说受到了您许多关照。"

“哪里哪里。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不称心的地方都指出来。不要客气。喂。师傅！”

监工似乎是要给他介绍木工师傅。师傅一边取下缠在头上的毛巾，一边说：

“是公子吧。”

“不知不觉中，进展很快呀。今天上梁吗？”

“是的。不管怎样，今天是节日，所以想凑在今天……”

“辛苦了。听父亲说好像暂时还没有成型，没想到……”

“你们不在的时候拼命加了把劲儿。”

“谢谢！上梁完全是日本式啊。”

“是的。奠基典礼是关系到土地的事情，所以按照监工的意见使用本地的仪式。但房子是日本式的，所以只是上梁用日本仪式。啊，托您的福，马上开始唱滚木歌，唱得不好。做做样子……”

“师傅老家是哪里？我是广岛人，这次我儿子在这里的土地上……本来是打算给死去的儿子扫墓到这里来打工，没有比让我在这里建日本式的房子更高兴的事了。对于我的儿子这也是很好祭奠啊。”

（应当在这位师傅似乎是欣喜、有趣地滚木歌声中结束。或者，更长一些，在进入通州市附近归纳一下也是一种方案。要言之，在电影剧本的情节方面还不成其为作品，大致的概要暂且这样，希望各位关照。）

——译自《日本评论》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号

附录二

《惜别》之意图

太宰治　作　董炳月　译

打算从明治三十五年[1]，当时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后来的世界文豪鲁迅）心中燃烧着在日本学习医学、以此重建他那到处是病人的祖国这一美好理想，作为清国留学生到达横滨写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现为怎样的景象？在横滨开往新桥的火车上，眺望窗外日本风景时的兴奋，以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单纯、宁静的留学生生活。他曾经怎样爱着、怎样理解东京这座都市？不过，他对于留学生同伴们怀有近似于厌恶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进入连一个清国留学生都没有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此后两年间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为决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受到医专两三个日本学生的恶意对待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作为超额的补偿，他拥有了难得的日本良友与恩师。特别是关于藤野严九郎教授那比大海还深的恩情，他在后来甚至写下《藤野先生》这篇充满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

[1] 明治三十五年即公元1902年。——译者注

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仙台镇，作为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民间旅馆居住下来之后，他逐渐地开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态。正值日俄大战激烈进行之际，接触到仙台人们的爱国挚情，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他也曾数次惊异、感奋。他本是心中燃烧着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的俊才，但与眼前所见的日本的清洁、活泼的姿态相比较，想到自己国家疲惫的老态，心情几近绝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机来自何处？他开始怀着异样的紧张感观察周围日本人的生活。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并非认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真实的想法好像是：应当学习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经在择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进行运用方面取得了成功，无须专程去遥远的西方、在近邻日本学习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吸取西洋文明。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同样怀着那种想法渡海来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经过各种细致观察的结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独自的、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清洁感，这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来自何处？那美的根源难道不是隐藏在日本家庭的深处？——他开始这样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没有例外地拥有在他的国家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称作理想也可以）。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开始往上追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1]这样，他终于得出了明确的

---

[1] 这里所谓的“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指《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前者1890年10月发布，1948年废除。后者由明治天皇于1882年1月向日本军人颁布，成为旧日本军队精神教育的基础。二者都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经典文本。——译者注

结论——中国自身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绝不是因为中国人肉体上的疾病，显然是起因于精神的疾病，即起因于丧失理想这种懒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认为为了改造此种病态精神、将其提高至中国维新之信仰，借助于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是最近的捷径，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1]告别了以恩师藤野先生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亲切的人们，心中燃烧着文艺救国的希望重回东京。作者打算在他器宇轩昂去东京的地方搁笔。如果仅仅叙述梗概，会出现过多讲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着力于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令人怀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树人曾经非常喜爱儿童）出场。作者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故晚年鲁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之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

——译自《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二年（1977）出版

[1] 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是1906年3、4月间。太宰治的表达有误。——译者注

附录三

"仙台神话"的背面

董炳月

一 "仙台神话"的诞生

1926年10月12日，星期二。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鲁迅正在写他的"旧事重提"之九《藤野先生》。笔依然是毛笔，纸是那种竖写的红格稿纸。窗外，海浪在拍打鼓浪屿，涛声隐隐传来。应当是晚上十一点前后，鲁迅在稿纸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于是，一个神话诞生了——这个神话可以命名为"仙台神话"。

"仙台神话"由两个互相关联的故事构成。一个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弃医从文的故事。就像《藤野先生》中所写的，周树人从幻灯片上看到给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捕获并被枪决，身边的日本学生鼓掌喊"万岁"，于是思想发生转变。在写《藤野先生》大约四年前的1922年12月所写的《呐喊·自序》中，鲁迅对这种转变有更具体的说明："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

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另一个是以仙台医专教授藤野严九郎和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为主人公的中日友好故事。藤野先生得知自己关照过的周树人要退学回东京，"有些凄然"，送给周树人一张照片作纪念，并在照片背面写上"惜别"二字。周树人没有忘记藤野先生，十多年后在北京当了教育部的科长、成了"鲁迅"，依然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墙上。由于与大文豪鲁迅的特殊关系，离开仙台医专之后在故乡行医的藤野先生也成为知名人士。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乡福井县成立了"藤野严九郎先生显彰会"。昭和三十九年（1964）4月12日，"惜别之碑"也立在了福井市的足羽山下。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在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普遍怀有的、以"日本鬼子"为主体的"日本形象"上，"藤野先生"无疑是一抹亮丽的玫瑰色。由于《藤野先生》被收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因此只要是读过中学的中国人，大都知道藤野先生。因为自己的学生而名扬全中国的外国人，可能只有藤野先生一位。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以弃医从文故事和日中友好故事为主体的"仙台神话"一直被学者和官方进行"再生产"，其神圣性日益巩固。鲁迅本来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神话"式存在，因此"仙台神话"的再生产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是在这种再生产的过程中，"仙台神话"背后的某些真实似乎被遮蔽了。

二　记忆的误差与选择

鲁迅1902年3月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二十二岁，1909年回

国的时候二十九岁，在日本度过了七年宝贵的青春岁月。然而，和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留日作家相比，鲁迅回忆自己留日生活的文字却是非常之少。除了《呐喊·自序》、《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等文章略有涉及，专写留日生活的似乎只有《藤野先生》一篇。因此，《藤野先生》在研究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和心境方面尤其珍贵。

如果我们意识到鲁迅是在离开仙台十五年之后叙述自己的仙台留学生活、把他的叙述作为“追忆”而不是作为绝对的真实来认识，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藤野先生》虽然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但鲁迅的记忆存在着误差。比如，关于藤野先生修改过的医学笔记，鲁迅写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音。”其实，他 1919 年迁居北京时把那些笔记留在了绍兴。1951 年这些笔记被发现，共六册，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第二，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鲁迅用“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物以稀为贵”之类的叙述把自己塑造成“孤独者”，不少鲁迅研究者因此误以为周树人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时候有一位关系密切的中国同学。

这位同学名叫施霖，与鲁迅同样是来自浙江省（施霖是仁和县人），同样是从东京到仙台留学，并且是和鲁迅同时进入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一校园的第二高等学校。鲁迅到仙台留学的消息是作为短讯发表在 1904 年 9 月 10 日的仙台地方报纸《东北新闻》，而早在 7 月 12 日，施霖来仙台留学的消息就发表在另一家地方报纸《河北新报》上了。根据“仙台鲁迅的记录”调查委员会委员渡边襄的考证，开学后鲁迅和施霖到达仙

台是寄宿在同一家民间旅馆。现存鲁迅仙台时期的照片仅有六张，而两张上面有施霖。一张是鲁迅与施霖两个人的合影，另一张六位“同宿生”的照片上四位是日本学生，另外两位就是鲁迅与施霖。[1]

然而，在鲁迅有关留学生活的所有文字中，这仙台留学时期唯一的中国同学都没有出现。

如果说鲁迅在回忆恩师藤野先生的文章中没有涉及施霖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施霖在现存鲁迅的所有文字中的“缺席”就耐人寻味。回首曾经有过的仙台留学生活的时候，鲁迅选择了藤野先生，而回避了施霖。这选择与回避之间是否隐藏着“仙台神话”的某些秘密呢？

话题要回到鲁迅去仙台的心理动因。

三　周树人何以去仙台？

关于何以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南京读书的时候“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还说“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类似的解释被他的挚友许寿裳和后来的众多研究者们延用，但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逻辑。那些“幼稚的知识”足以构成周树人学习医学的理由，却难以构成他留学仙台的理由。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医学，东京也有医科学校。实际上，关于青年鲁迅去仙台，鲁迅

---

[1] 渡边襄：《鲁迅与仙台》，收入鲁迅诞辰110周年仙台纪念委员会所编《鲁迅与日本》（1991年出版）。《鲁迅仙台医专时期照片考订》，马力译，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留学仙台时的同班同学半泽正二郎早就怀有疑问："至于为什么来仙台，并且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是难以理解的问题。当时，东京先设第一高等学校，而后仙台才设立第二高等学校；陆军师团，东京是第一师团，仙台是第二师团。"[1]半泽所谓的"第二高等学校"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其实是同一所学校，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第二高等学校医学部明治三十四年（1901）4月升格而成的。在现存的照片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牌子与第二高等学校的牌子也是同时挂在校门的两侧。

能够解答半泽正二郎的疑问的，是鲁迅去仙台之前在宏文学院留学时的同学沈瓞民的回忆。沈在1961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后来鲁迅决定学医，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王立才告诉鲁迅，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中国留学生，鲁迅便决定去仙台。"[2]1906年被鲁迅带往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由此可见：去仙台留学对于青年鲁迅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学习医学，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群体。而后者似乎更重要。

《藤野先生》一文的叙述逻辑也清晰地展示了鲁迅对清国留学生的不满与其离开东京去仙台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的第一节是写樱花烂漫的时节"清国留学生"速成班的学生们到上野公园去看樱花："头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

〔1〕《鲁迅与藤野先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收录。
〔2〕《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

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种二十多年后的回忆性描写中依然包含着讽刺与厌恶。第二节写留学生们在中国留学生会馆里学跳舞，“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于是，文章第三节就只有一句话：“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第四节的开头便是：“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事实上，在鲁迅有关留学生活的文字中，留学生的形象总是负面的。除了这里的“头”（发型）与“脚”（跳舞），鲁迅在写于1926年1月3日的杂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华盖集续编》收录）一文中还写及留日学生的“胃”。他是这样写的：“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这不妨看作《藤野先生》中描画的“清国留学生形象”的补充。对此类清国留学生的排斥，构成了鲁迅离开东京的心理动因。

关于当年离开家乡绍兴到南京读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琐记》（《朝花夕拾》收录）一文中他还强调对S城（绍兴）人的认识与他“逃异地”之间的关系，说：“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那么，这次因为看透了某些清国留学生的品性，不愿与之为伍而离开东京去仙台，依然具有“走异路，逃异地”的意义。

四　施霖意味着什么？

既然青年鲁迅去仙台留学是为了逃避清国留学生，那么施

霖的出现首先意味着鲁迅逃避的失败。也许，鲁迅在仙台第一次遇到施霖的时候很失望。——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结合“露题”风波来看，施霖确实是在证明与青年鲁迅的追求相反的东西。

鲁迅第一学期（当时仙台医专是三学期制）期末考试的成绩仅仅属于中等，便受到日本同学的怀疑，甚至有人检查藤野先生给他修改过的笔记。二十年后提起这件事鲁迅的感叹依然是：“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那么，在第二高等学校第二部工科就读的施霖成绩怎样呢？同样是根据渡边襄的考证，施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满分，英语、代数、几何、图画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在鲁迅离开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从仙台二高的学生名册上消失了。就是说：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证明着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着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

鲁迅说自己弃医从文是因为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不幸的是，心智与体格的这种关系恰恰也适应于施霖。体操得满分说明施霖体格健全、茁壮，而体操之外的科目均不及格又说明了他的“愚弱”。在仙台医专校园里那些对中国人怀有偏见的日本学生的眼中，施霖事实上成了愚弱但体格健全的“示众的材料”。——也许使鲁迅得出上述结论的并非仅仅是幻灯片上的中国人？

因为施霖是鲁迅不愉快的记忆，所以鲁迅努力将他遗忘。——这种结论难以证明却符合逻辑。而且，正是在对日本学生的不满与对同胞的失望这二重阴郁的心理背景下，藤野先

生才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五　两个“藤野先生”

《故乡》中的迅哥儿对闰土的崇拜偶像不以为然，但对于鲁迅来说，藤野先生却几乎是“偶像”式的存在。背面写着“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长期挂在他北京寓所的东墙上，成为他精神和良心的原动力。

关于与清国留学生周树人的关系，“仙台神话”的另一位主角藤野先生晚年也有回忆。昭和十三年（1938）初，即鲁迅逝世不到一年半的时候，一位名叫坪田利雄的人采访了藤野先生，将藤野先生的话记录下来，用《谨忆周树人君》的题目发表在当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关于修改笔记藤野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入仙台的学校确是在明治三十三年的岁末。周树人先生是在这以后两三年，作为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入学的。因为是留学生，所以免除入学考试。周先生的身材并不高，圆脸，样子很聪明，当时看来身体就不太好。我担任人体解剖学。在教室里，他很认真地用毛笔记着笔记。但是，他入学之后，日语的听说能力还不太好，理解上有困难，学习比较吃力。因此，我在课后留下来，给周先生看看笔记，把他听错记误的地方订正过来。”关于照片藤野先生已经没有清晰的记忆，他说：“他曾经到我的家里来告别，最后的会面在什么时候已经忘记了。听说我的照片他生前一直挂在屋里。这使我很高兴。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怎样送给他的，记不起来了。〔略〕也许是我的妻子拿给他的。”关于为何善待鲁迅，藤野先生这样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坂野先生教过我汉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来的。他养成了我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国的先

贤，也尊敬这些先贤的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周先生对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感激的缘故吧。因此，周先生在他的小说里或跟朋友的谈话中，都把我称作恩师。我想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1]

显然，藤野先生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尊重和一位教授的责任感，关心班里唯一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在他退学的时候赠送照片作为纪念。对于藤野先生来说，这只是一般性的事实，并且已经成为过去，而鲁迅从中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一直无法忘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其实这落差早已有人意识到。1964 年，彭柏山在一篇谈论《藤野先生》的短文中说：“作者通过‘我’对这位藤野先生的直接感受，把这个人推到崇高的地位。作者主观的意图，和客观存在的藤野先生，浑然融成一体，就出现了一种崇高的‘意境’。”[2]换言之，鲁迅是在把一般性的事实神圣化。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鲁迅“感觉的真实”，因为价值具有相对性。仙台时期的鲁迅是一位异乡的孤独者，在他当时的心理背景下，藤野先生的一般性关怀具有了“神圣的意义”。1974 年，在纪念鲁迅仙台留学 70 周年的讲演会上，曾经与鲁迅密切交往的增田涉谈及“漏题”事件，指出仙台曾经给了鲁迅“屈辱感”[3]（其实这“屈辱感”不仅仅来自日本学生）。正是这屈辱感赋予并且放大了藤野先生之关怀的意义。实际上，鲁迅 1902 年到日本留学之后一直在品尝弱国子民的屈辱感——比如研究者们早已论及的辫子、小脚、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事件给鲁迅的刺激。再结合少年时期家境败落、为父亲抓药看冷脸、寄居亲戚家中被称做乞丐等事实来看，青年鲁迅的心灵

[1] 此文的中文翻译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2] 引自《鲁迅研究资料》第 12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3] 《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中文翻译收入前引《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上存在着“创伤性记忆群”。惟其如此，藤野先生的关怀才使他难以忘却。

还应当注意的是，当青年鲁迅品味那种弱国子民的屈辱感的时候，藤野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同类”。在《藤野先生》的文本中，藤野先生出场的时候不仅衣着寒酸，而且地方口音很重，因此受到留级生们的嘲笑。这嘲笑将藤野先生置于留级生们的对立面，虽然他们同为日本人。而鲁迅作为来自弱国、操着不自由的日语的留学生，很可能从这样一位老师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并因此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这应当是一种和国籍无关的“弱者的共感”。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1〕中认为藤野先生与青年鲁迅之间浮现了“超越国籍的‘真的人’的关系”，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

藤野先生令鲁迅如此感念，但从 1906 年离开仙台到 1936 年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年间他没有与藤野先生取得联系。尽管离开仙台之后他还在东京生活了三年，他去世之后日本人很快找到了藤野先生也说明对于与日本人交往密切的鲁迅来说寻找藤野先生并不困难。比起郭沫若与其恩师小野寺直助之间的信赖关系，鲁迅与藤野先生的“绝缘”耐人寻味。郭沫若不仅长期与留学时期的恩师保持联系，甚至个人隐私都向恩师袒露。1933 年初，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嫖妓染上性病并传染了他忠贞、贤慧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治疗不见效，便写信向当医学教授的恩师求助。〔2〕而藤野先生只存在于鲁迅的记忆中。这种“绝缘”可以用鲁迅的愧疚来解释——中途退学、弃医从文辜负了老师的期待，笔记问题给老师添了麻烦，而且在各考试科目中恰恰是藤野先生担任的解剖学没考及格（59.3 分）。但更主要

〔1〕 中译本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李冬木译。
〔2〕 参阅龚济民、方仁念著《郭沫若传》第七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的原因也许在于：鲁迅意识到了记忆的虚幻但试图保留一个虽然虚幻却美好的记忆。换言之，他意识到了记忆中的藤野先生与生活在人间的藤野先生二者之间的距离，因此通过“绝缘”来保持前者的完整性。1927 年 5 月将十篇“旧事重提”结集为《朝花夕拾》出版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小引”。他在“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在 1933 年所写的《我的种痘》（《集外集拾遗补编》收录）一文中，鲁迅重复了同样的意思。看来记忆不仅在哄骗着鲁迅，鲁迅也希望被记忆所哄骗。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同时鲁迅也是一个平凡的、脆弱的人。他终于在离开仙台整整三十年之后，带着记忆中的藤野先生离开人世。真实不是记忆的唯一理由，变形的记忆是“理性的梦”，因其与幻想相伴往往更宝贵。在变形的记忆与有意识的遗忘之间，鲁迅孤独着并且寂寞着。

六 “留日”之于鲁迅

青年鲁迅怀着逃避中国人的愿望从东京到了仙台，但施霖的存在、藤野先生有关中国裹脚女子脚骨的询问以及幻灯片上（或电影中）出现的被杀头或者看杀头的中国人，使他意识到逃避的不可能。这样看来，青年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不仅具有弃医从文的意义，而且具有从“逃避中国人”转向“改造中国

人"的意义。其实，日本的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和丸山升两位先生早就怀疑鲁迅所谓在仙台看了幻灯片决定弃医从文这一表达的真实性。[1]因为在去仙台之前鲁迅就已经考虑国民性改造问题（去仙台这一行动本身是否定国民性的消极形式），并且了解文艺对人的精神作用。

鲁迅被称作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与此同时，一些日本学者又将他"亚洲化"（东洋化）。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去世，日本现代知名作家佐藤春夫当夜得到消息写了纪念文章《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把鲁迅称作"东洋的文学者"、"纯粹的东洋人"。[2]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2002年4月出版的《鲁迅事典》（三省堂）中，也是把鲁迅看作"东亚的文化英雄"。这种"亚洲化"倾向的合理性在于：日本在"鲁迅发生史"上的作用太大了。不过，因为鲁迅太伟大、留学日本对他的成长作用甚大，人们反而有可能忽视他作为普通留学生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

本文开头处对《藤野先生》一文诞生"场景"的还原是根据该文后面标明的写作日期、《朝花夕拾》"小引"、《两地书》以及鲁迅日记。"场景还原"是"文本"解读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果对留日时期的鲁迅进行"场景还原"，应当得到这样的表达：二十一岁的周树人脑后垂着一根辫子前往东京留学，他心中有少年时代家境败落造成的创伤，到日本之后又添上弱国子民的屈辱。而且，他有正常男性都有的青春期的躁动与苦闷。擅自从仙台医专中途退学（退学申请是别人代补的）回到东京之后，他把学籍挂在德语专修学校、靠官费维持生活，文学活动虽然只是业余活动但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

〔1〕 竹内好《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12月版；丸山升《鲁迅与其时代》，收入鲁迅诞辰110周年仙台纪念委员会所编《鲁迅与日本》（1991年出版）。

〔2〕 中文翻译收入前引《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七年的留日生活中玫瑰色的记忆似乎只有“藤野先生”，可见鲁迅的留日生活即使不是不堪回首的至少也是“懒于回首”的。鲁迅不像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人那样较多谈论自己的留日生活，留日生活的压抑与孤独可能是主要原因。

2002年7月6至8日草就，14日改定。于北京西郊花园村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二〇〇二年十月号）

后　记

到了写“后记”的时候，却并不感到轻松。书稿曾经修改五遍以上，仍然意犹未尽。这使我明确地意识到——学无止境，思无止境，因此对文稿的修改也没有止境。既然如此，还是暂且画个句号，让它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出版，进入学术流通领域，与学界同行展开对话。

本书的论述始自《留东外史》，这对于我来说具有某种象征性。我开始研究中日现代文学关系正是从“留东”开始的。1994 年 2 月第一次走出国门，进入高度现代化的东京，面对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眼花缭乱，开始品味“文化冲击”的苦恼。苦恼之中记起《留东外史》，想了解早期留日中国人的生活形态与心理状态，于是从神保町书店街的东方书店买来《留东外史》阅读。可惜只买到了第一册。第一次在藤井省三先生的研究班上做报告，谈的就是《留东外史》。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中，我的注意力渐渐集中到与《留东外史》类似的《一个青年的梦》、《亚细亚之子》、《惜别》等具有跨国性的文学作品，集中到“反动老作家”纠纷之类具有跨国性的文学事件，于是有了这本书的基本构思，并开始相关资料的搜集。本书完稿是在 2004 年 6 月，就是说，从 1994 年到 2004 年，资料搜集和写作断断续续花了十年。所谓“断断续续”，

其实也是“断”的时候多“续”的时候少。因为十年间经历了博士论文写作、归国就职、第二次出国、主编东京《留学生新闻》、第二次回国等许多人生大事，耗费了大量心力与时间。现在书稿即将付梓，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仅就与本书的关系而言，有许多人要感谢。感谢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我来说，本书是留学日本、知识结构改变的产物。而给我争取到这种机会的，是藤井省三先生。在青春逝去之后的“而立”和“不惑”之间有一个改变知识结构、改变价值观的机会，尽管伴随着许多烦恼和痛苦，但毕竟是幸运的。感谢北大的老同学吴敏。她在1996年夏天从不肖生的故乡长沙购买了岳麓书店出版的两本厚厚的《留东外史》寄往东京，使我能够顺利地进行阅读和相关研究。当时我居住在东京世田谷区的祖师谷留学生会馆里，生活枯燥，因此，阅读《留东外史》不仅是一种学习和研究，生活和心态也因之得以调整。感谢芦田肇、林少阳、刘雪雁诸友，他们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给予了无私的协助。感谢钱理群、严安生、王中忱三位先生，他们就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且热情地将书稿推荐给“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感谢三联书店的曾诚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本研究课题作为文学研究所2002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立项，并获得经费资助，这使我能够从容地参加相关学术会议，从容地购买图书、墨盒、打印纸之类。这里要向文学所的前辈学者、领导和科研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文学研究所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我看来也是国内最适合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有工资，有科研经费，一周只上一次班，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种待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来说近于“梦想”。写到这里我还要感谢樊骏、严家炎、钱理群、李葆炎、杨义、包明德、周发祥、刘纳各位老师，他们在我进入文学研究所的过程

中给予了无私而又高尚的帮助。1998 年底我结束留日生活、怀着中国人的自尊心回到北京，并且怀着与年龄不相称的雄心决定潜心学术研究，但是，国内社会环境与学术界的巨大变化使我再一次受到冲击。是他们使我重新树立起对知识分子良知和理性的信心，并且使我变得宽容、从容。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江河滔滔，红尘滚滚。相形之下，文学研究仅仅是一种寂寞的职业。非"经国之大业"，亦非"不朽之圣事"。作为一种职业，言权力不如从政，言金钱不如经商。既然如此，其终极价值何在？我想，或许在于"知"与"解"的快乐吧。因此，思想是重要的，知识和趣味同样重要，"自我"也同样重要。通过文学研究与历史上的人物、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遇，并且与学术界的同行相遇，这是一种生命的价值。此种学术态度，已经体现在本书的写作中。

董炳月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日记于寒蝉书房

主要参考文献

（只列图书、杂志。以书名、杂志名首字汉语拼音为序）

巴金文集（一至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至1962年，北京
白桦（日文杂志） 1910年至1923年，东京
北京大学日刊 1917年11月16日至1932年9月10日，北京
北京苦住庵记（日文） 木山英雄著，筑摩书房1978年，东京
比较文学 〔法〕马·法·基亚著，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
陈独秀书信集 新华出版社1987年，北京
陈望道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上海
冲击期化石 张资平著，创造社出版部1922年，上海
创造社作家研究 朱寿桐、武继平主编，中国书店1999年，福冈
从小说看到的支那民族性（日文） 〔日〕安冈秀夫著，群芳阁1926年，东京
东方（日文杂志） 第46期至第206期（1985年1月至1998年4月），东京
东京外语支那语部——在交流与侵略的夹缝中（日文） 藤井省三著，朝日新闻社1992年，东京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长春
东洋人的悲哀（日文） 刘岸伟著，河出书房新社1991年，东京
东瀛文撷 靳丛林编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长春
冯玉祥自传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北京

福田英子——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日文） 村田静子著，岩波书店1959年，东京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周蕾著，麦田出版1995年，台北
改造（日文杂志） 1943年4月至7月，东京
古今 第1至第50期（1942年4月至1944年7月），北平
郭沫若归国秘记 殷尘著，言行出版社1945年，出版地不详
郭沫若年谱（上、中、下） 龚继民、方仁念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天津
沫若文集（八卷本） 人民文学出版1958年，北京
郭沫若研究论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成都
郭沫若传 龚继民、方仁念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北京
国文学（日文杂志，关西大学国文学会主编） 第1期至第50期（1950年5月至1974年6月），大阪
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日文杂志，学灯社出版） 第1卷第1期（1956年4月）至第41卷第8期（1996年7月），东京
海的渴慕者 孙俍工著，民智书局1924年，上海
河南 第1至第9期（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东京
黄郛传 张学继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北京
回望周作人（八卷本） 孙郁、黄乔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开封
疾病的隐喻 〔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上海
教育时报 第1至第8期（1941年7月至1942年8月），北平
近代中日文学关系交流史稿 王晓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长沙
抗战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 第1至第3期（1938年5月至1939年3月）
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兰州
两个汉奸（日文） 志智嘉九郎著，私人印刷1988年，东京
两条血痕（日本短篇小说集） 周作人译，开明书店1927年，上海
留日学生的辛亥革命（日文） 小岛淑男著，青木书店1989年，东京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尚小明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南昌
鲁迅全集（十六卷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

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研究动态） 1987年1月号至2005年3月号，北京
鲁迅译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
鲁迅周作人比较论 李景彬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天津
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 张泉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北京
马铃薯（日文杂志） 第1至48期（1943年8月至1945年4月），东京
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 王晓元编撰，作家出版社2004年，北京
民国人物传 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台北
民国文坛探隐 陈福康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上海
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 范伯群著，南京出版社1994年，南京
明治、大正的新词、流行语（日文） 槌田满文著，角川书店1983年，东京
史料叙述·明治东京100话（日文） 日本风俗史学会编辑，冲羽根社1996年，东京
沫若文集（一至十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至1963年，北京
评传／太宰治（日文） 相马正一著，筑摩书房1985年，东京
劝学篇 张之洞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郑州
人寻找自己 〔美〕罗洛·梅著，冯川、陈刚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贵阳
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 刘立善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沈阳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 〔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长春
日本近代史 万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
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孟庆枢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长春
日本留学精神史（日文） 严安生著，岩波书店1991年，东京
日本人论（日文） 〔日〕三宅雪岭、芳贺矢一著，生松敬三编，富山房1977年，东京
日本文学报国会——大东亚战争中的文学家们（日文） 樱本富雄著，青木书店1995年，东京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北京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李欧梵著，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生存着的武者小路实笃（日文） 金子洋文著，播种社1922年，东京

史料叙述·江户生活122话（日文） 日本风俗史学会编辑，冲羽根社1994年，东京
太宰治全集（日文，十二卷本） 筑摩书房1975至1977年，东京
太宰治研究（日文，两卷本） 桂英澄编，筑摩书房1978年，东京
太宰治——制度·自由·悲剧（日文） 浦田义和著，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年，东京
天义 第1至第9期（1907年），东京
田汉在日本 小谷一郎、刘平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
汪精卫生平纪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
文坛史料 杨一鸣编，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1944年，新京（长春）
文学报国（日文杂志） 第1至48期（1943年8月至1945年4月），东京
文学理论 〔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
文学评论 1978年第1期至2005年第3期，北京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陈国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
“文”与日本的现代性 林少阳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北京
五四时期的社团（1—4卷） 三联书店1979年，北京
五四运动史 彭明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
武者小路实笃全集（日文，十八卷本） 小学馆1987至1991年，东京
武者小路实笃九十年——年谱式传略（日文） 渡边贯二编，新村1995年，东京
武者小路实笃·其人与其作品的解说（日文） 中川孝著，皆美社1995年，东京
武者小路实笃论——《新村》之前（日文） 大津山国夫著，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东京
武者小路实笃——日本的超越主义者 米山祯一著，大新书局1987年，台北
闲话周作人 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杭州
现代日本小说集 鲁迅、周作人合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上海
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日文） 伊藤虎丸等编，汲古书院1986年，东京
想象的共同体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上海

想象中国的方法　王德威著，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小说月报（上海）　1921年1月号至1924年12月号
新村（日文杂志）　1918年7月号至1924年12月号
新潮　第1卷第1期至第3卷第2期（1919年1月至1922年3月）
新青年　第1卷第1期（1917年3月号）至1926年7月号
性政治　〔美〕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南京
燕京文学（日文杂志）　第1至第7期、第17至第18期（1939年3月至1944年9月），北京
野草（日文杂志）　第1期至第56期（1970年9月至1995年8月），大阪
异乡的昭和文学（日文）　川村湊著，岩波书店1990年，东京
语丝　第1卷第1期至第5卷第52期（1924年11月17日至1930年3月10日），北京
郁达夫：悲剧时代的作家（日文）　铃木正夫著，研文出版1994年，东京
郁达夫日记集　胡从经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西安
郁达夫文集（十卷本）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至1985年，广州·香港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下卷）　魏绍昌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上海
越界与想象　王中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昭和世相史（日文）　〔日〕原田胜正编，小学馆1989年，东京
知堂书信　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5年，北京
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　许寿裳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石家庄
中国的叛徒与隐士　倪墨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上海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张哲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
中国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日文）　阿部洋著，福村出版1990年，东京
中国留学生史谈（日文）　实藤惠秀著，东京·第一书房1981年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日文）　大里浩秋、孙安石编，御茶之水书房2002年，东京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北京

中国人气质　〔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兰州
中国无政府主义史　徐善广、柳剑平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武汉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论　郭延礼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武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季刊）1987年第1期至2004年第4期，北京
中日文化月刊　第1卷第1期至第3卷第10期（1941年至1943年），南京
中日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张福贵、靳丛林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长春
众说郁达夫　蒋增福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杭州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舒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
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　孙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北京
周作人论　陶明志编，北新书局1934年，北京
周作人评说八十年　程光炜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北京
周作人日记（上、中、下）大象出版社1996年，郑州
周作人文类编（十卷）钟叔河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长沙
周作人年谱　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天津
周作人先生的事情（日文）方纪生编，光风馆1944年，东京
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天津
周作人与日本现代文学（日文）于耀明著，翰林书房2001年，东京
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　张挺、江小蕙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成都
周作人传　钱理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北京
竹内好全集（日文，第一至第十七卷）筑摩书房1980至1982年，东京
主体弥散的空间　孙歌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南昌
佐藤春夫全集（日文，十二卷本）讲谈社1966—1970，东京
作品论／太宰治（日文）东乡克美、渡部芳纪编，双文出版1974年，东京
作家之亚细亚体验·近代日本文学的底色（日文）芦谷信和等编，世界思想社1992年，京都
作家之世界体验·近代日本文学的憧憬与探索（日文）芦谷信和等编，世界思想社1994年，京都

人名索引

（本索引中之人名为出现于正文中者。注释中之人名不列。）

文献索引

（以文章篇名、书名、杂志名首字汉语拼音为序）

出版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使中国在21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

繁盛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七年五月